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制作

不同的世界 | 不同的梦想

日常生活批判系列



生命的尊严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

第二版

[美]菲利普·布儒瓦 (Philippe Bourgois) 著 焦小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 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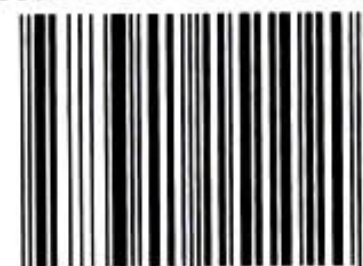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网址 www.cambridge.org

上架建议: 社会学·人类学

ISBN 978-7-301-15102-0



9 787301 151020 >

定价: 30.00元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不同的世界 | 不同的梦想

日常生活批判系列

生命的尊严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the Barrio
透析 | 克买卖

第二版

[美]菲利普·布儒瓦 (Philippe Bourgois) 著 焦小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295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第二版)/(美)菲利普·布儒瓦(Philippe Bourgois)著；焦小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

(培文书系·日常生活批判)

ISBN 978-7-301-15102-0

I. 生… II. ①布… ②焦… III. 尊严—研究 IV.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0764号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Second edition, EISBN: 978-0-521-01711-4, by Philippe Bourgois,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书 名：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美]菲利普·布儒瓦 著 焦小婷 译

责任编辑：徐文宁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102-0/C·052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0.25印张 450千字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2003 年第二版前言

从 1995 年秋本书第一版发行到现在的七年里，在哈莱姆东区的街道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四个深刻影响本书中的毒贩及其家庭生活的变化。第一，美国经济进入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增长时期。第二，纽约市，尤其是哈莱姆东区的墨西哥新移民数量明显增多。第三，随着反毒战争的逐步升级，政府颁布实施了针对穷人及社会边缘者的半官方的量罪和监禁政策。第四，市中心贫民区的年轻人对毒品兴趣发生转移，大麻开始盛行，快克和海洛因在拉美人和非裔美国人（以下简称黑人——译注）中失宠。

2002 年，在我所住的街区，快克、可卡因和海洛因交易仍然存在，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偷偷叫卖，但在整个哈莱姆东区，还是很容易就能买到麻醉类毒品的，只不过多数交易都避开了警察视线，撤回室内进行。在街角竞相喊着毒品品牌、流动叫卖的毒贩少多了。更重要的是，那些从小就从父辈身上看到毒品危害的年轻的拉美人和黑人，对海洛因和快克继续持漠视态度。纽约城戒掉快克瘾的人甚至摇身一变，成了自传文学的作家 (Stringer, 1998; S. and Bolnick, 2000)。然而在美国各市中心贫民区，人们依然能够看到从前那些顽固的瘾君子。尽管由政府资助、以对话形式所做的毒品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值得怀疑，但始于 1994 年的全国性年度家庭滥用毒品调查结果表明，90 年代“经常吸快克”的人数并未明显降低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00)。但医院的急诊室和拘留所的资料却戏剧性地显示出，90 年代末到 2000 年对男性血样的可卡因检测呈阳性的人数降低了 (CESAR FAX, 2001)。

在很多大城市，快克主要隐匿在黑人居住的最贫困的社区，其交易点往往位于或靠近公建住宅楼区的空闲地段和废弃的楼房里。在纽约市，波多黎各人对快克的兴趣尽管比起以前有所收敛，但仍然是消费的主流。

与快克相反，海洛因在很多城市的消费量从 90 年代后期到 2000 年则有所提高。

美国大部分地区海洛因纯度增高而价格降低的事实，让国人对反毒战争的前景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海洛因主要在贫民区之外不愿吸快克的白人青年中流行，纽约市中心贫民区年轻的拉美人和黑人对海洛因，特别是皮下注射的海洛因兴味索然。2001年在哈莱姆东区的快克和海洛因交易点，前来买毒品的人群出现了高龄化现象，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或五十来岁。

总之，2002年海洛因和快克继续以上亿美元的交易额和其特有的致命性，危害着市中心贫民区的家庭，只不过哈莱姆东区年轻的市民更多的只是倒卖，而不消费。真正吸快克和海洛因的拉美人和黑人，一般都不会向其朋友吐露实情，因而对于其毒品兴趣大转移的原因，我们无从了解。不过在21世纪伊始，我们很庆幸，12多年来，参与街道文化的他们一直对大麻和麦芽酒情有独钟（Golab and Johnson, 1999）。

比毒品兴趣移转和政客们反毒立场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持续发展的美国经济带来了90年代后期前所未有的低失业率。让我颇感吃惊的是，至少在2001年到2002年经济暴跌之前，本书中的一些毒贩及其家人从经济的持续飞速发展中受益匪浅。他们当中约有一半人在2001—2002年经济下滑前，都曾设法介入了合法、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我将会在本版的后记中对此做一详尽注解，这里只想概要地提供一份2001—2002年经济衰颓期的情势：一名毒贩当了有工会会员资格的看门人，一位当了家庭保姆，另一位是水暖工的助手。其他几个人中，三个在一个未注册的包工头手下当建筑工人；一位是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出纳员，他的两个姐姐一位是护士助理，另一位是秘书；一位毒贩的三个性伙伴中，一个是银行出纳，一个是保安，另一个在推销雅芳产品。毒贩的儿子们，一个是快餐店的收银员，另一个卖毒品，另外两个分别因卖毒和抢劫被监禁。有三四个毒贩的孩子在卖毒，但大都不卖快克和海洛因，只卖大麻。还有三名毒贩被判了长期监禁仍在监狱里服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很有可能以低廉的工资受雇于发展势头旺盛的监狱制造行业。

简而言之，随着9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雇主和工会把越来越多边缘化的波多黎各人和黑人整合到了劳动力市场，这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本书进行研究过程中的经济衰退形成悖谬。然而，即使在2000年夏季美国经济急剧上升的高峰期，大批街道青年作为边缘群体仍被排除在外，成了合法经济中完全多余的人，公然被纠缠在有利可图的毒品经济、发展繁荣的监狱制度、长期吸毒的困窘以及时时发生在彼此间的暴力之中。从长期的政治经济视角来看，且不考虑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短期波动，像“9·11”事件、世贸大厦灾难后经济下滑，纽约市中心贫

民区穷人的未来并不乐观(2001年9月26日《纽约时报》A12版;又见2001年美国人口普查中心资料)。从区域发展的层面来说,20世纪最后30年,在全国50个州中纽约州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最为严重(2000年9月19日的《纽约时报》B5版)。

纽约市强大的低报酬初级雇佣市场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来自墨西哥农村的贫困移民人数的激增,其实他们正是冲着这些低报酬工作而来的。1991年我离开哈莱姆东区时,那里的墨西哥移民已是随处可见,本书也探讨了波多黎各年轻人和墨西哥新移民间越来越激烈的冲突。我在1994年英文版后记中也提到了他们,还附上了当地墨西哥人口快速增长的一组数据。90年代后期,在我住的那条街道上,这一增长速度的迅猛势头是有目共睹的。1991年,我所在公寓周边的那些街区,至少有三栋楼住的全都是墨西哥的新移民(还不包括从塞内加尔农村来的新移民住的那两栋楼)。最近一次我回去写此前言时,竟发现整个街区(临近我住的那个街区)全部“墨西哥化”了。那里有几十个墨西哥食品专卖店,而我在的时候还只有一家,且还没有挂牌,可能是因为没有正式注册。简言之,21世纪的黎明时分,虽然一个新的种族更替浪潮在美国经济的外围打造着哈莱姆东区,但这里的人们毕竟是在为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做着不懈的努力。

2002年,整个哈莱姆东区新兴的小微企业在被隔离、废弃的街区里崛起。1994年,在我住过的那个街区里,新兴的小微企业数量猛增。我家旁边那个空闲了十几年的垃圾场已经被一片新建的四层公寓楼所覆盖,另一边,在我搬去10年前毁之一炬的那座巨大的废楼,现已改建成半成品的楼房,供有毒瘾的母亲们暂住。另外还多了五个合法的商行:两个理发店,一家光碟出租屋,一家外卖的中国餐馆和一家比萨店。

街区里以前的那两个杂货店,一家还在卖毒品,但仅限于大麻。纯度更高的海洛因在街角也能买到,不过已不再只是曾经竞争激烈的那三个品牌公司的产品。正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住在那里时一样,夜里,工人阶级会把他们的公共场地让给那些贩毒、吸毒的人。但总的来看,在偶然的毒品兴趣转换和必然的大批低收入劳动力移民潮的支撑下,日益坚挺的美国经济使街道上的工人阶级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降低了为爬向上层社会而促发的毒品、犯罪和暴力的毁灭性魔力。

与私人区域的发展和非法工人阶级移民的强劲效能相反,公共部门对市中心贫民区,特别是拉美人和黑人街区,继续抱着先前那种有害的漠视态度。90年代,原本就已捉襟见肘的美国社会福利安全网,再次成为一个昂贵、苛刻和犯罪的天网(法

网)。本已庞大的美国刑罚体系，则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犯罪工业综合体。2000年罪犯人数的比率大于世界上除了俄罗斯和卢旺达之外的所有国家。美国的监禁率在90年代翻了一番，比欧共体国家高出6—12倍(Wacquant, 1999: 72)。如果要考察其所涉及的种族不平等现象，那么被关押起来的纯人口数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Wacquant, 2000)。据客观统计的可能性数据分析，黑人男性中三分之一的人有过被监禁的经历，而白人中这一数据仅有二十五分之一，拉美人则有六分之一。90年代及本世纪前几年，“反毒战争”使得监禁率中的种族差异变得更为悬殊，因毒品犯罪被抓的黑人比白人多20倍。在89%的犯人都是黑人和拉美人的纽约州，这一差距更为突出(Macallairand Taqi-Eddin, 1990)。

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在1993—2001年任职期间，提出了对小犯罪的零容忍政策，推行了臭名昭著的“修补破窗”政策(该政策源于修补破窗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修理，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世界级名人。这位市长主张严惩“生活质量犯罪”，即着重抓捕那些乞丐、玻璃擦洗工、在街上闲逛的穿着时髦的年轻黑人和拉美人。警察对少数族裔群体的残暴行为，引发了侵犯人权的公共丑闻，并使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请看下面的例子，警方审讯一位海地移民时，用一节断了的扫帚把多次插进他的肛门，对其动用酷刑；另一位手无寸铁的圭亚那移民在自己家门口被警察射了41枪。纽约市严惩犯罪的政策同样也是昂贵的。90年代，在纽约市保健、教育、领养儿童、公共教育等预算精简的同时，警察人数却从7000人急剧增长到前所未有的40000人。同一时期，纽约州花费4.5亿美元用于建造监狱，这还不包括经营开支。1998年在纽约州北部监狱，人均年花费32000美元，位于莱克岛上的纽约市监狱，每年的人均开销更是高达66000美元(Camp and Camp, 1998)。

一些严苛的毒品管理政策的支持者强调说90年代后期纽约市的犯罪率锐减，岂不知纽约市的犯罪率并不比那些没有实施查禁路人或提高警察抓捕率政策的其他城市低多少。事实上，统计学家已经指出，90年代纽约市最大化地提高监狱人口数量以促成犯罪率下降的情况，并不比那些低于平均监禁率的各州好多少(2000年9月28日《纽约时报》)，更何况1994年纽约市市长强化整治犯罪政策实施前，纽约乃至全国的犯罪率都已有所下降。政策分析人士认为，经济的全面增长以及18—

20岁之间的人口流动量的减少，对降低犯罪率比控制犯罪策略的影响要大得多(Blumstein and Wallman, 2000)。尽管学界和统计部门都对此做过批评，但纽约市实施的这一政策却成了解决城市困境的新办法成功的象征：“把犯小罪的少年犯特别是吸毒人员关起来”、“把穷人当做犯人”(Wacquant, 1999: 74, 15)。在危机中挣扎的不雅观的穷人，被驱逐出属于城市白人及中产阶级的公共场所。随着社会疾苦的恶化现象得以安全缓和，房地产价值飞升，旅游业的产值也达到历史新高。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结交的那些毒贩朋友，除了年龄小、缺乏经验、比较狂暴的这类人之外，都设法逃过了牢狱之苦。90年代后期的反毒品战争，对本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生活形成最直接、具体影响的，反倒是由纽约官方颁布实施的联邦公建工程住宅房“一次犯罪必须搬离”的苛刻的处罚政策。90年代中期，生活在公建工程住宅房中的家庭中一旦有人犯重罪，其余所有成员都得搬离，不管其年龄大小和社会身份高低。很多城市都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联邦法令，但纽约市却这样做了。大多数毒贩通常都是和其家庭成员一起从家中被撵出来，很多人——包括本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被迫离开曼哈顿或纽约州。整个纽约城里的老人为了给他们的孙子、孙女腾出客厅里的沙发，只好呆在街上。至于他们是否已经年老糊涂，是否知晓孙子们的犯罪行为，或是否可能是在孙子们的威胁下跑出来的，根本没人问津(比较2002年3月27日《纽约时报》)。最具戏剧性的是，因为纽约市无条件实施“一次犯罪必须搬离”政策，三位做母亲的因允许毒贩(本书中的主要人物)和她们住在一起而不得不搬进临时收容所或挤在亲戚家的客厅里。

最让人忧心的是，这种延续下来的毁灭模式落在了本书中几个毒贩的孩子身上。本书出版后，我每年至少回纽约一两次，每次都会尽量找到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向他们问声好，和他们叙叙旧。在后来的造访中，我有机会见到毒贩们初长成的孩子，其中好几个我在本书中都有所涉及。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我看到了其经济条件的改善，但也对哈莱姆东区依然存在的社会疾苦有了新的认识。市中心贫民区居民中最脆弱的群体是那些孩子的孩子，他们被美国梦咀嚼后又被吐了出来，多年后回首过往的奔波与辛劳，却发现自己仍然以非同寻常的金钱和人格代价，深深陷入监狱工业的综合体中。

于圣弗朗西斯科

2002年4月

目 录

| | |
|------------------------------|-----|
| 2003 年第二版前言 | 3 |
| 绪论 | 1 |
| 第一章 直击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 15 |
| 第二章 哈莱姆东区街道的历史 | 37 |
| 第三章 快克买卖点的管理——癖好、规矩和尊严 | 59 |
| 第四章 “走向合法”——工作中的失礼和反抗 | 86 |
| 第五章 在校的日子——学会做个好罪犯 | 132 |
| 第六章 重画街道上的性别线 | 162 |
| 第七章 家庭及其痛苦中的孩子 | 198 |
| 第八章 脆弱的父亲们 | 219 |
| 第九章 结论 | 243 |
| 后记 | 250 |
| 2003 年版后记 | 258 |
| 注释 | 268 |
| 参考文献 | 285 |
| 中文版后记 失业虐待的机制性恶化 | 298 |
| 致谢 | 308 |
| 译后记 | 311 |

绪 论

伙计，我不怪现在的处境，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

——普莱姆

我是悖于心愿走近可卡因的。1985年春季，我新婚不久，第一次搬进哈莱姆东区（也叫El Barrio^[1]）时，想在纽约城找一个便宜点儿的公寓，打算在这个世界上最奢华的城市之一的中心地带住下来，写一本有关贫困和种族隔离制度的书。从理论上讲，我其实是对市中心街道文化的政治经济感兴趣，而从个人的、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主要是想通过论证种族隔离和经济边缘化给拉丁美洲人和黑人所造成的影响，来探究这一世界上最富足的工业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即致命弱点）。

毒品问题只是我要探究的诸多主题之一。我原本是想写有关整个地下（免税）经济，诸如路边的汽车修理、家政服务业、无照的场外赌场、毒品买卖等等。刚到那里时，我还从未听说过快克，事实上也没有人了解这一特殊的物质，因为这种由可卡因和发酵粉（碳酸氢钠）合制加工成的见效快、易吸用的易碎的小球在市场上还没见大量销售。^[2]然而到当年年底，我的朋友、邻居和熟人中的大多数人，却都被卷入这场涉及数亿美元的风暴之中：或买卖、或吸食、或为此伤神。

我跟踪他们，眼看着我租住的破旧公寓对面的住宅区的凶杀案发案率，一路飙升到曼哈顿几个最高的地区之一。^[3]一场大火后被废弃的建筑物前的人行道和我租住的屋子两边堆满垃圾的空地上，随处都可听见脚下踩着空瓶时发出的“嘎吱嘎吱”声。几乎是十年后，当本书付梓之时，尽管“毒品专家们”关于美国是否面临严重的“毒品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但在这条人行道上，唯一的不同是，除了随处可见的用过的可卡因瓶子之外，又多了些皮下注射用的针管。90年代中期，海洛因的国际供应商降低了价格，提高了质量，在贫民窟内重新找回了市场，因而海洛因、快克和可卡因作为主要毒品种类，在市中心唾手可得。^[4]

地下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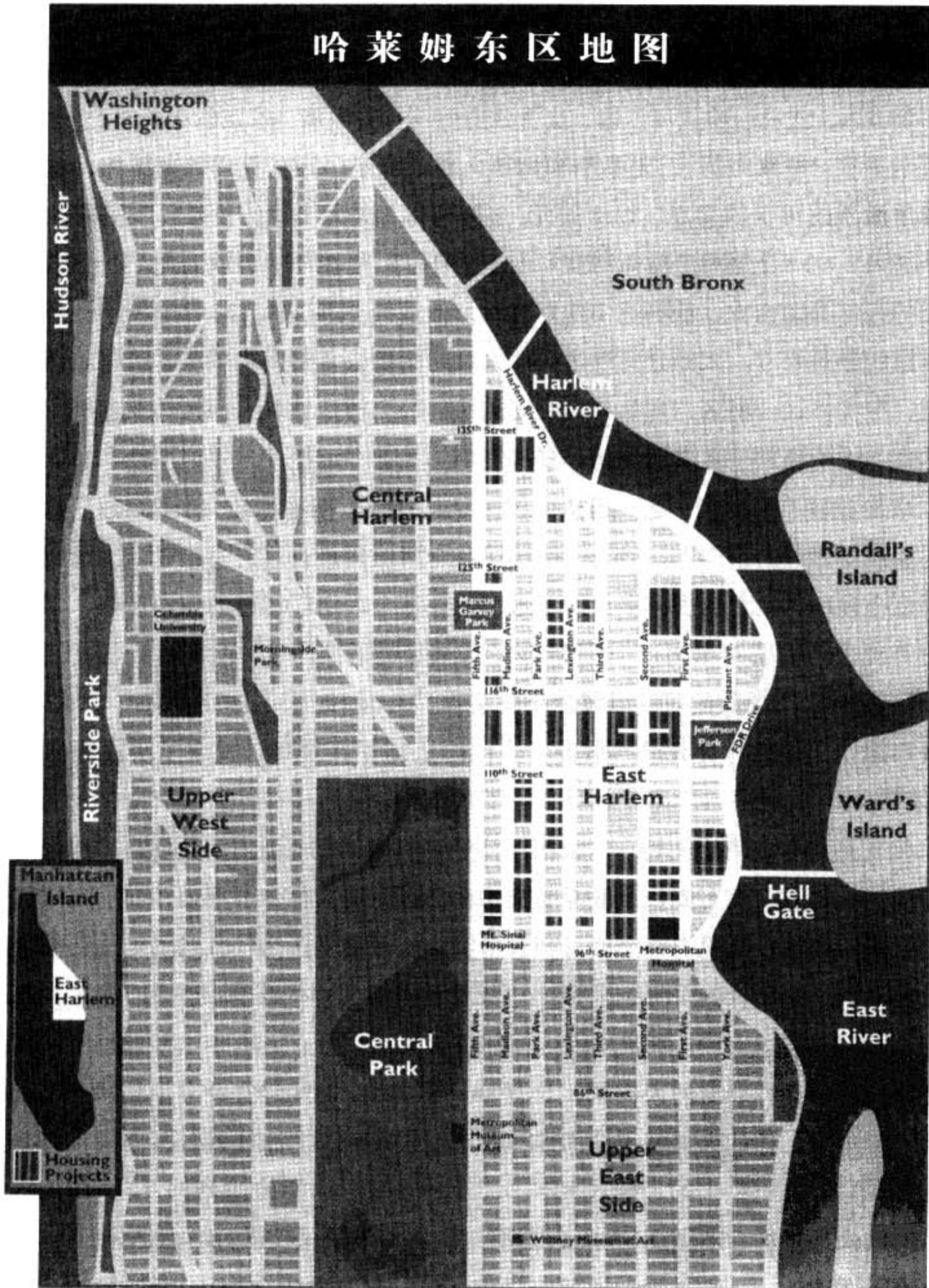
本书不是有关可卡因或毒品本身的书。市中心贫民区长期以来的毒品滥用仅仅是个症候——一个深层次的、动态的社会边缘化和异化形象的符号。当然，从最明显的个人层面来看，毒瘾和药品滥用只是街道上影响人们日常生活最直接、最冷酷的要素之一。不过，更重要的是，24位如今已经成为我的朋友们的街道毒贩和他们的家人，一点也不愿去谈论毒品问题。相反，他们想要让我理解他们是如何在贫困线上为了生存和尊严而斗争的。

官方资料显示，我的这些邻居们本应无家可归、食不果腹、衣衫褴褛才对。从曼哈顿的消费水准来看，他们中大部分人应该连房租和最低的食品消费都负担不起，更不用说水、电和煤气费用了。1990年的人口普查情况表明，哈莱姆东区有39.8%的当地居民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全纽约市民的比例是16.3%），62.1%的人的收入大约为贫困线指数的两倍。我周围的这些街区尤其贫困，有半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考虑到纽约城基本的商品价格及服务价格，这意味着按照官方公布的经济标准，生活在哈莱姆东区半数以上的居民根本无法维持生计。

事实上，这里挨饿的人并不占多数。尽管仍会有许多老人和孩子忍饥受冻，但大部分居民都是穿着讲究，身体健康。巨大的、没有被普查到的、未征税的地下经济，让成千上万像哈莱姆东区的纽约人一样依靠最低福利生存——这些福利在美国人眼里属于最基本的必需品。我决心对这些另类的挣钱策略进行探究，考察它们何以使这些坐在门廊外、把车停在我公寓前的年轻男女们如此劳神费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多多少少得到过公众资助。^[6]贫困家庭的家长们为了孩子的生存，不得不想办法补给他们肌瘦的脸颊。许多母亲靠给人带孩子或当清洁工挣点给养，有的可能会在周围六个夜总会和营业时间外的舞场找点活儿干，有的则偷偷在自家客厅里为服装承包商做点裁缝活儿，另外还有许多人被逼和有钱的男人建立一种色情关系以补家用。

地下经济中男人们的挣钱方法则较为公开。有的在路边修理汽车，有的坐在门廊外等着那些没有执照的（未经许可的）包工头来雇他们做一些夜间拆除或修理窗户的活。许多人则在卖“数字”——街上卖彩票的行话。最多的是那些三五成群叫卖着“五分或一角钱”的非法毒品的营生，他们属于繁荣的地下经济中最坚实的、涉及数亿美元的部分。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可卡因和快克以及90年代中



Sources: Housing Environments Research Group,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Kevin Keamey,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期的海洛因，为哈莱姆地区的人们提供了平等而最快捷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就业机会。毒品轻而易举地敌过了其他合法或非法的挣钱门道。^[7]

我住的公寓前这条街道颇为典型。在我写最后一稿时，方圆两个街区内仍能买到海洛因、快克、粉状可卡因、皮下注射针剂、美散痛、安定和天使粉^[8]、大麻、墨斯卡灵（一种致幻剂）、走私酒和烟草。在距我家门廊一百码的范围内，就有三家竞争激烈的可卡因卖点，以2美元、3美元和5美元不等的价格私卖药瓶。再过几个街区，在一个当地“药丸制造厂”内，有位医生在一年内就开出了价值390万美元的医疗补助药方，获利达100万美元。他开的“药”中，有94%属于社会服务部界定的毒品处方。大部分药片都会被人拿到街角去零售或以低廉的价格重新卖给药店。在我们这一街区，有家买卖快克的小店的二楼，就有一家污秽的诊所，向成群枯瘦如柴的瘾君子私卖镇静药和鸦片制剂。我曾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晚上的闲暇时间。这些瘾君子聚拢在一起，巴望着护士早点开门，把手写的“今日出诊”的牌子挂在亚麻布遮住的窗户上。因为权威部门从未对这里进行过突击检查，因而我无从查明这个诊所的生意到底有多大。不过，就在这个制造厂对面的住宅区内，纽约市住房管理机构的警察抓捕过一位55岁的母亲和她的两个22岁和16岁的女儿，当时她们正在把21磅重的可卡因装进0.25克重、价值10美元的“特大号”玻璃瓶内，制成市面价值100万美元的掺假品。在同一公寓里，警察还发现了小面额的现钞25000美元。

换句话说，在离哈莱姆东区公寓和公建住宅房咫尺范围内，只要有年轻人生活、成长的地方，就有成百万的毒品交易在进行。这些至少不用跑路、仅在他们公寓前的街角或在校园里卖毒品就可赚成倍钱的年轻男女，为什么还要坐地铁去市里的公司上班，拿最低的工资？实际上，我总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市中心贫民区有这么多朝九晚五按时上班、加班的人，但却经常入不敷出。1990年哈莱姆东区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6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48%的男性、35%的女性有正经的工作，而全市范围内有工作的人男性平均为64%，女性为49%。^[9]在我的公寓周围人口普查过的范围内，16岁以上的人中，有53%的男性（3647人当中的1923人）、28%的女性（4626人当中的1307人）有合法工作。其余17%的民间劳动力还没有工作，不过正在努力寻找；而对整个哈莱姆东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工作的人数占16%，整个纽约城为9%。^[10]美国官方人口普查办公室的统计资料，对市中心居民区的困难估计显然有待考证。受人口普查署授权的调查，往往没法对20岁左右的黑人和

拉丁美洲人做精确统计。很多人担心自己参与了地下经济而遭报复，所以有意隐瞒他们的行踪。^[11]从1988年纽约城管部门出示的报告中可以得知，20%以上的人没有被普查到。房管部门“过分拥挤”的结论，是从福利部门的交叉列表(cross-tabulating)和教育委员会管理部门开具的增长数字判断出来的。^[12]就在我住的公寓的周边，从16岁以上男女比例的失调——3647：4626——我们也可以看出普查中有多少男性公民被漏查。也就是说，如果按正常的男女比例来算的话，979个或27%的男性没有被普查到。在整个纽约城，16岁以上的男女比例要达到均衡，男性少了18%多；利用同一比例指数，哈莱姆东区的男性少了36%。

估算地下经济的大小尤其棘手，更不用说毒品买卖这一行了。^[13]首先，从其定义上来看，人口普查部门没有这一方面的数据。因为对市区的普查中漏查的个人要比家庭数更多，因而了解地下经济大小的一个可行办法，只能是以声称自己没有“工资收入”的一家人的数字为依据，但这仅能对不同住宅区的地下经济做最粗略的估算，因为有些家庭成员靠的是退休金或有限的、合法的自谋职业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其次，用这一方法估算毒品买卖的大小更是毫无意义，因为很多甚至大部分靠不交税的地下经济来补充收入的在家留守人员，都有其合法工作，并没有染指毒品。相反，许多从事地下经济的人也有其公开合法的工作。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假设大批无工资收入的在家人员很可能是依靠未纳税、未公开承认的收入来维持生计，而毒品买卖就是补充这一欠缺的重要来源。不管怎样，根据官方人口普查部门的统计数字，整个哈莱姆东区的所有家庭中，有40%的在家人员没有公开的工资收入，而整个纽约市的这一数据只有26%。我住的公寓周边的街区搞地下经济的人可能会稍多一些，3995人当中只有46%的在家人员有工资收入。接受公众资助的在家人员的比例是检测地下经济相对大小的另一个有效数据，因为没有人能仅靠福利而生存，他们靠公众资助所得到的合法收入，可以通过每半月一次的福利支票和每月一次的食物分配印章推理出来。在我居住的街区，有42%的人接受公众资助，在哈莱姆东区有34%，而整个纽约市则只有13%。^[14]

街道文化——抵抗和自毁

居于世界上最富足的城市却过着贫困的生活，痛苦郁闷和文化差异共同冲击着哈莱姆东区这些冒险出外谋生的年轻人，并催生出为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复杂而矛

表 1 1990 年人口调查街区社会指标对照一览表

| | 总人口 | 波多黎各人 (%) | 非裔美国人 (%) | 贫困线下居民 (%) | 接受官方援助的户数 (%) | 没有工资收入的户数 (%) | 16 岁以上被雇用的女性 (%) | 16 岁以上被雇用的男性 (%) | 16 岁以上男性与女性均衡差异百分比 (%) |
|-------|---------|-----------|-----------|------------|---------------|---------------|------------------|------------------|------------------------|
| 快克屋 | 11599 | 56 | 33 | 49 | 42 | 46 | 28 | 53 | 27 |
| 哈莱姆东区 | 110599 | 52 | 39 | 40 | 34 | 40 | 35 | 48 | 36 |
| 纽约城 | 7322564 | 12 | 25 | 19 | 13 | 26 | 49 | 64 | 18 |

Sources: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Population Division 1992 [August 26];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3 [March];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3 [December]; 1990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Block 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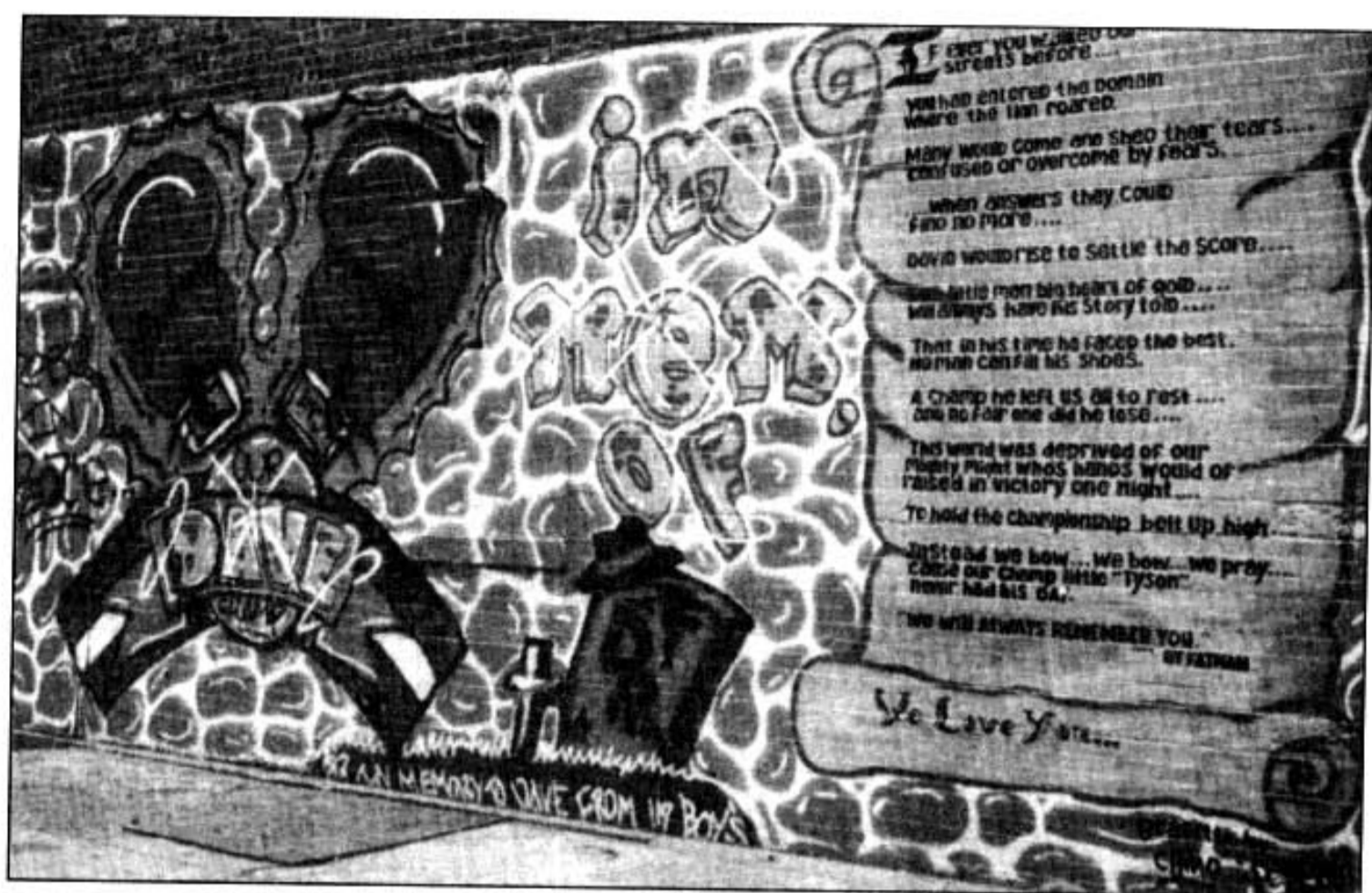
盾的信仰、象征、交往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网，也即我所说的“市中心贫民区的街道文化”。街道文化为探讨自主的个人尊严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平台。以美国为个案，社会边缘人口向着政治和生态孤立的市中心地带的汇集，已经勃发起一个旨在抵制种族主义和经济边缘化的、一触即发的文化创造力。“抵抗性质的街道文化”并非连贯、自觉的政治抵抗体系，它是长期以来以对抗的形式出现、即时爆发的一系列抵抗实践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流社会通过时尚、音乐、电影和电视，最终使街道文化以诸多的抵抗形式重现和商业化，并使之循环性地表现为流行文化。^[15]事实上，美国中产阶级中一些表示自尊的语言形式，像“酷”、“公平交易”、“加油”等，都产生于市中心的街道上。

长期以来麻醉毒品的供应为现代街道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使其较上一代更具强劲的诱惑力。然而，非法企业使其大部分参与者都深陷于暴力、毒品滥用和内化的愤怒等生活方式中。因此，抵抗性质的街道文化矛盾地预示着对其参与者及其庇护他们的社区起着毁灭性的作用。换句话说，尽管街道文化原本出于对个人尊严的寻求、对种族主义和被征服的拒斥，但最终却对个人和社区的毁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前所述，究竟有多少人卷入了不交税的地下经济是无论如何也计算不清的，更不用说那些吸毒、贩毒的人数。哈莱姆东区的大多数人与毒品毫无瓜葛。^[16]不过问题是，占大多数的守法公民已经失去了对公共场所的控制，且不说他们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



哈莱姆东区的再占有：前任房管把一些动物玩具放在这栋废弃的大楼上，用来保护这一街区的破败，这里成了交易毒品的最佳去处。照片提供：Henry Chalfant。



这是离游戏厅不远的地方，对一位被谋杀的年轻人的纪念物。他本有望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照片提供：Oscar Vargas。

例，这些勤恳的、远离毒品的哈莱姆人已经被推挤到防御境地。大部分人生活在对其邻居的恐惧和鄙视中，担惊受怕的父母为使孩子远离街道文化的浸染，把他们关在家里，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早日搬离这里。

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毒贩只代表哈莱姆东区的一小部分居民，但他们却在努力确立着这里公众生活的基调。他们迫使当地居民，特别是妇女和老人担心遭遇强暴或抢劫。公然聚集在街角、面色憔悴的瘾君子们，引起了当地不吸毒居民的同情、痛心和愤怒。更重要的是，街道上的毒贩每天都在为其周围未谙世事的年轻人提供一种极具诱惑力、但却有暴力和自毁性质的另类生活方式。

不管在数量上有多么微不足道，那些在市中心街道上靠毒品发迹的人却不容忽视，他们同样需要人们的理解。因此，住在哈莱姆东区的那些年里，我选择吸毒者、小偷和毒贩做我最好的朋友和熟人。美国市中心贫民区能够引发人们悲怜的因素，在街道这一毒品买卖天地里呈现得最为清楚。套句老话：“于不寻常中见寻常”，本书中这些毒贩和吸毒的人对贫困和种族隔离的极端或极具讽刺意味的反应，有助于洞悉多数行业中脆弱的人群，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压下，是如何以这样那样的形式经历着快速的结构变化这一过程。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经历也毫无例外，只是不论是在范围还是速度上，他们付出的代价和贫困程度都要更为突出，而美国正是凭

借这一广度和速度，在波多黎各开垦殖民地而使其经济和政治相背离。相反，如果说波多黎各人的经历有什么非同寻常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文化形式不断扩展，并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身上再生出尊严和自治这一一贯主题。事实上，面对长期以来的殖民统治事实，一些波多黎各学者将其称为“对抗的智性”^[17]。

民族志方法与消极成见

任何一种针对社会边缘化所做的详尽调查研究，都可能遇上某些与政治有关的严肃课题，特别是在美国，有关贫困的讨论往往直接涉及种族和自我价值问题。因此，我担心本书所涉及的真实故事，会被误解为对波多黎各人的成见，或是对穷人不怀好意的描摹。近年来，我一直很困惑，我赞同社会科学家们对大多数美国学术和流行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劣质记叙的批评。^[18]但与此同时，传统的道德偏见和中产阶级对贫困的敌意，也不该以弱化市中心街道的磨难和毁灭为代价。出于对损毁穷人形象的担心，不管这种担心是出于正当理由还是“政治敏感”，我并不打算回避或缩微我见证过的社会悲苦，因为那会让我有与压迫者同谋的嫌疑。^[19]

在本书中，我将通过展示自己亲身经历、亲耳听到或由当事人提供的一些残酷事件，直面当代美国社会边缘化所引发的政治矛盾。站在制度压迫和个人行为的交叉点上，我将通过自己的主要论证和直接呈现毒贩的生活及我们之间的对话这一方式，尝试建构起对美国城市中心有选择的、批评式的理解。文化生产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构成本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我将分别从文化的能动作用、个人的自主权、性别中心论以及家庭内部环境等方面进行解析，使读者能够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对美国城市持续性的贫困和社会边缘化的事实有所了解。

如前所述，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依凭人口普查办提供的资料或社区中随意的抽样调查，根本无法走近生存于地下经济阶层的人们，更不必说那些贩卖或吸用毒品的人。从概念上说，那些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个人与主流社会有着长期的敌对关系。许多吸毒、贩毒的人都对从主流社会派来的代表抱有怀疑态度，不管调查者多么善解人意多么友好，他们都不愿向这些陌生人袒露自己滥用和非法生产毒品的内幕。因此，犯罪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就犯罪和毒品滥用所做的大部分辛苦调查，基本上都是杜撰出来的。实际上，并非只有吸毒和贩毒人员会隐瞒自己非法活动的细节，就连那些所谓“诚实的”公民在个人所得税扣除方面也会

玩一些小花招，因而也时常会被卷入“地下经济”的纠纷中。换言之，谁会期望那些对老人行凶、抢劫的人能提供一份他或她详尽的挣钱门道呢？

20世纪20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家所倡导的参与观察式民族志方法，比起单凭定量分析法来探究生活在与其敌对的社会边缘人群更为合适。只有与被调查者建立长期互信的关系，人们才有可能问及一些具有挑衅性的个人问题，并有可能得到经过缜密思考、严肃的回答。有些人类学家就经常住在他们所研究的人群的社区里，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人群建立起一种长期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为了得到“准确数据”，我们需要打破实证调查之规则，做到和自己研究的人群亲密无间。

基于此，为了观察这些吸毒、贩毒的人，我在街道和毒品买卖点度过了几百个夜晚，用自己的录音机记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和生活故事。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也拜访过他们的家，参加过他们的派对和各种聚会——从感恩节晚餐到新年除夕的庆祝活动。除此之外，我还访问过本书提到过的毒贩的配偶、情人、兄弟姐妹、母亲、祖母，甚至他们的父亲和继父，后来还和其中不少人成为朋友。我同时也花费了不少时间，走访了当地的政客并多次出席过慈善机构组织的会议。

八九十年代人类学界急剧膨胀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质疑人类学权威的神话，谴责人类学的努力中所固有的等级政治的表现。后现代主义倡导的自我反省对我来说很有裨益：我是一名来自更大的社会中的主流阶级、主流种族和主流性别的旁观者，企望探究波多黎各人对市中心贫困的感悟。另外，在本书的内文以及对毒品屋里录制的对话进行编辑时，我把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思考一一呈现了出来。事实上，本书的结构本身同样表现了这一主旨。

在编辑整理上千页的文字记录时，我开始欣赏起“文化文本”（culture as text）这一深受解构主义者青睐的辞藻，也同样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方法与之相悖又相容的特质。尽管本书的文学品质和情感力量依仗的都是主要人物清晰的话语，但在如何表达这些话语方面，我总归是有发言权的^[20]——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权限的话。

在抬升了后结构主义理论批评方法的受众之后，现在我必须理清自己对许多后现代主义方法根深蒂固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趋势的失望和惋惜。解构主义“政治”，经常把自己禁锢于像社会相互作用的“诗学”或探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等学术话语中。尽管后现代主义的人种志学者经常声称自己是颠覆性的，但他们的权威之争主要通过形象的词汇运用、嬉戏多变的句式和多重声音的表达，并以对结构的过分为中心，而不多关涉日常生活中真正的斗争。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则避重就轻，只

注重那些被疏远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而对市中心待业人员迫切的生活危机置若罔闻。学者们的自省有时也常常流于自恋式的赞美，而激进的解构主义者更让人无法对不公平和受压迫这两个概念从范畴和优劣次序上做出甄别，进而在不知不觉中，否定了从社会和制度上超越种族、阶级、性别、性征和其他为权力所闾的范畴而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经历的苦与痛。且不说学界知识分子间那些小小的理论纷争，由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参与观察方法更是充满了根本上的分析学和政治学张力。出于某种人类学家把秩序和社区纳入其研究主题范围的实用主义范式的影响，人种志学研究者历史性地绕开了对诸如个人暴力、性虐待、吸毒、种族隔离和自毁这些敏感主题的探讨。此外，参与观察方法论上的后勤学要求研究者必须亲临现场参与调查，这就使得他们忽略了否定的原动力，因为他们必须和自己的研究对象打成一片，并获得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允许，与其共同生活，这自然会影响到人类学家对自己研究环境和研究主题的无意识的自我审查。如果人们只研究一些相对而言无伤害的、“富有奇趣”的主题，那么很容易获得个体的“广泛赞许”。最后，从个人的层面来说，像哈莱姆东区街道这一充满人间悲剧的极端环境，从心理上来说是令人迷惘而不知所措的；从身体上来说，则是更危险的。

人类学关于“异族他者”(exotic other)的困扰，阻滞了人类学家对自己社会的研究。当对其临近的家园进行研究时，他们又冒着将其研究发现视为异类的危险。所以在本书中我警告过自己，不能有意识地对街道上的毒贩和市中心的街道文化做窥阴癖式的赞美。由于对给人印象深刻的城市贫困做人种学意义上的研究的匮乏，特别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屈从于暴力色情而趋于强化的流行的种族主义陈规陋习的担心，许多人种学家就这一文化和人群写出了不少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实际上，这些内容都包含在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宗旨中：文化只有内在的逻辑，没有优劣之分。但事实上，痛苦往往是骇人听闻的，它是一种针对人类完整性的溶剂，人种学家从来不愿自己所研究的人群看起来丑陋不堪。在美国，个人行动中的适者生存、受害者遭谴责的理论，构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常识”，因而这一净化弱者的强烈欲望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结果如前所述，人种学家对于社会边缘化所做的描述，几乎注定要被公众透过保守的、无情的透视镜误读，这就严重阻滞了知识分子对贫困、种族歧视和移民问题的研究能力，公众对个人价值及种族决定论的迷念，也使他们受到了重创。

在美国，人们对社会结构制约与个人失败之间关系的流行理解与此也无两样。

因而，知识分子已经退出辩争，义无反顾地开始对穷人及生活在穷人中间受压迫的人群做正面的描绘，学会了做一个完全的非现实主义者。实际上，我在一个学术圈中表达本书中的一些主要论证时已经阐明过这一点，但那些进步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似乎不屑于听我的证言，但却对文中的一些表层意象进行了蛮横的回击。他们似乎很害怕蕴含于其中的“反面意义”，所以在还没有听之前就已经决定应该把这些错综复杂的、不尽如人意的信息压制下去。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很多评论文章，在公开的学术环境下，却公然详尽引用了本书中所阐述的关于社会结构压迫下个人经历的主要方面。

贫困文化批评

美国哈莱姆东区和波多黎各人的经历，引发了与之不相称的研究文献。波多黎各人被称为是“在美国研究最多但却最难理解的人”^[21]。最后一部引起国内关注的重要作品，是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关于哈莱姆东区人种志学的《生命》(*La Vida*)。该书完美地阐述了人种论方法固有的问题，以及对详尽的生命历史的个案研究。事实上，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发表于1965年的关于黑人家庭的报道，和《生命》一书一样，经常被引用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学家为何不敢涉足对市中心的研究这一主题。^[22]刘易斯从一个波多黎各大家庭中收集记录了成千上万页的生活历史，这些家庭成员中的大多数妇女都参与卖身。“贫困文化”理论就是刘易斯从墨西哥或其他人种学的数据中推演出来的，主要是指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毁灭性的价值观和行为，在代与代之间传承的痛状。刘易斯的研究方法来自盛行于上世纪50年代、主宰了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的弗洛伊德范式。他没能观察到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是如何制约个体的生活。但在时隔30年后，我们却很容易发现，刘易斯的理论框架太过简单。在对极度贫困的波多黎各移民心理所做的简单化描画中，作者并未涉及阶级剥削、种族歧视，当然还有性压迫以及背景化的文化意义的细微差别。然而，尽管缺少学术意义上的严谨性，刘易斯却通过对哈莱姆东区的居民及波多黎各贫民日常生活生动而深刻的描述，使该书成为美国当年的畅销书，与当时基督教新教粗糙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责任概念产生共鸣。虽然作者的意图是进步而政治的，他对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人群也抱持同情态度，但学界却把他的书解读为对弥漫于美国意识形态领域对“毫

无价值”的穷人根深蒂固的蔑视这一事实的肯定。

一位人类学家创造了“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这一概念并关注对个体行为资料的收集,并不意外。学科方法论——参与观察——的简单化和讲求实事求是,可以使其详尽地记载个体行为,但却无法触及权力结构和历史。具体而言,在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背景下,幸存在街道上的那些人的自毁式的日常生活,需要放置于其所面对的敌对的种族关系和结构上的经济混乱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去解读。常常陷入痛苦漩涡中的我,在人种学的研究中,往往很难看清建构起周围混杂的人类相互作用的更高层的关系。平日走在哈莱姆东区的街道上,我心中时常会有一种对那些受害者、施害者以及造成诸多无辜受害者的富足的工业社会的恼怒情绪。比如,当碰到有身孕的朋友发疯般地吸可卡因,有可能会使未来的宝宝处于情感破灭和脑细胞发育迟钝时,我不禁想起了她的同胞们所受到的殖民压迫和屈辱的历史,也无法不将其现状归罪于纽约变化着的经济。生活在美国所谓“下层阶级”的水深火热中,我就像周围的邻居和那些有身孕的吸毒者一样,经常责备受害者。

政治经济分析对个人主义、种族主义,或对社会边缘化做评判性的解读并非万全之策。事实上,过多地专注于结构反而会误导人们对人类是自我历史的积极的原动力,而非被动的受害者这一事实的理解。人种学的方法把那些只不过是士卒般的机制上的力量视作影响他们未来的真正的人类,但我却经常顽固地使自己陷入结构主义的樊篱,以免触及实际存在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中为了生计而自我伤害甚至伤害自己的至亲的某些痛苦的细节。再者,这一分析方法和政治问题,可以放在关于结构与机构对抗(即个体责任与社会结构缺陷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中去认识。文化生产理论的洞见——具体而言,街道文化抵抗社会边缘化这一概念,是一把矛盾的开启毁灭性冲力的钥匙——有益于避免简单化的结构主义解读。通过对抗的文化实践,个体塑造着由更大的力量强加于其自身的压迫。^[23]

把个体行为与政治经济联系起来的困难,以及美国七八十年代人种学家出于个人和政治原因的胆怯,共同模糊了我们对机制和被压迫者经历的认识。我解决不了结构之于机制间的争论,也不自信能够缓解自己不无道理的担心,即那些不怀好意的读者会把我的人种学曲解为“毁灭穷人的形象”。然而,不管从个人还是道德分析学的理论观点出发,我都真切地意识到,我必须说出自己亲眼目睹过发生在朋友们身边的恐怖事件,决不隐瞒任何一个血腥的细节。^[24]我们需要直面美国贫困和种族主义所带来的深切苦痛和恐怖经历,即使这样做会让我们深感不安。我用文件

资料记录了城市贫民躲避或巧妙绕开困扰他们的隔离制度和边缘化的策略，包括那些来自自残式的痛苦的办法，旨在使“人种学的写作可以变成抵抗的场所”，并坚信社会科学家应该而且能够“直面权力”。^[25]与此同时，我也担心把穷人和无权力的人的生活细节公之于众可能会带来的政治内涵。在人种学的显微镜下，人人都有病，人人看起来都像怪兽。再者，人种学家劳拉·纳德 (Laura Nader) 在 70 年代早期就明确指出：“不要去研究穷人和那些无权的人们，因为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用来对付他们。”^[26]我无法预见把自己在哈莱姆东区生活了三年半的经历呈现给读者是否会成为暴力色情或种族主义窥阴癖者的猎物——毕竟，受众的眼里既有难题，更有责任。

第一章

直击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爱听你说话。很好玩，听起来像在播报电视广告。

——一位八岁男孩笑着说

我对哈莱姆西班牙居民区街道的调查，差点因自己无意间对瑞（Ray）的“失礼”而半途而废。瑞经营着好几家快克买卖点，1985—199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午夜刚过，瑞来查看他的买卖收益情况，检查后半夜值班的经理有没有按时开门。红火的生意使这个32岁、又矮又胖的波多黎各快克贩子的身边，聚集了很多想引起他注意的圈内工人、朋友和想结识他的人。我们当时住在第110街的拐角，莱克西顿街地铁站的入口处，对面那座废弃的四层公寓楼被瑞的毒贩们占据着。瑞把底层装修成供工人们工作之余休闲的俱乐部和台球厅。其实在意大利楼主为获取保险赔偿金烧毁这座楼之前，瑞和他的许多员工就是在那里长大的。那里的拐角处一直被称作“药房”，因为从那里可以买到各种精神病治疗药物：有常规的海洛因、安定、粉状可卡因，更有墨斯卡灵和天使乐这样的非寻常药品。^[1]

学习街头智慧

每当想起自己因对街头智慧缺乏了解，从而无意间对帮助我走近毒品现场、保证我人身安全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的伤害，我的内心便会感到很是愧疚。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与其说我是对那个毒品买卖点的光顾，毋宁说我是被夜晚那里的友好气氛所吸引。当时，瑞靠在他金色的梅塞德斯车的前保险杠上，边笑边聊，满脸的幸福感。他的随从和员工也因为他刚请我们喝过啤酒且答应为我们叫街区那家中国小餐馆里的龙虾外卖而兴高采烈。我们很难看到瑞有性情好的时候，那时他会表现得

出奇的慷慨，与平日里的脾气暴躁判若两人。夜幕初降，这里温暖、惬意而舒适。整日聚集在药房之角周围的那些神色憔悴的贩毒、吸毒和静脉注射可卡因的人，已经躲藏在街道的对面，满心嫉妒地瞧着我们这一伙人；在这个时候，这里的地盘是由我们占据的。

沉浸在能和这里的“核心人物”保持越来越密切关系的惬意中，或许对我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一周前，瑞向我吐露了他持枪抢劫的很多细节。据他说，抢劫毒品买卖场所可是他的强项，他曾从一个海洛因窝藏点抢劫过14000美元的钞票，出逃时遭到一个暗中监视他的警察的伏击。在平房屋顶上交火后，他被判了四年半，他姐姐用他被捕前藏在屋顶上一个罐头瓶里的14000美金作保释金，把他赎了回来。

或许是因为瑞刚在大家面前喊着要给我买几瓶比其他人的布德威斯酒(Budweiser)贵一毛五的海尼肯(Heineken，国内多译为“喜力”)，让我放松了警惕。瑞抬高嗓门吆喝着，好使大伙都听得见：“菲利普，你喝海尼肯，是吗？”随后他给自己也要了瓶海尼肯，好像是故意用这绿色的包装瓶把我和街道上那些不起眼儿的酗酒者区分开来。我因此越发有了优越感。

得意之余，我想，该到和他们分享关于我的媒体报道的光彩时候了。那天早上，我的照片被登在《纽约邮报》第四版菲尔·多纳休(Phil Donahue)旁边，紧挨着一个关于哈莱姆暴力犯罪的黄金时间电视论坛，^[2]我希望此举可以给瑞和他的伙伴们留下点印象，借此提升我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教授”的可信度，证明我有进入白天主流世界电视节目的能力。我急于让我的出席合法化，因为瑞的生活圈里的一些人仍在怀疑我是个冒牌货——分明是一个花言巧语、不愿公开承认自己吸毒或性变态者身份的人，却假扮成一个自命不凡的教授。更糟糕的是，我的白皮肤和与他们格格不入的阶级背景，使得一些人始终以为我是个长期卧底的缉毒警。

当我得意洋洋地把报纸递给瑞时，我发现他愣了愣——等我想收回来时已经为时太晚。为让大伙儿都听见，我大声喊道：“嗨，大瑞！看看我这张报纸上的照片！”旁边几个人已经开始喊着叫他读读照片旁边的说明文字。瑞尴尬地抚弄着报纸，不知怎样把这张哗啦啦作响的报纸展开时，周围立刻静了下来。瑞一时慌乱，假装不在乎地把报纸扔到街沟里，可他那些拥护者却不肯罢休，喊着让他念念照片下的文字。“快点！瑞！怎么了？上面写了些什么呀？读给大伙儿听听！”为了挽回面子，瑞绝望地把报纸拿到路灯下，表情凝重而认真。我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瑞不识字。

遗憾的是，瑞竟然尝试着结结巴巴地读起这一颇有讽刺意味的题目——“暴风雨后的寂静”，他的脸扭曲得像一个朗读有困难的二年级学生被老师点出来捉弄时的样子。咯、咯、咯的不自然的笑声打破了瞬间的宁静，制度的过失所造成的瑞长期积压在心、矫枉过正的孩童时代的伤害在一瞬间全都爆发出来。他抬起头，恢复了以往在街道上的恼怒，扔掉报纸，大声骂道：“菲利普，你这个混蛋！我才不在乎这些破玩意儿呢！走开！都给我滚！”然后他笨重的身子钻进他那辆梅塞德斯车里，一加油门开走了，车胎在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响声，好像他是要冲过红灯，或者更像逃离药店边上那些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幸存者一样的吸毒者，而这些人则躲开他飞快的车轮，继续关注着安定药、掺假海洛因、快克和镇静药。^[3]

普莱姆(Primo)是我在这条街上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本书的主要人物。他是瑞的一个名为“游戏厅”的毒品买卖点的经理。那里离我所居住的公寓楼只有两间屋子的距离。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菲利普，你可是冒犯了那个黑肥仔。”当时有人捡起那张皱巴巴的报纸，读了上面那篇伤了瑞自尊的文章，并点评了报纸上那张照片的质量；其他大部分人则对此了无兴趣，并为当晚从这一贩毒头目手里买不来浓缩的可卡因而感到失望。他们散乱地回到快克买卖店里，或听说唱乐，或打台球，或者干脆观赏那些手里攥着钞票从门里散涌出去的吸毒者。

暴力、权力和慷慨指数

瑞把他的愤怒视作对其安全形成潜在冒犯的某种正当的警觉，以此挽回自己的尊严。我再次见到他，是在离我的公寓楼隔着两间屋的那间游戏厅里。当时他正忙着发送大批瓶装快克，收拾整理中转的货物。他粗暴地把我拉到一边，用大伙都听得见的声音叫道：

菲利普，你给我听着。有谁胆敢出我的丑，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都会挖出他的心，把他碎尸万段扔进垃圾箱里……或是把他的手塞进电源插座里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说完，他便摇晃着匆忙走过游戏厅门前的飞仿亚麻门垫，朝着停靠在人行道边装有黑色玻璃的林肯大陆车走去。可是让我费解的是，当时，他年少的女朋友正不耐烦地坐在颇有权势的男友的车内，嘴里嚼着口香糖，直朝我抛媚眼。担心瑞会以为我

在和他的女友调情，我若无其事地低头看着地面。

普莱姆很是为我担心。他非常了解瑞的为人。比他大十岁的瑞，孩童时就是两帮年轻人组成的团伙 TCC (The Cheeba^[4] Crew, 大麻毒品团伙) 和 La Mafia Boba^[5] 的黑老大，是他教会了普莱姆怎样拆卸汽车里的无线电设备，怎样破门盗窃商业区的商店。我对普莱姆的警告一笑置之，并通过解释他们过去常常用来打消老板坏情绪时常开的玩笑，以挽回我慌慌张张的尊严：“那小子不过是开玩笑而已，没准他很快就忘了。不要那么紧张嘛，伙计。”但普莱姆却无奈地摇摇头，把我拉到游戏厅外，小声告诉我最好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少来游戏厅：“你不了解，菲利普，那黑鬼是个疯子。他在街上的威望还蛮高的，大家都知道他。小时候就很凶，他蛮有影响力的。”我打断普莱姆，问道：“你是说你害怕瑞？”普莱姆用作为朋友的我很少见的懦弱承认道：

见鬼！是的，我怕他。我很小就认识他。他这个人很怪异，过去常常想着要强暴我呢！他块头大，而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只有 15 岁，伙计。他常说些“我要干了这家伙”这样的疯话。我一直在想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当时吓得从来不敢单独和他在一起。

为了证实、强调他的话，普莱姆还讲起了瑞和他儿时的好友刘易斯 (Luis) 曾经在游戏厅旁边的一所空房子里怎样强奸一个过路老头的事。我关掉了录音机，无意间强化了公开讨论强奸案的禁忌。但当时在游戏厅做眼线的普莱姆最好的朋友凯撒 (Caesar) 跟了出来，坚持让我把这件事录下来。他以为我震惊的表情是担心路人怀疑我，或是看见一个“白人男孩”向着两个波多黎各人举着个录音机发脾气。

凯撒：把录音机拿出来，这里没人会把你怎么样，菲利普。

普莱姆：对。他们强暴了一个又脏又老的男人。他们一直跟着他到那边（指着我们右边那片破砖堆成的垃圾堆）。

凯撒：对，没错！就是那里！

普莱姆：瑞和刘易斯就是在那里轮奸了那个老头（走到离事发点一半的地方）。

凯撒：疯了！没错，瑞简直就是头猪。不要脸的东西！他很有势力，你明白吗？菲利普。势力！……在街道上那可意味着受敬重。

普莱姆没理会凯撒的嚷嚷，接着讲起瑞正在考虑怎样除掉他这个同案犯、童年时的朋友和工人刘易斯，这样就不用为这次刘易斯在游戏厅运送大批毒品^[6]时被捕而付酬金了。巧合的是，雇凶杀人的酬金刚好和刘易斯的律师费用一样，都是3000美金。尽管刘易斯是瑞最好的朋友，也是普莱姆的大表兄，但瑞也不会再用他，因为他有毒瘾，对身边所有人都强行索要过钱。更糟的是，他还有个不好的名声——当过警察的眼线。据说几年前在警察的审讯下，他承认了盗窃事实而被捕，还交代了他义母的丈夫私藏赃物的事儿。

正是由于瑞冷酷和残暴的证言和传言，才使他的毒品买卖连锁店经营得像模像样。定期的暴力行为成为他对付同行、顾客以及那些抢劫高手们敲竹杠的必要手段。事实上，在街道买卖世界里的地下经济中往上爬，是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暴力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行、邻居、（某种程度上说还有）自身的。在外人看来，非理性的、残暴的、“野蛮的”、最终自毁的行为，在地下经济逻辑中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明智的公共关系和“人力资本发展”^[7]中的一项长期投资。在我们认识之初，普莱姆和凯撒曾用一些不太专业的词汇向我这样解释道：

普莱姆：有时你不能待人太好了，伙计。因为他们会趁机占你的便宜。真正的生活中你可以做一个好人，但要在街上混，你得凶狠一点。比如常讲一些“滚他妈的蛋！”或“我操”这样的话，以后才不会有人敢对你怎么样。

凯撒：对，就像我。大伙儿还都以为我很凶呢！

普莱姆：在这儿，在街上你就得凶狠一点。

凯撒：对这些邻居就得凶一点，菲利普。[枪声响起]我怎么跟你说的？

你不能让人当软柿子一样捏，那样别人会瞧不起你。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得让别人认为你很酷，这样才没人敢打你的主意。

你不是真的想变成恃强欺弱或凶残的家伙，但你不能让别人欺负你，那样其他人见了也会来欺负你，你会得一个“没种的黑鬼”的臭名。

不过也有办法不惹是生非，甚至不用去攻击任何人，但你得有办法让别人说“那小子好酷！别跟他混在一起”。

然后，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彻底的暴力。

意识到瑞在游戏厅前对我的警告的潜在后果，我尽量避开不见他。普莱姆和他的眼线刘易斯用心地保护着我的安全。我们还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以便我可以正

常造访游戏厅而不会碰到瑞。普莱姆“雇”了街角上的一个吸毒者当眼线，一旦瑞的车朝这边来，就吹口哨提醒我回家避难。

就这样在游戏厅小心翼翼地度过了几个星期，我还是没能正常地工作。普莱姆警告我说瑞做了一个跟我有关的梦：

瑞梦见你是个特工，就像联邦警察或缉毒警察，是专门派来做奸细的——还不如梦见你从火星或其他什么地方来的呢。

因为梦在波多黎各文化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而人人都很重视这个梦的象征意义。梦和非裔加勒比海人的萨泰里阿教(Santeria)的宗教活动融汇在一起，其含义比在纽约市中心出生的第二三代波多黎各人的混合的“纽约文化”更为深远。

我在快克买卖点的暗中造访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一天晚上瑞没有开车，步行来到这里，让正在大声讨论着的我们着实吓了一跳。普莱姆和我当时正在劝凯撒，当时他喝多了，碰巧在发泄对瑞的独裁主义行为的愤懑。因为频繁的毒瘾发作和发酒疯，凯撒被人叫作“C地带”(C-Zone，意思是“自由由我”)，他无缘无故的暴力习性必须得看紧一点。我们在安慰他时，其实一直在警告他瑞是不容许在他的买卖点里不守规矩的。

凯撒：瑞一直说[抱怨]他要赶我走？

普莱姆：别担心，安静一点，别担心这事。

凯撒：我告诉你，瑞这个狗娘养的、最肥最懒的家伙！喝布德威斯斯的混蛋[停下来在垃圾桶里呕吐]……这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他不想让别人赚钱。我，我要教训这小子……我，我要杀了这个米其林男人(Michelin man，源于米其林轮胎公司上世纪经典广告形象“轮胎男人”，形容人又肥又壮)，我不杀他是想搞掉他。

[看着我]你把这些都录下来了？菲利普，去你妈的！

[转向普莱姆]你废话太多，普莱姆，你害怕那个狗日的！我要杀了他！杀了这个狗娘养的。我要杀了他……这个又黑又丑的黑鬼、肥牛。

[又转向我]如果我没醉，我会害怕他。不再说这些没用的了……[指着录音机]可既然我醉了，我要杀了这个王八蛋。明白吗？[对着麦克风尖叫]我要杀了那个王八蛋！

普莱姆：[用挑衅性的口气说]你不会的。

凯撒：[语调清晰]我会的。我还要杀人，那混蛋像疯子一样，我不是受警方监管的对象。怎么了？你就从来没那样想过吗？伙计。

普莱姆：傻子才会那样想呢！

凯撒：想想吧！我应该成为一个杀人凶手，伙计。

普莱姆：你相信他的话吗？菲利普。

菲利普：我相信。只是，他杀人时我可不想在现场。

当时我们正在劝说凯撒不要太冲动，瑞却悄悄地走进了游戏厅。他对我笑笑，跟我开了一个无关紧要、不伤大雅的玩笑，说我看起来那么瘦，裤子多么的不合身。我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平静了许多。我们都释然地笑了，连和我刚才一样突然沉默而不知所措的凯撒也笑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和瑞的关系逐渐缓和下来。到年底时，我们俩已经恢复到失礼冒犯他之前的状态。我欣然记得他开始像从前一样跟我打招呼：“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完成了吗？”以此告诉身边的人他已经正式允许我打探他的个人事务了。

瑞的随从们因为害怕他和他的暴力行为并没有一如既往地尊重他，但他圈子里的一些老成员却是真心地喜欢他。他有回报这种友谊的能力。凯蒂（Candy）就是他童年的一位老朋友，是他几年来仅有的两个女性雇员之一。她曾这样说起过他：

他就像个岗比熊，一个顽童，一个不错的小伙子。[若有所思地说]他很凶，但还不至于让人恨。

我们相处得就像亲兄妹。他经常帮我，不让我犯错。他给我钱完全是出于他善良的内心。

文化资本的障碍

不管瑞是个岗比熊、凶残的性变态者还是个“有权势”的、全能的街道混子，在和我的交往中，瑞最终还是暴露出隐藏在其街道表面现象下的脆弱。私下和他谈起他未来的愿望时，他经常显得很幼稚，甚或表现得认识能力低下。与他成功地经营快克零售买卖的能力大相径庭的是，他根本不懂合法社会中错综复杂的规章制度。

借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分析模式，瑞缺乏成功迈入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世界所必要的“文化资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1年8月我离开纽约时，我俩的关系再次出现了问题，但这次是因为他对我太过信任所致。他希望我能成为他走向外部世界的文化经纪人，请求我帮他洗黑钱。这件事是从一次无关紧要的通话开始的。“菲利普，你知道我怎样才能搞到一张身份证照片吗？”

尽管瑞有好几辆汽车，口袋里也塞满了鼓鼓囊囊的美钞，但他连一张驾照或是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其他证件都没有。离开哈莱姆东区街道这一把大伞，瑞在外面的世界里举步维艰。他对于怎样和官僚政府机构打交道一无所知。申请驾照时，纽约机动车管理部门拒绝了他出生证明上的照片，执意要他照一张身份证照。我告诉他什么是护照，怎样办护照。后来他叫我陪他一起去了妨碍他成为合法企业家的所有官僚机构。他还叫着我和他一起去了由纽约市资助的、一年几次的警察拍卖会，查看了那些因欠税或经营毒品破产后充公的楼房的名单。他琢磨着买一栋废弃的楼房，重新改造，然后开始做一些正当生意。为了尽可能不伤害到他，我总在找借口以防不知不觉中变成他洗钱计划的帮手。当然，这个计划后来因为与立法部门或与所有正式文件相冲突而毫无悬念地搁浅了。

瑞想做的第一笔正当生意是建一个钱庄。但他费尽心机也没能得到迷宫般的官僚机构的许可证，几周过后他放弃了。后来他买了街角处的一个酒吧，其实是一个杂货铺。他想，这回总该能拿到二手的经营酒饮权和健康许可证了吧，但没想到又和官僚政策相背而不得不放弃。他涉足的最成功的合法生意是在离他的游戏厅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买了一个旧服装厂，并将其改建成“合法”的社交俱乐部，出租给那些开 party 的人，或是用来售卖不需要经营许可证的啤酒。他很是为此得意，并认为这种经营绝对合法，因为里面绝对“干净”。他明确表示不许在那里买卖毒品。纽约市局在残疾人法令颁布实施之后，于1992年以内部没有轮椅通道为由关闭了这一俱乐部。

直面种族、阶级和警察

住在快克买卖现场，瑞是我必须想法平衡的许多复杂的个人关系和种族矛盾中的一员。在我有能力结识毒贩之前，必须正视美国强势的种族和阶级隔离的事实。当我第一次搬进那个像火炉般灼热的公寓时，它的对面有一座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公建

工程住宅楼，那里住着 5000 多户人。^[8]搬到那里后，每次试图进入街道上的毒品买卖点，我都会痛苦地感受到自己外来者身份带来的烦恼。我第一次从地铁站步行回家，碰巧走进一个胡同里的“毒品交易角”，那里有六个不同的公司竞相以 10 美元的价格出售带有官方印章的玻璃纸袋包装的毒品。我刚拐进胡同，就听到阵阵的口哨声和喊“降价”（“bajando”）声，这是在外面放哨的人警告那些兜售毒品的人便衣警察来了的暗号。我眼前的所有人像逃离瘟疫一样，迅速散去，街区里的人一下子稀疏了很多。我顿时觉得自己像是受了病毒感染，白色的皮肤标志着自己已经到了传染病晚期，一路上散播着浩劫和灾难。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因为正是此前一直感到孤独，我才特意走了一个街区的路来到这个热闹的街角，想享受一下这里的热闹喧嚣。我天真地以为，人群熙熙攘攘表明这里是一个集市，从小城镇往日的遗风中一路延续下来，像春日里的一抹亮色，会为哈莱姆东区平添不少色彩。

毕竟，是我的白皮肤、像吸毒者一样的外表，而不是秘密毒贩的身份成了我接近快克买卖点的最大障碍。街道上那些毒贩都对我敬而远之，从来都不会主动骚扰我。反倒是在路上巡逻的纽约市警察会经常拦截、搜查、谩骂和侮辱我。在他们看来，一个白人男孩除非是个便衣警察或吸毒者，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在那个地方出现。因为我很瘦，所以经常被视为后者。仅有一次，我被一个愤怒的警察拦住时，我成功地扮演了一次缉毒警察。当时我正在街区拐角处的一个廉价品酒吧，和普莱姆的一个兼职眼线一起买冰激凌三明治和啤酒。一位个头高大的白人便衣警察把我推到冰淇淋柜台对面，分开我的双腿，在两腿间搜摸了一通。在他快要碰到我右面口袋里鼓起的东西时，我在他耳边悄声说：“是录音机。”他赶紧后退，放下掐在我脖子上的左手，嘟囔了一句几乎听不见的“对不起”，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脸之前，就匆匆走开了。很显然，他以为自己冒犯了一个外片来的便衣。当时驻扎在酒店前卖大麻的人，看到那个警察在我的内裤里乱搜乱摸的粗暴态度后，立即放松了警惕，相信我不是个便衣，而是个吸毒的白人。其中一位个头很高、眼里泛着光、一看就知道是刚服用过天使乐的人，则立即飞跑出门去抢劫外面排队等着付款的队伍。

平均两个月一次的和警察的遭遇，大都不怎么顺利。最糟的一次是第一次，凌晨两点，我在离住处三个街区远的毒品买卖点和一个毒贩交谈，他是我的邻居的前男友。他让我等他，说刚值完班，就等着夜间值班经理来拿回收据后去参加一个“派对”，要我和他一起去。我很想讨好他，很高兴终于找到可以带我步入一个全新的、特活跃的毒品买卖场所。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同行、对手，说我是一个多年失去联系

的老朋友，他前女友的邻居，这样一说，打消了别人对我的怀疑。就在这时，巡逻的警车突然呼啸而来，停在我身边，灯光闪烁，警笛长鸣。让我吃惊的是，警察不是冲着我认识的那位毒贩，而是冲着我喊：“嘿，白人小子，过来。”接下来的15分钟内，我发现自己被越来越多的贩毒、吸毒者、放哨的人围观，而警察则不住地吵我，骂我，羞辱我。我错就错在当晚向警察说了实情。“你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当听到我用一个警官的语气说自己是一社会学家，专门研究贫困和边缘化现象时，坐在车里的那个大号警官叫道：

那你说说我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以为我很傻，是吗？你这个混蛋瘾君子，白人中的人渣！去白人居住区去买你他妈的毒品去吧！赶快给我离开这里！否则我带你去局子里去！想让我带你进去吗？啊？啊？回答我，王八蛋！

无助的反抗只会使他们更恼怒，所以我只好低头看着地面说：“是！先生！”并乖乖地走向车站乘车回家。他们在我身后喊道：“如果以后再让我在这里碰见你，白人小子，我非带你到局子里去！”^[9]

我最终学会了怎样见机行事。第二年，当警察把我推到墙上，让我伸开四肢搜查枪支和毒品时，我不再那样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了。不过我的口音却成了一个难题。哈莱姆东区的警察大多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说的是口音很重的爱尔兰或意大利英语。我们社区里那些波多黎各人或黑人孩子们都很羡慕我的发音，认为我说话很像电视里的广告播音。可与他们不同的是，这些警察却认为我在取笑他们，或是当我用完整的句子很礼貌地讲话时，他们更认为我是在变本加厉地嘲笑他们。我意识到自己唯一的希望是眼睛盯着地面，尽快掏出驾照，只说“是的，先生！”或“不是，先生！”诸如此类简短而事实性的词语，尽量缩短和他们接触的时间。如果我说话听起来真诚、友好或彬彬有礼，就会有伤害他们的危险。

相反，警察待我很礼貌时，他们的行为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冒犯隐含的种族隔离法令的感觉。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出门，被一个巡逻的警车追上，问我是否迷了路或脑子出了问题。“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吗？这里是哈莱姆！”还有一次我坐在我家门廊边，欣赏只有纽约的烟雾才可以产生出的五光十色。一个过路的警察问我：“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赶紧拿出驾照，上面的住址可以证明我有权在此逗留。他不相信地笑道：“你是说你住在这里？你没事吧？”我带着歉意解释说，这里房租便宜。

他很热心地建议我还是到离纽约市机场很近的女王区一个多民族、种族划分严明的工人阶级区找一个便宜点的房子住。

种族主义和恐怖文化

促成美国城市中心种族隔离现象的不仅仅是警察，种族主义者的“共识”迫使白人和各种肤色的外来中产阶级人士都不敢冒险走近贫困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居住的地段。就拿我来说吧，当我搬进哈莱姆东区时，几乎所有的朋友，不管是白人、黑人还是拉丁美洲人都谴责我的疯狂和草率。来拜访我的人经常提前打电话，希望他们一下出租车我就能下楼去接他们。说真的，至今大部分人还认为我“逼迫”妻子和孩子在哈莱姆东区的公寓楼里一住就是三年半的时间，是一种神经质和不负责任的行为。90年代中期我离开那里时，几个朋友还特意祝贺我，所有的朋友都为我松了口气。^[10]

美国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相信，一旦他们涉足哈莱姆区，肯定会被凶蛮、愤怒的当地居民抽去肋骨的。199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哈莱姆东区日日有危险。当地的110599人分别由51%的拉丁人/波多黎各人、39%的黑人和10%的其他人组成。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当地都没有遭遇过抢劫，如果有的话，也绝没有任何规律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街坊里住着的白人可能会比他们的黑人和波多黎各邻居更安全，因为许多想抢劫的人都会认为，白人要么是警察，要么是吸毒的，要么两者都是。因此他们在袭击前都有顾虑。普莱姆的第一位眼线凯撒，首次给我解释了这一现象：

菲利普，大家伙以为你是个联邦警察或什么的。但这也不错，这样他们就不敢碰你。

你想想，如果你在街上卖那玩意儿，看见一个白家伙走过来，你肯定不愿去惹他。

但大伙也会这样想：“他是个白人，住在这儿，他肯定疯了。”如果不是这样想的话，他们肯定会走过来煽你的脸，再把你的钱包给抢走。

你很幸运。看看我，我是个波多黎各人。如果我走进本松赫斯特(Bensonhurst)区，^[11]他们会说：“走，去教训教训那家伙。”他们会以为我疯了或怎么样，但他们会来检查我或踢我的屁股。

我在哈莱姆东区夜晚的每一个时辰都出来散过步，只被抢劫过一次。那是凌晨两点发生在一个商店内的事，当时那里所有的人都被打劫。我的妻子（她是哥斯达黎加人）从来没有被抢劫过，她经常在附近自由穿行，只是天黑之后她会有点怕。但在同样长的时间里，住在商业区较为安全地带的我们的朋友当中，至少有六人被抢劫过。我不想有意强调哈莱姆东区有多安全，我的房东，一位70岁的菲律宾人，就是在大白天从公寓的一楼里走出来到我们这栋楼的半道上被抢劫的。正如我在引言里提到的，人人都在担心真正受袭击的可能性，就连瑞圈子里那些最粗暴的毒贩，天黑后如果带钱或毒品外出，也都会叫上朋友做伴。

暴力不可能降低到像统计学计算的结果一样，那将意味着发生在任何一个市中心贫民区的多数凶杀案和打人事件都被限定在那些直接参与滥用毒品和地下经济这样一些小小的团体之内，或是那些明显易受攻击的人，比如瘦弱的老人身上。街道文化的暴力渗透于哈莱姆东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主流社会以一种与其真正的危险完全不相称的态度来看待少数民族聚居区。原因之一是，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即使对旁观者不会形成身体上的威胁，也会使其触目惊心，过目不忘。比如，在我居住在哈莱姆东区的前十三个月里，我曾亲眼目睹过一些暴力事件：

- 窗外一个女毒贩遭到手枪致命的一击（她是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
- 当地一个黑社会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用机枪扫射了一个彩票中心（同样在我的视线之内）。^[12]
- 我和妻子在一家比萨店用餐，目睹了一场警车交战和追击的场面。
- 我的公寓楼附近，一位拿不到酬金的供应商放火烧掉一间储藏海洛因的屋子。
- 六七起触目惊心、血肉横飞的打斗。

不过，以上这些事件没有一起危及我的人身安全。但其伤害性和恐怖性却给人留下一种恐怖事件无处不在的假象，而且这种假象远远大于成为统计中的受害者的可能性。^[13] 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在分析南美洲和纳粹德国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环境时，新造了“恐怖文化”（culture of terror）一词来表述普遍的暴力对一个脆弱的社会所具有的支配性意义。^[14] 在当今哈莱姆的西班牙人聚居区，恐怖文化活动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安宁地居住在附近的大多数人保持沉默。他们远离这一社区，并逐渐憎恶那些参与街道文化的人，在此过程中，有时还会内化为种

族主义的模式。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对自己邻居的不信任。^[15]相反，主流社会却在不知不觉中利用恐怖文化的形象，使受害者和施害者丧失人性，为其不愿勇敢地面对种族隔离、经济边缘化和公共部门的衰退进行辩护。

我在哈莱姆东区居住的那些年里，总有一种出于职业和个人的考虑，否认或是把恐怖文化“正常化”的欲望。很多当地居民都运用了这一策略，他们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以应对每天发生的暴行带给他们的惊恐，从而保持一种身心的健康和安全感。为了在我的街道人种学方面取得成功，我不得不放松心情，在街道上找乐子。在外面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谈天说地时，我必须感觉很舒适。白天，有时甚至是在华灯初上的傍晚，哈莱姆东区也会充满温馨和情趣。孩子们四处跑动，快乐地喊着，玩着捉迷藏的游戏；邻居们出门遛弯儿，时不时会停下来友好地聊上几句；从一栋楼房第10层的窗户里传来喇叭里放着的萨尔撒舞曲，街上的行人会自由地和着乐曲跳上几步。简言之，尽管有暴力存在，但那种浓浓的社区情却让人感同身受。事实上，大多数居民甚至都能叫得上自己憎恶或怀疑的邻居的绰号。

我是在曼哈顿的丝袜区长大的，那里离哈莱姆东区南边边界只有七个街区的距离，被标为东第96条街。在温暖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里和哈莱姆的西班牙街交相辉映。我一直很欣赏那里人人共享公共场所的感觉。我是在安全的城市商业区的楼房里长大的，那里的邻居们没有绰号，乘电梯时人们从不打招呼，也不点头。^[16]我喜欢幻想出一个气氛友好的公共场所，哈莱姆东区里占多数的工人阶级在白天都可以畅所欲言。是那些毒贩们打碎了我乐观主义的情绪，并坚持认为我应该敬重那些少数的暴力分子，因为是他们冲击波来临时控制着街道。举一个特殊的例子，快要搬离那里时，有一次在游戏厅，我对凯撒说这里还算安全。他听后震怒、滑稽的表情反应特别有趣，让人联想到极其含混的恐怖文化圈子，是通过这些可以保护我们的人的明显的凶残来表现的。罪犯和警察都受制于恐怖文化的法则。

凯撒：你们这些爷们听着（招手让普莱姆过来），（转向我）菲利普认为这个社区很酷。

好，让我告诉你，菲利普，今儿早上发生了什么，一整天这一街区都乱糟糟的，连新闻都不用看，只要看看窗外就明白那一个个谋杀和警察镇压的事，一切。还有大火，各色各样的垃圾、废物，应有尽有。

一切都是由两个吸毒者对一个女孩的骚扰开始的——一个老一点，一个是黑人小伙子。他们把女孩打翻在地，抢走了她的珠宝，用拳头猛砸她的眼睛，

还一通乱踢。女孩在尖叫，老男人接着继续踢她。大概是下午两点钟左右的事儿。

后来警察来了，制服了他们。因为他们反抗，至少有20多名警察用脚踹这两个黑鬼。

他们真不该他妈的反抗，那可是在玩命。警察在那男孩脸上一阵狂煽。该死！他们是在要他的命，后来叫了两辆急救车。

他们的同伙也受伤了。两个人都躺在担架上，血流不止，看不清人样，血肉横飞的，可警察好得意。

和平常不一样，镇压时把你狠狠地扔进警车就可以了。我是说，“该你了，兄弟。”（咧嘴笑着）抓住这儿（瞄准）嘣！嘣！这小子挨上了！（假装不省人事。）

布拉（Bucla）奶奶也看见了。当时她就在我旁边，惊恐地喊着，别人也在叫着：“虐待！虐待！警察在虐待！”

如果我有摄像机，肯定录下来送给夏普顿（Al Sharpton）。^[17]他们是在欺负黑人，这是一起极大的政治丑闻。

菲利普：你对警察的做法怎么看？

凯撒：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挨打，能感觉到疼痛。我知道被警察殴打是什么滋味。他们一打起来就没个完，想打死你，兄弟！他们很享受这个过程（咧了咧嘴）。

那叫加强管理，叫缓和紧张时局，叫在家受老婆气后出来发泄，叫带着徽章的恐怖主义者，就是那样！

警察都很期待那样做。他们早上起床说：“妈的，今天我要去收拾那些少数民族分子。”（舔了舔嘴唇，摩拳擦掌的。）

我知道那态度。如果我是警察，我也会那样做。因为对肩上的徽章已习以为常，已经昏了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觉得自己战无不胜，可以他妈的为所欲为。

我也会有这种想法。今天我要去伤一个人，不管他是白人还是波多黎各人。我想找乐子。我已经陷进去了，不能自拔。我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已婚男人，因为我不用带着老婆一起去。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用人来做警察，放一群动物过来不就行了嘛。一句话，因为他们还不如动物，就是一群有思想的动物而已。

制度暴力的内化过程

尽管我们不得不为警察的凶残所引发的后果担心，但这肯定不是我们平日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内心深处会有一股强大的、担心会被捕的焦虑暗流在涌动，但比起那些在拘留所收审的同伴们，我们一点儿也用不着担心警察查抄毒品买卖点的虐待行为。曼哈顿的法官们几乎从来不会把首次参与小剂量毒品买卖的人送进监狱。亲手把快克卖给便衣警察会被判2—4年缓期的重罪。我从未听说过有顾客被带来审讯，更没听说过对其判刑的事。逮捕的一个问题是，法官在安排提审某个特殊的吸毒者之前，必须让他们先在市拘留所等上28—72小时。¹¹⁸¹

我们在过度拥挤的“局子里”的命运是一个热门话题。我录音机里有这样一段辩论，是凯撒不吸毒的表兄埃迪（Eddie）在游戏厅提醒我们，如果当晚警察来扫荡，抓走我们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被鸡奸。埃迪的父亲是个黑人，凯撒确信一定会让他的反击种族化，并证明他对在纽约城拘留所里遭遇性骚扰的可能性具有不凡的专业知识。

埃迪：凯撒，你不是有一次哭着来找我，说他们把你抓进去后你失去童贞了吗？[笑声]

凯撒：（煞有介事地）嗯，他们拘留所不强暴黑人，因为害怕染上艾滋病。就连雷克监狱（纽约城最大的监狱）也不会的。

在纽约州北部地区，他们会对坐牢20多年的那些健壮、高大的黑人、斗牛犬似的黑穆斯林感兴趣。

他们对着你胡作非为，（凯撒跳到埃迪面前）因为他们比你强，身体又肥又大，正因为他们强壮所以才敢捉弄你、侮辱你。（转向我）他们就这样抓着你胳膊（抓着我的胳膊），放下来，再扭过去。（转身把埃迪压在胯下）他们狠狠地扭拧你的胳膊（用他的腿抵住埃迪的后背），就这样。（边挠头边抓头发，叫着）哇喔！

（凯撒停下来观察我的表情，接着说）他们这群王八蛋！可恶的东西！闻起来就像黑人，很壮实，闻着像詹姆斯·布朗。他们对着你乱射乱吐，你还得像小羊羔似的温顺听话，替他们洗裤头、袜子和其他狗屎样的东西。呸！这就是你们的人（凶狠地搂住埃迪）。

如果你是个新来的黑鬼（跳到我面前）、同性恋，他会追着你，紧跟在你后面不放。

如果那些同性恋者喜欢你，你的麻烦可大了。（转过身来对着我）“好了，妈的！你还想骗我，我是跟黑吉普赛人一起回来的。”

（又转身来到普莱姆面前）他们那样做，会让你也变成同性恋。街那边的人正盯着你看呢（又转身贴近我的鼻子）。

对于那天晚上凯撒的夸夸其谈我很敏感，因为纽约市警署刚刚部署了反毒的精兵强将——在哈莱姆东区被称为 TNT。^[19] TNT 成立于 1989 年，是在国家提倡向毒品说“不”的口号下，用来缓解日常暴力事件的。^[20] TNT 的特殊使命就是只逮捕街道上的小毒贩，而对于那些批量的毒品供应商则从不过问。一周前的凌晨两点钟，TNT 乘坐一辆大卡车堵住了离我们只隔几条街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快克买卖点的两头，他们连人行道上闲逛的人也一起抓起来，连街区公寓里仅有的几个住户也没放过。

就在凯撒和埃迪争相描述监狱里的强奸案的那天晚上，我忘了带驾照。没有随身携带能证明你身份的、有照片的证件注定会惹恼警察的。这一时间段的录音以我对凯撒的谩骂结束，背景里还能听到紧张的笑声。

菲利普：离我远点，凯撒！你他妈的到底在发什么神经？性变态还是怎么了？

普莱姆：我在这儿，你们这些家伙让我觉得恶心。不过我马上回来，上楼去取我的身份证。

走进游戏厅里的快克买卖点

刚来这里的前几个月，我还没有开始探讨美国如何使市中心隔离合法化，或者受害者是如何强化自身的社会边缘化的野蛮程度这样一些理论性的问题。我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让我们街区内毒品买卖点的经理相信我不是个便衣警察。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见他的那天晚上的情景。邻居卡门（Carmen）是一位 39 岁的奶奶，我在三个月内见证了你对快克入迷进而变成一个无家可归、仅剩下 99 磅重的泼妇，再到遗弃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孙子的过程。是卡门把我带到游戏厅经理面前，用西班牙语介绍道：“普莱姆，认识一下我的邻居，菲利普。他来自于本街区，想见你。”

当时我很激动，想着这下可有机会进到快克买卖现场了。但普莱姆害羞得笑了笑，转过身把脸藏了起来。他望着外面的街道，用西班牙语问卡门，好让我也听得懂：“你是从哪个警区把他弄来的？”我慌忙介绍说自己不是“便衣”，只是想写一本关于“街道及其周边”的书。但我没有把自己硬推介给他，相反我买了份啤酒，悄悄溜到后面停着的一辆汽车旁边。情急之下，我还买错了啤酒的牌子，很是尴尬，因为这种牌子的酒在市面上很不受欢迎，连普莱姆都不喜欢它的味道。普莱姆只喝一种名叫“私藏”的16盎司的新牌子的麦芽酒，在这种酒随处可见的广告牌上，有几个漂亮的棕肤色姑娘，身上很随意地搭挂着豹皮，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吸引着市中心贫民区街道上年青一代的酗酒者。

那天晚上过得并不顺利，但不到两周时间，普莱姆对我渐生好感。有了他，我每天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几次穿越游戏厅去超市、汽车站或地铁。普莱姆通常会站在所谓的音像制品店的外边，身边围着一群争宠的少女。起先，我们只是客气地点点头。一周后，他对我说：“嗨！伙计，你喜欢喝啤酒吗？”然后我和他15岁的女友玛丽亚（Maria）及眼线大奔（Benzie）喝起了私藏牌的啤酒。大奔的原名叫贝尼托（Benito），按照英语发音和人们对奔驰车的崇拜，人们直接叫他大奔。大奔是个身材矮小、嗓门特大的20岁的小伙子，他在街道上的狂妄自大掩饰了达姆弹射中他的股骨留下的一瘸一拐的后遗症。

酒过三巡，普莱姆邀请我走进游戏厅后面储藏快克的油布围成的围栏，我的心止不住一阵狂跳。他打开10分硬币一包的粉状可卡因，是“我即世界”牌的。这种牌子与80年代庆祝埃塞俄比亚饥荒解除的摇滚乐同名，穿过街道，在那个半个社区长的壁画下面就可以买到。“你吸吗？”我很担心拒绝他可能会破坏我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融洽和谐的关系，说得更严重点，甚至有可能会证实我就是个便衣警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普莱姆和他的眼线大奔都为能与我这样“不吸毒”的“好人”交往而得意。那是我第一次面对街头伦理中深刻的道德（甚或是公正）矛盾：把任何一种毒品滥用都视作邪恶的事，即使几乎街道上每个人都忙于吸毒、注射或叫卖毒品。

普莱姆、大奔和玛丽及其当晚在场的所有人，从前都从未面对面地和一个友好的白人交往过，因此，当他们纯粹是出于兴趣而非获取毒品或做其他恶事时，他们会觉得很放松。之前和他们这么近距离交往过的白人都是校长、警察、巡警和发脾气的老板，就连他们的老师和社会工作人员大多数也都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尽管

普莱姆有点担心我的身份，但他掩藏不住对我的好奇。几个月过后他向我吐露，他一直想找机会和一个活生生的、代表主流文化的、“不吸毒”的美国白人“谈谈”。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定时去游戏厅的快克买卖点呆上几个小时，和普莱姆以及大奔、埃迪等当班人员交谈。让我吃惊的是，我成了那里颇有威望的人。那里的常客实际上都想让别人看见他们和我在一起。不知不觉中，我走进了权利关系领域，我的出现在那里威胁到了他人。因此我的下一个挑战就是打破颠倒权力关系必不可少的“印象—管理”的游戏规则。比如，我触发了普莱姆心中内在的种族主义思想，基于此，他急于表现得比我们周围的这些“社会渣滓”都优秀，一直努力使自己有别于那些“在工厂干活”的“无知的波多黎各人”。当他告诉我和我交谈有益于他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时，我很惭愧。可他那时仍然认为我是个便衣警察。认识他几个月后，他对我说：“我不在乎明天你会不会来抓我，我就想跟你说话，你是个好人。”直到三年后，普莱姆才开始这样随意地把我介绍给别人：“他，是个白人黑鬼。我



在普莱姆母亲的公寓楼道里录音。

照片提供：Susan Meiselas。

们经常来往。”事实上，我至今还记得被封为“名誉黑人”的那个晚上，当时普莱姆喝多了。为了确保他在电梯坏了后爬楼梯不会遭人抢劫，^[21]我陪他一起回到他的女友玛丽的姐姐住的高层公建住宅楼里。安全到达后，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门口，抓着我的双肩感谢我说：“你是个不错的黑鬼，菲利普。你是个好黑鬼。明天见。”

两年后的一个元旦假期，凌晨两点钟，在普莱姆母亲的高层公建住宅楼的天井院内，普莱姆和大奔刚刚吸过由海洛因和可卡因合制成的“速效丸”，就说起了他们在游戏厅时对我的第一印象。普莱姆撕开用玻璃纸包着的10美元一包的海洛因，用房门钥匙放进白色粉末里沾上一点放在左鼻孔里深吸了一下，然后又熟练地

用同样的动作往右鼻孔塞了两次，最后叹了口气，让我把正在喝的一瓶40盎司重的英国产麦芽酒递给他。大奔则把价值15美元的可卡因放在一美元钞票上卷起来，用拇指和食指不断地捻搓，把其中的块状和颗粒状的东西碾碎便于吸用。他把一张书的封面卷起来，在一小堆一英寸长的粉末里沾了点，一本正经地吸过两次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它搁在楼梯座位的角落里。

普莱姆：菲利普，我第一次见到你，一直在捉摸你到底是谁？但我待你不错，因为你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当然对你好了。（又要可卡因）我把你当朋友一样对待、敬重。

大奔：（打断普莱姆，把酒递回给我）菲利普，我要告诉你实情。——他知道（指着普莱姆）第一次见你，我觉得你是个……不太寻常……还是不给你说了。（用普莱姆的钥匙吸海洛因）

菲利普：（一边喝着酒）没关系，尽管说，我不会生气。

大奔：好吧！嗯……嗯……（转向普莱姆，不敢正视我，又吸了一下）对，你记得吗？我以前告诉过你，是吧。他说话的方式，他过去的样子。我以为，或许……是吧。……你叫他什么来着？有些人有两重特征。尽管你有老婆，我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地道。

不过确实是因为你说话、做事的方式有点怪，总是问很多的问题。好多同性恋的人就那样——是吧。总想知道你的事儿。

但过一段时间，我认识你之后（从我手里抓回酒瓶），知道了你的为人，对你了解多了一些，可内心还那样想，“哥们儿，但，但这个黑鬼是同性恋”（喝了一口）。

普莱姆：（打断大奔）该死！住嘴！你会让他难为情的。（胳膊放在我的肩上）就因为你是白人，他一直想“这个白人小伙子到底是谁？”

菲利普：因为我的口音？声音？还是走路姿势？

大奔：对，你的口音。

普莱姆：（打断大奔）我告诉他你是个社会学家，你说的话很有智慧。我是说，你有自己的主见。或许个别词我们听不懂，但总的来说还行。

但你说西班牙语时确实有点不一样，真不一样，你说的西班牙语像西班牙人一样。

连我妈都以为你是个同性恋，不过，那是因为她只在电话里听过你说话。（有枪声传来）有一天她问我（用西班牙语），经常往这儿打电话的那个白人小伙子是谁？是个同性恋吗？

我说：（仍然用西班牙语）“不是，他是个教授，会讲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当时听到这些，我禁不住有些恼羞成怒，因为当时我还自负地认为自己挺有城市底层生活能力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倒很释然，在实习的头几年内，我对街道上的各种迹象一窍不通，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有时是在传递一些“肮脏的性变态者”的信息。我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形象在街道文化敌视同性恋的背景下，很可能妨碍了我和那些毒贩建立融洽关系的能力。

街道上黑人与波多黎各人的关系

哈莱姆东区的种族矛盾并不仅仅局限于与白人间的冲突。瑞的社交圈内部就有严格的种族区分，他的圈子几乎全都由生于纽约的第二代波多黎各人组成。^[22] 尽管瑞和他雇员当中一半以上的人被盎格鲁人界定为“黑人”，但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很敌视非裔黑人。给瑞干活的二十多个毒贩中，只有两个非裔黑人，而且他们的名字还都已经西语化。比如别人称塞拉韦斯特（Sylvester）为加托（Gato），在西班牙语中是“猫”的意思；另一个名叫胡安（Juán）的非裔黑人私下里对我说，他发现药店边上的快克俱乐部里的气氛明显很不友好：

这里的黑人与波多黎各人真的处不好。看见那个牌子没？上面写着“拉丁家庭”，好家伙，有些人很看重它。这简直就是种族主义。我要想跨过那道门，必须有目的和意图。如果我走过去，坐下来跷起腿，他们会突然之间集结起来，用西班牙语说：“你，你是干什么的？”然后用英语说：“你，你最好安分点儿。”

在游戏厅里，凯撒对于种族关系表现得更为露骨——至少是在他喝多的时候：

我是3K党，专杀黑人。知道我为什么恨黑人吗？他们又黑又臭，闻着像狗屎似的臭，而且还很懒。我对天发誓，我讨厌他们那帮无礼的家伙。

我甚至讨厌那些长有非洲人卷发的波多黎各人，我像讨厌其他一切黑人那样讨厌他们。（用手抚弄着普莱姆的头发）普莱姆的头发就是这样，又卷

又黑，我他妈的杀了他。

（转向我）我也恨白人，想把他们统统杀光，但不包括你，菲利普。你是个好黑鬼。但如果你不和我们来往了，我会杀了你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那些黑家伙吗？因为他们杀了我姐姐，在楼道里砍了她18刀。我恨死他们了，他们凭什么那样待我？我他妈的已经受够了，我恨所有的人。

凯撒明显的种族主义言论，仿效了地下经济中具有完全霸权作风的黑人的街道文化。

我过去一心想当黑人，想有黑人那样的作风，因为他们更坏。对，坏透了。

我那时最喜欢黑人小孩，因为当时我正学着怎样从水果摊位上偷水果之类的东西。黑人的穿戴还很夸张，很粗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看起来很野蛮的那种，像黑人自己。全是黑的，很酷。

因为过去我身边的西班牙人都很懦弱，你知道吧。

瞧瞧现在，奇装异服都是从那些黑家伙开始的。

那样的穿着很是时尚。

尽管种族冲突、阶级分化以及平日里的街道时尚很复杂，但瑞圈子里的人最终还是接纳了我，大多数人还真的喜欢和我来往。当然，瑞的关系网的周边或其他社交圈子中，也有十来个人始终不信任我，尤其是那些黑人和年轻一点的波多黎各毒贩。他们对白人社会的态度远比其父辈或其他同伙更明确、更敌对。然而，作为一名“教授”和“社会学家”，我觉得很惬意。有好几次，瑞圈子里的几个哥们，还有几个局外人突然走近我，生气地质问我为什么不记录他们的故事，他们说自己的经历“至少可以占我这本书一章”的篇幅。我起先担心本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可能会憎恨我这样一个局外人用他们的生活故事来构建我的学术生涯，但我的最终目标是回报这一社区。当和瑞及其雇员们谈及我要写的书是“关于贫困和边缘化”问题，并期望人们通过此书对主流社会所造成的市中心贫民区问题有所了解时，他们都认为我疯了，并对我关于社会责任感问题的关注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巧取豪夺，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想写一本能赚大钱的畅销书。除了本书出版的当天那次聚餐之外，他们可从来没想到要从我的这本研究项目书中得到些什么。有好几次，我坚持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从我的研究项目中得到一些实质性

的政治利益，但却遭到他们侮辱性的反应。

凯撒：菲利普，你说那么多顶什么屁用。

就像、像我们在奥普拉·温弗莉（Oprah Winfrey，美国“脱口秀女王”，著名电视访谈节目黑人女主持）或多纳休（Donahue）的节目中看到的一样，什么屁作用都不起。那不会对社区有帮助，也不会对我们有帮助，更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一丁点儿。全是废话！空磨嘴皮子。

我当然希望凯撒说的话是不对的，但或许，他的怀疑主义要比我的理想主义更现实。

我的科研工作做到一半时，我和本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已经建立起很深的友情。他们很配合我的写作习惯并强烈要求我进展得快一点，他们想成为这本“畅销书”的一部分。有一次我的手腕和前手臂得了肌腱炎，不能长时间地打字，心里很郁闷，凯撒和普莱姆真的很担心我，也很失望。此时我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一种神交的地步。

凯撒：（抓住我的胳膊扭起来）别放弃我们，菲利普。别停下来不写了，否则我会揍你的。

（转向普莱姆）我觉得菲利普有点心不在焉了，我们得给他点压力。

（笑了笑）你在这里可是我们的榜样，你可不能他妈的一事无成，否则我们会杀了你。我们说到做到！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们，除非我拿到写有你名字的书，作为一生的纪念。不管怎么说，你得给我留一章的内容，我知道我说的话会在你的章节里出现，因为我的故事不错，你不会把它们删掉的。

（拥抱我）我想，学生肯定会比这个老师更高级、更有智慧。菲利普有压力，他遇到作者们常碰到的思维停滞问题了。

第二章

哈莱姆东区街道的历史

（哈莱姆东区）是孕育各种犯罪者的温床，孕育出一起起吸毒、偷盗、抢劫、欺诈和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得出的违法事件。这个国家充斥着来自这里的罪犯们。出租车在天黑之后不敢从第二大道东 113 条街上穿行，装甲车可能会是这里唯一安全的交通工具。

——天主教牧师，1930 年代^[1]

本书中描写的快克贩子及其家人详尽的生活细节，是不能放在历史的真空中去理解的。纽约市中心贫民区第二三代波多黎各移民，应该被置于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受压迫的殖民历史背景下来解读。波多黎各岛位于加勒比海中间地带，是穿越大西洋航线的枢纽。其战略性地理位置几乎从哥伦布 1493 年首次踏上这个岛、1508 年庞塞·德·莱昂（Ponce de León）控制了这里起，全世界各超级大国都对此地垂涎三尺。无视这里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和当地人的切身利益，无端的战略军事阴谋成为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他们蛮横地扭曲了这个岛上的政治和经济，对它的控制达五百年之久。尽管最早的西班牙殖民者运来了非洲奴隶并建立起甘蔗种植园，但波多黎各从未成为一个在经济上赢利的殖民地。最为重要的是，它一直是军事控制的中心。因此西班牙在整个 19 世纪仍竭力维持着对它的统治，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美洲其他国家独立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里才得以独立。更为近代的时候，波多黎各在上世纪获得多种政治经济发展形式的失败，引发了 20 世纪最大的人口迁移混乱。

美国人在 1898 年进军波多黎各后，沿用了西班牙的统治形式，他们对这里进行的军事管理远远胜过对其经济发展的关心。从 1952 年起，这个拥有“自由联邦”这一模糊政治称呼的国家隶属于美国，但其民众却没有选举权，也没有参选代表，民众们的殖民身份经常受到联合国的谴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多黎各人对他们

的政治“大恩主”却有着财政义务和责任。正如150年前的西班牙政权一样，美国政府花费大量财力以确保对这里进行军事、政治控制，扶植着根本没有清偿能力的经济。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以食物券和社会安全保险的形式给波多黎各人提供适当的补助，这些补助占据波多黎各人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一。1992年，有50%的波多黎各人有领取这种食物券的资格。^[2]在游戏厅值班时，凯撒巧妙地总结了波多黎各和美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凯撒：美国认可波多黎各的唯一原因是它离古巴很近——是消灭这里的共产主义的便道。我是说，我们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来：没有自然资源，没有石油、金矿，连饮用水都没有。一无所有。

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酒吗？他们已经有肯塔基、田纳西了，所有南部各州都生产酒。

从波多黎各的乡巴佬到西班牙的快克贩子

20世纪初，美国积极改善波多黎各的经济结构，但比西班牙人统治时期更漠视当地的需求和文化发展。对这里实行军事管制之后，美国又把土地和权利都集中到大型国有农业出口公司的控制之下，成千上万的小农户不得不离开故土，去那些占据了波多黎各沿海肥沃的平原地带的大甘蔗种植园找活干。二战以来，这些无立足之地的农民和他们的后代经常被称为“鸡巴罗”(jibaro)，译成英语就是“乡巴佬”，意指那些穿着破烂不堪、独立的、靠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的典型的农民形象：头戴草帽，手拿宽刃刀，一天劳作过后，蹲在老家拥挤的平台上，被人围观。面对殖民者的影响、控制和他们的飞散经历，“乡巴佬”这一词尽管带有一定的贬义，却已成为波多黎各人自我尊重的文化完整性的象征。“jibaro”在西语里是“野蛮”的意思，指的是那些拒绝在西班牙殖民种植园里当砍甘蔗工而逃跑的非裔奴隶、美洲印第安人及欧洲人和摩尔人中的偷渡者。整个18、19世纪，他们定居于岛内崎岖不平的山区，不愿意接受西班牙殖民统治下高层社会的法律和习俗，生活在以城市为基础的国家管辖范围之外。^[3]

以往的乡巴佬社会出于一种不屈的自我尊重感，拒绝殖民地种植园里挣工资的劳工身份和上等的西班牙文化形式，这一点恰似街道文化对美国社会的剥削和边缘化的抵抗。同时，“乡巴佬”这一概念不应该被具体化成过去的乡间文化遗留物这一

简单的文化主义范畴。飞速发展的政治经济，不断修订和界定着乡巴佬的外延与内涵。如今其外延不仅包括种植园里的劳工，而且包括工厂工人，甚至包括那些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市中心贫民。比如普莱姆就时不时称自己及朋友们是乡巴佬，但当我俩就当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提到二战后蹲在院子里的乡巴佬形象时，他却禁不住笑了，他不仅对“bateys”（院落）一词一无所知，并且让我相信他

“唯一一次被称作乡巴佬是在（监狱里）的临时拘留所。不过，也对。我们那时一大帮波多黎各人蹲在地上，几小时不间断地胡说八道”。^[4]

普莱姆也许不知道，他的祖父母（更不用说他的曾祖父母了）在美国跨国公司接管波多黎各农村经济期间，很可能就是被迫成为季节性的砍甘蔗工——卑微的土包子，但他绝对知道波多黎各经济转型后大规模的移民现象。这些数据是很客观的：二战后的15年内，每年平均有40000波多黎各人离开家乡，而仅在1953年一年，就有75000多人。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年，普莱姆当时才17岁的母亲也告别了位于阿罗约海边的村子，放弃了她在甘蔗地里的小棚屋，来到哈莱姆东区租下了一套公寓，在市中心一家工资低廉的小工厂当裁缝。在随后的60年代，大约有586000波多黎各人来到纽约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寻找新的家园和工作。^[5]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输出如此大比例的人口到文化如此迥异、如此敌对的国家。即使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土豆饥荒中，也不过有200万爱尔兰移民和100万饥民的迁移，在比例上也没超过150万波多黎各人的比例——二战后的两年内，岛内三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离开甘蔗地、棚户区和高原上的村落，拘泥于纽约城的公寓，即后来高高耸起的公建工程楼里。^[6]据1980年的统计数据，年龄在25—44岁之间的波多黎各人当中，有36%居住在美国大陆。^[7]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多数波多黎各人在轻工制造行业（特别是服装加工厂）工作——确切地说，随着那一历史时刻全球经济的重整、组合，这些工种大多远离了城市。^[8]随着纽约城变成跨国公司的总后勤供应站，当地的生产厂家被迫关闭，随即搬迁到劳动力极其廉价的海外市场，制造业逐渐被服务行业所取代。普莱姆是1967年在纽约市医院出生的。之后的20年内，纽约市约有50万工厂工人失业，就业率因制造行业的不景气下跌了50个百分点。^[9]

总之，纽约市出生的波多黎各人，是在马拉松式的发展中期背井离乡的波多黎各人的后裔。换种说法，在上两代或三代人中，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先后经历

过这样的变数：(一)半自给的农民，拥有山坡上的小块土地或当地的小庄园；(二)由殖民者控制的、大量农业资本输出的种植园里的劳工；(三)住在输出地贫民窟里的工厂工人；(四)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棚户里靠血汗钱维持生计的工人；(五)住在市中心高耸的公建工程楼房里的服务行业的雇工；(六)街道上的地下经济企业家。当我问普莱姆为什么有时称自己为乡巴佬时，他用了下面这段“宏论”来回答我。

普莱姆：我父亲是一名工人。我的出生证上是这样写的，但他是以一个砍甘蔗工的身份来到纽约城的。呸！我不在乎！我他妈的就是乡巴佬，说的是乡巴佬讲的西班牙语，就像乡巴佬一样。

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从波多黎各不断重复的社会经济转型期捞取了不少好处，那就是控制这里经济命脉的美国跨国公司。他们充分利用岛上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特权，把波多黎各变成了膨胀的获取庞大利益的港口，而军事战略思想又使这里的经济再次遭到重创和扭曲。1959年古巴人民革命发生后，美国想把波多黎各变成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一个世界典范，由此催生出以发展私人行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制定了在生产设备投资方面免税10年的政策，促使那些跨国公司通过当地的子公司操纵转换价格系统，使波多黎各岛上的利润率超过任何一个西半球上的国家。正如1990年波多黎各州州长狂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波多黎各一样为美国公司带来如此多的纯收入。”^[10]

伴随着影响波多黎各人生活的经济政策而来的，是带有明显种族主义思想的“文化攻略”(cultural assault)，它象征性地表现为1949年前波多黎各的学校里只准教授英语的美国殖民管理政策。^[11]那些从岛上移民过来的人越来越强烈地感知到这种文化冲击。毫不夸张地说，新移民之前以农村为基础的文化定位和自尊，一夜之间变得不得不依据复杂的年龄、性别和家庭关系来定夺，他们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种族上的劣等贱民，而人与人彼此尊重的关系也在他们来到美国后，具体表现为北美种族关系史上的两极化和移民劳动力市场上的人种学分割，一直饱受刻毒的鄙视和羞辱。

这一现象给以农村经济为基础的波多黎各人带来的则是统计数字所显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滥用毒品、家庭破裂以及居民健康状况下降。除了本土的美国印第安人，几乎没有哪一个族群在1990年的官方统计数字上比生活在纽约市中心的896753名波多黎各人生活得更艰难。与城市里其他族群相比，他们对福利救济的依靠程度最

大，家庭贫困率最高，而就业率却最低。事实上，1989年其38%的贫困率比纽约城19%的贫困率高出一倍。一组统计数据表明，80年代他们的家庭贫困率比纽约城平均贫困率高出50个百分点。^[12]

尽管90年代的统计见证了波多黎各人中几类人群的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尤其是那些没有居住在纽约城的人群，但流行病方面的健康指数却表明，波多黎各人遭受着他们难以承受的疾苦，诸如人体免疫感染率最高、卧床不起的残病人员最多、因患肝硬化而导致死亡的人数最多、有自杀倾向的人最多。1993年3月，美国波多黎各人中等家庭的收入比白人低了14000美元（具体数据为33355：18999），比其他拉丁族裔人低4000美元。^[13]

直击街道上的个人责任

从学校里的课桌和椅子受破坏的程度来看，波多黎各经济上遭扭曲、政治上受控制、文化上受压迫，以及大规模的移民史实，都可用来解读哈莱姆东区街道文化为何会呈现如此野蛮的自毁状态。从政治、经济角度对街道上那些有暴力倾向、滥用毒品的个人进行因果分析的尝试，似乎不太可行。但从道义角度来说，当我和像瑞、普莱姆和凯撒这类人接触时，人们会认为，“历史的谢罪”（historical apology）和“结构上的牺牲”（structural victimization）丝毫没有使他们免于暴力、自毁和寄生行为带来的后果的侵扰。在人际交往中，他们每天都会带给其家庭、邻居和朋友某种伤害。

对于这一复杂的组织结构关系的理论问题，我和现已成为朋友的一些快克贩子都谈论过。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同样信仰个人责任。大部分人都把自己边缘化的生活境况归因于其心理或道义上的失败。他们很少抱怨社会，认为个人应该负一定责任。这一点或许是把过去的乡巴佬个人主义和美国盎格鲁移民流传下来的开拓者的清教主义混融于一体，再与纽约市中心地下经济中适者生存的观念高压汇合在一起的结果。与此同时，哈莱姆东区还存在一种几乎与主流社会在政治上完全对立的、异样的、年青一代街道文化的变异现象。这种对立在普莱姆和他的朋友、小他五岁的凯撒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菲利普：那么你明白我所说的你没有钱、种族主义的存在及——

普莱姆：（打断我）菲利普，不仅是白人……让我们觉得更难。我们穷，这是事实，但我们得去争取，自我创造。这样的斗争会因我们贫困变得更难。

凯撒：(打断普莱姆)我们除了玩数码赌钱之外，没有继承来任何东西。

普莱姆：(不理凯撒)为了有所作为，你就得做个好人。为达到某种目的，你得在生活上有所成就。如果你不想奋斗，原地不动，那么以后肯定会有你哭的时候。奋斗对穷人来说更难一些，但不是不可能，只是更难一些。你再穷也得为自己争得信任和尊重。

如果我有什么问题，那也是我自己造成的。没人会为我担心，我得自己担当着，那是我的问题。

凯撒：别废话了，这个国家都想挣你的钱。人人都想挣大钱、住到郊区，然后慢慢死去。

普莱姆：闭嘴！凯撒，我烦你他妈的这样乱扯蛋。

极度混乱的哈莱姆东区

本书中的大部分分析模式，最终都聚焦于个人是如何应对反对他们的权势的。以哈莱姆东区为例，那里其实还有一种社会边缘化的历史遗留物，它与波多黎各的殖民窘困毫不相干。在人们为哈莱姆东区的发展轨迹定位，其实也是在为这一社区最东边的十字街区里瑞的快克贩们定位时，一个解读他们的犯罪生活、暴力和滥用毒品的生态性问题浮出水面。简言之，不管当时住在这里的是哪一个族群，哈莱姆东区街道永远都在制造着凶暴的、滥用毒品的重罪犯。

第一批移居这里的人是荷兰人。他们从以狩猎、打鱼为生的土著居民那里抢走了曼哈顿岛。如今这一社区邮局的名字——地狱之门——就是荷兰人留下来的唯一的遗产，它位于第110条大街，靠近瑞的毒品买卖点。地狱之门(Hell Gate)是荷兰语“海湾”(Hellegat)一词英语化后的说法，意即“下沉的洞”^[14]，位于东河拐弯处，正好在第96条大街上。350年之后，地狱之门低洼的湿地变成哈莱姆东区的最东边。我就住在那附近，也就是瑞生意兴隆的快克买卖点所在地。17世纪初期，这里经常是来侵犯的荷兰清教主义农场主和当地居民之间血腥战争的战场。1669年瑞克格瓦旺克(Reckgawawanc)人从地狱之门邮政区域赶走了最后一批美洲印第安人。不久，荷兰人所属的赢利的烟草农场就遍布哈莱姆东区。^[15]18、19世纪，哈莱姆东区在变成纽约城内贫困移民和滥用毒品中心地域之一以前，被一些当时追求时尚的纽约富豪当作乡间休闲的好去处。曼哈顿市中心离这里乘马车也只有一个半小时的

路程。就连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的曾祖父, 也在这一田园诗般的小河谷地带拥有一份自己的地产和呈十字形穿过这一区域的小农场。^[16] 随着 19 世纪后期庞大、低廉、居心叵测的私有公共交通网和纽约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大型国营部门的投资, 哈莱姆东区的原始农村解体, 比如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沿公园街铺设的哈莱姆河铁路; 1870 年第三大道马铁路; 19 世纪 80 年代建造的第一条有轨电车; 1903 年开通的 IRT 莱西顿街地铁。^[17]

20 世纪初, 哈莱姆东区便利的公共交通使得通往曼哈顿、布隆克斯及布鲁克林的部分地区变得更加便捷。这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开始于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首批移民雇佣工到来之后, 进而将其转变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贫困、文化最多样的地区之一。19 世纪后期, 首批永久性的城镇居民是德国和爱尔兰的天主教建设者们。他们铺设了呈十字架形状、穿越整个曼哈顿的电车轨道和地铁通道。接踵而来的是从拥挤的曼哈顿东部低洼地带搬到这里的欧洲中东部的犹太人。哈莱姆东区低廉的公寓及其便捷的公共交通, 使其成为工作在曼哈顿市中心工厂挣钱不多的工人们理想的居住地。20 世纪初, 伴随或紧跟犹太移民而来的是非裔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到了 1920 年, 除了两个兴旺的希腊东正教教堂之外, 这里自恃拥有纽约城芬兰人和挪威人最为集中的地方。

从这一时期起, 所有关于哈莱姆东区的报道都在绞尽脑汁地寻找词汇来描述这里种族的多样性。“国际联盟”、“万花筒种族群”^[18] 都是曾经用过的词汇。192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这里有 27 个不同的民族。“世界上大概很难找到像这样在如此小的地域却聚集了这么多不同族群的地方。这里重现了旧世界里很多不同的生活。”^[19] 当时的社会科学家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这一国家和种族多样化现象, 阐释成负面的阻止社会发展的力量: “历来如此, 这里有那么多的方言, 父辈们的旧世界道德观与其子女们新世界的新习惯融为一体……阻滞了他们的进步。”^[20]

意大利人对哈莱姆东区的入侵

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工人阶级背景下, 意大利南部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在 20 世纪初来到这里, 迅速把这一地区变成 1937 年以城市规划为主题的市长议会所提议的“意大利在西半球最大的殖民地”^[21]。19 世纪 80 年代首批到达这里的意大利人, 是第一大道有轨电车管理部门为了应对爱尔兰轨道铺设工人的罢工而输入的。^[22] 意



1889年第116和117条大街间的第五大道。照片提供：纽约市博物馆。

大利人聚居的棚户区在第104条街上，离那里一个多族杂居的棚户区不到两个街区的路程，当时已经被解雇的爱尔兰罢工工人仍住在那里。接下来的30多年里，工作和住房的竞争极端地表现为种族之间的隔离。种族间的仇视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最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比如当地教堂的大门不会对新移民敞开。1910年由当地新教教堂资助的一项社区调查统计表明，有79.5%的社区移民属“非吸收人员”^[23]。1884年12月4日，当德国和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宽敞明亮的卡梅尔山的圣母玛丽亚修道院（Our Lady of Mount Carmel）里第一次做弥撒时，当地的牧师让意大利堂区移民坐在底层的地下室里。直到1919年，意大利移民才准许与其他堂区的教民自由交往。^[24]

少数年龄在80—89岁的意大利居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一过渡时期爱尔兰和意大利作战部队的名称。他们如今还住在哈莱姆东区五个街区长的、最东边的幸福大道上，很乐意谈说这些不同族群的人占据的街区，甚至包括当年一些具体的建筑物。开始的几十年里，意大利新移民被挤到离东河最近、最肮脏、最穷的街道上。东河两岸，即现在的幸福大道所在地，在1900年被描述成“垃圾成堆，破旧的汽车、货车随处可见……废品收购站无处不在，破碎的酒瓶和破布片举目皆是。”^[25]这一

社区最东北的拐角处，正是我住的哈莱姆东区瑞圈子里的人的活动区域。

种族主义者叫嚣道，伴随着世纪交替时意大利南部农村人口的流入——大部分来自西西里岛——纽约城变得越来越大。惊恐的政客们谴责哈莱姆东区的新移民有“非洲种族世系的血统”，将他们和住在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也叫日耳曼人^[26]）进行不合时宜的对比。早在1893年，《纽约时报》就曾谴责过“哈莱姆东区来自意大利南部众多移民的无法无天和报复性的冲动。”^[27]

意识形态领域内代表着主流社会的行为和态度，对意大利移民的文化尊严感和个人价值观的侮辱最为险恶。他们用盎格鲁-美国文化来同化移民的孩子。据学校老师说，“意大利人不愿意学习……他们反应迟钝”，“不愿与人交往”。一名社会科学研究员抱怨说，当她“问一户意大利家庭他们在美国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时”，答案竟是“和我们的动物们一起生活”。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尽管为穷人做了很多具有社会责任意义的报道，其进步态度也值得肯定，但其对意大利工人阶级及移民的敌对态度依然没有改变。“这一社区里的少年罪犯很多，低能弱智和痴呆人也不少。”^[28]事实上，常被冠以先锋派学者之名的弗雷德里克·特雷什（Frederick Thrasher）在1930年曾一本正经地说过：“这一地区所有男孩子的智商皆低于其实际年龄应达到的水平。”^[29]如今我们找到了当年一些很敏感的自传体叙述，证实了偏见对于那里的意大利年轻人的影响。

我们很快便懂得“意大利人”意味着劣等人，意大利血统的孩子与他们的父母之间存在一道交流的屏障。这就是被广为认可的美国化的进程。我们在学习着如何为我们的父母感到羞耻的过程中变成了美国人。^[30]

波多黎各人对哈莱姆东区的“入侵”

可想而知，当来自农村的波多黎各移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进入这一社区时，遭遇到了与上一代、上两代意大利移民同样的命运。50年代中期，波多黎各人逐渐取代了在服装厂工作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恰似19世纪后期意大利人对有轨电车建设工地上的爱尔兰人的替代一样，他们变成了现实和意识上攻击的目标。莱昂纳多·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经典音乐片《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讲述的就是50年代发生在街道上的意大利和波多黎各年轻人之间群体版的大众娱乐性的、体制上相冲突的故事。现代纽约文学中经典的自传——皮里·托马

斯 (Piri Thomas) 的《打倒无情的街道》(*Down These Mean Street*) 和爱德华·里韦拉 (Edward Rivera) 的《家庭分期付款》(*Family Installments*), 以些许浪漫主义的语调和雄辩的事实细节, 记述了十二三岁的波多黎各少年在保卫其传统地盘不被肤色偏重的新移民侵占而同意大利裔美国年轻人打架时的感受。瑞的圈子里那些年龄在 25—30 岁之间的人, 至今仍能记得被一伙意大利人殴打的事情。这伙意大利人来自“维尼国”(Vianie-land), 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沿东河的最东部的街区——第一大道和幸福大道。凯撒 37 岁的表兄 (现已搬离这一社区、在康涅狄格州近郊做保险代理人), 向我讲述了这一历史过渡时期的一些事情:

我还记得白人搬走的时间。当时我住在第 112 条街, 经常和意大利人打架。那可是打群架的年代。有很多秘密犯罪团伙成员——他们现在还住在那里。(指着窗外) 我们过去经常和意大利人在第一大道上打架。记得一个小子被意大利人差点打死。你知道, 那用的可是棍子之类的东西。

(有枪声响起) 但不是用枪……有时或许会用自制手枪。

(更多的枪声响起) 听, 这才是真正的枪声。

从街道层面来看, 二战后小小的意大利带给哈莱姆东区的典型冲突, 并不仅局限于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当地的犯罪团伙成员逼迫房东保持与白人族群建筑物的距离。我所居住的地方和瑞的毒品买卖点拐角处尤其如此。据一些中年居民讲, 直到 70 年代初一位名叫邱罗 (Joe Rao)、来自热那亚市犯罪家庭的职业杀手死了之后, 首批波多黎各移民才开始搬进我当时居住的那个特殊区域。我刚搬来不久, 移民过来的房地产经纪人就向我抱怨说, 热那亚家族的一名中尉看到一对中产阶级黑人夫妇来看他刚装修好的房子时, 警告她“认真考虑你的房子该租给谁”。

集体记忆强调了意大利一波多黎各敌对暴力行为的严重性。但事实上, 30 年代哈莱姆东区最新的种族更替顺序中, 首先出现的是迁往有更多中产阶级、更多同族人聚居社区的犹太人。1931 年犹太人福利部门发布的一项报道的首页有这样的记载:

波多黎各人的迁入 (其中大多数是黑人), 是哈莱姆东区人口大量迁往布隆克斯和布鲁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31]

1930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当时那里的黑人占总人口的 14%。他们定居在这一区域内相对独立的街区, 不大会引起别人的愤怒。^[32] 他们一直都在忍受着被限

定在隔离的楼房和街区的命运，或许是与北美式的种族主义者的长期交往让他们变得更随和或更谦卑。因此，20年代后期一位研究人员赞同道：黑人小孩与白人小孩间的障碍被当地的图书管理员拆除，他们“给他们讲一些小黑人萨姆波（Little Black Sambo）的故事”^[33]。但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里却经历过三重种族暴乱事件：非裔黑人——意大利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1946年这一地区还招致《时代》杂志上一篇充满恶意的社论：“哈莱姆东区是一个充满毒素和犯罪的贫民窟，聚居着成群的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和黑鬼们。”^[34]

不过，总体来说，是那些新的波多黎各移民挑起了部分地区主流社会的强烈反感。他们是这里最穷的人。事实上，依照1929年医院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他们肯定在挨饿：“波多黎各的大部分孩子都检查出患有营养缺失症”^[35]，他们的健康问题当然是依据种族主义的习语来表达的。例如，从20年代到40年代，公众健康中的歇斯底里病症突出，远远超出结核病和性病的流行。这两种病被认为是波多黎各人带到纽约的。国家最好的热带疾病研究专家们，“科学地”证实了纽约波多黎各移民受蔑视的情形。

哥伦比亚大学的热带疾病研究专家黑文·埃默森（Haven Emerson）博士指出，……每一个波多黎各人^[36]的身体细胞内都带有热带疾病和性病病毒，以及一些被视作无生命危险的“脏病”。这一健康问题没有像困扰纽约人那样困扰波多黎各人，因为他们对此有免疫力，但肺部疾病在他们中间的流行却呈上升趋势。他们对如何照看孩子只有一种原始的认识。很多波多黎各人从来没见过奶牛，不知道桶装牛奶是怎么回事儿……。意大利母亲就比他们聪明，至少知道可以用羊奶喂养孩子。^[37]

正如上一代的意大利移民一样，学术话语再次反映出当代人的偏见。一位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国硕士生写于1931年的论文中，把波多黎各人称作“斯皮克斯”人（Spics，讲西班牙语的美籍人，一种蔑称。——译注），并注解他们“侵占”了哈莱姆东区。^[38]另一篇写于1930年的论文认为，波多黎各人“带来了……低下的道德水准和生活水平”^[39]。受纽约州商会的委托，1935年完成的一项调查研究指出：哈莱姆东区的波多黎各人“天资劣弱，其平均智商比正宗的美国人低20.5分”。这些调查人员还抱怨说：“几乎没有聪明人，甚至一般智力的波多黎各人都难以找到。”^[40]二战之后一本缺乏学术性和合法性的读者指南上更是煞有介事地说：

波多黎各人天生就不是纽约人。他们多半是易患热带疾病的粗俗的农民。身体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缺乏技能，没接受过教育，不会说英语，在这座用石头和钢铁铸成的活跃的城市中，无法接受和适应这里健康有益的生存方式。

……波多黎各人长得都很相像，名字听起来也很相似。如果检察官去他们人满为患的廉价公寓楼里造访，连一个会说英语的人都难找到。

……很多波多黎各人在踏上甲板或二等机舱的一小时内，就需要福利救济，更有甚者，一些人还在空中或水上，就已经开始提前预订救济了。^[41]

贫困与生态破损

19世纪80年代之后，尽管哈莱姆东区族群繁多，但研究人员和时政评论员一直诋毁的还是这里集中的贫困问题，并凭借自己的识辨能力谴责着这一贫困：

哈莱姆东区是这一城市最糟糕的地区之一。男孩子从不顾及法律法规……贫困和社会心理失调在这里广为流行。^[42]

社区内大约一半的人是贫困人口，另一半是极度贫困人口。^[43]

“拥挤和肮脏”、缺少公共基础设施等，都是经常用来描述这一区域的词语。1946年，一位记者曾明确地评论道：“每一项服务……都是最低限度……显然满足不了如此多的人口负荷。”^[44]1930年人种志研究者们关于街道的描述，完全可以用于20世纪90年代的街道：

街道上肮脏不堪，西瓜皮、香蕉皮、碎玻璃瓶、破盒子、旧报纸随处可见……一个空空如也的商店（仅有的一扇窗还是破的）、人行道、门外的台阶、窗户旁，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45]

哈莱姆东区极度集中而又被隔离的贫困，却历史性地引发了一种学术和艺术上的谴责文学。这可能是因为在曼哈顿中这一最穷的街区与城里最富裕的居民区相邻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哈莱姆东区距离最具权威的艺术展览馆和美国出版集团只有几步之遥。这里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大都采用实地考察的方式探究过这一贫困病理学课题。本章提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颇具影响力的犯罪学家特雷什，就将其生

命的最后 15 年投注到意大利裔美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上。他通过自己在纽约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几十名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提供资金,让他们来考察研究这个“空隙地带”里的跨文化传播的生态问题。他认为,犯罪和社会病态出现于核心城市贫困区不断扩大的同心环中。^[46] 尽管他的研究方法太过简单,理论性也不够强,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里,他的研究却代表着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批判。

在绪论中,我以自己在哈莱姆东区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简单讨论过下面这一关于贫困的主要理论。“贫困文化理论”旨在引起国家对城镇贫民困境的关注。60 年代,社会学家刘易斯发展了这一理论。刘易斯的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盛行的美国人类学界的心理分析——简单化主义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影响,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关注社会化到孩子身上的贫困所导致的心理特质的分析,肯定了保守的、谴责受害者的个人主义对贫困这一顽疾的解读,从而成为影响美国的最为流行的思想之一。

这一区域所引发的艺术、文学和多媒体产品,比起社会科学理论更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詹姆斯·阿格 (James Agee) 是一名以纽约为写作背景的作家,在大萧条时期他深入美国最南部,把那里佃农的贫困问题大白于天下;二战期间在摄影师海伦·列维特 (Helen Levitt) 的陪同下,他来到哈莱姆东区创作,大获成功。他们拍了一部实验性的电影,如实记录了这里拥挤的街道上孩子们的潜能,这部电影现在在一些大型博物馆展出中也时有公演。更有名的是,哈莱姆东区唤起了班伊金 (Ben E. King) 的灵感,他于 1961 年创作了单曲“西班牙哈莱姆的一朵玫瑰”。^[47]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哈莱姆东区街道已经成为纽约各种文学类型的具体背景,它实质上已经成为波多黎各人飞散意识中的尊严和反抗文化贫困及边缘化的象征。^[48]

再次聚焦哈莱姆最东端的贫困

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社会科学家对哈莱姆东区居民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褒贬不一。相反,正如本章所论述的一样,从世纪之交到 50 年代,他们对这里生活条件的书面报道都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术或政策性的报道都把我曾住过的街区,也就是瑞的快克贩子们工作的那一带,描述为哈莱姆地区最贫困、少年犯罪率最高的街区。比如 1935 年一篇人类学报道中曾这样写道:“人们越走近

东河，……就会越明显地看到萧条的景象。”^[49]

可想而知，正是这一持续存在的超边缘化现象，引发了5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耗资几百万美元的小社区“城市恢复”工程建设——这个小社区正是90年代初瑞的游戏厅所在地。公共部门针对贫困的政策是当时的典型特征，直接导致几十个岌岌可危的工人阶级社区实际意义上的毁灭。不顾当地新闻舆论的谴责，这一街区最后留守的意大利裔工人阶级，被推土机以“清除贫民窟”^[50]的名义赶走。随后，几千个贫困的波多黎各人和非裔美国黑人家庭搬进了用红砖砌成的高耸的公建工程楼里，从而逐渐演变成整个纽约城最集中、最混乱、最贫困、基础设施最匮乏的地区。

90年代初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40162个居住在哈莱姆东区的家庭中，有15736户居住在官方的公建住宅楼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20%的非法聚集或靠其他补贴形式挤在这里，比如八区的几千个家庭。正是这一事实上集中和种族上分割的贫困，才导致残暴的自毁式的街道文化席卷整个公共场所，脆弱的生命蜷缩进美国许多城市中心、边缘地带及工人阶级社区里。^[51]

五六十年代旨在促进城市重建的推土机，实施着经济和种族上的隔离，慈善救助机构的档案卷宗里，塞满了绝望的社会工作者所写的、有关意大利人居住的哈莱姆地区人们的生活，是如何急剧衰退并最终沦为哈莱姆东区贫民聚居区的报道：

最低的生活保障品缺失……抢劫案件时有发生。水管、暖气设备、抽水马桶、浴盆的被盗，让留守在这里的居民叫苦连天……空空的公寓内和楼道里到处都是废弃的物品。老鼠成了威胁人们健康的最大敌人。它们在空空的建筑物内四处乱窜，快速繁殖，肆无忌惮。

……无家可归的人们聚集在空着的公寓里喝酒或吸毒，人们进出家门都变成了件可怕的事儿。

任何人、甚至连天使在此也难逃苦恼！我最为这里的孩子们感到痛心。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高雅的社区是什么样的。^[52]

借助历史后见之明的优势，这些不足凭信的社会工作者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俗语：“越变化就越没变化。”实际上，我找到了一份1956年社区服务协会的报告，其中描述了一个廉价的公寓楼被烧成灰烬的事儿，那里正好是我1990年住过的那个拐角地带：

8月的一天，在Y大街与X街道的拐角处，我们和一帮来消遣的工人共

同目睹了一起火灾。两层楼高的大火把一切都烧成了灰烬……烟熏黑了比邻还住人的房屋，一名妇女站在那里，惊恐不已。

……从下落的砖块上脱落的灰尘掩盖住了一切。

我们看见窗户变得孤零零的，有的只剩下花篮和窗帘，有的还能看见小孩子的一张脸。^[53]

24年后，我发现自己也在透过我所租住的破旧的廉价公寓窗，吃惊地注视着“一场约有两层楼高的大火”，燃烧着斜对面一片空地上少数依然存留的廉价公寓之一。

从非法酒馆到快克买卖点

从街道上毒贩的视角出发，本书关注的主题是少年犯罪学专家眼里的哈莱姆东区——“纽约城最突出的滋生犯罪的地方之一”^[54]。与最初荷兰移民在这里种植烟草这一经济作物一脉相承的是，偷卖毒品成了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收入。特雷什的学生们在20年代为了写硕士、博士论文，对这里的街道进行了彻底的搜索和调研，谴责了这里日益增多的“无处不在的非法酒馆”^[55]。在他们笔下，这里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污秽的社区，一个控制不了自己深重罪孽的魔窟：

一座座旧砖砌成的楼房，又脏又黑，沉闷不堪，毫无生气，晾晒的衣物如条形旗一样在安全出口处飘着，人们的着装看不出是一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街道上到处是从手推车和繁忙的路边市场里扔出的垃圾；排水沟里一堆堆黑色的“麦芽浆”（做啤酒的原料）默默地证实着非法工业的繁荣；从厨房里扔出来的垃圾四处乱堆，厨房内量大、油多的食物为贪食的人备足了干粮；墙上和人行道上随处可见铅笔和粉笔的涂鸦，那是从淫荡的头脑里溢出的下流话语；底层的商店里堆积着毫无吸引力、落满灰尘的存货；地下台球室，那是“喝酒的小店”，许多都用窗帘或百叶窗遮着，暗示着其真正的生意；无所事事的人群挤满了这一肮脏的地方。^[56]

60年后，遍地开花的快克买卖点和打靶场取代了这里的非法酒店。走在我们这一街区的路上，双脚踩着的不是往日的“成堆的麦芽浆”，而是装过快克的塑料瓶，偶尔还会有皮下注射用的针管。

从世纪之交起，瑞的社交圈子里的人，给这一区域带来的犯罪和很多不道德的

行为细节，依然存在。比如药店之角是瑞最赚钱的可卡因买卖地，那里一直都是分送零售麻醉药品的中心。为地狱之门一带提供服务的公共图书馆所留下来的纸张痕迹，就可以证明这一切。这座图书馆位于离药店之角不到100码的地方。我住在那里时，这座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是这一社区的反毒品联盟主席。他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试图关闭一个紧挨图书馆的、废弃的市属射击场。从图书馆青年人馆区的一扇窗户里，可以把那里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无法给官方施加压力，这一反毒品联盟成员与可口可乐公司签署了一项公开协议，给拆除这一廉价公寓楼提供资金保证，并打算建造一座儿童游乐场。然而，这一私人与社区的合作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

30年代，人们在图书馆门前看到的主要是酒鬼们对这里顾客的烦扰，而不是当道的吸可卡因、海洛因和快克的人。事实上，90年代早期被废弃的射击场的公寓楼，就是20年代后期的非法酒馆。

冬天，（图书馆）看门人每天都得来赶走那些在图书馆喝醉的人。早上人们会看见醉酒的人躺在人行道上，警察不得不出动货车把他们拉走。图书馆后面的那间屋子……遭到袭击，关闭了长达一年的时间。^[57]

倘若这些有历史传承性的非法酒馆、妓院、快克买卖点和射击场，不会深深地影响到这里想过上“健康生活”的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质量的话，它大概也不会显得如此重要了。这一点同样被地狱之门图书馆和与其临近的街区之间的敌对关系所掩盖。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对其工作环境颇感焦虑，对他们的顾客持怀疑态度。我刚刚住进那里不久，那时还对公共场所的功能抱有幻想，有一次我带着邻居家一个11岁的男孩安杰尔（Angel）来到馆区想给他办一个图书借阅卡，却遭到充满敌意的管理员的羞辱。当时我猜想，可能是我的外表有点像“瘾君子”试图指使一个无辜的孩子来偷拿图书馆的书。现在我才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以为我有恋童癖，正试图勾引一个新的受害者。

无处不在的海洛因和可卡因

这一社区处在毒品滥用所带动的地下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之下，海洛因和可卡因对日常生活质量的侵扰首当其冲。二三十年代，当联邦政府实施的新的滥用麻醉药品为犯罪的政策带来的全面经济效应影响到美国时，特雷什的学生们已经

对吗啡和可卡因给这里带来的超高利润震惊不已。40年后，一名地下麻醉药品侦探就这一主题出版了一本二流的畅销书《街道链接之快意》（*The Pleasant Avenue Connection*）。^[58]

美国公众对于周期性的、如潮水般汹涌的毒品泛滥给予极大的关注。^[59] 随即出现的必然是周期性的全民恐慌。在有大量新闻图片的报道中，药店之角经常被放到突出地位。1990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60] 受纽约市福利救济委员会的委托，一位社会工作者写了一篇题为“麻醉药品对纽约市孩子们的威胁——一项根除邪恶的计划”，报道对药店之角周围街区做了详尽的介绍，其中一名中学生这样描述第110条大街：“男人们排着队等着注射，……险些要发疯。”^[61]

1990年10月19日，39年之后，在同一个地点干着同样事情的瑞的那些顾客们，占了纽约市最大的小报^[62]的头版。不同的是，他们把瑞的可卡因与海洛因混合到一起注射。

血通过注射器打进滴管里，很快与液体海洛因混合在一起。他挤着滴管把血挤进自己的血管里……用完之后，其他人开始同样的死亡之舞。

……吸毒的人在第110条街和莱克星顿大道的拐角处买来快克和海洛因（和粉状可卡因）——那里是纽约城最繁忙的毒品基地之一——之后突然消失在……某个角落去注射。

40年来，中学生们一直在抱怨毒品给哈莱姆东区带来的极大混乱：“‘外边总有人拿着针管往胳膊里扎’，六年级的卡瑞玛·萨皮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身边的人。’”^[63] 1990年的情势如此严峻，第110条街上学校的老师用黑色的美术纸把教室的窗户糊上，让学生用粉笔在上面画上虚假的天空，以遮挡瑞的顾客们注射快克用的这片市属空地。

地下经济中的黑手党

如果说从事街道麻醉品买卖对志向远大、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没有产生长期深远影响的话，那么在瑞和他的工人们成长和工作的街区，看得见的毒品滥用的历史传承性，只不过是一个不相干的巧合而已。然而，1951年一位社会工作者的报道内容和1991年的报道竟然惊人的相似。

有个男孩这样说：“人人都如此，几乎交不上不吸毒的朋友。如果你不想买这玩意儿，会有人随时准备送给你。你逃不掉，因为它随时都会向你抛过来。如果想抓捕吸毒的人，恐怕每个人都得被抓起来。”^[64]

同样，特雷什于30年代初也提出了“犯罪传统”在年轻人当中“引发”了“一种恶性循环”：

哈莱姆东区的地下犯罪组织和行动……促生并鼓励了少年非道德的行为并最终产生更多的犯罪活动。

一些屡屡得手的歹徒和诈骗犯的名字，成了当地居民的口头禅，他们经常被街道上的青少年、俱乐部里的男孩子和年轻人神圣化。^[65]

特雷什的学生们无不担心电影院里的意大利孩子对于犯罪片的反常反应。换句话说，从20年代开始，街道文化已经开始备受推崇和赞赏。

这里的社会工作者和巡警已经注意到这群意大利儿童观众对于不同电影的不同反应。反面人物得势而“警察”或“执法”人员失利时，他们会报以热烈的掌声。^[66]

一个重要的推论解释了起源于哈莱姆东区对抗式的街道文化的不间断性的历史魅力。这一街区地下经济非凡的利益潜能，是由意大利黑手党一手建立起来的，他们把这里变成兜售毒品和干非法勾当的超市。早在1893年，《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纽约的黑手党密码……暗杀是无论真假错误最受宠的处罚”^[67]的文章，公开谴责哈莱姆意大利人的有组织犯罪。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组织犯罪已经威胁到这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人们对支持犯罪和暴力的“常识”有了重新界定。40年代的记者们把地方警察的腐败当做一个明显的事实。^[68]特雷什的学生们在禁令期间就因太过天真而受到一个被激怒的警察的训斥：“难道你们还不明白，警察拿的钱太多所以没法回答你们的问题吗？”^[69]1990年报纸上的文章与1946年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那篇关于武器进入哈莱姆东区街道可能性的文章，其内容异曲同工，再次记述了“警察说，从冲锋枪到自制手枪等武器，都可以用杀伤力极强的口径为22的子弹。”^[70]特雷什的学生们也同样记录了90年代哈莱姆东区居民熟知的谋杀者的日常行为和行踪。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下面两篇实习报告的部分内容，第一篇可以追溯到20年代后期，

第二篇是我 1990 年写的：

一名男子坐在门前的椅子上。他指着 234 号 [楼] 说：“那里有两人被杀死了。举起手来。周日晚上。男人们在里面玩牌。没能赢钱。只好逃跑。”地板上到处都是从门窗上打落的玻璃碎片。^[71]

(1990 年 6 月) 在瑞的社交俱乐部快克买卖点的外边等得很是无聊，普莱姆的表兄刘易斯开始聊起他童年时发生在这里的一件事：“在那边，就在那家卖鱼铺旁边的那道墙上，我看到迸裂出来的脑浆。”

人们用许多“追忆”性的涂鸦作品来悼念亡友，戏剧性地表现了公开杀人现象在这里很常见。在我们公寓楼拐角处那栋被废弃的建筑物上，画着一幅两层楼高的绘画“片段”，宣扬的是那个有名的黑手党袭击一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的故事，据说就是以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的这里为背景。

80 年代，多数在哈莱姆东区长大的年轻人都知道热那亚犯罪家族——纽约城一个有组织的非法团伙，五个西西里“家庭”之一。更具体地说，当地的居民在街面上都能指出那些通过暴力犯罪手段而暴富的人。巧合的是，“肥仔托尼”萨勒诺 (Salerno)，热那亚家族黑手党的头目，就在游戏厅和我住的公寓楼所在的街区有一处豪宅。这是我妻子在向一位朋友抱怨我们这里水果店里的水果经常很不新鲜时才知道的。一笑了之之后，朋友建议她别再去那里购物，因为那个卖烂水果的人正是“肥仔托尼的孩子”，他们现在仍然监管着那个活跃的信贷银行，^[72] 就是这帮人在 1985 年 2 月 25 日托尼被捕后，跑到法庭欲赔付 200 万美金的保释金，那一天恰好是我搬进这里的三天前。我在那里住到一半时间时，“肥仔托尼”170 年的服刑期又被追加了 5 年。^[73]

尽管“肥仔托尼”被判终身监禁，但他的党羽仍然把持着我们附近街区的几个办公楼，其中大部分都是些过时的只许白人进入的俱乐部，而最最重要的，当数位于卡梅尔山圣母玛丽亚天主教堂对面的那个俱乐部，我儿子就是在那个天主教堂接受的洗礼。杰拉尔多·里韦拉 (Geraldo Rivera) 作节目时把这个俱乐部安排在第一时间电视直播，他在外边忙得上蹿下跳，挥动着手臂，指着停靠在教堂前占有两个车位的黑色豪华轿车，手里的麦克风快要挨到站在围栏旁一位保安的脸，这位保安 20 来岁，看起来闷闷不乐，身上全是文身花纹。再往前走，另一个街区尧氏街区，是 80 年代纽约城最豪华的饭店，属邱罗 80 多岁的弟弟文斯 (Vince) 所有，我们之

前提到过邱罗，就是他在70年代曾警示房东要尊重种族隔离制度。^[74]他的饭店经常会有一个长达三个月的预约名单，用来蒙蔽从此地路过的联邦调查局的巡警——可以想象当时市中心的雅皮士们在唯一一个黑手党氛围里享用正宗的意大利餐是何等的激动。我家的保姆是意大利裔美国人，算是与他有点关系。她注意到这个饭店上面的一层是官方聚会厅，是专为热那亚家族的高层人士准备的。这栋楼上半部分的窗户用波纹状的金属保护着，从外面看起来似乎已被废弃。

因为担心会有生命危险，我没敢靠近附近那些传统的有组织犯罪阶层。当地一个房产经纪人——也叫维尼——在银行大厅里被杀，也就是我申请他的公寓楼两天后的事儿，之后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为了让大家明白任意一次有组织的犯罪都是经过批准和认可的这一事实，那些杀手们把维尼装满百元钞票的公文包仍在他血糊糊的肚皮上，然后堂而皇之地走出银行。事实上，我后来都不敢去维尼的秘书那里要我的申请费，怕她怀疑我到过维尼的办公室而与他后来被杀不仅仅是一次巧合。

在我们社区有个农产品商店，我有时还能在店旁的中国外卖餐馆碰到“肥仔托尼”一个忠实的街道助理。尽管他对我很友好，但我还是不敢贸然问他既然身边有两个带有军队配置的移动手机通讯包和步话机，为什么有时还要跑到拐角处的电话亭打电话，更不敢问那个年轻黑人给他店里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他戴着牛仔帽，穿着一身橘色、粉色相间的皮衣，指挥人们从他那栗色的美洲豹后备箱里卸下几十个“帕里斯塑料袋”。

据说这个热那亚家族在干着非法联合诈骗，欺行霸市，比如由木工和细木工兄弟联合会组成的纽约市地区委员会就相当有权势，但我住在那里时，他们日益衰退的生意却让人产生怜悯——有时也会让人觉得挺滑稽的。^[75]他们似乎在抗拒着向上层社会攀爬和种族传承的逻辑，而其他四个家庭则在充分利用纽约市的黑社会。可以看出，其他几个纽约市黑手党的头目，对以哈莱姆东区为基地的热那亚宗派不再尊重。据联邦调查局报道，当纽约城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头目保罗·卡斯特利亚诺(Paul Castellano)和其他四名黑手党头目一起被捕后，他对“肥仔托尼”不合时宜的穿着嘲讽不已。^[76]对热那亚家族最大的侮辱，莫过于对“肥仔托尼”水果摊上面的彩票赌博银行里那间画室的抢劫，就连我家的意大利裔保姆也深感吃惊：“我说，‘我这是在哪儿呀？欧洲中世纪？’我说，‘这不可能！’”就是在60年代种族暴乱盛行时，也没人敢碰“肥仔托尼”家附近任何意大利老板的生意，“当时人们挺尊重我们的”。

当地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以为我想买这里的公寓，告诉我自从80年代后期“肥

仔托尼”被告发后,街道上的小型犯罪一直在攀升。她还安慰我装上防盗门就没事了,几年前她从“肥仔托尼”那里买来的房子就装上了防盗门。她还补充说,联邦政府对托尼的敲诈勒索控告已经人为地削弱了房地产市场,因为“肥仔托尼”及其合伙人急于抛售他们的公寓楼去支付律师费。她向我保证,自从那个犯罪团伙被瓦解后,

把房屋出租给黑人客户已经不成问题。但在1985年,你得按这里的规矩来——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话。现在,他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关注这里了。

她还向我保证,“肥仔托尼”在市政厅的“政治影响”不会很快消减,第二大道东边的街区不会受到市政资助的社会福利规划的破坏。这一工程计划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对废弃的楼房加以修复来安置无家可归的人。

快克和可卡因自由市场

街面上黑手党霸权的衰弱期,正好与80年代中期地下经济重新定位到快克和可卡因这一变化同步。快克和可卡因取代了海洛因成为无可争辩的最有利可图的产品。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快克和可卡因经济的繁荣,主要起源于强劲的联邦禁毒政策对毒品走私的刑事镇压力度的加强。80年代中前期,控制着拉丁美洲大麻供应线路的进口商,为应对美国国境逐步上升的检查—没收政策,从运送大麻转为贩卖可卡因。相对于同样价值的大麻来说,秘密运输可卡因因占据空间较小所以会更便捷。但在联邦政府加大毒品打击力度之后,美国各市中心高纯度、低价位的可卡因却泛滥成灾。据毒品管制部门的资料显示,一公斤可卡因的价格掉了5倍,在80年代由原来的每公斤80000美元降到每公斤15000美元。^[77]

哥伦比亚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在历史上一直垄断着可卡因的生产和运输。80年代初,他们抓住新的市场机遇,充分利用企业家的强烈欲望——即美国梦不可或缺的一方面——迅猛地超越了专门从事海洛因买卖的意大利人黑手党。竞争激烈的市场诱惑,催生出一种新的更加有利可图的毒品——快克,即我们在绪言中提到的可卡因和炒苏打的混合物。一方面,吸烤苏打合成品满足了对可卡因有瘾的人。另一方面,粉状可卡因只能用鼻子吸入或用针管注射,肺部的毛细血管比骨骼系统的动脉或鼻腔里的血管的吸收功能都要强,但快克能够把可卡因作用于精神的效力以最有效和最便捷的方式传递给大脑。此外,吸毒者不满足于用鼻子吸入的粉状可卡因

那种淡而弱的漫长的快感，快克则正好能让他们在几分钟内达到两分半钟的兴奋时间，所以迅即成为一种备受青睐的消费品。尽管个人用的剂量并不贵，没钱的人也可以用，但有钱的主如果无节制地吸食也会是笔不小的花销。混合可卡因对烤苏打在技术和市场上的突破，刺激了成千上万急于打造高利润、高风险的零售快克的生意人想成为夫妻企业家，因此到1985年底，游戏厅里以前靠卖5分钱一包的大麻勉强维持的糖果店，一跃而成为提供10美元一瓶快克的视频娱乐中心。

快克和可卡因在哈莱姆东区地下经济种族传承的长期传统中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像瑞那样的新的、充满活力的生意网，填补了由意大利黑手党向上层社会爬及其在可卡因-快克市场笨拙摸索过程中的空白。即使在地狱之门最东边的那两个黑手党曾经肆虐、专横的街区，波多黎各人、非裔美国人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创业者们也是异军突起，开始为抢占人行道上快克的买卖点而争得你死我活。

尽管黑手党不再像以前那样气焰嚣张，但他们却通过其决定性的犯罪和暴力行为，为哈莱姆东区留下了一种强大的机构和意识形态上的遗产，主流社会里不断发生的华尔街和金融世界丑闻更是强化了这一点。凯撒显然领会到了这一信息，并将其用于在游戏厅里做眼线的工作实践中。

凯撒：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干“那档子事”。你得像那些意大利人那样弄脏你的钱。

如果你是干净的，你还得把自己的白领搞脏。因为你是脏脏的。你已经富起来了，还得与毒品打交道。

像新闻里说到的关于他们（存贷款）银行那件事……像他妈的西尔维拉多（Silverado），那个家伙——那个纳税人因为那事还得交上亿美金的税。

那些人凭什么要铲除毒品买卖呢？我就是搞不明白。

第三章

快克买卖点的管理——癖好、规矩和尊严

见鬼！没错，有了这个游戏厅我觉得很爽。当时人人都对我好，人人都需要我。我一开车过来，就有人帮我开车门，要给我洗车，连那些不知道毒品是啥玩意儿的孩子们也高看我。

——菲力克斯

卖快克的技巧与其他有风险的私人零售店的经营没什么两样。买卖销量大但价位低的产品本身就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需要诚实懂规矩的人才能干成功。做这种生意大多用的是传统式的管理办法。正是高风险、高利润差额和犯瘾后绝望的心境，才使快克买卖不至于变得那么平淡和沉闷。我住在那里时，游戏厅具体的经营方法为理解这些原动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与快克一起成长

这个游戏厅不是瑞亲手建起来的。是他童年时的玩伴菲力克斯（Felix），也即普莱姆的大表兄，把这个 250 平方英尺的游戏厅变成了如今的快克买卖点。菲力克斯公开卖快克，他的张扬最终没有逃开警察的视线，后来不得不雇佣一个经理或至少是一些助理当中间人来完成手把手的交易。这个店开张的第一年，菲力克斯亲自经营一切，只把“烤”制快克的活，以传统的父权形式交给妻子凯蒂（Candy）打理。后来他干脆把大部分精力都用于结交游戏厅里那些有毒瘾的性伙伴，特别是少女们。

1985 年后期快克盛行，普莱姆当时是菲力克斯最稳定的顾客群之一。他丢掉了自己在排字店做送信员的差事，与妻子感情破裂，想尽一切办法推脱了对两岁半儿子的抚养责任，只身回到 50 岁的母亲住的公建工程楼公寓，与三个姐姐挤在一



游戏厅里的快克买卖点。照片提供：菲利普·布儒瓦。

间狭小的卧室里。母亲整日在客厅为一个没有执照的服装承包商做衣服以补贴开支，而普莱姆为了满足毒瘾，则用所有的时间拼命挣钱和抢劫。

后来，普莱姆在朋友、同事、甚至顾客面前总是津津乐道他前些年作为一个吸毒者所度过的那些绝望的时光：

普莱姆：我活在毒瘾的世界里，什么他妈的都不干。

我给你们说，有次我毒瘾发作，特想吸一口（瞥了眼凯撒）。

凯撒：（在门口转来转去）可不，你当时最担心的是烟斗（玻璃造的快克烟斗）里没烟冒。

普莱姆：有一次我和一名同伙及他女友，看到我婶那栋楼的大厅地板上躺着一个墨西哥人。他可能是喝多了，看起来像有工作的人，因为无家可归的人一般不会戴金戒指。

我跑过去问他“几点了？”他挪了挪身子想看手表，我立即抓住他的后颈，用我的007手枪^[1]顶着他的后背（从后面死死地抓住我），把枪放在他背上——就这儿（放下我，用手指着他的脊椎下部）。使劲地压着他（咧嘴笑笑，拿眼瞥了瞥女友玛丽）。

凯撒：墨西哥人喝醉酒就像真正的疯子一样，人人都抢劫他们。他们很

好上钩，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非法移民。

普莱姆：我说：“别动！否则我会像剔猪那样剔了你……”（我们都笑了）

对，对，像根棍子——猪后背……就像你想捅猪后背，就在上面戳个洞放调料进去那样。

凯撒：没人把墨西哥人当回事儿。那可是一段犯罪高潮时期，针对墨西哥人的犯罪把纽约城都搞乱了，抢劫他们可不是件新鲜事儿。

普莱姆：那个墨西哥人慌了手脚，看样子是想逃，但他越挣扎我越不放开他，越使劲地按住他。

我的007可是大号的。我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的。我肯定得按住他，如果他再挣扎，我会嗑嚓嚓（一边慢慢扭转他的手腕做刺扎的手势，一边假装很痛苦的样子）。

后来我有点后悔，但我一直盯着他那个金戒指（笑了笑）。

我把他放倒在地，用拳头猛打，我同伙的女友开始在他身上搜。

我说：“全拿走，伙计！找，再找找看，别放过一样！”

她看见了她的项链。我说：“把那狗日的戒指也拿走。”

他大声哀求：（张大嘴巴模仿着）不要，行行好！请行行好吧。

那肯定是他很珍惜的东西，很可能是。他说：“随便什么都行，把戒指给我留下吧。”我说：“放你妈的屁！你哪儿有什么钱？（像个工头在建筑工地上大喊大叫一样）把戒指从他手上拽下来”。

抢了戒指，我们赶快跑开，卖掉戒指后，让她联系人买来毒品过了把瘾。

凯撒：对，对，你当时抽得云天雾地的。

普莱姆：我们把她丢在公园，她一分钱都没拿到。

凯撒：抽点大烟好爽啊！

普莱姆：她其实不想要什么。

凯撒：（陶醉在吸快克的想象中）我想发飙的唯一原因是我爱它。第一次发飙，最妙不可言。就像拉夫牌土豆条。不能只吃一个，你一直想吃，因为味道太美了。

一旦你有过第一次发飙，整个晚上会成为一场让人发狂的冒险。没别的，你一心想要第二次发飙，第三次，更多的。

普莱姆：你他妈的给我滚开！我在讲菲力克斯时你怎么老插嘴？

普莱姆的生活在他吸快克最厉害的时候来了个急转弯。菲力克斯的大男子气概失了控，给他提供了一个全新而酬金很高的工作机会。

菲力克斯在新泽西州一个酒店的二楼和几个女人厮混。他的妻子凯蒂知道后来找他。

他从二楼跳下去，扭伤了脚不能走路。^[2]

第二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从那天起，我就在这儿干活了。

菲力克斯的脚踝好了后，把普莱姆留了下来做经理，处理日常买卖，给自己腾出更多的时间在街上混。他经常来游戏厅炫耀他的“性猎物”——一般都是些吸毒的姑娘。菲力克斯的古怪举动让普莱姆有了份固定的工作，给他带来了稳定性和自我价值感，并促使普莱姆戒掉了12个月长的毒瘾。

普莱姆的戒毒梦一度险些搁浅。当时菲力克斯的妻子已有六个月身孕，为了惩罚他与自己的妹妹乱来，她朝着他的腹部开了一枪。菲力克斯刚出院，就以私藏武器的罪名被送到“北部”监狱，判了2—4年断断续续的监牢。凯蒂随即以3000美元的价格把游戏厅的生意卖给了瑞——当时瑞因在其私藏海洛因的屋顶上与警察交火而被判交罚金14000美元，又因用致命武器伤人而服了四年刑刚刚出狱。

重整游戏厅

一两周时间的紧张交涉，让普莱姆暂时又吸上了快克，之后瑞把普莱姆留下来做了游戏厅的经理，每天上8小时班，从下午4点到夜里12点。当时，游戏厅对面公建住宅楼的天井院里，有两个年轻人也在做快克生意，晚上有时打折到每瓶2美元。因此，他们只好把价格调到5美元一瓶。普莱姆是按提成拿工资，每卖出5美元他可以提取1美元。几周前普莱姆遭遇抢劫，所以他得到瑞的允许，用自己的工资雇用了几个眼线或助手。但对于快克买卖点门前那些非顾客的光顾者，瑞则有更严格的限定，以减少拥堵和嘈杂。

事实证明，瑞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几年来，我看着他有计划地从那些问题工人中赚取了越来越高的利润。70年代初，他是以一个头目的身份在哈莱姆东区长大的，他知道如何严格控制自己手下的工人又不会逾越相互尊重的文化底线。他也明白什么时候是凶暴的极限，什么时候该不会暴露自己脆弱地表示友好或理解。

瑞尤其擅长维持圈内人士的关系以保证那些或吸毒或凶残的工人的忠诚。他的雇工绝大多数都跟他有亲戚关系或婚姻关系，或是通过某种虚构的家族关系所约定的亲属关系。比如，他让普莱姆做了自己儿子的教父，以此建立起一种“挚友”关系。挚友在波多黎各文化中是一种颇具影响力的传统，它把休戚与共、互为责任的男人间的关系变得神圣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上几代波多黎各农村，户主们或许也是通过这一家长式的教父机制，压制瑞和普莱姆负债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3] 瑞不过是在一种更为现代的语境下，从现代街道文化的血缘关系表征中获取利益，这种表征迫使女性与不同的男人通过生命链而建立起一系列的家庭。就这样，他与其雇工刘易斯童年时的友谊，通过与同一个女人生子而发展成所谓的血缘关系。

刚刚接管游戏厅生意的头几周里，瑞敏锐的生意嗅觉——即降低价格，提高产品质量——使其生意变得红红火火，轻而易举地打赢了街对面公建住宅楼天井院里那几个低价叫卖快克的年轻人，也挤垮了与游戏厅只有四家之隔的杂货店内低质量的粉状可卡因生意。不过紧接着就爆发了一次地盘危机。警察在治理公立学校操场上的毒品买卖时，把几个多米尼加人经营的海洛因公司赶到这里。一夜之间，这里的人行道上云集了六七个私人团伙，每个团伙都分别有两个眼线、一个送货者和一个兜售者。经过几轮紧张激烈的较量之后，瑞迫使多米尼加人不得不尊重他的地盘，从这条街上搬走了。

几个月内，瑞的游戏厅生意就开始向外扩展，还新开了两家分店：一个位于由纽约城资助修缮的公建住宅楼二楼的一所公寓里，不过没经营几天就关门了；另一个位于地狱之门邮局旁边药店之角的社交俱乐部里。在一开始的扩展时期，普莱姆在瑞刚有起色的快克圈子里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这些常规人员当中，我是第一个来这里干活的人。我在攒钱，没有吸毒——只是有时会喝点啤酒。经常和瑞一起进进出出。那时他还没有车，经常走路。我就和他一起，每天晚上到处乱跑。

那时候我们俩晚上总能挣一沓的钞票拿回家，留下几百，第二天出门时口袋里就带三四十块零花钱，工作时用。

作为瑞扩展后团体里一个正式的元老级人物，普莱姆享有从部分快克贩子手里获得利润的特权，比如保释金、律师费、特殊假期津贴（圣诞节、复活节和父亲节等），有时还可以去帕克海滨、考尼岛或遥远的洛基山吃海鲜，但他的眼线和助手们却低

他一等。合法经济中可不会有这样的工作环境，让普莱姆可以很现实地梦想成为一名经理或在工作的第一年里就有权自己雇用工人。到了后来，即我居住在那里的后期，我经常让普莱姆给我讲讲我们认识五年来他在游戏厅雇用的那六个人的情况。

普莱姆：（坐在游戏厅前的汽车发动机罩上）威利（Willie）是第一个给我干活的人。我负责他吃喝，一天下来给他几块钱。

之后是小皮特（Little Pete）——每周给150块。绝对150，再加啤酒之类的东西。再后来是大奔，因为小皮特被瑞抽调到药店之角的俱乐部去了。

我基本上每天给大奔付一次工资，每次35或40块，晚上生意好时也给他50。听起来不多，但我待他比其他人还好。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俩对半分，任何事都平摊。

因为大奔和瑞的关系出了点问题，我才找了长期工凯撒。之前凯撒只打零工，那家伙有时脑子不好使。还经常妒忌大奔。我就跟他说：“你不行，自己吸毒，还经常惹事。”

每次付钱给凯撒时总有麻烦，真不知道拿这黑家伙怎么办。（消遣性地向在门口值班的凯撒挥了挥手）他做事太笨，我得找他说说。

菲利普：听起来你还蛮严格的，像个老板，嫌工人表现不佳。

普莱姆：不，菲利普。我才不像老板呢。我不抱怨，在这里我从来没有成功地行使过自己的权利。菲力克斯的儿子比我大13岁，是我的雇工。每次叫他干活，他都会说：“好了，好了！闭上你的嘴。”

我唯一一次动用权利是那次恼火之后，但我不会为了指挥人而指挥人。

我还是比较有责任心的，不容许这里搞得乱七八糟。如果丢了什么，瑞会拿我试问。他们都（倨傲地又向凯撒摆了摆手）喜欢接管所有的活儿。

（传来巨大的枪声）喂，冷静点，菲利普，看把你给吓的！

后来，……我雇了大奔，他干起活来神气十足，觉得自己做买卖很有两下子，可以不把顾客放在眼里，还经常不尊重好人，尤其是男人。

他不尊重他们，视他们为小孩，把他们当狗屎。不过那些家伙们也不在乎，但他们是人，也很酷。我那时经常跟他说：“把那个混蛋赶走。”还会跟他说：“好好跟他说话，放尊重些。”但他不按套路来，把人家像狗屎一样对待。所以我才把凯撒要回来，不过凯撒也挺傲气的。

菲利普：难道凯撒比大奔强？

普莱姆：两个都不怎么样。凯撒更差一些，他谁的账都不买。我都有些不信任他了。

说真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大奔得意洋洋地对着顾客喊：“好样的，伙计，来吧，继续自杀，把钱给老子，去抽死你吧，先让老子富起来。”其实普莱姆对他的客人也不怎么好。有时他也会和同伙一起嘲弄街面上那些吸了几个月快克后变得像行尸走肉一样的瘾君子。这一点在游戏厅内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为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

凯撒：菲利普，你真该见识一下早先来过这里的两个混账：那个黑鬼^[4]和他的女人。

普莱姆：（笑了起来）她出门时一屁股摔在地上。

凯撒：她肯定摔坏了，因为她绊倒了，脸上也受了伤。

普莱姆：我看见她一瘸一拐的……

凯撒：肯定受伤了，伙计，她碰到了我们放在水泥地板上那个铁玩意儿。她是瘸着腿走出去的，真的伤得不轻，可她的同伙根本不在乎，径直走开了。

（可能是注意到我的沉默，他摇了摇头）太差劲儿了，那家伙。

普莱姆：（没有理我，只管嘲笑凯撒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不，小子，他犯瘾了。

凯撒：没错，没错。他好像在说：“随她的便吧！我要抽烟。”（贪婪地吸了一口，满意地笑了笑，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不管你怎么想，反正那些黑鬼比波多黎各人更讨厌、更邪恶。因为当她摔倒时，我还问了句：“喂，你没事吧？”

但她的那个男人，就像……他绕过她，从她前面走了出去。

控制毒瘾 引导暴力

普莱姆和凯撒的关系其实挺复杂的。凯撒发酒疯时经常会袭击他人。他吸快克时——也就是他领工资的时候——不会向身边的人借钱或偷抢。不过，我住在那里的最后三年里，凯撒和普莱姆几乎形影不离，他成了为普莱姆当眼线和雇工时间

最长的人。

有时候我在想，普莱姆忍受着凯撒的不守规矩是不是因为他同情他有毒瘾。他似乎一直在帮助凯撒，就像当年菲力克斯待他一样。但另一些时候我又想，普莱姆雇用像威利、大奔、小皮特及凯撒这些吸毒的人，是不是因为他可以少付一些工资，还能使他们更依赖他。替换班时，他经常只付给他们一些瓶装快克来代替现钱。当然，普莱姆也别无选择，因为他的圈子里都是些吸快克的人。有几次，普莱姆自己也承认，他对雇工们毒瘾的控制和自己对瑞的依赖，是出于从他们那里赚取稳定的现金供自己买粉状可卡因和酒的考虑。

普莱姆：那天晚上他妈的出手太慢。我们削价处理，只挣了30块，还得分给凯撒一半。

因为生意不好，我们只好一起花，也不分了。

另外，你知道我们已经从瑞那里借了不少钱，还得一点点的还给他呢。

似乎是想证实他的话，普莱姆连停都没停，就把一张20块钱的钞票塞给路边一个口袋里装着白色粉末小瓶、面色憔悴的买可卡因的人。凯撒走在我们前面，听不到普莱姆对我说什么。

普莱姆：凯撒其实不会算账。我可以坑他，根本就不是对半分成。

尽管普莱姆和凯撒经常在一起喝酒、吸毒，但他确实也在尝试帮他的朋友和工人戒掉这一毁灭性的、难以控制的快克毒瘾。那些年里，他曾用不同的方法让凯撒接受康复治疗 and 训练，想把他培养成一位遵守纪律的人。

凯撒总是在捣乱。他每天晚上都向我要钱拿去吸毒。下次见到我，再求我多给他一些。

我就说：“你这个王八蛋！我已经给过你了。别再吸了，疯子。我不是已经给过你了吗，别他妈的再跟我要了。”

第二天他就不来上班或来得很晚，这样我就不用每天都给他付工钱了。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在瑞给过我钱之后，周末再付钱给他。

就那样也不行。（停下来从一纸币做的装满粉状可卡因的烟卷里吸了一口）我烦他那样对我。有一天给过他钱后我对他说：“如果你再把这些钱花完，明天就不要来了。我不想再和你一起干了，我受够了。”

后来不久我雇了大奔，他那时还是我的一名顾客。

大约一年后，普莱姆把他另一位朋友威利以同样的理由解雇了。威利的绰号叫O.D.，因为他过量吸毒（英语 over-dose 前两个字母的缩写）。据普莱姆说，O.D.的毒瘾更让人难以接受，他连工作时间都在吸。威利曾在父亲的威逼之下当了兵。他是瑞的公司里唯一可以参军的人，因为只有他有高中学历，毕业于市中心一所不错的学校——当时这所学校一时心血来潮，搞了个希望工程，现在已经倒闭。他接受过坦克手的训练，在1991年1月的海湾战争中奇迹般地逃生。他是在哈莱姆东区休假时偶尔吸上的。后来他干脆拉长了饮酒作乐的时间，擅离职守。

尽管普莱姆常年埋怨凯撒，但与O.D.或街道文化中像大奔那样喜怒无常的人相比，作为眼线的凯撒还是很不错的。他以其喜怒无常的恶名威胁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并通过这一方法在以恐怖文化为中心的街道文化中，把个人暴力的逻辑体现得淋漓尽致。凯撒在游戏厅当班期间，唯一一个不遵守那里规矩的人是位年轻气盛、嫉妒心特强的小伙子。他后来是带着自己破伤的头骨从这里走出去的。我现在还记得那次板球拍砸到他额头上发出的令人震惊的声音。当时我正准备离开那里，只听见身后的游戏厅门砰的被关上。普莱姆后来对我说，他打了凯撒三拳，才制止住他杀死那个昏倒在地的人。凯撒很乐意把这件事讲给我和其他任何人听。要知道，一个良好的公共关系才是保证这里安全的前提。^[5]

凯撒：那黑鬼一直在讲废话，说我们如何胆小。他在这个街区是怎么称王称霸（两手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头一前一后的晃着，就像在奚落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怎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我们一直忍着，直到他开始说这说那，还说要到警署去告发我们一类的屁话。

那时候我才抓起球拍——我看到了普莱姆身后的斧头，我说：“不，我要短一些的、结实一点的东西，轻轻一挥就能把这个王八蛋打个屁滚尿流。”

（朝着游戏厅大门喊）你他妈的尿不出来了，我们捏着你那玩意儿。哈哈……

（转向我）就是你跑出去那会儿工夫，菲利普。但我们的底线是：适者生存——或戴头盔的才能生存，因为我气疯了。

现在我得要瑞把他的林肯借给我。

凯撒从他不能自制的脾性中得到的另一个实惠是，终生享有按月付给他的社会安全保险支票，因为就像他说的那样，他是个“被诊断患有精神病的人”，他时不时表现出的自杀意图确证了这一点。

在瑞看来，凯撒不好管理，因而不能信任，所以他从来都没有把他正式录到公司里来。瑞在用人方面比普莱姆更仔细，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他不会雇用毒瘾较大或特别粗暴的人。凯撒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瑞对自己的排斥，但还是渴望成为他圈子里的一员。

凯撒：瑞不直接给我发工资，我是普莱姆雇用的。如果我进了监狱，普莱姆会负责，瑞会照料我，因为为了安全他也乐意把我留在他身边，他想把我偷偷地吸收到他的团队里去。

另外，我没有犯过重罪。在所有为瑞工作的人当中我的犯罪记录最干净。如果我被抓，他知道我不会让他像给大奔那样付保释金的。我经常上法庭，但不用付钱。

代替凯撒当眼线的大奔也是有毒瘾的人。但不像凯撒，他和普莱姆一样，他是用自己当毒贩的角色作跳板，用一些毒性较轻的粉状可卡因或海洛因代替快克，以克服对快克的依赖。因此他俩的等级关系不怎么清楚，普莱姆随后把他提升为合伙人。很有趣的是，当普莱姆雇他作眼线时，大奔还在曼哈顿市中心唯一一家男人俱乐部里当看门人助理，那可是一份合法稳定的工作。当他作为一名有权势的人物沉迷于街道文化的地下经济中时，他才不再用快克。换句话说，大奔是有了那份合法工作之后才开始用快克，而在他放弃了这份工作当了全职的快克贩子时才戒掉毒瘾的。一个街道毒贩职业的责任心使他戒掉了毒瘾。

普莱姆：“我解雇了凯撒后，开始时自己单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家伙（指着大奔）以某种方式示意我他想要这份工作，我喜欢他（停下来吸了一口）。

所以我问他：“想在这儿干吗？”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紧张（用钥匙尖从玻璃纸装着的10块钱一包的海洛因中，舀了点用鼻子吸过后，递给大奔）。

大奔：（吸过后）当时，我在帆船俱乐部，是一名合法的维修工，下班后经常来这里（游戏厅）。

普莱姆雇用我后，我有两份工作。

你知道我几点起床去帆船俱乐部吗？早上5点，因为7点我必须准时赶到那里。早上7点到下午3点半在帆船俱乐部上班，4点钟我得赶到游戏厅（又吸了次海洛因）。

普莱姆：所以我告诉他：“一天30块，一周6天，周日不上班。”

他说：“好，好，挺不错的。”之后他就在这儿混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还蛮酷的——比以前吸得少多了。我经常带他去社交俱乐部那里，买巴卡迪（Barcardi）酒和一些吃的东西，我们还一块吸（停了停，把另一瓶可卡因倒进一美元的纸币里）。

有一次我对他说：“去吧，去招呼那些顾客。”过了一段时间，（又吸了一次）我对他说：“我们以后不管卖什么，咱们都平分，那样你也可以多挣点。”

因为那时我多少有点收入（把头靠后去，猛吸了一口），一晚上8小时经常可以挣二百、二百五、三百甚至四百，最少也能挣个一二百。

大奔：对，当时能挣点钱，兄弟，两人一晚上能挣双份。

普莱姆：我当时还做记录，伙计。这些海洛因（指着游戏机后面藏放的地方）像烧饼一样好卖。

我他妈的好傻，当时应该买点什么东西把钱留下来。

但我们一起干的时候，经常聚会，我的钱都成了历史。花钱如流水啊，小子。（一字一字地吐出来）花钱住酒店、买可卡因、买酒。挣得容易，花得也快。我经常请大家的客——大奔，O.D.——所有人。我就想交朋友，我们每天住酒店，酒店可是花钱的地方啊，老兄。

可惜那些天里我没怎么见到你，菲利普。我们肯定会很喜欢你的。（动情地抓住我的胳膊，可卡因的冲劲儿可以使情绪突然变得低落，而快克则可以使人亢奋——海洛因加可卡因则会让人更兴奋。）如果你当时在，我们可能会更酷。因为你不会惹麻烦。我们常常会砸烂屋里所有东西。

我整天在外厮混，一心想成为大明星（又吸了一次，瞥了大奔一眼）。因为有钱，我们很享受（手猛拍了大奔一下，俩人都笑了）。

领最低工资的快克贩子

对于街面上那些快克贩子生意兴隆期间居然还身无分文的理解，使我最终意识

到他们慷慨的社交行为，说到底与合法经济中那些崇尚个人主义、另类的、摆阔气的暴发户没什么两样。对横财恣意挥霍以炫耀自己，是拜金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快克贩子们对不义之财的挥霍，只不过是存在于北美洲同一情形的讽刺版。他们在合法经济中有限的花钱路子，加剧了他们挥霍的力度。

快克贩子与主流经济关系中一个更为复杂的层面，就是与合法劳动市场的交互关系。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做详尽探讨，这里要探究的是它与合法经济的张力与冲突，是如何影响到游戏厅的日常运营的，因为可卡因经济的感染力并不局限在简单的金钱逻辑关系中。

街道上的毒贩习惯于向外人或自己吹嘘他们每天晚上能挣多少钱。实际上，他们的真正收入从来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一直都很高。

像普莱姆一样，大多数毒贩都是按件计酬。也就是说，他们挣钱的多少取决于他们能卖出的数量。如果转换成按小时计酬，那就更微不足道了。据我计算，以瑞的工人为例，他们的收入是每小时七八美元，比合法的平均最低工资的两倍稍微低一些。但也有例外，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挣到比最低工资标准高出10倍以上的钱——当然回忆时他们更易记起这些时候，而遗忘的往往是警察突然来搜查、生意根本无法正常做的那些夜晚，更不用说他们在监狱里度过的那些本该工作的时候了。



凯撒在游戏厅里展示他挣来的现金和几包快克。照片提供：Susan Meiselas。

我是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意识到，做快克生意的收入并不那么稳定和富足。有天晚上，普莱姆和凯撒正在关闭游戏厅大门，我突然象征性地想通了这个道理。凯撒拔下电源插座上的连线，断开游戏机，普莱姆把刚刚剩下的快克瓶子藏在一个空着的带电的插座里，开始查晚上挣来的一沓钞票。就那么薄一点，我当时感到很震惊。他把钱分开，卷起来放进自己的皮夹子里。最后他们急忙把游戏厅的防盗网放下来，用耶鲁牌的锁把门锁上，和干完一天活急忙收拾回家的工人们打着招呼。惊异于急着锁门回家的工人们身体语言的普适性，我突然有一种把这一另类经济中的工资做一对比的冲动。我有意避开普莱姆前面那个鼓鼓囊囊的口袋，从他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他的钱包，那里装着晚上与瑞共有的收入，如果遇到拦路抢劫的，普莱姆会拼死保护的。没有想到的是，我还掏出了一张价值 15 块钱的食物券和两张 20 块钱的现金。一阵尴尬的笑声之后，普莱姆结结巴巴地说，他母亲增加了他的月伙食费，现在每月给他 30 美元零花钱。

普莱姆：我给女友玛丽亚 (Maria) 一半。我对她说：“给，拿去花吧。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另一半我留着应急用。

就这样，我们每天装着几美元维持生活。因为今晚上纯现金只挣了 40 块！你明白吗？

另外，快克经营中的工资相对来说比较低，工作环境也不如合法经营场所。除了看得见的遭枪击、蹲监狱的危险之外，快克买卖点的外部工作环境也不尽如人意。比如游戏厅内的基础设施比哈莱姆东区任意一家合法零售点都差，没有浴室，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话，冬天里没暖气，夏天里没空调。普莱姆经常会抱怨一通。

普莱姆：你瞧瞧这里，一切都乱糟糟的（指着那些破旧的、有凹痕的游戏机、脱了油漆的墙面、堆满废弃物的地板、用电影画报糊着的肮脏不堪的窗户）。糟透了，兄弟（又指着挂在屋顶上闪着苍白的光线、40 瓦的灯泡）。

说真的，除了那几台游戏机外，唯一的家具就数那几个落满灰尘的牛奶箱和歪歪斜斜的铝制小板凳了。更糟的是，屋里还总是弥漫着一股股尿骚和呕吐物的气味。几个月来，普莱姆已经修复了这里老化的音响，但却被发酒疯的凯撒摔成了“肉酱”。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普莱姆用 5 块钱一瓶的毒品换来的那台黑白电视机上。当然，基础设施还只是令人沮丧的工作环境的一部分。

普莱姆：我不喜欢别人把东西搞得乱七八糟的（把三瓶快克交到行色匆匆的客人手里），可这里偏偏就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一句话，我讨厌做快克生意。

（远处传来枪声）听到了没？

大奔为什么当时愿意放弃他稳定的维修工工作而跟着普莱姆在这种环境下干活呢？

大奔：我丢下我的工作开始跟着你干（指着普莱姆，又吸了一口）。

起先，我们整晚不睡觉狂欢，可第二天我还得去上班。但让我感到心寒的是，我整天进进出出，可没有一个人在乎我。没有人理我——我的老板、师傅从来不跟我讲话，因为我是个维修工，我什么活都得干。

任何事儿！不管什么，你都得干。你得维修饭店里所有的东西，只要他们一喊，你就得去修，不管是什么。

比如电线漏电什么的，水管漏水——所有这些狗屁活儿，都是你的。我是工会会员。你在纽约城帆船俱乐部联盟，你就可以有工会会员证——我是说，你可以享有特权。

那可是个高档的地方。我看见过市长考茨（Koch）在那儿吃过饭。对，我还看到过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新闻里经常提到的小子？老兄，我看见过很多人在那里吃饭。

就像会员资格一样，你必须属于一个或几个帆船俱乐部的成员！他们都是些有帆船的人，有的是钱，到处都有他们帆船的模型。在那里吃饭的只有白人，反正我看到的都是些白人。

我从不白在白人面前找麻烦。见到他们，总会这样（鞠了一躬并模仿上层人士的口音说）“你好吗？”（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停下来吸一口）“早上好”。不过他们都是些不错的人。

我在那儿呆了很长时间，大约一年零几个月。一周工作五天，可以挣600块钱，老兄。

（继续伤心地说）现在，我丢了工作。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你（指着普莱姆），凯蒂和弗劳拉（Flora），我们在凯蒂家狂欢了一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的过错。我开始与弗劳拉来往。今儿早上我还

和她在一起呢。

我没去工作，开始瞎胡混，尽情地吸毒。第二天也没有打电话，也没干别的，和弗劳拉在一起。

最后大奔从他的街道文化身份推导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他忍受不了瑞的专制，开始偷他的钱，并因一桩与快克毫无关系的原因被捕。瑞为此付出了2500美元的保释金。在“北部”监狱度过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大奔被放了出来，在一家健身房内的健康视频自助餐馆里“帮厨”，工资比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略高一些。周围同样是那些有权势的白人，自己只是他们的下属。他尽量只在周末喝酒，吸快克和海洛因。他喜欢来游戏厅玩，给普莱姆讲起那些合法雇工的些许荣光。在那些寒冷的夜晚，游戏厅关门之后，我们回到公建住宅楼的楼梯间取暖，普莱姆和大奔吸可卡因，我们一起喝麦芽酒，一直喝到天微微亮。我把和他们的谈话录了下来。¹⁶¹

大奔：最好的生存办法是做合法生意。挣你的钱，让大家都爱你（打开10美元一包的海洛因，递给我一瓶麦芽酒让我开）。

我希望你也一样，普莱姆。我已经做了一年了，普莱姆。看看这个盒子（拿出一个小塑料瓶），看看上面写的。一年，这是个别针，领带用的别针。但那是因为我做了一年了，上面就写了这个。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做一年吗？（吸了一次）因为我在戒快克瘾（指着普莱姆用一元钞票卷起来的粉状可卡因），我他妈的一直在戒这东西——我的价值——我终于到了这一步，我不会再吸了（再次指着可卡因），我烦透了这种靠快克活命的日子（指着楼梯口的瓶子），我是认真的，兄弟。

就像现在（停下来吸了口可卡因），我不吸毒了！妈的。瞧瞧我的脸（粗暴地一把从我手里夺走酒瓶），我的脸是圆的。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猜出他是否吸毒。（用普莱姆的钥匙从一包海洛因里粘了一点，仔仔细细地吸了起来。）

突然，可卡因带来的兴奋好像触发了他大脑中一些特别的东西，大奔小心谨慎地讲起了他在干合法工作时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是多么的艰难。

大奔：但你从来没有对我不敬或挫败过我。

普莱姆：（安慰他说）你是个工人，我尊重你现在的这种状态，（转向我）我

尊重他。

大奔：(怒气未消)我不想让别人尊重我，我想自己尊重自己。

我尊重自己，兄弟。(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我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爱我自己，你知道，我不想自吹自擂(喝了一大口酒)。

普莱姆：(安慰我似的)他像是在发泄，菲利普，大奔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很爽。

大奔：(稍平静了一些，把酒瓶递给我)我一小时挣他妈的8块钱。我是个助手，帮厨的，一小时挣8块，一周最多挣300块。OK，他们还得拿走100块，交税什么的，我才落150块。如果你晚一些回家，就能看见我说的是实话，交税需要八九十块，那么我就只剩下150块了。

普莱姆：(很得意自己能够了解合法的工人阶级的工作)那是因为你只需要照顾一个人，我当时有三个人要养活。

大奔：那是你！我爱我自己，为自己感到骄傲。有谁他妈的会为我骄傲、爱我？兄弟。我老爸，我兄弟。他现在连我尿的尿都稀罕呢。

我老爸是个辛苦了一辈子的人，21岁时从波多黎各来。现在53岁了，当了一辈子服务员。

普莱姆：(低声说)老兄，我可不想一辈子只做一样的工作，不想为小费活着。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

(突然改变了话题)我们再去买瓶啤酒吧！

私下里，特别是在我住在那里的最后几年里，普莱姆承认他其实也想做一些合法的生意。

普莱姆：我把这儿的钱给弄脏了，真想干一些不违法的事儿。

菲利普：那样你就成不了这里的小头目，也不会有那么多朋友了。

普莱姆：我现在虽然不缺女友，但如果我有份合法的工作，我可能会更酷一些。我不会去喝酒，也不会每晚都吸可卡因。

菲利普：但在这里你挣的钱会更多一些。

普莱姆：就算是吧。我想要钱，但不想干这活儿。

我真恨它，兄弟。确实恨它。我恨这里的人，恨这里的环境！恨他妈的一切，兄弟。但你似乎被缠住了，你一直在做，你会说：“唉，明天再干一天！”

多一天，就能多赚点钱（指着刚刚进来的一个消瘦的男人）。

但我确实认为我不会希望自己有天会更富。我不能那样说，只是想想而已，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如果我干的是合法的事儿，我就不会这么乱来，也不会招待你（指着我手里的柯尔特酒）。如果有了工作，我的环境会彻底改变，我会有不同的朋友。下了班我会和同事们一起吃午餐、晚餐，或者我干脆回家；我太累了，不想瞎混了——我知道我明天还得工作。

如果有了份合法的工作，我保证我肯定能变好！

问题是，当普莱姆所能竞争的唯一合法的工作没法给他提供像样的工资时，他的美梦其实改变不了什么，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做详尽的讨论。快克贩子们没有谁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合法经济中有限的工作选择以及对毒品的嗜好，与在经济生存和个人尊严方面对快克的依赖不无关系。然而，普莱姆的所有同事和工人都讲起过他们在步入合法工作时是如何拒绝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可忍受的工作条件的。大奔就讲过他丢掉合法工作变成有快克瘾的人以及后来变成毒贩的过程中个人对尊严的理解。普莱姆的另一个眼线威利，在受雇前同样有份合法的工作，他则描述了驱使年轻人在快克世界里寻找慰藉的力量。矛盾的是，威利放弃了他在合法劳动力市场上所遇到的粗暴的工作条件，转而选择了给自己的邻居和社区带来毁灭性的残暴。

我一生中都没有干过一小时能挣六块多钱的活儿。最多的那次，是我最后那份在美国保护动物协会的工作。一周可以挣二三百块（税前）。

记得第一天去上班，我穿戴整齐。和一位漂亮姑娘一起工作，我想让她喜欢上我，后来他们推出来一车中毒死亡的动物。

我戴着皮手套站在那里，对吧？想站得远一些，因为我受不了了。我爱动物，你知道，现在楼上还养着三只吉娃娃犬呢。

不过老板清楚会有麻烦，所以雇了多余的人——他们经常这样做。他们解雇了一个。所以当老板说“你跟着她干”，我就干了。

后来我一看见那些死动物就觉得恶心。我穿着衬衫、便裤，戴着皮手套，在一家像加油站一样的屋子里干活，把装满死猫死狗的手推车放到大卡车上。

我不能在那儿干了。

所以有一天他们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不适合干这样的工作。”我就这样被解雇了。

管理——游戏厅里的劳工纠纷

普莱姆在合法职场上的遭遇并不比他的那些工人们好多少。但在游戏厅的门廊内，他的脆弱是看不见的——尤其是与他的顾客和工人们相比。他的一言一行看起来像个能干的老板，但在瑞的公司里，普莱姆相对的自治和重要性在瑞扩大了他的经营范围之后最终大打了折扣。最初位于药店之角的那个社交俱乐部的零售店，为瑞赢来比游戏厅更大的利润。于是瑞在这里实行双班倒，除周日外，每天开放16小时。也可能是出于他个人对这里的偏爱——他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他在这里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很快社交俱乐部就有了台球桌，一套很不错的音响，一间有时还能用的冲水厕所，一个空调和电暖器。瑞还在那里建了一个供工作之余消遣的酒吧，提供啤酒和巴卡迪酒。对于那些高档消费者和静脉注射可卡因的吸毒者，除了几分钱的快克之外，还提供20块钱半斤的较纯的可卡因。

瑞对公司的扩展和改善，使其在处理劳动力关系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他从普莱姆的游戏厅开始，加强管制力度，提高利润差额，从而引发了与普莱姆之间长时间的权力冲突。瑞首先废除了普莱姆雇用工人的权力，派遣自己选定的两名雇员做跟线和销售，与普莱姆一起工作。普莱姆对此颇为不满，他不想从一个经理降格成一个销售员的身份。

在这场争夺场地自主权的争斗中普莱姆输了。他作为“经理”的位置变得越来越模糊。到了我住在那里的最后两年，普莱姆几乎没有任何管理游戏厅的权限。瑞同时还设法降低了给他按件计酬的比率，从每瓶提取一美元降到75美分，尽管依然保留了晚上如果卖7包（175瓶），每瓶可提成1.75美元的奖励机制。瑞认为，普莱姆不积极应对这里的暴力和争吵，再加上旷工和有限的工作能力，才让这里的生意每况愈下。其中有一段时间（大约10个月），普莱姆的存在变得如此无关紧要，以至于瑞雇用了托尼（Tony）做高级销售员来经营游戏厅四分之三的生意，普莱姆每周只需上两个晚班。

普莱姆用酗酒和吸毒来应对工资降低、工作时间减少和管理权利的丧失。他变得更不守时、守纪了。瑞几次报复性地暂时解雇他，只留给他两周的察看期。实质上，

供求关系变化才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街区内公建住宅楼房里的竞争，把他们每瓶3美元的价格永久性地降到2美元；街区外快克买卖联合大企业也把价格从5美元降到3美元，同时还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瑞孤注一掷，通过增开游戏厅的门面以保持市场盈利，把楼上的生意搬到周围腾出的新地盘上。那里曾经是三个有行医证的医生非法经营的药厂。如此一来，工人們的士气暂时得到了鼓舞，但销售额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我们对老板管理策略进行这种世俗化的探讨，正像合法领域零售企业职工担心被解雇而对生意萧条原因的猜测是一样的。

普莱姆和凯撒下了夜班来到我的客厅休息，我录下了他们一段特别焦虑的对话。前两周因风声紧，游戏

厅关了门。重开张的那天晚上，瑞引进了一种劣质产品（之前给他供货的多米尼加批发商被捕，新的联络人卖给他的是一种劣质可卡因）。

闷闷不乐地开讲之前，凯撒打开装有海洛因的玻璃纸信封，用鼻孔吸了一下，把盒子扔到咖啡桌上。随后赶忙伸手拿起普莱姆刚刚卷好的装有可卡因的一美元钞票卷。普莱姆抢过可卡因说：“可怜的兄弟，我来喂你吧！”转向我强调说：“我痛恨这黑鬼发毒瘾的时候。”普莱姆把火柴纸板的一角折叠起来，从一堆可卡因中舀来一点，放在凯撒鼻子前让他吸。凯撒一只手按住一个鼻孔，另一个张得很大，怪模怪样地吸起来。普莱姆又舀了三次，直到凯撒平静地坐回到沙发上，点头表示谢意。

凯撒：（慢慢地说）今晚他妈的太背了，只挣了22块5。我冒着被警察抓住、搞脏我的犯罪记录的危險，向那个大屁股的黑鬼讨要零钱。



游戏厅关门后，普莱姆在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住房院子里的长凳上喂凯撒可卡因。照片提供：Susan Meiselas。

瑞在这儿肯定会丢很多生意，连灯都没有，谁会来这儿。

普莱姆：错，这与场地没什么关系。问题是我们卖的2美元一瓶的东西只能吸五次。

凯撒：就是，瓶太小了。（严肃的）瑞最近一直搅和这东西，兄弟。他好像在偷偷替换，刚有好转，他又换，再好一点时，他又换了。

普莱姆：真正的问题是，瓶太小了。

凯撒：还有，我们关门这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才开门，还卖这东西。

重新开张你们怎么就卖这种火一样的玩意儿？顾客们都这样问我，说快克怎么吸起来有点像火。真是堆垃圾！

他可是在糊弄我们，根本没有几个回头客，兄弟。大家抱怨说我们是在卖火。

（找回了他的节奏，可卡因起了作用）我真的已经告诉过瑞：“到底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可是垃圾啊！”但他却说：“去你妈的，老子卖的就是这个。”

普莱姆：（重吸了一次）我从来不给他讲废话，特别是今晚。因为太难出手，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纽约城电力公司的人也没有来，他更恼火。

当我把话题引向他们怎么能容忍甘当快克买卖中拿钱最少的人时，他们却用一种庆贺式的方式，荣耀地回忆起从前一些破纪录的买卖。或许，同样的内容在地方经济衰退时期那些喝多了酒的旧车销售员当中也可以录到。

凯撒：（从普莱姆举着的火柴板纸中猛吸了一次）不对，菲利普。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今天是周一，又是月底，大家都没钱了，所以今晚才卖得少。

（激动起来）前几天普莱姆自己一个人挣了300块呢。

普莱姆：（笑了笑）那是月初，大家都领到钱了。

凯撒：（这次吸得更狠）买卖最好的时候是在月初，所有的东西都来了。所有支票之类的……

普莱姆：对，大家都有钱了（咧嘴笑笑）。到了月初，福利支票、租金账单、社保支票都到了。月初绝对是钱、钱、钱（咬着嘴唇说）。

凯撒：所有的人。老兵支票、养老金、社保、福利、犹太人的放高利贷支票等……（注意到我吃惊的表情）你知道，犹太人诡计多端，他们用纸挣钱……保险、不动产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好像是在捡钱一样（贪婪地

捻着食指，带着狡猾的笑）。

每个月初，钱在飞舞。

普莱姆：大伙都来买，享受福利救助的人、工人，我一下子卖出去 12 包。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瑞的生意不太景气。时局变得越来越紧张，工人们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凯撒接二连三地酗酒闹事之后，瑞命令普莱姆把他解雇了，但普莱姆没答应。于是瑞把他每周四、周五晚上的班，调到周一、周二，以示报复。周四可是市里那些官员们发薪的日子，晚上销量特别好。普莱姆和凯撒对托尼的憎恨，是劳工管理中矛盾内化的一个经典实例。托尼是瑞几个月前雇来顶替、惩戒普莱姆和凯撒的，他刚好迎合了他们之间的对抗。当藏在游戏机里的三包快克在周二、周三普莱姆和托尼当班的间隙不翼而飞后，这一矛盾迅速升级为潜在的生死对抗。大家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但又找不到入室抢劫的任何印迹，而且除了瑞，只有凯撒和托尼有游戏厅门的钥匙。瑞恼火得直想杀死或至少打断罪犯的腿，但却苦于不知道该惩罚哪一个。

接下来的那个周四，一夜之间又有三包藏在带电的储藏室里的快克不见了。瑞气急败坏，但却束手无策。——这下子他更加恼火了。为了挽回面子，他从普莱姆和托尼的工钱里各扣除与被偷的快克等值的钱。可是普莱姆当班的周一、周二买卖如此萧条，瑞不得不对普莱姆的偿还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普莱姆和凯撒获准周一晚上可以整夜开门，以弥补其周二晚上的不景气，直到他们还清与丢失的快克等值的 450 美元。

意识到自己是首要怀疑对象，凯撒公开认定托尼是小偷，不断扬言“要废了这个狗娘养的”。而我们这些经常去游戏厅的人，则习惯性地认定是凯撒干的。普莱姆没办法，只能一起受牵连。自己最好的朋友加雇员——他的“主要黑鬼”受到如此伤害，普莱姆觉得很是沮丧。就是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我录下了他深刻谴责自己被卷进快克买卖的原因。

六包快克的失踪之谜在一次预料中的毒打之后终于解开了，但托尼、普莱姆和凯撒都不是受害者。小偷是加托 (Gato)，瑞的一个技多而不精的维修工。他曾维修过游戏厅楼上的新场地。他挖空镶在地板下面的线圈，通过游戏厅后面那个废弃的建筑物，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才爬进来。他了解瑞储藏快克的所有地方，因为他维修过这里的每一台游戏机，了解所有的电路。实际上，还是他从附近的酒店为这个

快克买卖点偷来的电。三天之后，瑞把加托带到了游戏厅，让他维修新近买来的旧游戏机来偿还他的债务，我们都不禁为加托感到遗憾。三天前他挨了一顿暴打，艰难地从瑞的林肯车里爬出来，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拒绝和我对视，开始拧开一台损坏的游戏机后盖。他身上发出的那种无家可归、无法洗澡、没干净衣服换、吸快克的人特有的那种酸臭味，让我们都退避三舍。瑞没伤着他的骨头、没要了他的命，证明他俩童年时的友谊多少起了点作用。他作为“奇葩团队”（The Cheeba）一个忠实的少年队员，已经跟随瑞混了12年了。

瑞趁此机会把托尼的工资从按件计酬改为每包提成12元，不管卖出多少。这对他来说当然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托尼晚上的工作时间往往是销量最好的周三到周六。托尼和普莱姆之间的恩怨太深，因而他们做不到联手提出增加报酬的要求。说真的，根据分而治之的规则，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的对手和同一老板间有什么样的工资协定。

快克买卖点的小圈子——应对安全

晚上经常聚集在游戏厅、寄生于普莱姆的朋友、熟人和想要成为其雇员的人，并没有看出普莱姆对瑞的妥协。普莱姆值班时，在与他厮混在一起的那帮人面前表现得很顺从。他特别大方，总请他们喝酒，有时还请他们吸可卡因。我一直以为，普莱姆对街角这帮人的态度主要是为了填补自己对权利和控制欲的心理需要，特别是想借此吸引少女们的注意。

几个月后我才意识到，那些斜靠在汽车发动机盖上、蹲在附近门廊里、或点着脚和着收音机里的说唱乐或萨尔撒舞曲节拍的人们，对于这一快克交易点其实意义非凡。他们在毒品行业的竞争、毒品味道的变换趋势及地下经济的市场走向方面，都可提供策略性的实用信息。只要不是太吵闹，他们还可以掩饰那些面色憔悴的吸毒人员的进进出出，使快克买卖点看起来更像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普莱姆的养祖父亚伯拉罕（Abraham）的到来，使这里变得更加“正常”。他主要负责从游戏机里取出两角五分的硬币，一旦有可疑的缉毒警察来造访，这位72岁嗜酒如命的老人就在那里倚老卖老，他无助而温顺的表情和左眼上罩着的自制眼罩更强化了他的无助感。80年代初他在勒诺克斯山医院（Lenox Hill Hospital）的咖啡厅上班，他的眼睛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行凶抢劫的人刺瞎的。¹⁷¹

最重要的是，这帮人在预防游戏厅的暴力事件和袭击方面还可以填补眼线工作的不足。普莱姆周围围拢着的这些人，实际上是些真正尊重和喜欢他的人，也是他防止遭遇人身攻击最好、最便宜的意外伤害保险。调查谋杀案时，他们可以充当最有效的侦探；有盗匪突袭时，他们可以保护他并为他作证。说实在的，对普莱姆最大的人身攻击莫过于来自盗贼的袭击。每当看到有两个人同时或前后脚紧接着走进游戏厅时，普莱姆都会很紧张，对于一些陌生面孔更是很警觉，担心他们会不会是来踩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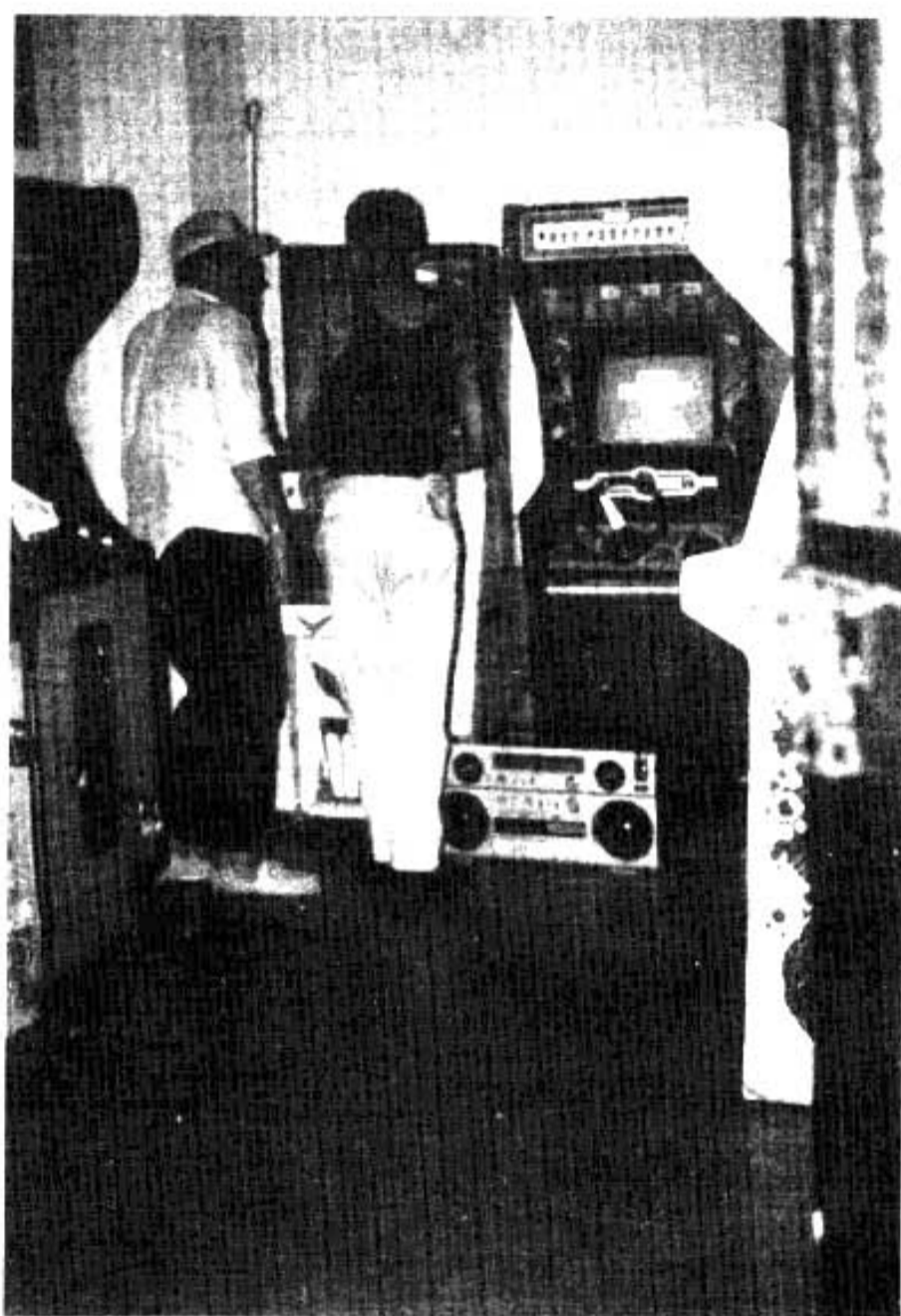
普莱姆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在我考察游戏厅运转的那五年半的时间里，他曾被戴着面具、持枪的人抢劫

过两次。普莱姆向我吐露，第一次遭抢劫时，歹徒用枪顶着他的太阳穴，他躺在地上撒谎说没有现金时吓得都尿裤子了。但当晚些时候向瑞汇报这一情况时，普莱姆却夸大其词，说有不少现金和快克被抢走了。

普莱姆认为我把他慷慨地招待朋友和熟人解读为功利主义是对他的亵渎，但他却反复重申，每天晚上他都有紧张感和危机感。更详细地说，他使我意识到这帮人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保护他不受袭击，而且还可为平衡作为一名孤独销售员的他经常受恐吓要被致残的焦虑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氛围，因为他们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把他从危险的现实生活中解救出来。

普莱姆：我不需要任何人来保护我，菲利普，不需要。我一个人就能搞定。我就想要我的人待在那儿就行。

O.D. 没必要在这儿（指着当晚值班的眼线威利）。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陪我。杰姬（Jackie）也行（杰姬是他当时的女友）。



在游戏厅里闲逛。照片提供：Oscar Vargas。

明白吗？只要有人陪我说话，和我做伴就行。甚至玛丽亚（他的前女友），但瑞不喜欢玛丽亚在这儿；他不太了解她，她是从别的街区来的。

你能理解吗？我就想有人陪着……做个伴。这种地方一个人干活是很难受的。

因为如果是你一个人，你会觉得……更急躁。没劲儿，我想更放松一些。如果有什么事儿，你总得有个人作证或什么人在那儿……是吧？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普莱姆和我之间的友情原来也是他下意识地笼络游戏厅前那帮人的一部分。在哈莱姆东区夜晚的快克买卖点，看到一个困窘的白脸比看到大块头的威利、狂躁而有暴力倾向的凯撒和与普莱姆交往的那些少女们，对有意抢劫的持枪歹徒的震慑力或许会更大。周围可以攻击的人那么多，他们何必去冒险袭击一个可能的便衣警察呢。

普莱姆这帮朋友和眼线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掩缉毒警的耳目。快克贩子必须通晓街面上的各种迹象才能分辨出真正的吸毒者和秘密的骗子。那些一生都在街道上瞎混、认识街区所有人的人，才能成为最优秀的眼线和街道上的卖主。当普莱姆对某个顾客有疑问时，他首先会找他的眼线或门廊里的朋友们查证，然后再给他们提供服务。那些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身体还没被快克损毁的人是最容易被混淆的。

普莱姆：你，凯撒，那两个黑鬼是什么人？我怎么不认识这两个王八蛋，他们会不会是警察？

凯撒：啊？没事儿。他们长相不错，穿的还行。我认识那个黑高个儿，阿拉巴马人，还挺酷的。我认识他，以前来过游戏厅，是你忘了。

他肯定刚从监狱里出来，穿着一身新制服。那家伙身体挺棒的，身材有点像巴斯特·道格拉斯（Buster Douglas，泰森之前世界顶级拳击手）。

我认识普莱姆的五年里，他亲自做过的快克买卖绝对有上万次，经手的钱有上百万美元。然而，就是如此活跃的他，仅被警察抓过两次。同一时期这个游戏厅也只有两名卖快克的人被抓过。瑞其他的快克买卖点从来没有人被抓过，就连药店之角那个社交俱乐部生意最兴旺的时候也没有。可笑的是，这一社交俱乐部却因要扩展成为游泳池和出售非法私酿酒被查封过六次。这里大批的老主顾让警察很是迷惑，他们根本分不清要抓谁。再加上店主属于纽约市民，他们没法剥夺店主的酒吧，而原来的业主已经把拖欠的税务还清了。但有两次，警察把游泳池里的桌子砸了个粉

碎，扯断了电线，还用板材堵上了入口。一次查抄时，他们认为凯蒂卖非法酒饮给一位便衣警察，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地方一直做的是毒品生意。纽约市的消防队是社交俱乐部最大的危险。在南布隆克斯社交俱乐部那场夺去84人生命、骇人听闻的纵火案后，消防人员以违反消防规则为名，几次将这里查封。^[8]

警察对于瑞快克交易点的控制形同虚设，这主要是与大家所公认的这里公共部门的失职有关。市中心的警察队伍如此道德败坏，软弱无能，他们大部分时间用不着彻底堕落——尽管他们往往是这样——就可使他们管辖分区内的毒品买卖兴旺繁荣。^[9]那些诚实的官员对当地社区的态度太过敌对而无法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所以搞不清自己辖区内众多的毒品交易现场的活动。举例来说，五年半的时间内，作为一个白人，我晚上经常出没于这条街上的六个毒品交易网点，竟然从来都没有被警察认出来。就是在我开始出席社区里的反毒扩大会议之后，他们在街上也没能认出我来。^[10]

瑞和他的工人们采取了几个基本的防范措施，以减少被捕的危险。他们从来不在门外的街道上做交易。为了防止警察从对面楼里用望远镜观察，他们经常让顾客来到公司后面那个乔装打扮的游戏机背后，才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为重要的是，任何情况下其他人都不会看到超过25瓶一包的毒品。根据晚上的时间和季节的不同，多余的毒品包会被小心地藏藏在改造过的秘密地，比如头顶上正使用着的电源插座，用漆布做的墙板里面或游戏机的内部。根据供求需要，兜售的人会定时送来更多的毒品，拿走现金收据。

警察来查抄时，卖毒的人必须具有一定的藏毒技巧。普莱姆就以其娴熟的技能，在最后那次买卖中免受四年监禁之苦。当警察用便携式夯锤猛砸游戏厅的大门时，他立即把药瓶塞进一个游戏机内，警察在现场什么也没搜到。但若是卖毒人员警惕性过高，对每次的警报声和汽笛声反应都太敏感，快克买卖就没法进行。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放松和保持真正的警觉。就拿普莱姆来说吧，很有分寸地把啤酒和可卡因分发到那帮好朋友的手里，对于他维持平静与警觉的平衡至关重要。

凯撒：(喝了一口麦芽酒后说)他们来抓我时，我手头有毒品不要紧，我会尽快扔掉或把它藏起来。我的犯罪记录是很干净的，我甚至一直以为我不会被抓到。他们经常会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去错误的地方抓人。

我不会把毒品卖给我不认识的人，从来不会。那些在游戏厅连续犯过这种错误的大爷们，都是因为当时太紧张了。

普莱姆：(从另外一瓶酒里也喝了一口)对，我那次就是中了他们“先假装买而后再抓”的计才被逮起来的。但有几次，我知道警察来了，故意装酷。当时我爷爷亚伯拉罕还在这儿，我正在给他读报纸上一篇关于拉里·戴维斯(Larry Davis)杀死一名警察的报道。我读着报纸，浑身发冷。

凯撒：我老表和戴维斯还在路易斯安那的同一所监狱被关过。

普莱姆：闭上你的嘴，让我说完。

我当时正在给亚伯拉罕读报纸上那条报道，他不识字。一个穿军服的小子走了进来，是个白人。

我不明白怎么会派他来，一看就知道是个警察。他向我走过来，我假装没看见，还在读着(眼睛盯着一份假想的报纸)。他走过我径直去亚伯拉罕跟前要东西。但亚伯拉罕意识到了是怎么回事，他这样，“什……什什么？”(他在模仿老人，嘴里含糊不清)我在前面尽管读我的报纸(两腿交叉着搭在牛奶桶上)，有几个孩子在那儿玩着，很酷。

然后他对我说：“他们还在这儿卖快克？”我就来了句“不知道”，接着继续读我的报纸。

他是个警察，白天我在街上见过他，穿着蓝制服。

普莱姆把那次他被抓并判刑归结于自己的疏忽。

普莱姆：我把我的(犯罪)记录带了回来，当时O.D.还在这儿。兄弟，那次我被抓了。我在外边拿着镜子梳头发，是一大早，大约4点来钟。当时我开门比现在早，大概一两点钟。因为菲力克斯经常警告我们说：“必须这个点到，小子！”我都快烦死了。

亚伯拉罕叫我，因为当时我没注意到那小子进来。我在那儿一边梳头，一边和O.D.说着话。

我走进去时，他假装玩游戏。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好像他还带着金项链、穿着短裤，穿戴挺整齐的。

于是我从一个盒子里把那玩意儿递给他(指着存放的地方)，他说想要五个。我拿给他时才看见他的脸。我心想：“妈的，怎么不认识这家伙！”他看起来干净利落，长得也蛮好看的，圆脸；我有点太……(慌乱得舞动胳膊)

于是我告诉他：“你怎么吸这个？放在烟斗里，你吸‘喔拉斯’(一种快

克和大麻合成的毒品)吗”?他问:“你也有那个?”我说:“没有,随便问问。”他走开了。

他一走开,我就跟 O.D. 说:“你,等会儿,让我把东西藏起来。”我对那个家伙不太放心,但 O.D. 一直给我讲他那些糟事儿,让我分心了。

我正准备把瓶子拿走,就这样(做着手势),他们推了我一把(走过来把我推到游戏机旁),我还以为是埃迪闹着玩的,所以没理睬。藏完后一看,警察已经拿枪对着我,(用手对着我的太阳穴)就这样。他是有备而来的。这帮黑鬼杀了我们个措手不及,小子。(喝了口酒)他把东西放在手上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手里拿着快克瓶子,苦笑起来。)

我因卖了 5 瓶而被判了 2—4 年监禁(伤心地摇摇头,喝了一口,把酒瓶递给我)。

一年之后,随着在押贩毒人数的猛增和缉毒政策的严格执行,纽约州的刑法制度逐渐陷入危机。一个恼怒的法官为了清理自己负担过重的备审案,宣布普莱姆的刑期为一年。普莱姆是因为没有向监管缓刑犯的官员及时汇报他的犯罪事实而被捕的,通常情况下,判缓刑的罪犯是该受彻底监禁的。

普莱姆第二次被抓是因为他亲手把价值 10 美元的快克出售给一位便衣警察,而 1990 年初极端混乱的毒品监管政策,再次把普莱姆从服刑 4—6 年的重罪中解放出来。^[11]为了急于扩大缉毒逮捕的数据,策划了对游戏厅进行突然搜查的战略反毒协会的官员们,在法庭上混淆了普莱姆和凯撒的身份。凯撒发誓讲真话,供认自己才是那个把快克卖给便衣警察的人,陪审团不得不按照宪法修正案第五条释放了普莱姆。瑞和其他几个快克圈内的常客,幸灾乐祸地观看了法官是怎样斥责律师为这个案子浪费了法庭的时间。普莱姆被判无罪释放。后来在游戏厅继续营业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再也没有警察来检查过。

第四章

“走向合法”——工作中的失礼和反抗

我真想干点合法工作。

——普莱姆

瑞的社交圈子里的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有丰富的城市工作经历。大多数人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正规的劳动力市场。12岁时他们就开始在超市替人拎包或送杂货挣小费，在当地的酒店帮忙搬运啤酒，或为别人干些跑腿的事儿。如今快21岁了，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实现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找到一份合法、稳定、高工资的工作。

这是有关机制上的问题，正如我在第二章简要概述的那样：从50年代到80年代，市中心贫民区第二代波多黎各人被拘笼于以工厂为基础的脆弱的经济当中，这一脆弱的经济随即又很快被服务性行业所替代。1950—1990年间，纽约市的工厂职位比例大约降低了三成，而服务性行业却增长了一倍。根据城市规划署的统计数字，从60年代到90年代初，80多万工业行业的就业机会没有了，各行业的就业总数相对稳定地维持在350万个左右。^[1]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统计数字表明：以服务行业为中心的美国经济调整，带来了失业、工资降低、合并能力减弱以及初级工人利益锐减。然而，对于这一新的服务型经济所表现出的文化上的断层现象，有关学者却很少关注。随着纽约市金融业、地产业和保险业的极速扩展，这一文化冲突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办公室服务性的工作上。这一特定的服务性行业格外受到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的青睐。邮件分发室的职员、复印人员以及高耸的金融业办公大楼里的通信员等职业，让许许多多市中心的年轻人有了与白人世界里的贵族及中产阶级文化对抗的机会。屈从于大楼内走廊文化的规范和标准，本身就是对街道文化所界定的个人尊严的谬悖——特别是对那些不愿接受屈从的男性来说。

抵抗、懒惰和自毁

和我所期待的情况不同，大部分毒贩其实还没有完全从合法经济中撤出来。相反，正如第三章提到的威利和大奔，他们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变成了卖快克和吸快克的人——颤颤巍巍地栖居在合法经济的边缘。但当他们在街面上买卖毒品和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合法工作之间来回转换时，贫困成了一成不变的事实。他们苦心找到的那份工人阶级的工作，实际上只是美国社会中最不被人看好的职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游戏厅里的常客在我认识他们之前所从事过的工作：无证的砖瓦搬运工、家政服务人员、街道上的发送广告传单者、满身油腻的厨子、在市中心医院暴力区域和预防精神病患者出没的地方夜里值勤的保安。

尽管他们往往是从合法职业中被开除的，但却把进入街道买卖行业看作自由意志的实现和抵抗的胜利。被合法的职场拒绝后，他们不得不加入快克买卖行业及吸毒者的队伍。然而，与此同时，成为一名毒贩并非其情愿和必胜主义者的抉择。普莱姆就经常跟我说起他找不到一份合法职业的苦恼。他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事，是在他因贩卖快克被判重罪后，负责监管他的官员命令他去职介所找份合法工作。除了工作环境恶劣外，他最大的问题是担心自己的无能和懒惰。

普莱姆：（在游戏厅后面一边用一美元钞票卷着可卡因，一边说）那个混账娘们简直是个蠢货。她建议我去做保安，你知道吧，我才不愿意当保安呢。我不想和外边那些狗娘养的打交道。我让他们随便偷。他妈的，我手里拿着警棒，一周领一次工资，随他们去偷吧。

那个混账咨询师还告诉我说（模仿官腔）：“越有资格，就越能找到好工作。”去他妈的，我还是得自己去找。

昨天有个面试，是个公司搞的，想招聘几个负责照看床单之类东西的人，类似于旅馆里打扫房间一类的活儿。我去看了看，但那里有很多墨西哥人，我不是他妈的墨西哥人。

我表兄找了份工作，干了三年了。上周他对我说：“明天早上我带你去见见我们的老板吧！”我睡过头了，结果没去成。我定了闹铃的，可就是没听见（吸可卡因）。

菲利普：你现在为什么不找一份老式的工作，比如像你妹妹那样在麦当劳干活？

普莱姆：知道我为啥不跑出去工作吗？我都26岁了还找不着一份正式工作，跑出去在麦当劳干活，那就证明你只能靠麦当劳活了。26岁的小伙子还在麦当劳干活！你肯定找不到这样的人。

如果真有，说明他们根本没接受过教育，没上过高中，什么学都没上过。他们不会讲英语。我是说我的英语很糟糕，但还是比在肯德基里干活的人要好混得多。

菲利普：兄弟，你这是找借口。

凯撒：（很生气地打断我，说）你知道我怎样称呼那些在肯德基或麦当劳干活的人吗？奴隶！

我知道，我在那儿干过。在那儿干就意味着多干少拿。你可以做全职——每周干五天——全职，但只能挣140另加30块。

知道为什么吗？还不仅仅是因为你干得多，挣得少，那是因为你没办法。我是说你还得炸牛排、拖地；因为你要想多挣，就得多干。

（突然抓起装有可卡因的纸卷，刚才还严肃的口气一下子变成了傻笑）我没有一份体面职业，唯一的理由是我懒，不想干这些工作。

我不想再找什么狗屁工作了，不想那么受累还挣不了几个钱。

你想想，如果你有份破工作，怎么去找另一份活儿干？工作就占去了你所有的时间。那为什么还要丢下你的活儿不干，跑去面试，等着他们告诉你：“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

（示意普莱姆用钥匙舀点可卡因）你，喂我一点！

你少拿一天的工资，就离地狱近了一步。因为没钱买毒品啊！（咧嘴傻笑，然后从普莱姆放在他左鼻孔前的可卡因钱卷中吸了一次）如果我挣不了周末吸毒需要的那么多……（又吸了一次，大笑起来）

菲利普：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但说真的，普莱姆，接下来还有场官司等着你呢。

普莱姆：（吸了一次，镇定下来）不错，我是在找借口。不过我打算周一就去职介所，以后经常去。我想，我已经习惯了街道上的一切，离我有份合法的工作那会儿可有些日子了。

我不喜欢上星期他们推荐我去的那个穿职业装的地方，我不想成为计量员，我不适合和那么多人打交道，没用的。我也该歇两周，那可不全是借口。

我的问题是在游戏厅干得太晚，第二天又得早起去上班。

凯撒：(安慰似的)对，我去过那个店，不是个能干事的地方。

普莱姆：(懊恼地说)我就是很烦。于是我选择了这儿，现在还在这儿。

凯撒：对，我现在很懒。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洗漱一下，挺着肚子从我的屋子里走出来，踩着节拍上楼去挣我的钱。

知道吧，我卖快克倒省去很多麻烦。因为我害怕普莱姆，(示意让普莱姆再给他点可卡因)知道吧。我在干那份合法的工作时就在吸快克，就是那玩意儿把我的生活全搞乱了。

真的，我本来活得挺自在的。(又吸了一次)没人找我的麻烦，别人也尊重我。

我奶奶很爱我，我有女人，有孩子，我觉得很满意，什么也不缺。[可我却]挣了钱拿来糟蹋我的身体。(再吸一下)现在我只需要下楼为老爹干活就行了，不需要挣钱带回家。因为第二天不需要钱，所以我还会继续糟蹋我的身体，反正第二天我要回到游戏厅，不需要钱：我干活，挣钱，然后再继续糟蹋我的身体(指着正在用钥匙留可卡因的普莱姆)。

菲利普：(笑笑)怪不得你的运动鞋那么脏！

凯撒：我没新的，是因为我已经决定要么省钱买双运动鞋，要么糟践我的身体健康。不过现在，我要糟践我的身体了(又吸了一次)。

我用在游戏厅挣来的钱来满足个人的疯狂，为了个人的毒瘾和自毁，这是我唯一能控制的事。没有人告诉我该怎样对付它。

(开始长篇大论)所以我会伤及身体内部，所以我每天醒来肚子拧结成一块块的，发胀发痛；不能吃东西，不能呼吸，拉个不停，拉得到处都是；一切都乱套了，一只眼睛发红，一只眼睛发白；头发里有刺鼻的臭味；我很脏，不洗澡，浑身发臭；我开始恨我的女人，早上醒来恨每个人，身体垮掉后就是这样。(吸了一下)然后我浑身发冷，病倒了，想呕吐；可到了游戏厅我就又酷起来了，过得很开心；我们搞垮身体，(指着原来放电视机的地方，有人敲门，打开了门)与顾客吵架，骂他们，用西班牙语骂他们，把垃圾毒品卖给他们，赚我们的钱。(收了10块钱，卖了两瓶快克。)再拿着这些钱出去买毒品(手指着放在普莱姆膝盖上装满可卡因的纸币卷)来糟践自己，在这里胡说八道(指着我的收录机)。

菲利普：如果有合法的职业，你打算把挣来的钱怎么花？

凯撒：我的女人养活我，因为她有福利和食物券。几个月后我又开始有社保了——每月300块，足够我穿衣了。

如果他们知道我有份合法的职业，问题就来了，我得交纳1500块钱的税，他们还会一直催我直到我的社保保险全部付清。

第一个被解雇，最后一个受聘任

瑞的社交圈子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地下经济这块领地使其免于直面这样的事实——对于主流社会来说，他们在社会、经济领域都是多余的。我看到过普莱姆曾经似乎努力想要弄懂他所面对的深重的经济脆弱。那是1989年年底到1991年期间，他想重新找份合法工作，这一期间恰好是困扰美国的经济衰退日益加剧的时期。起先普莱姆很自信：“我之前干过十来种工作，16岁辍学后就开始工作了。笨蛋都能找到活干的。”他几乎很享受白天乘地铁进城去上班的过程，还很钦佩那些有合法职业、“红光满面”、“头发梳得很整齐”、看起来很健康的乘公交上下班的人。

后来当先后有六位雇主莫名其妙地拒绝聘任他时，普莱姆还在埋怨他的职业咨询师的无能，尽管当时的报纸上已经发表文章，委婉地评述“当下美国发展的障碍”和“劳动力市场疲软”的事实。^[2]他挑战性地炒了他雇主的鱿鱼。

普莱姆：我觉得职业中心那个狗娘养的职业咨询师喝高了，他的眼睛都红了。他弄掉了我的文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还想帮我。他让我去了那么多鬼地方，结果一无所获。

那家伙肯定吸毒。他在办公室到处找我的文件。太白痴了，那么厚一叠文件，怎么会弄丢呢？那里头有我参加过的所有的考试成绩。

我告诉他：“你大概不愿意做我的咨询师吧！为什么不去别的咨询师那里找找看？”

他说：“不会，你的文件就在我这儿，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他那里有一大堆文件，我希望他好好检查一下，找到我的。结果没有找到，好像我从来都不存在似的。

一个月过后，又有六次面试也先后被拒，普莱姆的自尊受到了重挫，他的毒瘾变得越来越大。他活在个人血肉之躯的无奈之中，这是经济衰退期非个人的劳动力供求市场强加于脆弱的劳动者身上的一种无奈。

普莱姆：我觉得现在找份工作可真难，过去还行。或许是我去的那个评估安置中心给我推荐的地方不适合我。

我一直跟我的咨询师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头一天没人去过的地方？这样他们肯定会用我的。你已经给他派去几个人了，他们当然就不会再用我了。”

不过我想我的咨询师和老板可能已经达成某种协议，要送几个人供他们挑选，“喜欢哪个，就留下那个”。这太糟糕了。

我告诉他：“你为什么告诉他们‘我们这儿缺人，只能送一个人给你们。我们没有那么多委托人。’”

然而这家伙还是一次送好几个人过去，这样你的机会就少了。要想找份工作，你还得奋斗。

过去的评估安置中心就很不错。他们每次让我去应聘都会被录取，因为他们不会送那么多人去。妈的！

1990年劳动力市场上能找到的初级合法职位数的大规模下降，着实让普莱姆吃惊不小。不仅仅是因为经济衰退期使得人们很难找到工作，问题是，普莱姆还不得不面对自己生命周期循环的制约：他很快就将老得无法竞争那些自己年轻气盛、刚离开学校步入合法劳动力市场时的工作了。现在他二十五六岁，他没法就其没有工作的那几年向给未来的老板作出合理解释。普莱姆内化了自己在结构上的边缘化。他诚惶诚恐，心中愈发感到沮丧。

普莱姆：我想我错了，菲利普。我把找工作的事看得太容易了。

一直听着大萧条……经济衰退之类的新闻，我心里寻思：“妈的！这不光是与城市、国家或联邦的工人有关系，还会影响到我们这帮人……我猜想——像我这样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可该怎么办。太糟糕了。”

找不到工作让我觉得很受伤，因为有时这会让人觉得好像我很懒似的。

但你讨厌那种无所事事的活法。我想让自己变得有用，真的——比如有点价值。可没工作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兄弟。

或许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人际关系才能帮他找到工作，普莱姆开始邀请以前在游戏厅干过、唯一有合法职业的大奔和他一起出出进进。大奔还真告诉普莱姆，他工作的那个市中心保健俱乐部的厨房可能需要人。圣诞前夜，他甚至鼓动普莱姆去圣诞办公室见见他的师傅。但普莱姆后来去晚了，高层领导都已退席。他设法见到的只是几个收拾残局的工人。当晚晚些时候，坐在他母亲公寓楼的楼梯口，身边堆满了啤酒、可卡因和海洛因，大奔斥责普莱姆丧失了一次找到工作的机会。但在谈话中，普莱姆却终于弄明白了他要找的工作的局限性和他的竞争对手：

大奔：你记得晚会上那个肥仔戈多（Gordo）吗？我一直在说服我的师傅解雇他而后再用你。

普莱姆：他不就是在刷盘子嘛！

大奔：（有点慌张）我知道……我和他一起干活，我管着他。他总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我经常说他，可他一点都不在乎。

我经常给我的师傅说我认识一个人，他真的想要份工作。但他对我还不赖，只是为戈多感到遗憾，我也是。因为我知道这人怎么样。

普莱姆：（怀疑的口吻）“这人怎么样”是什么意思？

大奔：（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老爹，你的任务就是刷盘子，但那可是一小时六块！别的地方刷盘子可不会给你六块，最多也就是四五块。

工作一年之后还有假期……

普莱姆：（打断他）告诉我，戈多怎么了？为什么大家都为他感到遗憾？

大奔：（不好意思）我是说，他有点慢，干起活来怪怪的。

普莱姆：（有点担心）有点慢是什么意思？

大奔：我是说他脑子转得慢，他有智障。

（辩护性的）听着，伙计！我只想尽力帮帮你而已。

大奔那个有智障的同事竟把想刷盘子的普莱姆淘汰出局。就在此时，普莱姆的生活开始没有了规律。他本来一直和女友玛丽亚一起住在游戏厅对面她姐姐家里。玛丽亚的姐姐、姐夫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在与其合伙的一名毒贩死在汽车里后，逃到康涅狄格州去了。普莱姆和玛丽亚负责替他们缴纳房费。但偏偏在这一时期，瑞把普莱姆在游戏厅的工作调成生意不好的两个晚上。玛丽亚在一家快餐店找了份工作，但仍然保证不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普莱姆沦落到不得不向姐姐和母亲要钱的地步。

普莱姆：玛丽亚本周刚刚开始文帝快餐店工作，一周只能挣税后八九十块钱。她的福利救助金他妈的顶个屁用，每两周还不到40块，37块多点，因为出纳员还留点零头。天哪！就那么丁点钱。

但我和玛丽亚从来没挨过饿。如果玛丽亚那里没什么吃的了，我会去我妈妈或姐姐那里，她们就住在街道那边。

有时候我妈会照顾我。20块，或随便给我几个钱。有时直接给我食物券，一周一次。

这次谈话过后的几周内，普莱姆和玛丽亚因没按时交纳房管所的房费，被赶出她姐姐的公寓。他们不得不分开，各自回到本区域自己母亲居住的公建居民楼里去。

失业的内在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普莱姆的主要策略是不去想他被合法的劳动力市场拒之门外的事情。酒喝得越来越多，毒品吸得越来越频；对于他唯一还能控制的玛丽亚，经常大打出手。玛丽亚丢掉了快餐店的工作后，普莱姆狠狠地教训了她一番。不知怎的，他竟颠覆了性别功能的传统认知，忘记了谁更应该出外工作来承担养家的责任，他甚至还保留了家长制的遗风，对玛丽亚实行家法处置。

普莱姆：我要教训教训那婊子，她什么都不干——比如上学什么的。就知道整天缠着我，别的什么都不干。

但我处理得不错，我和她谈过了，我要用我的教训恶心她。

我觉得玛丽亚应该去麦当劳干，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可她不想去，我就吓唬她，如果她不去的话，我就离开她。

我要她“去职介所，打个电话”，但她刚好就错过电话，偏偏就把那事儿给忘了。

普莱姆一长串的防卫行为，是想在被经济学家委婉地称为“沮丧的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又译失望劳工）的行列中找寻庇护，这些沮丧的工人在国家级的统计中不再被登记为失业人数。他成了80年代中期统计学家所描述的纽约市

波多黎各人参与的劳动力市场呈“螺旋式下降”趋势中的又一位贡献者。尽管199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波多黎各人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呈稳定趋势，但住在纽约市中心的波多黎各人，依然是美国各种族群体中除了本土美国人之外，参与率最低的族群。^[3]

普莱姆：我找工作的事就没法说，什么地方都不要我，就连在伍尔沃斯（Woolworth）做搬运工，一小时4.4美元的活儿也不要我做。四块钱顶个屁用，还是份工会工作。

所以我不认为我会很快找到工作，我不想去为那点最低工资去工作。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愿去干一小时才挣五美元的工作，而他们也根本不可能给我这样一个这样的工作。

算了，菲利普，我不想再谈它了。

我可看不出花那么多钱买火车票跑去面试却没有结果有什么意思。我去过很多地方，菲利普，我精疲力竭，烦透了，所以才回到游戏厅。

事实上，普莱姆确实是想说说这件事，但只能是在他喝足了酒、吸足了可卡因和海洛因之后，才承认自己的最大问题和焦虑是什么。普莱姆从前的眼线威利正好在这一困难时期从部队休假回家。黄昏时，我们三个经常去附近一所公立学校的操场，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们蹲坐在一个堆满垃圾的健身房旁边，躲开阵阵疾风和警察的探照灯，把10块钱一包的可卡因和海洛因摊放在以前供小学生玩耍用的厚厚的原木上。作为普莱姆的朋友，看着他越来越大的酒瘾和毒瘾，我不免为他担心，劝他要面对现实。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录下的普莱姆和威利抑郁的、几乎是意识流式的对白，却不时被学校操场边叫卖海洛因的声音打断：“终止灵”、“黑色力量”、“速效丸”、“兰博”、“抑制剂”。这个特区不仅仅是曼哈顿最活跃的海洛因零售市场之一，还是东哈莱姆校区总部的所在地。^[4]

普莱姆：好了，好了，菲利普，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所以我喝酒，我吸毒，我什么都干。

你说我抑郁，但当我他妈的受控制时，什么也顾不了了。或许我快连肠子都吐出来了，但我知道总会有明天。明天又是一天。我会醒的，也有的是时间想（吸了口海洛因，把酒递给我）。

威利：你知道普莱姆是怎么了（吸了一下）。你没什么盼头，没工作，可你总得找点事情做吧。

普莱姆：（继续）明天，兄弟……明天又是一天……（指着可卡因和海洛因）

菲利普：明天会有后遗症的。

普莱姆：你知道，我想我会成为酒鬼，对，酒鬼。我要戒酒，戒酒，兄弟。我想自杀。我无所适从，对，无所适从。

菲利普：你母亲是怎样看待你现在这个样子的？她担心吗？（把酒传过去）

普莱姆：见鬼，当然了。（喝了一大口）而且我自己也担心，菲利普。主要问题是：我不再年轻……不会再年轻了；一天天变老，就像……妈妈不在又怎么样？如果妈妈不在了，我姐姐肯定也不会管我。如果她们不想照顾我，那么，你知道，我会像个流浪汉，彻头彻尾的浪子。

如果我住在纽约市，那肯定无家可归。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付房租？你知道房子现在很贵。我只有卖毒品……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事活着。

如果我不卖毒品，就得靠救济活着。我不想靠任何人，我想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威利：（打断他）对，没错。从前大家都有工作，福利救济最没人瞧得上眼。但现在成了风气，几乎人人都靠福利活着。不过我们家人还都有工作，从来没靠过福利生活。

普莱姆：除此之外，福利还会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我还得去上学，接受培训，然后才能继续领到支票。

所以嘛，我怎么能靠那么点钱活着，养活自己，去上学？我必须干点别的什么，挣点钱才能活下去。

威利：不，老爹。（吸了一下，又喝了一大口）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吗？你的问题是钱来得太快。你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偷懒，习惯了有地方住，有地方吃，晚上还有地方去。

普莱姆：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因为我确实已经习惯了懒惰，真的已经习惯了……

威利：习惯了睡懒觉。

普莱姆：我真的习惯了回家吃饭……不用为改善我的生活做任何事情（吸了一次）。

菲利普：那又会怎么样？你怎么不想着用在游戏厅挣来的钱帮帮你妈妈（喝了一口酒）？

普莱姆：没错。我妈管我吃，管我住。我就是利用了这些（又吸了一次）。但我想到了。它让我思考，让我变得不安，我说或许如果我不这样瞎混——就像现在这样——我还是能处理好一切的。

菲利普：那你今晚为什么还要花钱买这些玩意儿（指着可卡因和海洛因，然后晃晃酒瓶喝了一口）？

普莱姆：我妈经常在我跟前唠叨，并不是嫌我吃她的饭，因为她并不想让我挨饿，但也不会有人愿意看到你白活着。（用西班牙语）“你不去上学，什么也不干，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你已经不小了。（伸开胳膊模仿他妈跟一位朋友说话时的夸张表情）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菲利普：你对她说的话怎么看？

普莱姆：我觉得她说的没错，我必须振作起来，挣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去工作。

说实话，如果我去工作的话，伙计，我妈肯定会为我熨衣服，我会穿着熨得平平展展的衣服出出进进。如果玛丽亚过来看我或在这儿过夜，我妈是肯定不会发脾气的。

可是，我妈让我很难堪。“因为我明白这个。”

她有工作，姐姐们也有工作，人人都有工作。她们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她想看见我工作，看见我成人。

我妈就这么想。她特讨厌自己早上醒来看见我还在床上没起来。工作了一天，累得精疲力竭的，回到家看见我像国王一样躺在电视机前的摇椅上（张开身体躺在吊床上的样子），她都快被气疯了，老兄。（喝了口酒）

她说得对。我是得干点事儿。我必须开始干点事情，尽管没有工作。我必须让我的生活走向正轨。……找一些我真正想做的事。

现在，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懒蛋——醉醺醺、赤裸裸的懒虫。

威利：我跟你一样，普莱姆。（喝口酒）我俩是同一年代长大的。我妈也不停地在工作，努力工作；她是个护士助理，挣不了多少钱，但我们从没靠过救济金生活。和你的感觉一样。

但该死的！老兄，难啊！很难。我是说我的经历（吸一口海洛因）。

普莱姆:(吸可卡因)是难,但不是没可能。

威利:(去够可卡因)但确实很难,老爹。我经历了那么多两难困境。

普莱姆:忘了过去,想想现在,走向明天。

我是说,如果我这样的生活有问题,我想改正。咱俩今晚在这儿吸,对吧?但明天,明天你会醒来。即使还没完全醒,可以吃早饭或什么的,你恢复了。因为你还得为今天做事,也得为明天干活——如果不得不继续的话。

威利:但普莱姆,我他妈的已经迷失在生活里了。

对威利来说,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是不会轻松结束的。不知怎的,他向我和普莱姆分别讨要了10块钱,开始了整夜的吸毒作乐。

1990年那个特殊的经济衰落最严重的月份里,我一直尝试着培养我和普莱姆的母亲之间的友谊。眼巴巴地看着儿子一天天地变成酒鬼、变得越来越忧郁,我从电话中听得出她的无奈和失望。更糟糕的是,她们楼上的总水管破了,她和女儿们不得不带着水桶到邻居家一趟趟地去提水。因为维修人员白天来修水管时,她们还没下班。她们以为普莱姆会开门,但有人来敲门时,普莱姆根本还未醒,没听见。这种提水的日子持续了两周时间。

普莱姆的母亲:(用西班牙语)他总是早上7点钟回到家,像个醉狗似的昏倒在沙发上。

26岁了还和他妈住在一起,太不像话了。他应该找个女人搬出去住。23年前我把丈夫赶出了家门,普莱姆就和他爹一个样,他每天早上从街上回来,都喝得酩酊大醉的。

他在街角一直有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是学校老师告诉我的,他15岁就不去上学了,都是那帮坏朋友给带的。

他从来没有踏踏实实地干过一件工作。上个月那个工作才干了两周(租赁商店),我给他供车钱和午餐钱,可他连工资都懒得领回来。

我有时候都不敢把啤酒放在冰箱里,他会都拿走分给他的朋友们喝。

如果我病了,不能干活了怎么办?我们会连家都丢掉的。

雪上加霜的是,普莱姆和他的母亲还落入了不法分子利用失业人员找工作的心理,打着培训的旗号骗钱的圈套,赔了2400美元。在一起利用邮件推销产品的骗局中,她“中了奖”,只用交4800块钱的维修工程培训费的一半就可参加培训。

她立即交纳了剩下的那一半，逼着普莱姆去上课。结果另一半费用要依照客户是否有资格得到联邦政府担保的学生贷款证书才能享受“打折”。普莱姆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2400元的学生贷款，满怀热情地向我和凯撒炫耀说他在周考中得了八九十分。他开始幻想着将来找一份像门卫这样稳定的工作，每次提到培训结束后找份工作的事，都会后面来一句典型的波多黎各农村人的老话：“这是上帝的意愿”——盎格鲁用语“用手摸石头”（迷信认为，用手摸石头可以避邪，儿童玩游戏时摸石头能免于被捉住。——译注）的拉丁美洲表达法。

普莱姆的梦想破灭了，没等他毕业这所学校就宣布破产。不仅母亲损失了2400美元，他还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得偿还联邦政府为培训活动预先为他支付的2400美元的贷款。更糟的是，普莱姆还因亲手把两瓶快克卖给一个地下缉毒警官，现在还处在第二年审判期。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普莱姆的法律援助律师在法院的台阶上对着他大叫时他低头顺从的样子，为此我很是感到惊异。

你他妈的是个饭桶啊！就想找个好工作！什么狗屎工作！好，我可以告诉法官你是个好人。上帝！难道你不理解我跟你说的话？

当然，问题的实质是，在国家经济衰退期，普莱姆根本无法找到“任何狗屁工作”。凯撒成了他唯一生死与共的朋友。他与普莱姆同病相怜，苦口婆心地鼓励他的朋友坦然享受毒品的快乐，赞颂街道意义上的拒斥低工资、老老实实工作的尊严。

凯撒在对街道边缘化对抗式的赞扬中，最具说服力的一面是他把快克买卖和失业定义为一种文化上的骄傲，尽管结果往往是自毁性的。一个周二的晚上，从游戏厅下班后，我顺路陪着普莱姆和凯撒去离游戏厅几个街区远的商业区去买20块一包的绿蛤蟆——一种质量上乘的新品牌的可卡因。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买东西，所以凯撒和我在外面等着，以迷惑那些卖主，让普莱姆一人去买。我开始用西班牙语和三个从普埃布拉（Puebla）州一个农村自治市皮阿科斯特拉（Piactla）来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聊了起来。他们在公寓门廊里喝着啤酒，用蔑视的眼光看着从东撒普韦德（El Sapo Verde）里面走出来的顾客。

其中的一位是两年前来到这里的，干维修油炸机的工作，一周挣500美元。我把胳膊搭在凯撒肩上问这位成功的移民，为什么他能干得这么好，而我的朋友，表达能力强、讲一口流利英语、又是本土出生的凯撒却找不到每周200块钱的工作？他的回答带有地道的种族主义色彩：

好，好。我用一句话给你解释：因为波多黎各人很愚蠢，愚蠢！你知道吗？很笨！瞧瞧那边那个小伙子（手指着凯撒），他懂英语。再瞧瞧他的身体，没问题吧，至少保证他能找一份和我一样的工作。但他找不到，因为他是个畜生。就这样！

他们只想走捷径，发不义财，靠别人。不过我们墨西哥人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我们愿意自己挣钱。我们不偷，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工作。就这么回事儿。

当我看到凯撒脸上的表情时，我担心起来。害怕自己不负责任的谈话会引发一场血战。然而，凯撒在等到普莱姆回来后，用英语大声回应着，把墨西哥种族主义者的羞辱转化成几代人沉积下来的街道文化的傲慢与自信。

凯撒：你说得对，兄弟。我们就是寄生于毒品的疯子。我们不想成为社会中的一员。就像那条语录说的那样：“为权利而战”。¹⁵¹

我们要工作干什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我们诅咒自由，因为波多黎各人不喜欢工作。我宁愿靠制度活着；养胖身体，玩玩女人。

是的，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还有老一派严谨的人们在工作，但新一代，才不干呢！

我们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新一代才不会关心公众的屁事儿呢。我们想挣来得容易的钱。就这样，挣的不是那么难。钱，记住了。我们不想努力工作。这就是年青一代。

如今，老一代人赞成我们年轻那会儿的事，那时我们干过许多愚蠢的活儿……刮金属上的铁锈、烘干、广告代理。

但老子现在不干了，（胳膊搂着普莱姆）现在我们处于反抗期。我们宁愿逃税；发点不义之财，然后活下去。不过我们对此也还不太满意，哈！

交织着的梦想

凯撒尽管公开坦言自己的主张，但对于自己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也深感苦恼。有时，他也像普莱姆一样，同样幻想着成为一名“正常的黑人工人”。但他对剥削的忍耐还不如普莱姆，对于工作中遇到的不尊重表现得尤为敏感。与此同时，能



街区里的酒店。照片提供：菲利普·布儒瓦。

够促使他与中产阶级交往的社会技巧——即他的文化资本——则要比普莱姆逊色得多。但在不受街道文化规则谴责的前提下，如果有机遇来临，他也不会忘记构想“走正道”的幻想。比如，当瑞首次尝试通过协商买下一个酒店的租借地，来洗凯撒为他挣来的钱时，凯撒就没有放过这样的好时机。瑞让普莱姆来清理、维修经营场地，普莱姆又雇用凯撒做他的助手。对于这两个快克贩子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转入稳定、合法职业的机会。他们不仅有同一个老板，还可以继续留在同一社区。这个酒店距离社交俱乐部普莱姆的快克交易点只有半个街区远，也就是说，他们只需要把他们一直在卖的快克换成猪油、土豆条、三明治、啤酒、冰激凌等就可

以了。

瑞本人同样为自己即将开业的“正当的地方”兴奋不已。在开始阶段，他证明自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生意人，为街道上的摊位租赁与原来的房东讨价还价。这位房东是在把这里作为他们银行的“一个敲诈勒索团伙”因分赃不均而放火烧了这个地方之后，被迫离开这里的。普莱姆的首要任务是消灭这里的老鼠，扔掉繁杂、腐烂、被水浸泡过的货物，最后再把这里粉刷一遍。凯撒在对付这里呈几何数字上升的老鼠群时（在纽约城杂货店大火之后被废弃的一个月里，只有老鼠可以繁殖），表现得很是突出。他乐此不疲地用砖块、扫帚把、工作靴来对付这群老鼠。

尽管这么多的硕鼠可能会给这里带来不少的麻烦和侵扰，但凯撒和普莱姆两人都为将在瑞的旗下做些“干净工作”的前景激动不已。那些天下班之后，他们经常来到我的客厅，一边吸毒、喝啤酒，一边计划着他们即将在瑞开张的酒店里得到份

稳定工作的幻想。他们的衣服上散发出一股股臭味，湿漉漉的运动鞋上沾满了灭鼠药和腐烂的食品。对于即将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份合法的职业——的期待，再次从语义上证实了他们乡巴佬父母身上内化了的根深蒂固的迷信。

凯撒：我还没告诉我奶奶呢。开始每周领工资前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用拳头拍打着掌心，然后俯下身从普莱姆给他准备的混合可卡因的钥匙尖上吸了一下）。

我不会失败^[6]，但我认为——如果上帝愿意——这件事将对我很有利。我要戒掉毒瘾（咧咧嘴再次吸了一下海洛因），或许除了鸦片和可卡因。

我在这里的事业会步步高升，因为商店赚得越多，我就挣得越多。而我又是三明治广告宣传员，那可意味着我可以拿双份的钱。

这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对普莱姆来说太好了。我们俩关系不错。不会再到处瞎转悠了（用胳膊在我的客厅里比划着）。

在这个特殊的晚上，凯撒和普莱姆还吸食了紫色的合成墨斯卡灵药片。正如心理分析学家指出的那样，如果说致幻剂可以减缓焦虑、困惑和潜意识的幻想的话，那么凯撒的喋喋不休正好表明他对于有可能找到一份合法工作是多么兴奋不已：

晚上做广告宣传员、清洁工、伤害顾客、骗点小钱的人（眼里露出狡猾的光）。

对对对，我还可以被雇来驱逐捣乱分子，如果我能抓住一个冒充顾客走进商店偷拿货物的人，警察来时就不必给他戴手铐了。他们也不必带什么扩张器，我和普莱姆就能把他打个四脚朝天。

（抓起我的收录机，对着麦克风说着，好像这样就可以唤起他一些了不起的思想似的）我们会把它搞成一个为他人、为菲利普提供信息的社交俱乐部，俱乐部！

放下收录机，凯撒开始一面模仿收银员大声叫订单和零钱跌落到现金记录器的抽屉里的声音，一面做着卖三明治的动作。

凯撒：三明治广告宣传员！看这里，你。这是你的！叮当叮当！下一个！（坐回到沙发上，眼睛睁得很大）哇噻！好神奇啊……普莱姆，来试一下。（挥动着手赞美墨斯卡灵带来的视觉上的变换）像蓝色的波涛一样，（迅速转过身，

指着天花板)这些看起来是紫色。

(猛然转过身对着我,好像我是顾客一样)带钱了吗?(像个男子汉那样举起双手)我有工作了!(挥动着手,又开始赞赏五颜六色的光影,然后再不断变换着顾客和酒店雇员的角色)我想叫光线变成蓝色。三明治广告宣传员!嗨,你近来好吗?

(凯撒再次坐回去,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好了!我们终于要开一家熟食店了(走过去抱住普莱姆)。

遗憾的是,凯撒想找份合法工作的梦想破灭了。瑞没有通过纽约市复杂的身体检查和未偿还的税收罚金这两项考核。他甚至从来就没想过要干一天合法的生意。未经官方许可,他开始卖了10天的货,随即才明白这里的人对杂货的需求并不多。他受到的最后一次侮辱是,一个雇员从仓库里偷了他的存货逃到波多黎各去了。瑞只好放弃,让普莱姆和凯撒又回到游戏厅,周一周二继续做他们的快克买卖。

瑞尝试的可行而合法的生意投资——熟食店和社交俱乐部——接二连三的失败,与其有权经营快克买卖的事实形成强烈反差,从而凸显出他在合法经济和地下经济中运作一个私营企业时不同的“文化资本”。如前所述,瑞对街道文化的掌控能力,使其在毒品经营中熟练而有效地驾驭着他的生意。他老道地训导他的职员、判断他们的需求,在暴力、胁迫和友谊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保证了滚滚的财源以及来自街道上的尊重。然而他刚刚涉足合法经济时,同样的街道技能却使他在那些负责发放许可证和调拨库存产品的纽约市检察官、职员和小芝麻官眼里,变成了无能、粗暴、无知的城市乡巴佬。

同样,当普莱姆在汽车站张贴影印的广告,宣传他们的家用电器维修的“维修服务项目”,尝试创建一个合法企业时,有着丰富快克买卖经验的普莱姆,同样输得很惨。当有顾客把电话打到他女友玛丽亚所住的公寓楼时,一听到他们的地址顾客就犹豫起来,更不愿让他们去上门服务。那些对他们没有顾虑的人又怀疑他的前资本主义的(*precapitalist*)、乡巴佬式的讲价方式。深深体会到自己在设法“走正道”时的脆弱的普莱姆,把这件事当做种族主义羞辱的谈资。

普莱姆:他们好像一听到我的声音,就不说话了……电话那边没了声音。

每个人都问我是哪里人。他们会问:“你的名字听起来好奇怪,你是从哪儿来的?”因为他们听出了我的波多黎各口音。我告诉他们我是纽约人。

气死我了！

还有，我告诉他们维修后他们再看着给钱，但他们根本不让我过去。
我恼死了，菲利普。

当普莱姆想法去面见他的顾客时，他遇到了更老套的阻挠。有一次，我让他来我加盟的一个机构修理三台录音机和有线电视盒，其中一位主管为此专门发给我一封致歉的邮件，建议我不要再带普莱姆去那里了，因为他担心资助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把这里变成了电器维修站”。

普莱姆作为一个私营企业家，他的失败不全来自那些不信任或种族主义者顾客。他在试图赚钱时所表现出的低能，其实是他本人对于保持礼节、对朋友和亲戚的责任这些乡巴佬式的定义造成的。有一次，我母亲请他去修一台音响，他几次违约没去见她。最后在我的坚持下，有天晚上他和我一起来到我母亲那里。后来他承认，单独去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女性的公寓似乎不太合适。修理完后，他不知道该要多少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而且她还为我们准备了晚餐。

追寻移民的梦想

按照种族陈规，主流社会会很轻易地把普莱姆、凯撒甚至还有瑞，定义为无能的失败者、懒汉、病态和自毁的吸毒者而解雇他们。在文化生产理论的框架下，我的举证强调了文化交流形式与以符码标识为中心的权力分配之间的断裂关系。从政治—经济化的角度来解读快克贩子在合法世界里的失败，我们需要首先探讨他们及其父母从出生之日起是如何被输送到最边缘的经济区域这一问题。我设法在他们随意聊起自己第一份“真正的”工作时，探寻到一个结构上的经济论证。我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少年时就开始追求移民工人阶级的梦想：找一份固定的、男子汉干的活儿，为稳定收入而努力工作。在我收集的几十个事件中，一个规律浮出水面：经母亲允许，高中甚至初中就辍学回家，到当地工厂干活。一两年后，工厂关闭，搬到别的地方做一些更廉价的劳动力。随后他们开始干一些单调重复性的工作，从一个低薪的活儿转到另一个更低薪的活儿，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缺乏技能，他们根本走不出边缘化的工厂——他们唯一的社交领域。

普莱姆和凯撒的情况更具代表性。普莱姆在追寻其母亲的工人阶级梦想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积极和主动。他少年时就辍学，在家人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工作。

普莱姆：我逃学出去熨烫衣服、裙子之类的，都是一些很便宜很便宜的衣物。

我那时还是小孩，蒸气锅后面通常温度很高。但我喜欢那份工作，那是我工作过的最好的地方。

本来希望可以在那儿一直干下去，可没想到，他们搬走了。

我姨妈先在那儿干，然后是她儿子刘易斯的哥哥——现在在监狱，他们先雇的他，因为他妈同意了，“如果不想上学，就得去工作。”

他还小，大概十五六岁。我比他更小，经常跟在他屁股后闲逛，但后来那个工厂有时需要他帮忙干些紧急的事儿，我就跟着他出去帮忙。到了周末，老板还经常能注意到我。当时我没想着要去工厂干活，大家都希望我能好好上学，但我还是去了。

我想挣钱，我恨学校，我宁愿去工作。

可想而知，普莱姆是在一家服装加工厂工作，那是制造行业中最脆弱的部门。

普莱姆：老板是西班牙人，妈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头儿。她管着整个厂子。她丈夫有毒瘾，但通常是他来发放工资，我们过去还得跑到市里去领钱。通常还是白人领得的钱多。

普莱姆和他的表哥还成了代理，帮忙把自己的工作从市中心搬走了。在此过程中，他俩成了纽约市失业的 445900 产业工人中的一员。从 1963—1983 年，工厂的工作岗位下降了 50%。^[7] 普莱姆当然看不透自己成了转型经济的受害者，他还高兴甚至得意地回忆起他在工厂清理机器时赚来的那份额外收入。

普莱姆：那帮人可真有趣，伙计。还是我们帮他们搬走的。

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只有我表哥和我我们俩。哇塞，那才叫工作。他们给了我们每人 70 块。当时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好家伙！还有，我们当时还只是两个不起眼的小黑鬼呢！

不无巧合的是，凯撒打断了录音机里普莱姆的回忆，给我说起了他和普莱姆几乎相同的故事。凯撒也是通过家人的社会关系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不过不是在服装厂。他去的是一家冶炼厂，也是纽约城中另一个最没人感兴趣、最不稳定的工作。

凯撒：我之前在这个工厂干过，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离开学校后，我叔叔帮我找的。我妈告诉我要么去上学，要么去工作。

那时我可喜欢这份工作了，但那里太热，我的身体瘦了很多。他们经常会给我们一些香烟之类的刺激性东西。

那里原来是给金属类东西涂一层什么东西，把金属压制成平板，像是给珠宝涂色一样。但这个公司后来搬走了。

像普莱姆的姨妈一样，凯撒的叔叔也有着工人阶级努力工作的尊严高于教育的思想。这是工人阶级原初的渴望而非破落的孩提时的记忆，他们心中还没有像没人雇用的快克贩子的那种绝望和虚无主义思想。对于凯撒来说，粗糙、艰苦的工厂工人人们的局限性，是从给他起着模范作用的叔叔后来的惨痛经历中才理解的。

凯撒：该死！那是我叔叔的绝活，从冶炼炉内打捞金属并镀金。他在那里干了45年，朋友。一样的工作，干了45年。你能想象到吗？45年，他只是个工头。

有一次他掉进液酸里去了，太可怕了——掉进他们浸泡金属用的液体酸里了。我亲眼看见的。

这个黑家伙只好停了七八个月没上班，兄弟。他的皮肤组织全被烫坏了，眼看着烫成了红色，像露在外面的肉一样，暴突出来。

但他不能起诉，因为是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那是条流水生产线，他们得清理用来浸泡金属片的大容器。这黑鬼从上面过，脚底下一滑掉了进去。不到五秒钟的时间他就跳了出来，衣服全变成了碎片，嗞嗞地响着。他快要疼死了，尖声哭叫个不停。

从此之后他一天天的瘦了下去，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以前他可全身都是肉。

重要的是，在这条生产流水线上干了一辈子的人最后变成了性无能，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一点成了快克贩子们谈起自己合法工作经历的无奈时的一贯主题。

凯撒：那个黑家伙就是我的叔叔乔 (Joe)，他还活着。他的整个身体，像腿之类的全被烧坏了。

他不能生孩子了，兄弟，成了废物。

现在他住在辛辛那提，那个公司搬走了，他们在一个生产浴室装置的厂

子给他找了份工头的工作。

(听到门外警车慢慢开过来停在游戏厅门口的声音，凯撒急忙示意普莱姆把装有快克的小瓶藏起来)你！你！静一静！静一静！

回想起来，凯撒在家人同意后离开学校，在那个逐渐萎缩的制造行业的死胡同里找了份工作似乎是一场自毁性的悲剧，但干这件事时凯撒才15岁，在受限的第二代移民工人阶级圈子内，他有着像国王般的威风。对于一个贫苦的少年来说，离开学校成为一名边缘工厂的工人，是多多少少会让人刮目相看的。一次单独谈话中，瑞社交圈子里唯一一位有高中文凭的威利，证实了当时凯撒的威风凛凛和无尚荣耀。

威利：我那时14岁，凯撒狗日的好像15岁。他不上学了，整年跟着他叔叔干活。

他他妈的在挣钱，我还得上学，我很妒忌他，真的。

凯撒一直在工作。到了八年级、九年级，直到我上十、十一、十二年级时他都在工作。因为有钱，他穿得很时髦。他还有性伙伴，什么都有。

放学后我回到家经常说：这个狗日的凯撒，他不用去上学，还有钱。

凯撒真猛。他好像什么都不怕，这是我遇到你之前对他的印象。

他是第一个穿着很时髦的衣服进进出出的人。普莱姆，你还记得他当年的样子吗？

他总带着一个大钱袋。还经常带我出去，因为放学后我总跟在他屁股后跑。我们那时特神气……真的。从那以后每年我都有新大衣穿。

凯撒过去经常穿一件紫红色的皮夹克，戴着一顶勃艮第帽(Burgundy Kangol)。那时候我们也通常会有些花冠之类的东西，金色的——对，就像你外衣上的那种——你别在衬衣或什么地方的小饰品。

我们成了“团队之王”。那要算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喽。

服务行业工人阶级梦想的破灭

乍一看来，凯撒、普莱姆和威利像是生错了年代。他们那富有男子汉气概的无产阶级的梦想——长大后在一个工会工厂找一份八小时的工作，外加加班费的牢固的职位——已经被微薄的报酬、高度女性化的办公室勤杂人员的工作噩梦所替代。

可以帮助其养家糊口、保证稳定收入的工厂工人的职业，在市中心已经很难找到。或许，如果他们的社交网没有被拘泥于失业率飙升时期最脆弱的制造行业，年少时当工人的梦想还有可能使他们稳定一段时期，并有可能使其有能力适应当地经济的重建。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推到了文化尊严感与服务行业中备受屈辱的主从关系的冲突之中。

从前，当大部分初级工只有在工厂里才能找到时，对抗性质的街道文化与传统工人阶级车间文化的矛盾，特别是在其受工会保护的情况下——并不那么突出。我并不想把工厂的工作浪漫化，其实它们往往是很乏味、艰苦和危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充斥着等级制度。然而在工厂车间中，在年老的工会工人的包围下，在最时兴、最粗狂的街道文化形式中被看好的高中辍学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期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工头和“老板”对着干，并称这样的行为为阳刚之举。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同样的对抗性的街道身份在服务行业中却表现为机能不良，特别是大部分稍有前途的职位都已被办公室的服务人员占据。街道文化与办公大楼里那些想高升所必需的恭顺、忠实、屈从的社交模式势不两立。邮局分发室和复印机后面站着的工人们，是不能公开维护他们的文化自主权利的。具体而言，他们没有工会，或者说，他们周围几乎没有人可以团结起来，培养他们以文化为基础的阶级团结意识；相反，他们会被异质的、充满敌意的、明显的主流文化的主管和雇主包围。当这群办公室的主管人员不屑于街道文化的威胁时，他们会反过来嘲弄它。像凯撒和普莱姆这样不善言辞的工人，在试图模仿权利语言时，反会因表达不清一些陌生的词汇而被嘲弄。他们看不懂草拟的指示——里面全是些神秘的缩写——那是匆忙的办公室经理留给他们的任务。白领工人的“常识”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比如说他们不理解一式三份的会议记录归档的道理，或把发票的日期写得靠后一些的理由。当他们尝试即兴发挥或展现其主动权时，却因没有按“具体、详尽”的指示去办事而惨遭失败，表现出工作效率低下或很不顺从。

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比起有限的职业技能来说显得更加欠缺。除了威胁，他们根本不知道怎样去正眼看他们的同事，更不用说主管了。除了有意无意、放肆地摇晃着双肩如同在巡查自己的地盘一样，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穿过门厅走到饮水机那边去。性别障碍更是成了一个充满文化感情色彩的领域，他们经常会因性侵犯行为伤害到同事而受到谴责。

白人“雅皮士”权力和市中心“粗活”在服务性行业中的文化冲撞，不仅仅体

现在表面上。服务人员如果不能遵守职业文化所规定的人际交往规则，就永远不会得到提升。在曼哈顿或华尔街的办公大楼内，刚刚雇来的市中心高中辍学生突然意识到：在他们的老板面前，自己看起来像个愚蠢的小丑。本书的论点——就像书名所表达的那样——主要是普莱姆和凯撒这类人并没有被动地接纳其结构上受害者的事实。相反，他们让自己卷入地下经济，骄傲地拥抱街道文化，寻求着走向社会边缘化的抉择。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一天天地演变成一种导致自身毁灭和社区磨难的真正的力量。

办公室里“受蔑视”

普莱姆和凯撒在尝试步入陌生而充满敌意的办公大楼时，都遭遇到很深的侮辱和工作的无保障状态。普莱姆就有一段在邮局分发室当职员时的不愉快记忆。那是一个已不复存在的专业的贸易杂志社。重要的是，他唯一一次明确承认碰到过的种族主义歧视，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工作场所别人待他的态度。他认不出老板的姓名和种族，正如老板分不清他是从拉丁美洲哪个国家来的、怎样拼读他的姓是一样的，这一点正好可以用来解读他所在工作单位里因种族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读的程度。

普莱姆：我的老板对我有成见。她叫格劳力亚（Gloria），是白人，姓克里斯琴（Christian），不，不姓克里斯琴，姓基尔辛曼（Kirschman）。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犹太人。她喜欢跟去她办公室的人谈起我——去她办公室喝咖啡的助理或别的什么人。

谈话时她会说：“他是个文盲。”好像我真的很傻，听不懂她的话似的。

所以有一天——你知道他们的桌子上经常会放一个很大的词典，又大又厚——我打开词典查“文盲”这个词的释义，那时我才搞懂了她的意思。

她是在说我很愚蠢之类的话。我蠢！（用两个大拇指做着个笨的表情）“他啥也不懂！”

普莱姆遭遇到的最大侮辱还不在于他被称作文盲，而是他还得在词典里查这一自己受辱的词汇。而在地下经济中，他从来都不需要为自我价值冒这个险。

普莱姆：瑞从来没有那样对过我，他不会那样说，因为他也是个文盲，而且我比他接受的教育要多。我差点拿到普通教育水平证书（GED）。

然而，更糟的是，普莱姆是真想在格劳力亚的杂志出版公司表现他的主动权和进取心，但他越是努力，失败后他越觉得自己愚蠢。像他说的：“他们了解你之后更糟糕。”

普莱姆：所以，你说说，尽管你想干好，但别人都那样待你。

伙计，你刚开始还挺棒的，后来突然之间，当他们了解你之后，就想解雇你了。

我第一次去上班，就拼命地工作。但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就剩下憎恨你的老板了。

好几次工作时因没听话结果被谩骂。老板让我那样做，但我觉得这样干更好。她就解雇了我。那个女人简直就是个娼妇。

很简单，普莱姆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缺少走出复印机或邮件计量器后面的文化资本或符号资本。他被主管异质的、强势文化的凝视死死地幽闭起来。

普莱姆：我必须沉着冷静。即使在中午休息或规定的休息时间里，我还得保持冷静，因为主管们也都在场。

普莱姆既不情愿也没有能力与他的街道身份相妥协，去模仿有可能赢得老板赞同和尊敬的人际交往模式。正是在这一特殊时刻，人们才会看见已经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是如何通过把盎格鲁、中产阶级文化资本的潜意识强加于专业服务行业的。老板不允许他接电话，因为客观上讲，一个波多黎各街道口音会让客户失望而影响老板的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普莱姆用电话的冲突还是发生了。普莱姆看见老板很忙或不在办公室时，就很想通过接听电话来表现自己的进取心和赢得老板的青睐。

普莱姆：我不在乎她说我是文盲。让我生气的是，有电话打来时她不让我去接听，即使我的主管——接待员——不在旁边电话响个不停时也不让。

我去接电话，老板听到我的声音好像心脏病发作了一样。“勒妮在那儿吗？”——勒妮·西尔弗曼（Renee Silverman）——那个接待员，也就是我的主管。

我说“她出去吃饭了”或别的什么。

然后她说：“弗兰 (Fran) 在吗？”

我说：“她在。”

你说说看，接听电话又不是弗兰的工作。她是负责管理账目的，总是忙个不停。所以我说：“她可能出去吃饭了。”

老板太过分了。我不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接听了一个电话而已。纽约城有那么多人说话都有口音。他们有的在搞房地产，有的干别的什么事。说话有口音又怎么了，但那个贱货就是不喜欢我的波多黎各口音。

我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他妈的真是个贱货。

好吧。或许我没有学过打字，我可以不打。但不能因为我接听了一个响了很久的电话就炒我的鱿鱼吧！万一这个电话很重要呢？贱货！

我过去挺会接电话的，兄弟。但从那之后——从她炒了我之后——当我真的拿起话筒时，我就故意加重波多黎各口音了。他妈的！

性别蔑视

当代街道对遭遇蔑视的敏感，直接表现为发生在办公室里蒙羞的记忆。街道文化的大男子主义气概，加深了男人对经历过的侮辱的感触。因为办公室的初级主管都是女性，因此一提到老板或主管，他们就会说“骚货”、“婊子”，或是对其身体进行指责性的攻击。有很多次，在游戏厅里、在我家的客厅、在街上，凯撒都用自己在工厂蒙耻的记忆打断普莱姆关于合法职业的讲述。比如当普莱姆说到“打电话受辱”这件事时，凯撒就愤然讲起了他在合法劳动力市场被迫打破街道文化的禁忌，公开屈从于女性支配的不光彩经历。

凯撒：我干过好几种工作。老板都是些又肥又胖又丑的娘们。最糟的一次是在桑德勒 - 赫尼塞 (Sudler & Hennessey) 制药广告公司。我不喜欢那个工作，不想卷入那种关系中去，所以你只能做个无用的人。

上帝！我恨死那个主管了。那个婊子叫佩姬·麦克纳马拉 (Peggy MacNamara)，爱尔兰人，挺漂亮的，就是太可恶了。

她经常叫我为她干一些乱七八糟的私事，不正常！有一次她让我去斯坦顿岛 (Staten Island) 为她取两幅画。或者他妈的干些别的什么事，可她就是不喜欢我。

她喜欢解雇员工玩，伙计。都在她脸上写着呢，搞得那个意大利小伙子哭哭啼啼向她求情。妈的！后来她又把他留下来，给了他一定的试用期（手指握得啪啦啪啦响，气愤得直晃脑袋）。

之后我还听见她拿这件事和其他主管开玩笑呢。

最终，性别侮辱对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权力等级做出了回应。快克贩子们无奈的经历，经常以一种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词汇来表征。例如，尽管凯撒跟普莱姆一样，在其主管身上辨不出白人人种学的标记，但却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劳动力等级方面的边缘地位这一经济和种族事实。

普莱姆：我在那个邮件分发室干了八个月。他们还算是相信我，让我去银行拿支票和工资，再把工资交给所有的主管。

妈的，有个婊子叫印加·霍夫曼……不对，叫霍桑，是犹太人。那娘们当时挣的可多了，兄弟，让我看傻了眼。

这个骚货一周挣5000美元呢！你可以看得见（斜眼看着一个想象的信封）5343块多。

我那会儿，大叫一声“天哪！”对，霍夫曼，骚货！挣那么多！

在那里我的工资最低，所以我才他妈的走人了。我就是个土得掉渣的波多黎各黑鬼。

纽约市服务行业的最底层，有成千上万在500强企业工作的通信员、复印机操作员和保安，受到白人年轻主管的粗暴使唤。这些主管经常是些女性，他们两个月的工资抵得上下属一年的工资还要多。曼哈顿金融区的奢华，则又加剧了性别—种族主义对刚刚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的凌辱。

工作场所里的战争

纽约金融服务行业中最有利可图之处在于，管理部门可以随意克扣那些即使是地位最为低下的雇员的奖金，这就使得那些邮件分发工和复印机操作员们竭尽所能，为挣得小费和津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

凯撒：我的主管是个贪婪的黑家伙。他总想知道我挣多少钱，因为他们

假期会发奖金，比如圣诞节什么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多。我的奖金只有 300 美元。

普莱姆：(喘着粗气)那就不少了，我的还从来没超过 75 块。

凯撒：主管知道我拿多少后，在电话里就开始抱怨起来：

“啊？为什么？”(笨拙地模仿着办公室里电话的声音)——那里人人都那样讲话——“为什么邮件分发室的职员都能拿 300 块，他才干了八个月，我在这儿都干了九年了才拿 400 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你瞧，他在跟别人说他应该比我拿的多，我压根就不该告诉他我拿多少奖金。

这个王八蛋很恼火。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他加奖金，不过一段时间后他开始什么事都来找我抱怨。他碰到了和我一样的难题。

在不太景气的服务行业中，初级工人与其顶头上司之间的暗斗明争意味着失业的危险。普莱姆在高度专业化的、脆弱的桌面出版工业(用微型电脑工作，把杂志、小型书稿等准备好等待出版。——译注)工作时就经历过这样的事。尽管他懂一些计算机技术，但缺乏依照职场规则所需要的有效竞争的文化资本。当年度报告需求或合并达成协议刚刚出台时，他第一个被解雇。他把对失业的怨恨全部集中在受雇于女性主管而遭受的侮辱上。他说话时嘴里不停地夹杂着一些“婊子”之类的词，并总是指向复仇对象的身体。事实上，他甚至还幻想过用古典而粗暴的办法：下班后跟随主管到她家，用那种传统的男权制的方法从身体上去征服她。说这些话时他不停地吸着 10 美元一包的可卡因，似乎想要由此点燃自己痛苦记忆中的种种恼火和挫败感。

普莱姆：我的问题是，主管让我不停地干活，即使有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她根本不必那样抓住我不放。

我在那里其实是挺负责任的。可有一次我刚刚被调到夜班，不小心睡着了，结果就被解雇了(吸了一下可卡因)。

那个骚货！我恨死她了，又肥又胖的。她在我之后也被解雇了，才干了三个半月。

我过去也在做电信工作(来了热情)。从一个开普敦电脑上把文件发到波士顿(指着远处)。我负责那里所有的东西：电脑，清洗机器等——甚至

重装系统。那会儿多好！我还有自己的文件夹呢。

但我他妈的给睡着了，兄弟。有时候终端机还在那儿运转着，我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醒来后，我发现有人在我干活。我赶紧走过去让他们走开：“好了，可以了。这样我会失业的。让我来干吧！”（又吸了一次）

但值夜班的主管，那个婊子，已经记下来了。

我在终端机里发现了她关于我的一些记录。我知道，如果系统终端机里有你的文件，你才有密码，所以我经常破译他们的密码。

我会想（眯缝着眼睛假装在想）：“他们很可能会用自己的姓、小名。”我试着用这些名字打开他们的文件。我就是从那里知道部门主管的文件的。我找出了她写的关于我的所有的信件（吸了一次）。

当时我一看到她就想把她杀死、烧死。她当时住在一个小挂车里，我真想抓住她——用各种最残忍的办法干掉她。

我知道她不喜欢我。

我告诉有关主管她上班的时间也睡觉，有时跑到后面的地板上睡觉。

但他们却跟我说：“没错，但那是下班时间，上班时间一到她就回来了。”

他们倒是应该在我睡着时说我已经下班了，醒来后才到上班时间。但我认为那是因为她是主管，而我他妈的什么都不是。

普莱姆的白领对手显然不吃他报复的这一套。最后他才意识到他在工作场所所表现出的脆弱是制度上的，而不仅仅是因为与顶头上司的个人关系没处好。

普莱姆：我在那儿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问题是很多人都在那儿干过，我还算比较幸运。他们一直在等我们犯任何小小的差错，一直在找理由把人打发走，就这样。（拍握着手指）

他们没有雇用任何人，唯一留下来的是那些最先在那儿干活的人。其中有约翰和施瓦茨两个高大的白人小伙子。

菲利普：你对此有什么感想？

普莱姆：（两个鼻孔分别吸了一次可卡因）我知道后都想哭，兄弟。喉咙发干，就像……（挥舞着双臂就像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一样，后又吸了一次）

我去拿我的支票时还发生了争执，于是他们把我叫进办公室里。

我就想，“噢！妈的！”（又吸了一次可卡因）

我斗不过他们，我当时还求他们“让我干通信员吧，我可以少拿工资，让我留下来吧！我需要钱，需要这份工作，我有家。”

可他们说（学着负责解雇的官员的口气）：“不行，不行，不行！”

于是我说：“好吧！”就走了。

我的朋友们在外面等着我。我被炒了，结果一切都乱套了。

按照街道文化的标准，与主管和老板的关系并不一定是有预谋或是件丢面子、甚或是忍受不了的事。就拿普莱姆之前干过的那家贸易杂志社的工作来说吧。老板格劳力亚·基尔希曼还算是位不错的开明人士。从普莱姆辱骂性的评语来看，人们可能会怀疑她颇能替为她干活、聪明能干的高中辍学生的前途着想。有一次她把普莱姆叫到一旁建议他“回到学校去”。但她的善意，客观上说是很正确的建议，在普莱姆看来却变成这样：

普莱姆：如果你还年轻就去工作，就是个白痴。

我的老板，她也想让我回到学校去。去他妈的！我哪儿都不去！我在工作，我得挣钱！

他们说起学校里的一些事，因为他们过得很惬意。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直上学。有的人得活命。他们得吃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兄弟，特别是如果你有了儿子，你得……你得做点事。

那时我18岁，我儿子帕皮特（Papito）快要出生了。我是说，你得做点什么，不能在那儿傻等。

我受教育关她屁事！

凯撒：我可看不出学会乔治·华盛顿渡过该死的特拉华河在这个世界上会对你有什么帮助。

普莱姆：比如教我怎样给其他公司写信。用英语，（转向凯撒）那就是他所谓的英语——阅读和写作。

普莱姆根本就弄不懂他的老板格劳力亚坚持让他做办公室工作的任务是什么。

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儿的工作。不管怎样，我不想做校对或邮件分发一类的活儿。

另外她还经常让我整理壁橱，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我忘了那些叫什么名字……哦，对了，她叫“做清单”。

我根本就不懂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财产清册？总之，壁橱里乱七八糟。我就想：“我应该把一些没用的东西扔掉，这样不就看起来整齐一点儿了吗？”

于是我把那些玩意儿都扔了，因为在我看来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再用这些东西。

就在普莱姆为办公室工作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事而困惑的同时，他也十分担心文字常常带给他的羞辱。他处处留心，唯恐格劳力亚因为他没有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意图而瞧不起他。因而当她命令他做一些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具体的事情时，比如怎样折叠、包装或裁剪所推销产品的邮件包裹什么的，他那防卫性的机械主义的特质就又被激发起来。他母亲所住的市中心公建住宅工程楼的邮箱地址，一般是不会被那些直接邮递活动看在眼里的。因此普莱姆压根儿就不理解把这件事做到精致的必要性，而格劳力亚则是想通过做到精致来检测判断自己直接邮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于是，在普莱姆看来，她就成了一个专横、苛刻又无礼的家伙。他甚至怀疑格劳力亚很迷信、很专断，因为他所准备的直接邮递包裹的每个细节她都会进行认真细致的监督和指导。

弱者的武器

普莱姆拒绝接受这些棘手的、目标性很强的邮递活动的“灵活性”，即后半夜集中核对、核实大量邮戳的最后期限，以确保与杂志的印刷和出售日期相一致。对普莱姆来说，把整理好的包裹后半夜送到格劳力亚家里让她做最后检查，同样意味着对自己的冒犯和性别上的不合适。

普莱姆：天很晚了我还得在办公室干一些要紧活儿；校对、装订，只能用正确的方法折叠……一切都得按她的意见办，可还总不合她的意。

还必须严格按照她说的去做。我得按照正确的方法装进去，再封住口（双手狂乱地比划着）。

我讨厌这样做事，我装进盒子里后，晚上10点半带到第38条街的邮局。但有时她会在她家打电话给我，让我把文件带到第79条街第三大道（曼

哈顿丝袜区)她的住所,再让她检查一下。她逐个检查每一个信封,总能从中发现点问题。

她还总想给我点东西吃。每次我都回绝说:“不用了,谢谢。”因为她这样做是想回报我,这个娘们。

她会说:“来点比萨、茶还是咖啡?”这一类的点心她那里都有。

我可不愿接受她的任何东西,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知道吗?兄弟。

她以为我是个文盲,很蠢,我才不傻呢,兄弟。每一分钱我都不会放过。(咧嘴笑笑)我一离开办公室就意味着加班,一直到她家。可以挣原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

我经常精确到小时。如果我工作16小时,我会写成18或20小时,看看我能不能蒙混过去——还行,我才不会白干那些狗屁活呢!

那骚货简直是疯了,她经常吃儿童食物。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看见她用勺子从瓶里挖东西吃。

如果在格劳力亚眼里,普莱姆是个愁眉苦脸、不知感恩、不太诚实的下属的话,那么在普莱姆眼里,格劳力亚就是个变态者。正常的中年妇女怎么会在后半夜邀请她19岁的下属去她的厨房吃东西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有了后半夜紧急集合处理需要邮递的包裹这一灵便性和紧迫性的任务,普莱姆在格劳力亚杂志社才可能会被提升——或者至少是赢得工作的稳定性。她很可能会认为自己把这个有点胆怯和敌意的下属友好地请到她的厨房,并提供给他一些吃的是屈尊了自己。

不论怎样,普莱姆对其老板的工人阶级的斗争的胜利代价太大了。他对工人权利的界定依然停留在概念上。这些概念来自一代代工厂里的斗争,那里按时计酬的工人们八小时后总要求相当于原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在办公大楼里的跨文化冲突中,那些要求增加工资的人永远也不会有被提升的机会。“书面追踪”远比集体商议的合同更能预知未来的生存态势。

办公室工作的操行评语在街道文化中找不到副本,进而成了初级水平的市中心工人们面临的一大障碍。当像普莱姆和凯撒这样的人“(合同)中止”了,其个人报告上往往会包含一系列诸如“缺乏进取心”、“口齿不清”或“理解力差”这样的评语。普莱姆明白,在街道英语中,这些评语意味着“她跟她的助手们说我很愚蠢”。但是,如果不危及他对个人尊严的基本定义,他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因而,普莱姆成了格劳力亚的贸易杂志社这一高度专业化领域里周期性经济衰退期来临时的第一个

受害者。

普莱姆：我不能在那儿干了。他们减少了我的上班时间。我以为每天还可以干四个半小时，可再后来有些天，她整天都不让我干活。好像要干的活少了很多。

我儿子已经出生了，还有其他开销。我儿子他妈桑德拉(Sandra)享受国家补助。但那根本不够花。她在帮别人卖书，仅够维持生活。她表妹……还是谁……邻居在她工作时照看我们的孩子。

桑德拉照顾他们，不容易。她挣的钱一半得给保姆，而且她挣的是最低工资。

为了那点破钱，她拼命地干活。

所以我必须找一份新的工作。老板规定工作限时，不能加班。

尽管普莱姆和凯撒处于职介部门中服务行业的最底层，他们也不是没有一点权力。办公大楼里这些非工会的服务人员完全可以像大批受控的人，像农奴、学徒工、现代的家政服务人员那样，充分利用职场上的全部技能，诸如怠工、敌对的态度和小偷小摸。^[8]不过这种明显表现出的不满情绪，在新的办公领域是尤其不容许的，因为在那里，“态度”——热情、进取心和灵活性——往往决定着人们受雇用和被提升的命运。在工厂车间里，对文化身份作敌对性的界定是合理的——甚至可以使管理仪式化和稳定化——但在服务行业却是截然相反，因为这里的中、上层阶级中盛行盎格鲁式的报复。

与有工会会员资格的工厂工人相反，服务领域最底层的雇员没有正式的机制和渠道表达自己对工作环境的合理不满。结果，在初级办公室雇员力所能及的自主范围内，疏离出一种“工人阶级文化”。凯撒是在其工作的药品广告代理处的邮件分发室里体会到这一点的：

凯撒：我经常去得很晚，可其他人什么也不干，都是一帮懒家伙——包括主管在内。

他们坐在那里不是打电话聊天就是在玩电脑游戏。你就在这种环境下工作。

我的老板比尔，还偷偷跑出去喝酒、吃饭。

不过，普莱姆和凯撒两人更喜欢用一种效果不错、个人又满意的方式进行报

复——在工作中偷懒。

普莱姆：我负责处理速递业务，邮资是 9.34 美元。他们会给我 10 块让我送到邮局去。但我经常把邮件投到邮资机，再扔进最近的邮筒里。

普莱姆对于自己如何成功地从雇主格劳力亚那里偷懒极为满意。事实上，在受雇的那几个月，普莱姆很出色地编造出各种谎言和诡计，伪造双倍的发票收据——这些骗术通常不是文盲所能干出来的：

普莱姆：有一次，我从办公室前面的接待员那里的现金箱中直接拿走 80 美金（从我客厅里的咖啡桌上拿了盒海洛因，狠狠地吸了一口）。

我不光偷了钱，还知道其中的窍门。我做什么事都有备而来。

知道吧？我一开始在这儿干，就把所有的发票都带过来了。有时我还从

这个小金库里借钱，发工资后再还回去。格劳力亚简直太贱了，总是埋怨我发票放的不是地方、乱接听电话，还竟然说我是文盲。

她其实不会管账，什么都搞不清。所以她经常会让我去复印东西，我知道价钱，因为以前去过那里问清了价格，看看她能给我多少钱，比如印多少张、纸张的大小。

然后我再去跟办公室的接待员要 80 块，说要付复印费。

然后再去问格劳力亚“用现金还是支票？”

她会说“支票”。这样我就可以拿支票去支付复印费，而那 80 块现金当然就据为己有。从复印社拿回发票后，我再把它放进现金盒里。神不知，鬼不觉的（笑了起来）。



快克贩子的自画像：带着金项链和大徽章。这个毒贩直接与游戏厅叫板，用涂鸦把它的买卖点装饰起来。照片提供：菲利普·布儒瓦。

这个妖精很笨！她就知道抱怨，别的什么事都不会做（笑得更厉害了）。

普莱姆的这段对话被他的呕吐打断。他急忙朝我的卫生间跑，没来得及，直接吐到了客厅的地毯上，凯撒关心地叫了起来。

凯撒：哦，兄弟！没事吧？普莱姆。我跟你说过，别一下子吸得太多，你就是不听（用钥匙沾了些海洛因，两个鼻孔分别吸了一次）。

“时髦服装”和符号权力

不是所有反抗边缘地带合法职业的形式都是制度化和实用的。从更深层次来讲，街道文化的全部基础，以及像普莱姆和凯撒这些不愿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妥协的行为，都意味着对主流职业世界里的边缘化的拒绝。街道文化的对抗身份，既是对社会边缘化的成功排斥，也是在某种恐惧情况下对自身脆弱性的保护。办公室里穿着的两极化，为人们更深层地了解这一复杂的动态事实提供了依据，因为服饰是一种具体的、看得见的、包纳了象征性和文化冲突的平台。让我吃惊的是，快克贩子们用事实证明了他们那不相称的衣橱及其附加在其上的文化代码，居然成了他们拒绝合法职业的基本因素。起先我并没有在意这件事，直到几个月过后我才意识到，这一象征性的身份表征在职场与权力关系上究竟有多大关联。

在年轻人当中，在社会边缘地带，“亚文化形式”的对抗意义早已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9]可那些材料大都把社会边缘化的真正伤痛理想化和情调化。与其相反，从美国主流文化视角来看，一个市中心年轻人对“时髦服装”的关注，只不过是其典型的不成熟和无理性甚或是个人病态的表现。

在职场上，当市中心的男女青年作为办公室初级人员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白人女性的管制和领导时，外表就成了其加强和争夺权力的有力阵地。当然，大体上来讲，当快克贩子以及所有关注街道文化的人，超越市中心的藩篱，冒险步入把持着大部分公共空间的中产阶级白人世界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凯撒就在气愤地回忆起他在办公室工作时发生的冲突时强调过这一点。他不知道自己的穿戴在什么情况下会引发别人的奚落或愤怒。在街道环境之外，他的弱势与无奈清楚地表现为他对服务行业中“灵活多变”的工作性质的恼怒。他把办公室着装的苦恼与工作中客观存在的无奈相混淆。

凯撒：我在药品广告代理处工作时，他们对着装就有规定。我打领带打了三个月，但比尔，我的主管，那个狗娘养的爱尔兰老家伙——他告诉我，如果我真的不愿意的话，可以不打领带上班，于是我就没打。

因为某种原因，既然我是新来的，新来的邮件工，他们就重新塑造我，让我干一些没人愿干的活，比如把书架搬下去、打扫卫生、拖地一类的脏活。

我是说我不想穿着这么好的衣服干建筑方面的活儿，可又不能穿得太随意，那样主管会说：“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来上班了？”或是“穿成那样是什么意思，像个无赖。”但我觉得自己穿得已经够不错的了：考究的衣服、价格不菲的皮鞋，还有不错的花呢衬衫。

但当时他们有工作装，我恨那玩意。当时我还在吸可卡因，没钱买衣服，下班回来后还穿着那身打扮。说真的，我第一次发工资就用来买衣服了，但那时候上班前得换下来。

与普莱姆需要查字典才知道“文盲”一词的意思所受到的侮辱一样，凯撒在自认为穿戴不错的情况下被主管说成“看起来像个无赖”同样受到了伤害。他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没钱买衣服，还在于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衣服。文化资本斗争中的挫败感使他们不知所措，觉得街道上那些时髦的衣服可以使其变得“鹤立鸡群”，就像本章中提到的威利说过的那样。

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几个月前，在普莱姆母亲公寓楼的地下室里，我看到了从“职业培训”活动中撤出来的他。这栋楼房从前是一位吸海洛因的人经营的，他因培养“无业人士”的创新方法，而得到了价值几百万美金的私有区域。普莱姆深深地感到这个活动对自己的失礼，他把面前的羞辱集中到对自己衣橱的不满上。这一旨在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的活动，其根本问题出在对“这些人的态度”上。他们用对待劳役营里年轻人一样的办法对待其客户，第一周内就撕毁了他们的尊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只能找一些服务行业里的保安、通讯员、数据输入人员等这样的工作，工资也仅仅高于最低的工资标准，这与那些黑人中年妇女在其子女们长大离开家后，想中止享受政府的福利救济不无关系。

我原本对于那些有某种心理动机和控制欲的人接受工资低而乏味的职业抱有一种“不好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我在游戏厅亲眼看到的暴力和自毁事件，让我明白了在工作中受到剥削，要比排斥在合法职场之外强多了。不管怎样，我还是说服

了普莱姆和他那六位游戏厅的助理，包括凯蒂和当时管理药房之角社交俱乐部毒品交易点的小彼得（Little Peter），报名参加了这个培训活动。连凯撒当时都有点动心了。

参加职业培训的这些快克贩子，没有一个人坚持到三个月以上。普莱姆是第一个注册、接受培训后放弃的人。有数周时间他都不愿谈起自己的这一经历。我一再追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加”这一免费的职业培训活动。在我的反复追问下，他才说出了每次他步入合法职场时所感到的痛切的羞辱和软弱。在这次特殊的上岗职业培训活动中，衣着和外表——服装式样——再次成为服务行业中他们抵抗奴仆地位羞辱的特殊途径。

菲利普：普莱姆你听着，我担心你根本就没意识到你在干什么。你好像一直在吸可卡因，每天晚上都吸。

普莱姆：你什么意思？

菲利普：不去参加职业培训，你嫌耽误事儿。但我怎么觉得是你应付不了，比如说你整夜狂欢、吸毒，所以去不了吧！

普莱姆：听着，菲利普。真正的问题是衣服，我的衣服很有限，连一件正规的衬衫都没有，只有一双鞋。总不能穿着拖鞋去上课吧。他们都打领带，对吧？我根本就没领带——有一条，还是你给我的。

我不可能三周只穿一身衣服：T恤和牛仔装，像个浪子似的。

菲利普：你找什么狗屁借口？别给我说这些，没人会注意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普莱姆：嗨，菲利普。真的！听我说！我正在认真想这件事呢！见鬼！他们当然会注意了，因为要是有人穿的衬衣、领带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我自己都能发现。

我不想穿得像个浪子一样去参加这种培训活动，那样会让我没法集中精力听课，会被人说三道四，像个……像个傻瓜似的被人盯着看。脏兮兮的牛仔褲……或像旧牛仔褲一样，但我又必须穿牛仔装，因为我只有一件休闲装可以穿。

我总共有两件配西装穿的衬衣，其中一件还掉了扣子。

我不想给你说这些，听起来像在找借口，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去的。那时候我说：“我就不去。”

像我这样又黑又瘦的黑鬼，穿什么样的衣服可需要格外小心，否则别人会认为我是个吸毒的。

菲利普：（有点紧张地说）哎，我比你还瘦，人们肯定会以为我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瘾君子。

普莱姆：别担心，你是白人。

显然，这里的问题远远大于没钱买笔挺一点的西服，种族主义和其他一些微妙的权力象征通过衣橱和身体语言浮出水面。最终，普莱姆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在职业服务行业的工作环境中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合适。就像凯撒，当他尝试穿正装时，总担心自己走在路上看起来像个小丑。他承认不去参加职业培训课的直接原因是听到有人骂凯蒂“看起来很俗气”，可她第一次去上课穿的可是她最满意的衣服。事实上，她上课前还去普莱姆和他母亲面前炫耀了一番她的新衣服，普莱姆也认为她那件黄色的紧身连衣裤看起来挺高雅的。

工会化的曲解——种族主义和敲诈

凯蒂、凯撒或普莱姆这类人，把自身禁锢在市中心街道文化中，避免了在其勇敢地走出他们的社交圈到外面寻找合法职业时面对屈辱的危险。与此同时，即使毒贩中那些最凶残、最疏离的人也一直有这种认识：相对于毒品经济来说，一份有工会会员资格的工作，意味着正面的、合法的选择。这对于纽约城唯一容易找到、相对而言充足的、有工会组织的初级工种——建筑行业——来说，尤其如此。建筑工地上的活儿恰好比传统文化界定为男性化的工厂工作要强一些。^[10]我骂凯撒太懒不愿去建筑行业上班时，他指责过我。只能被框定在游戏厅周围做人家眼线的他，喘着粗气，握紧拳头，提醒我想想为开普敦星球（Captain Planet）做的电视广告。

凯撒：不，伙计。去他妈的。我明白搞建筑是不错。

可瞧我这身体，我有搞建筑需要的身体吗？

我不像普莱姆（指着在一旁忙活的普莱姆），他的身体做搬运工和买卖都行（远处传来枪声）。

让我吃惊的是，凯撒告诉我他在普莱姆雇他在游戏厅干活前，也曾尝试过做一名建筑工人。那里比他在广告代理公司所受的屈辱要少一些。众所周知，对于在

黑手党控制的工会庇护下收入不错的白人工人来说，纽约市建筑业是种族主义的禁区。^[11]从70年代起，以市中心为基础，以鼓励雇用少数族裔成员和妇女或改善他们受教育的机会等为目的的希望行动组织，一直试图给地方上的建筑工地施加压力，希望他们能雇用自己社区里的劳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却利用了意大利黑手党从前发明的一个强制手段。像凯撒这样肌肉发达、性情暴烈的人，被希望行动组织以虚假的宣传招聘进来，充当凶暴的抗议者来威胁建筑公司，强迫他们把拉美人和黑人合并到他们的建筑工地上去。那些表现不错的抗议示威者，还可以在其强制策略取得成效的这个建筑工地上，得到一份全职的、有工会会员资格的白班工作作为奖赏。

凯撒以他的鲁莽、粗暴及对公开暴力表演的偏爱，效力于一个比较正规、颇有名气、没有种族界线、即有名的“哈莱姆反击战”(Harlem Fight-Back)组织，仅在一周后他就得到一份宝贵的工会工作。尽管在示威抗议的圈子里凯撒觉得自己很有名气，但他发现当自己离开哈莱姆反击战的街道文化策略的保护伞之后，却输得很惨。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来自全新的、纯白人同事的种族主义的阻隔。

工资蛮高的。他们每小时给我14块。但我是波多黎各人，而他们看起来都像意大利人。我从来没领到过工资。

是这样的。他们拿我当球踢。我干的是拆迁的活儿，但我每到一个工地，工头根本就不认识我，于是就把我打发到另一个工地上去了。

这帮大眼睛的意大利家伙！看起来40来岁——问我（粗声粗气的）“是谁让你来的？”

我就这样（耸耸肩）。

我告诉他们是谁让我来的，可问题是总工会办公室没给我任何文件，也没有工时记录卡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只能拼命地干活。

我到了工地上，人人都在等着老板说：“好了，大家开始干活吧。”然后他们开始干活，我就跟着他们干。但没人知道我是谁。没人问：“谁让你来的？”“你的工时记录卡呢？”

他们就这样来回耍弄我。我太笨了，再也没去过那里，因为当时我在吸毒，我就告诉自己：“去他妈的，他们这是在耍我。”我就走了。

换句话说，是快克、种族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和凯撒个人的脆弱，让他不得不

从最传统的男性工人阶级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被制度化地排除在外的事实。

有工会组织的建筑业内部有两个下属部门相对来说是向哈莱姆东区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开放的：建筑物的拆除和高层楼上的窗户更换。这些最危险的工业领地，在纽约最贫困的社区里随处可见。那里是实现中产阶级化、滋生公共部门恣肆腐败的地方。最为露骨的是，在拆除过程中，哈莱姆东区这群粗野的高中辍学生很得意能有这份合法工作，乐于拆除火灾后被废弃的工人阶级公寓楼房笨拙的建筑，为新的豪华建筑群扫清地基——这些奢华的建筑是他们及其家庭成员永远也享用不起的。经济学家和地产商们称其为旧房改建。但在街面上，人们则称其为“漂白化”。

充足的更换窗户工作是曼哈顿不太昂贵的房屋建筑商之间相互竞争的微妙结果。纽约市的住房政策规定，更换窗户意味着增加资本投资，房主们可以想办法以高出真正价格几倍的价格，通过——绝对合法的——记账方式把费用转嫁到未来的房客身上，这也就意味着，房主可以其特殊方式越过纽约市严格的固定租金和家庭驱逐法规，迅速抬高房价，迫使那些贫困的客户搬离他们的租住房。处于富裕与贫困的中间地带，比如纽约市东第96条街的丝袜东区与哈莱姆东南区的区间，就是这一类对于旧房改建方案来说最脆弱的夹缝地带。可笑的是，在哈莱姆东区，年轻人却把对自己出生地的永久性置换视为有益的事，因为他们可以在短时期内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建筑工人的活儿，修复贫困的工人阶级再也负担不起的房屋。

周期性的房管工程对建筑物的“整修”，是在犯罪团伙的资助下进行的，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些充足的高层窗户更换工作。好几位快克交易点的常客，诸如小皮特（社交俱乐部的经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很自豪地加入到这些黑手党控制下的窗户更换骗局中去。小皮特负责更换游戏厅对面公建住宅楼区成千上万的窗户，但他的任期因头部受伤、玻璃渣滓刺伤了左眼被迫中止。他不得不去哈莱姆东区市属公共机构（都市医院）去申请贫困医疗援助，因为承包商从来没给他买过任何医疗保险或工人赔偿保险单。更糟的是，医院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在调查中发现，小皮特的承包商与一个腐败的联邦官员商定好非法雇佣了他，并准许他们把本应支付给他每小时18美元的全额工资降为10美元。小皮特还曾为每小时10美元的工钱欣喜若狂，他从来都没想到过按照联邦规定，他的劳动价值应该是每小时18美元。^[12]

新移民的抉择

尽管大家都有着处于工会劳动力市场边缘的经历，但却都认为工会职业是最理想的。“我得找一份工会职业”是普莱姆在时断时续的找工作阶段经常念叨的话。实际上，两个月来他一直幻想着自己已经在一家夜间保安服务公司找到一份负责打扫展览馆会议室及时代广场剧院的工作。一开始的工资是每小时 6.5 美元，这已经让他兴奋不已。他很坦诚地跟我说，他感觉太好了，“像一个正常的有职业的黑人”，尽管同时他也告诉我：“你说奇怪不？那里除了老板，其他人都是他妈的移民。”他还埋怨说，公司拒绝付他加班费，但他接受了他们的解释，饭店管理人员坚持让工人们在客人醒来之前离开岗位，“我估计他们不想让客人看见周围都是我们这样的贱人。因此我们尽量在晚上 11 点工作到第二天 6 点半离开。”他不喜欢那个“秃顶”的白犹太人老板，他每次来检查他们的工作时都很凶狠。那些值班的工会工人们对于秃头老板的谩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第二次领到双周的工资后，发现有几个晚上的值班都没算。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坚持到两个半月的见习期满，而这个见习期是工人们加入工会前必须有的。

实际上，普莱姆在还差两周就有资格获得工会任期时被解雇了。

普莱姆：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我在那里干了两三个月了，所以我是被解雇的人当中为了那个破工会的事而冒最大风险的人。他们不仅不发给你那个有十字勋章和盾牌的蓝色证件，还克扣你的工资。

一位在那儿干了好几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你不会拿到会员证的。等你在这儿干完三个月，他们肯定会解雇你，等着瞧吧！”

他们还欠我几小时的工钱，那个工作很糟糕。后来很快都成了墨西哥的流动工人、西班牙人和中美洲人的了。

普莱姆关于加入工会组织失败的叙述让凯撒颇为恼怒，但他们俩都屈从于经典的种族主义者分而制之的逻辑，把新移民当做自己在劳资冲突内部结构上的脆弱的替罪羊而迁怒于他们。在此过程中，他们进入高工资的工会工作的梦想也被进一步摧毁。

凯撒：墨西哥人在这些地方经常受欺负，兄弟。工资很低，什么活都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是廉价劳动力。

人们都愿意在用白人或波多黎各人之前先用黑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好欺负。

普莱姆：是他们抢走了我们每小时两三块钱的工作。

凯撒：我也为这事生气呢！兄弟。

普莱姆：他们抢走了美国市民该干的工作。

凯撒：因为我们是美国人。

普莱姆：否则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还可以每小时挣五六块呢。

凯撒：墨西哥人还带来很多他们的伙伴，建筑工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普莱姆：第116条街上的建筑里到处都是墨西哥小孩。

凯撒：这个街区挤满了不同种族的人，都挤在一个个简陋的小屋子里。

特别是非洲人——我看着他们都觉得恶心。

普莱姆：他们把你当小人一样看，但却过得比我们好。

凯撒：他们看起来确实很脏。

菲利普：好了，别这么说！

凯撒：他们确实很黑，像夜晚一样。我就觉得他们脏。和身边的美国黑人不一样，他们真的像太阳直接晒黑的那种。

普莱姆：还有多米尼加人。

菲利普：兄弟，你们这些人应该读一读我的书^[13]，了解一下穷人种族主义互相诋毁有多愚蠢。让我给你们念一段吧——那是在哥斯达黎加种植园内，黑人与拉丁美洲人相互攻击，而公司得益。

凯撒：（不听我说）多米尼加人最不是东西了。他们来到这里不是卖毒品就是开商店。

我最恨多米尼加人了，兄弟。

这是把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带到哈莱姆东区历史进程的经典重放——但普莱姆、凯撒以及实际上游戏厅周边的每个人却都扮演着悖反的角色，对那些新搬进来的移民深恶痛绝。我在那儿实地考察的最后几年里，他们的痛恨演变成对住在破旧公寓楼内毒品购买力最强的墨西哥黑人随意施暴的行为。游戏厅的几位常客中，包括瑞直接雇来代替普莱姆和凯撒做毒品交易的毒贩内斯特（Nestor），就曾因走私、杀人和枪杀几个新邻居的行为而被捕。

三四十年前，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痛恨波多黎各人“偷走了”他们在工厂的工作，“侵占”了他们的地盘。90年代墨西哥人面对的、同样是第三世界的极度贫困变成一种动力，使得比起前一代移民的后代——纽约出生的意大利人，四五十年代波多黎各的新移民群变得更易“剥削”。普莱姆的母亲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回忆，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普莱姆的母亲：（用西班牙语）我喜欢在波多黎各的生活。我们有的是吃的，因为我父亲一直有工作。那时候的习俗是在院子里的花园里种粮食和其他食用的东西。

我们在周日才能吃上肉，因为只有那一块地，你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得种植。我们有茄子、豆荚等（列举了很多传统的波多黎各蔬菜名），我们就靠这些省钱。

因为没有冰箱，我们把吃不了的腌制咸的，比如咸鱼、碎牛肉和沙丁鱼罐头。

感谢上帝，我们从来都没有挨过饿。我母亲做了很多的玉米粉。为了省钱，她把吃剩的豆荚晒干、捣碎、做成汤，再加上点玉米粉。我们从来没有挨过饿。

50年代，莱昂纳多·考维洛（Leonard Covello，哈莱姆东区公立学校的意大利裔校长），为他的邻居对普莱姆母亲这种人的种族主义表现深感遗憾。在他的自传中，他描绘了自己在哈莱姆东区拐角处与一帮意大利裔美国人间的一场辩论：

（街角的人）：我们和他们可不一样，我们是美国人，一周至少吃三次肉。他们吃什么？豆荚！

（中学校长）：你们说说看，你们的父母当时刚到美国时吃的是什​​么？也是豆荚和通心粉——别忘了，别人也曾对你们父母说过今天你们说过的话。^[14]

90年代发生于在纽约出生而没有工作的波多黎各年轻人与“侵占”他们社区和劳动力市场的新移民之间的暴力和种族主义冲突，体现了纽约经济重建时期人类的最底线。80年代最低工资的真正价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同一时期，联邦政府对纽约市的同比份额预算却下跌了50%多。正常情况下，这将促成初级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危机。^[15]然而，新移民提供了新的劳动力资源，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不得不接受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消费的苛刻的劳动条件。具体而言，在哈莱姆东区，新

移民大多数是来自普韦布拉 (Puebla) 和古瑞洛 (Guerrero) 的墨西哥农村人。与生俱来的贫困使其变成高度自律、廉价的劳动力，这满足了服务行业高收入的行政当局对个人服务的大量需求：家庭保姆、办公室清洁工、投递人员、宴会侍从、饭店服务人员。^[16] 此外，在他们贫苦的农村家乡，连自来水和电视都被视为奢侈品，因而他们能够忍受美国市中心特有的、极其显眼的公共地区恶劣的工作环境。纽约出生的任何一个族群的人在承受力方面，都无法与这些来自乡下的低工资的新移民奴仆相抗衡。

除了忍受物质生活水准低、接受更苛刻的劳动条件之外，新墨西哥移民还要遭受来自波多黎各人和非裔黑人不同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工作中的羞辱。他们的自尊感与本土出生的北部美国人建构的种族等级制度及自我价值相去甚远，也不在乎日常生活中很多针对拉丁美洲人的种族主义和不尊重的微妙言辞。当然，来自其他族群的谩骂随着新墨西哥移民在当今社会中的发展壮大及在纽约出生的新一代墨西哥人的逐渐成长会有所改观。可想而知，不同的文化经济特质所促成的这一状况，同样会发生在曼哈顿处于下层的、未注册的亚洲新移民、西北部的多米尼加人以及纽约市郊布鲁克林西部的印第安人身上。^[17]

双重文化选择：向上爬还是背叛

鉴于纽约市劳动力中最底层的新移民在结构态势上的种族传承性，纽约出生的波多黎各人把努力爬向高层社会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服务领域中的办公室服务人员需求的扩大上，比如邮局工作人员、复印工和接待员。这一领域不仅是城市发展最快的区域，而且是爬向上层社会可能性最大的部门，比如通讯员被提升为雇员，再被提升为行政管理人员助理等。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的恰好是为街道文化嗤之以鼻的恭顺言行。

如前所述，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成功，要求市中心办公室的工作者们有双重文化身份。换句话说，白天面对城市商业区的白人女性要做到“彬彬有礼”，晚上回到家中则要皈依公寓或公建住宅工程楼房内的街道文化。哈莱姆东区成千上万的居民都是在这种处境下努力平衡他们的身份。他们在取得成功后，经常会被那些不愿工作或没有工作的邻居和童年的朋友骂为种族的背叛者和内化的种族主义。

我从一些游戏厅的常客那里，搜集了他们对于那些工作在城市商业区、已经适

应办公大楼内办公室文化的成功的邻居们的苛刻的谴责和不满。

勒罗伊 (Leroy)：当你看见有人去商业区找到一份好工作后，如果是波多黎各人，你会发现他们个个油头粉面。他们融进去了，融进去了，我知道。

他们彻底变了，想变成白人，兄弟。如果你用西班牙语招呼他们，会惹麻烦的。

我是说，拿皮德罗来说。皮德罗会说，(模仿白人的鼻音)“我的名字叫皮特。”看一看西班牙人怎么整他妈的头发就知道了。如果有份好工作，他们突然间连说话都变斯文了。

双重文化的选择对于勒罗伊来说不是一个选项的问题。他的黑皮肤和粗俗的街道举止，使他无法得到办公大楼里的丝毫信任。我后来得知，那天晚上我录下他对“转化”的谴责时，他的愤怒部分来自于最近碰到的办公室工作中的不愉快：一位白人女性尖叫着从办公大楼的大厅里跑出来躲避他。为了回到公建住宅工程楼的楼梯里做他的毒品买卖，他刚刚放弃了一份“商业区办公大楼里的工作”。勒罗伊和那个受惊的妇女乘同一电梯，正巧与他要去送信的地方在同一层。然而糟糕的是，勒罗伊在这位妇女逃跑时一直试图表现得温文尔雅。他怀疑，是自己不恰当的外表和殷勤的意图间的强烈反差，造成了这位妇女的恐惧。

勒罗伊：你知道在电梯里需要让女士先行吗？我就是那样做的。我不过看起来衣衫不整而已。有时我不太喜欢梳头发，所以看起来邋里邋遢的。或许是因为我让她先行了。

直到后来在我的启发下，勒罗伊才承认单独和一位白人女性在一起让他也感到很拘束。他被对她的禁忌和空间上的如此接近搞得不知所措，当他最初和她一起走进电梯后竟忘了摁电梯的按钮了。

勒罗伊：是她先走进电梯的，然后站在那儿等着我按，看我要去哪一层。她好像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一层。她想看着我先按完之后再作决定。我站在那里，忘了按电钮。

我在想着别的事情——不知道到底怎么了。而她似乎在想“他不按电钮是不是想要跟踪我。”

勒罗伊努力地去理解自己的外表带给白人的恐惧感。

勒罗伊：之前这类事情也发生过。我是说过一段时间后也就适应了。

第一次发生时确实令人很生气。“麻烦大了，他们怎么能这样看你？”你会纳闷。他们在想：“像这类小子，周围可多了。”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我理解他们。该怎么说呢？很多白人……（紧张地看着我）我是说白种人——（赶忙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我说白人，你可别生气，因为这个社区住着一些白人。

但另外一些白人，他们从来都没有和黑人打过交道。他们来自富裕的社区，上学时学校里也没有黑人孩子，大学里更看不到黑人的影子。他们来到办公大楼上班时才开始见到我们。

你知道，我们找不到最好的工作，你知道为什么，我把它叫做“挣钱的活儿”。我们经常被误解，穿戴的也很不合体。

有时我穿得很邋遢就来了，所以他们自然认为我有问题。他们或许还以为我是来打劫的。所以我喜欢……我不太在乎。可有时候也挺烦的，脑子里都是这些事，总想写点什么。我经常把这些想法写下来。有时会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记下是怎么发生的。我想试着从中整理出流行的说唱乐曲出来。

当然，作为一名快克贩子，勒罗伊必须面对这一类使他慌乱的阶级及种族羞辱。

我就这件事和凯撒的另一位在合法职业中已经“站稳脚跟”的表哥进行了探讨。他有份稳定的白领工作后，举家搬到了郊区。他的经历很有趣，在街面上长大，吸过海洛因，和街道上的那些老朋友至今仍有来往。起先他让我以为他搬离街道文化与种族妥协毫无瓜葛，只不过是信仰改变而已。他及家人都是虔诚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后来，他也承认自己来探望哈莱姆东区的朋友时必须很低调才行。

凯撒的表哥：我的朋友中一半已经不在人世了：有被杀害的，有吸毒过量而死的。但我和那些活着的人还保持着联络。事实上，今晚我刚刚还看到了一位，他还在吸毒。

我的朋友们并不认为我瞧不起他们，因为我从来不会那么做。他们确实不知道我的生活到底怎样，只知道我在“搞保险”，但我不会拿这个来炫耀，否则他们心里会很不是味。我从来不那样做！所以他们并不把我看成叛徒。

平衡阶级和种族的双重困境，在他努力靠近的新世界里并不那么容易做到。这个世界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所控制，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把美国种族隔离制度内化为合法又合情的事。

凯撒的表哥：我孩子的未来要比我们当初好得多。我可是住在郊区。说实话，我们那里可能只有一两家西班牙人住户。

我出门跑步时，大家都很惊慌，很紧张。可那是他们的事儿，我很自信，我不在乎，也根本不担心。我在家时不时地会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嗨，操西语的美国人”之类的话，可我不在乎（笑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学会了去适应他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见识过少数派作为一个群体能在社区干些什么，也看到过一些很好的社区已不复存在。所以我在适应他们，也能理解他们。我已经学会怎样去同情他们，我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

可是凯撒和普莱姆就不会有这样的同情和理解，相反，他们仍在地下经济的庇护下为街道文化摇旗呐喊。

第五章

在校的日子——学会做个好罪犯

上高中时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浪荡。校外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经常打群架，波多黎各小孩时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还有个小孩被活活打死了，所以我们都不想上学，经常逃学到商业区去偷抢。

——凯撒

来自家庭、学校和同龄人相互间复杂的影响，在促成和强化社会边缘化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13岁前。因此，我专门收集了瑞社交圈里的毒贩对自己童年和上学时期的回忆，尝试探讨一下他们与主流社会和市中心街道文化之间的早期机制关系，并引导他们谈谈自己比较熟悉的家庭生活。本章及接下来的三章——它们探讨了变化着的性别—权力关系，家庭制度转型（尤其是情感培养）和经济稳定——就是对这方面资料的记述。本章主要关注市中心主流社会中典型的早期社会化机构——公立学校。这里面自然会涉及街道文化对学校的替代选择——同龄人或最初的犯罪团伙（帮派），是如何有效地填补因逃学导致的正式机制真空。毒贩们开始向我坦陈各自早年在街道上的暴力活动和经历时，我也不得不面对在其正规或非正规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性暴力这一野蛮现象。因此，本章将以学龄男孩子所属的街道帮派为中心，探究他们是如何学会通过轮奸的方式来强化街道文化的厌女症的。

幼儿园的过失——遭遇文化资本

大部分小学教师都认为，学生们到了二年级后，大都想讨好老师，即使在教室

里想表达自己的私事时也是如此。然而，凯撒和普莱姆对学校的最初记忆却与此截然相反。

普莱姆：我讨厌学校，我恨它。在学校我从来没表现好过，从来不做作业，就是不想做。

从一年级到我辍学，就做过两三次作业。

我一辈子从来不做作业，从来不。

家中传统权力关系的动摇，加重了因文化和年龄差别所导致的普莱姆的制度化疏离感。只会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单身母亲，与在纽约出生的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间发生了文化冲撞。孩子最大的“不道德”行为，莫过于拒绝用西班牙语回答她提的问题。^[1]上幼儿园后，这一危机更是开始加重。如果说文化的相互影响——具体来说就是文字的相互影响——是强加给任一社会权力的“符号资本”的话，那么在布迪厄看来，人们完全可以从新移民母亲和她的孩子的角度，去解读其与公立学校制度第一次亲密接触时所受的创伤。

普莱姆的母亲有限的文化技能和不会说英语，很可能是导致第一天送孩子到幼儿园的大教室和老师接触中遭遇的制度化灾难的原因。任何一位发育早、身体壮的五六岁孩子，都不忍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顷刻间从生活中的权威跌落成他人威胁、奚落的对象。更为糟糕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敌对式、欠友善的管理模式，竟比母亲的抚爱、批评及大麻在决定未来命运方面更具权威性。

普莱姆在幼儿园的年级大教室里，立即继承了母亲从乡下种植园里的个人到当下市中心新移民来的血汗工人的身份过失。母亲表现出的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cy，相对于功能性识字而产生的名词，1947年美国普查局将那些未能完成五年级学校教育，且无法看懂简单的文字说明者列为功能性文盲）和无法与教育界的官僚者沟通的事实，共同框定了老师眼里既不配合又很愚蠢的普莱姆。或许，当时他是不得已才与老师对抗以保护自己，从而避免了一味地去讨好他们（尽管注定会失败）可能会遇到的下意识的侮辱和伤害。不顾其焦虑的母亲“要尊敬老师，在学校好好表现”的警告，在教室里的成功，注定会背叛他对母亲的爱。

教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交叉领域里的理论家，创造了大量文献——有时也叫文化生产理论——用来解读教师在潜意识中是如何通过阶级和文化信息给其学生划分等级的现象。代表着主流中产阶级的白人官僚主义者，通过口音、衣着和细微

的表达方式，比如眼睛的对视、身体语言、玩耍的方式和注意力的集中度等标志，来确认某个孩子到底是纪律问题、情绪问题还是智商问题。可以想象一下，普莱姆到了二年级后在老师们眼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普莱姆：我在课上什么都不听，从不举手，就在那儿傻坐着。

我总想藏起来，当时确实很害羞，坐在教室里最后一排，或者干脆告诉别人“别理我”。

后来我开始画画——课桌上都让我给画满了——像涂鸦。

有时候觉得很郁闷，所以开始吵闹，他们就把我赶出教室。

但市里的考试，我一般都能过关。

普莱姆在教室里的言行举止，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符号性的评价。这些评价从宏观上组建了一个联合阵营，保持了一个特定社会中等级和经济的不平等。我已经间或提到过文化资本的排他性权力，像我经常造访的那个快克交易点里的半文盲瑞没能拿到驾照，或更重要的，凯撒、勒罗伊和普莱姆在办公大楼里遭遇过的屈辱，但正是在学校里，中产阶级社会对恰当的文化资本的界定和符号暴力的绝对控制功能，击垮了工人阶级出身的波多黎各人的孩子。

普莱姆：当老师批评我爱说话或注意力不集中时，我会骂她个狗血喷头。

比如她要是说“闭嘴”什么的，我会说：“操你妈！”

凯撒的违纪状况几乎都是身体上的。

凯撒：老师们恨我。他们经常说：“他的年龄大而且太贱。”我那时是个课堂小丑。

气死我了，我成了不良少年。（大笑）

校园里社会权力符号特质的强化，对于被卷进来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它毒蚀着弱小的孩子们生活中最本质的一面。例如，当普莱姆开始识字并能听懂小学里学的对话时，就开始利用这一体系与母亲作对并背叛她。母子间正常的权威渠道被阻塞。母亲只能无助地打骂他、生他的气、不信任他。

普莱姆：我上一年级时作业本上全是些红杠杠。需要我妈签字，我也不告诉她为什么都是些红色的批注，所以她才签。

后来老师跟她说了，她牙齿咬得嘎嘎响，都快气疯了。

再后来，我经常画画玩，一直学着描摹。如果我的作业有问题，他们写信给我妈并让她签字时，我就仿着她的字体签上她的名字。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像我儿子现在这么大，六七岁。对，那是上二年级时候的事。

普莱姆上小学时的对抗言行，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升级到逃学、犯罪和吸毒。母亲为了挽救儿子，把他送到阿罗约（Arroyo）老家父母那里，她自己就是在那里的种植园里长大的。普莱姆来到了住在新建的联邦政府救济工程楼里的姥姥家。这座公寓楼位于美国跨国公司所属的蔗糖种植园旁边，他的姥姥、姥爷、舅舅、姨妈们都曾在这个公司工作过。然而，母亲想尽力疗治孩子在美国市中心创伤经历的良好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哈莱姆东区的学校没能把考卷发送到他手里，所以14岁的普莱姆在波多黎各成了一个合法的逃学者。但更麻烦的是，在心理成长方面，普莱姆姥姥家的农村种植园社区直接拒绝了他。在这个岛上出生并长大的波多黎各人实际上已经觉察到，社区和社会对于归来移民的控制权已经丧失。纽约人在这里一般没人信任。普莱姆发现自己身跨两种文化——两种文化都排斥他。^[2]农村的波多黎各以那种传统的背井离乡经历与他对抗，这种经历迫使移民的孩子们向上爬并做一个真正市民的夙愿，在被隔离的市中心贫民区被击得粉碎。

普莱姆：（抿了口啤酒）14岁时我妈把我送回波多黎各，因为我在这里经常捣乱（向着游戏厅招了招手）。

我还是个孩子，我想接触的那些女生也一样。她们在离我很远的地方站着，好像很怕的样子。

我从来没见过她们的爸爸，但她们常说：“我不能和你说话，我爸不让。”

我就问：“谁是你爸啊？”我以为自己可能见过他，他也许不喜欢我。

但总有人警告我。你知道吧，那边的小镇上消息传得特别快，因为从纽约来的人，大都不检点。

凯撒：对，别人也那样说我。波多黎各人好怪。我也去过那里很多次，他们一点儿都不喜欢从纽约去的人，叫这些人“外国佬”，说从纽约来的人太世故、太野蛮，控制欲特强。

他们想着：“你们来这里不就是想把我们比成乡巴佬嘛。”你瞧，像乡巴佬。

在波多黎各，你得处处小心，否则就会有麻烦。

普莱姆：没错，我在那儿就遇到过很多麻烦。

我真该死。有一次和表兄跑到卖彩票的姥姥屋里，打开钱包，偷了500美元。那女人（羞愧地低下了头），其实很爱我。

后来她丈夫把我们抓了回去，打了我们一顿，所以我又回纽约来了。

家庭暴力和制度暴力

凯撒的学校经历比普莱姆更惨、更糟。像普莱姆一样，他母亲也是青年时就移民过来的，但她来自城市的棚户区。与普莱姆的母亲相比，她更有文化，适应能力也更强。但这反倒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更残暴的个人迷乱：少女时期和不同的男人怀过几次孕、吸过海洛因，小罪不断，最后因杀人蹲了大狱。于是才有了凯撒生活中的个人及制度上的中断和仇视。

凯撒：我在学校可不木。我凶着呢！唯一的原因就是没人引导我……

我是老大，生活中没爹没娘的。我是说我妈很少和我住一起，我经常跟着我外婆。

我妈到处乱跑，生我时她才16岁。在当时的波多黎各她是个女王式的美女，没少让人占便宜。我爸爸当时也很年轻，大约20岁。

我妈还吸毒、酗酒，问题可多了，兄弟。

我是说她没法照顾我，因为她还得照顾我的弟弟妹妹们，所以才跟着外婆。

我们搬过很多次家，从哈莱姆东区到芝加哥再到康涅狄格州。

我和外婆住在一起，我妈已经完成了她的任务，正在蹲监狱。

几周过后，普莱姆向我详细说起了凯撒和她母亲的关系。

普莱姆：凯撒他妈不是个东西。她有毒瘾，待凯撒很不好。简直就是个混蛋！

他妈胆子好大，杀死了一名医生，是故意杀人。那个医生出示过她卖淫的凭据。

凯撒很可能一出生就有毒瘾。

凯撒：我一生下来就有病，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是我妈的问题。

后来她杀了那个男人，因为他待她很不好。她是在自卫，她是这样跟我说的，所以杀了他。

我妈的公共辩护人也不是个好东西。他们在耍她、欺负她。法官判她25年牢狱。这就是我的生活。

菲利普：你和她还有联系吗？她现在怎么样？

凯撒：我去看过她很多次，我不喜欢去那种地方。

她和简·哈里斯（Jean Harris）都在监狱里，（笑笑）你认识那个斯卡斯戴尔减肥医生（Scarsdale Diet doctor）吧，我妈就和她在一起。我见过她。不过她脾气很暴躁，我有她俩的照片。她们一起住在一个荣誉监狱，是顶级的。

凯撒还说，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学校，是因为得跟着外婆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的缘故。

凯撒：第一次是搬到康涅狄格州我表兄那里，因为我在纽约惹的麻烦太多。

从那里又去了芝加哥。外婆病得很厉害，她得去医院做手术，我经常惹事，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他们说，我犯了法，如果不回到原来的住处，会蹲大牢的。我害怕了，只好回到纽约。

我愿意搬家，因为那些地方通常都有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让我跟他们走。

但每次搬家，就得换一所新学校，还得等很长时间的考试。可一回到纽约，我好像就可以不去上学了，我去工作了。

那会儿我已经不小了，大概在11、12到16岁之间。

我都记不清转了多少次学，6、7、8、10次吧？

以暴力为主的学校生活，是他对正规学校教育的最初回忆。当一位懵懂的少年不断地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时，他无论如何都得表现出一副凶狠的形象。

凯撒：我辍学之前上过一大堆学校，第113、117、102、109中学。去过很多地方，兹岛、州北、州南。

我经常打架，没人敢惹我。发疯般地打架。真的！每次打架，他们都以为我是疯子。记得有一次，我把一个黑家伙的脸打得开了花，自己的手腕也受了伤。

普莱姆：我也经常打架，即便输了，也照样打。

凯撒：知道吧？每到一个学校，开头几天，所有年龄比我大点儿的都想挑战我。他们在楼道里喊着：（挑衅性的）新——来——的。

他们往那儿一站，（迎面向着我撞过来，差点把我撞倒）专门找我的事。

对了，还用巴掌打我的脖子（拍着我）。

他们就坐在楼梯的扶手上。我使出全身力气把第一个过来打我的那个家伙从扶手上推到楼梯下面，把他的头摔伤了……（一把抓住我提起来）因为我太害怕了。

他们又高又大，专门欺负弱小的人。老子我就等着这一天呢，兄弟。

普莱姆：过去大家都受过欺负，但没人敢来惹我，因为我会用椅子、铅笔一类的东西和他们拼命。

所以他们才不敢欺负我。

凯撒：对，后来我长大了，也学会去对付那些黑鬼们。

我是说，菲利普，你有钱，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可就不一样了，背着债到处游走，但我很少参与暴力事件。那时候我们这种人真不少。

康涅狄格州更糟糕，那里的黑人与波多黎各人势不两立。

暴力和大男子主义的性侵犯是校园里能否受尊重的重要参数。

凯撒：我从来都没受过那么大的委屈，因为我经常辱骂女生。所以黑家伙们轻易不敢来惹我，但我很少参与暴力事件。

尽管凯撒庆幸自己在街道文化暴力中的胜利，但他也确实承认过自己在制度化的学校环境里的懦弱。

凯撒：我被送到州北的管教所后，才真正遇到麻烦。那里所有的孩子都挨过教官的打，而且是往死里打。其他小孩也打我们。他们经常踢我的屁股，把我打伤。

黑家伙们让我拖地，我成了那里的受害者。

那个管教所太垃圾了，兄弟。我经常看到教官们把光着身子的小孩扔出来毒打。他们扒光他们的衣服扔到外面的雪地里。简直是太残忍了。

我那时十二三岁。太残忍了，兄弟。我常常看着那里的一切，对自己说：“我得想办法逃出去。”那些教官他妈的简直不是玩意儿。

凯撒非同寻常的脆弱表现让我为颇为震惊，于是我开始探究他这一时期的生活。我从他的表兄埃迪那里，搜集到他在管教所经历过的几件事。埃迪刚巧也因为少年犯罪，9岁时被送到同一个管教所——一所“你必须拼命才能活下来的学校”。当时他们俩都遭遇了家庭危机，没人告诉他们如果犯罪会被送去劳教所接受教育。

埃迪：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凯撒也在那里。直到有天我们被带出去游泳，我才看到他。我们在一起后事情就好多了。那些黑人孩子在我们面前也老实了不少，因为我们彼此间会有个照应。

埃迪也给我讲起了他自己在学校经常“受欺负”、“整天麻烦不断”的痛苦经历。7岁时他就试着自杀；9岁时有位老师因“他不注意听讲殴打他时”，他曾试图从三层楼高的窗户上跳下去。像凯撒的母亲一样，埃迪的母亲也是被她嗜酒如命的丈夫——“一个小气、平庸、从来不知道付出、只会生孩子的男人”——遗弃的。和凯撒不一样的是，埃迪敢于承认，“我想我妈，过去常常哭，哭得死去活来的。挺傻的，整天都想着自杀。”学校领导认为这个9岁的孩子因被母亲遗弃得了抑郁症，违反了校纪校规，因此把他送了到劳教所。

埃迪：他们告诉我：“你不能去见你妈，因为你需要的是隔离。”我被安排到医疗区隔离了一段时间。

埃迪很动情地讲起了他成人之前经常面对的家庭生活的创伤和公立学校体制上的暴力，从而激发了我对凯撒在同样稚嫩的童年时代的家庭生活做更深层次探究的兴趣。埃迪很委婉地告诉我凯撒破碎的青年时代，但却带着极大的同情心，详尽地讲述了凯撒遭受过的毒打和特殊羞辱。

埃迪：凯撒的经历确实太惨了。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布拉（Bucla）经常在大庭广众下虐待他，用短棍、棒子之类的东西打他。她像个虐待狂：滚回学校去，让别人打死你得了。

一开始，凯撒不愿承认他幼年时的脆弱，但年少时的恐惧和焦虑却是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在后来的谈话中，他还是向我倾诉了自己童年时所受的虐待。

凯撒：不，我外婆从来不打我。我像上帝一样，外婆就是我的圣母，她爱我。

菲利普：你母亲呢？她打过你吗？

凯撒：她也从来不打我，因为我很少在她身边待。我怕她。

小时候我看见过她和别人打架，当时把我吓坏了。有一次，我看见她把一个来打她的黑人妇女从窗户里扔了出去。从那之后我就很怕她，所以她也很少打我。

我外婆是唯一打过我的人，但我愿意被她打，因为她打不疼。她打我很好玩，一点儿也不疼。我宁愿让她打。

菲利普：还记得哪一次你挨的打最厉害吗？

凯撒：布拉拿刀子向我扔过来那一次，刺中了我的胸部，这儿，没留下疤痕。

我记得刀子“嗖”的一声飘过来。幸亏我躲得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最惨的一次……因为那次我犯了大错。

菲利普：还记得别的吗？

凯撒：我记得我很害怕，从那以后好长时间，我都不敢靠近她。

那一次是我的错，值得被打上很多次。她不得不用电线抽我，但我没觉着疼。

我是说我一直期待布拉打我。有时候她会打我一拳，挺狠的一拳。但大多数情况下，她只用扫帚把敲我脑瓜。

我去拜访凯撒时，布拉每次都表现得很有礼貌：把放在屋子中央的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低，示意我们坐下，再去厨房给我们拿吃的、喝的。客厅里的沙发显得格外舒服，是深红色和金色相间的条纹状，上面堆满了杂物，出厂时的塑料包装还未撕掉。整个房间显得小了一点，我们只好从浅橘色的、用塑料布盖着的茶几旁边挤过去坐下来。尽管她的举止很传统、很客气、很有礼，但就连毒贩中那些最强横的人也让她三分。我见过布拉对面快克交易点的一位经理对一位不太规矩的顾客这样说：“闭上你的臭嘴！否则对面那位老太太会拿拐杖敲碎你的头。”

考虑到凯撒的家庭背景，他在青少年时期用暴力应对学校里的各种事件也就不



Fame 里面的涂鸦墙面。照片提供：Henry Chalfant。

足为奇了。利用他和普莱姆在 10 和 12 年前被赶出来的那所混凝土做成的学校操场上偶尔喝酒、吸毒的机会，我录下了他俩对校园生活的回忆。这所特殊学校的娱乐场地四周用水泥板挡着，2—5 码高，让人想起了恶魔岛监狱（Alcatraz）。就像是為了训练这里的孩子们适应美国市区的种族隔离现象似的，一列城郊火车恰好从哈莱姆东区中心公园路穿过，把它的影子投射到这个水泥操场旁边。只要是孩子们在校上学期间，这列在全国范围内服务最周全的特殊火车，每天都会载着上千名纽约市有最高收入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界的大亨们疾驶而过，把他们送往康涅狄格州和纽约的家。如果乘车上上班族从车窗向外望，可以看到疾飞而过的校园水泥墙上用喷漆做的涂画作品，在太阳下熠熠发光。从纽约城不同地区来的各路艺术家们把这面墙称作“名人涂画”，并争相在这几百平米大、高清的、光秃秃的墙面上展示自己的绘画技术。具有迷幻效果的格斗中的吸火怪兽、有神秘的说唱乐的首字母、有摆着胜利者反抗姿势的巴特·辛普森（Bart Simpson）的表演，应有尽有。一些最优秀的艺术家可以把他们的作品“片段”保留好几周时间，直到被一些竞争者和嫉妒他们的后来者抹掉。街道文化审美在这一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上相敌对的别样的环境下，坚定自信地取得了胜利。人类创造力的奇迹和美学天才，似乎在表现绝望和压抑时才能够彰显出来。校园里冰冷、灰色的水泥墙面没有一处是空着的。

在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眼里，凯撒是一位个人恐怖和机制衰颓的代表。他的逃学对大家来说是种解脱。问题是，即使他真的旷课，他的时间也还是在校园里度过。

凯撒：有天早上我迟到了，那个叫华盛顿的老师气个半死。

我也生气了，在心里面嘀咕着：

“我真想抓把椅子，砸烂他的头。”

我一直这样想，直到后来看见一个名叫托托的小孩就不再想了。他也是个古怪的家伙。

普莱姆的女友杰茜：(插话说)他已经死了，是被人杀死的。

凯撒：(点了点头)于是我说：“妈的，我要去监狱了，因为我也是个犯过罪的贼。”

于是我抓起椅子向那个老师走过去——他正在黑板上写字——我走近他，从背后向他砸过去，砸断了他的胳膊(我们四个都笑了)。

普莱姆：你有病啊，你这个黑鬼，我可从来没用椅子砸过老师的头。

凯撒：我只是把椅子给砸裂了，没有断。我恨死那个老师了。

普莱姆：我也恨老师，经常想着要杀掉他，不过还没到那种地步。

凯撒：你记得那个跳踢踏舞的老师吗？瘦得像猴似的？蠢猪一个！我们当时想着要搞她呢！

杰茜：好啊，小子！你他妈的可真够狠的。

凯撒：还有那个狗杂种科学老师，走起路来内八字，叫普尔先生(Mr. Poole)，看起来有点神经质。每天放学后我们都在公园等着去抢劫他。

但他从来都没有告发过我们，根本就没怀疑到我。

我们在他的教室里点火玩，把教室给烧毁了。是我和几个黑人孩子干的，搞得全校的学生不得不离开学校。

普莱姆：没人愿教我们这个班，学校请来些代课教师。我们用橡皮、纸团扔他们，经常把他们从教室里赶出去。

那时我还经常无故旷课，高中时从来不让我妈看我的学习登记卡，不想让她见到我的那些旷课、迟到、早退什么的。

凯撒：我压根就不去学校。我喜欢去体操房，然后吃午饭，下午去找女孩玩——但我上午从来没去过。

不，我撒谎了。我们经常去学校欺负那些接受特殊教育的黑人孩子，踹他们的屁股。学校里有一些弱智学生，走起路来像这样（模仿起那些患先天性脑瘫的孩子），我们经常打他们，欺负他们，因为我们讨厌他们。

有个叫鲁克斯的小孩走起路来怪模怪样的，我们经常用脚踢他（普莱姆和杰茜都笑了）。

上午大家一来都去看他、打他，就这样“啪、啪、啪”的拍他（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不像话！（看到我的怒容）我们对那个孩子太狠了。

有一天，我们找来一根长绳，假装要把他吊死在体操房。我们把他往上一拉，看见他被勒得直咳嗽，又把他放下来。

还有一次，我们从科学课上偷来一把橡皮锤敲他的头。

普莱姆：（看到了我的面部表情）你这个混蛋！凯撒。

凯撒：（也注意到我的表情）我们狠劲踢他的屁股，他竟然走路正常了。过了一段时间，他还交了一帮朋友。

普莱姆：（可能想到两个月前我一岁的儿子患了脑瘫）他、他、他……（双手抓着我的肩膀）他后来入了一个团伙，菲利普。

菲利普：（忍住眼泪，清了清嗓子）他、他、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凯撒：（有点不好意思）他走起路来有点怪，（有意刮刮他的拇指）但不太严重。他开始吸毒……玩女人。（也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那个家伙竟敢玩我的女人，菲利普！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凌晨两点钟的这次谈话，那是在街道上头一次亲自面对暂不做道德评判的人类学方法学所告诫的矛盾。当时我仍然处在怎样面对我儿子身体挑战的恐慌之中，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凯撒的残忍和野蛮。值得注意的是，他那出乎寻常地想通过男人间的亲密关系来安抚我的举动，随即揭开了另一个以性别为基础的残暴的潘多拉的盒子，这种残暴更是在人类学熏陶下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的我所无法接受的。这次谈话结束前，我麻木的双耳和悸动的情感已经被校园里的强奸事件所震惊。我真真切切地记得，我一直在努力说服自己他只是用隐喻、在夸大其词。直到几年后，我才有勇气或者说有胆量，还有对游戏厅里这帮毒贩的尊重，收集了一系列青少年轮奸事件。

凯撒：我们经常砸开锁跑到楼顶，搞妓女玩。

杰茜：你这个畜生！

普莱姆：闭嘴，你这个蠢货！

普莱姆：（哄着我说）不可能，凯撒，你肯定在夸大其词。你不会是真的强暴她们吧？

凯撒：（笑笑，把一个空瓶扔向10英尺高用漆喷成的灰色的龙身上）我的女人被强奸了，一群人。

普莱姆：（担心地看着我）别说了，伙计。

凯撒：（换了种口气）（此处删去两句）我说，我渴了，咱去搞点啤酒喝吧。

中学里学到的街道技能

普莱姆对学校的抵触，使他被圈定在“低智商”、不受欢迎的班级，凯撒的凶残则把自己拘禁于沃兹岛上的医院里。在这所专门为疯狂犯罪的人开设的具有特殊教育设备的实验性医院里，心理学家首次尝试用镇静剂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试验。那个时候也是凯撒对社保依赖的开始。从那以后，他一直按月接受联邦政府的补贴，只在他找到那份稳定合法的工作期间停了三四个月。

凯撒：他们认为我“精神不正常”，因为我的行为太野蛮，所以得接受特殊教育。

（几乎是他的胸腔里喷发而出）我成了接受特殊教育的人，菲利普。于是我慢慢有了毒瘾——因为我狂躁不安。

狗屁！我接受的特殊教育比我上高中时学的东西还多。通过特殊教育，我读了一些书。

我接受特殊教育的原因是，有一天我犯了毒瘾。那时候科学老师一直在找我的茬，吸了几口之后，我跟我那帮伙计们一起发飙：我拿起一把剪刀，抓起他的领带，向着这个狗东西刺过去。

很有趣，随后校长问我：“你怎么干这种蠢事？”我告诉他：“因为……”我说了什么来着？——啊，对了。我说：“我听到一些噪声。”我说我听到一些噪声，那其实是他们让我服过氯丙嗪（一种镇静剂）后我听到的声音。

我被送到沃兹岛上一所学校接受特殊教育。沃兹岛是关押各种精神病人

的地方，那里的所有人都在服用氯丙嗪。他们用西班牙小孩和黑人小孩做病理试验。我们都得服用，成了那些毒品的试验基地。小孩子们被迫服用各种毒品，真的！

在那里待了三年后，我回归主流，跑到这里来了。

作为一个精神残疾、情感残缺的社保接受者，凯撒“未来的事业”在最初的学生时代已经打造成了。当然，像大多数人一样，个人和社会因素共同认定了凯撒这个绝对癫狂的疯子。他对于我指责他懒得工作的懊悔反应，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凯撒：你说得没错，菲利普。我总在找借口不去工作：因为医院的事（他第二次自杀未遂，刚刚从大都会医院出来）^[3]，后来又是我妹妹的事儿（她妹妹在楼梯口被刺了17刀）。

凯撒的无能并没有把他从社交圈里孤立起来，相反，却为他平添了中产阶级身份的荣耀。在三个和他母亲生过孩子的男人中间，他的父亲，一位萨尔撒歌曲歌手，是唯一一位没资格领取伤残补贴的人。

凯撒：我们过得相当好！像中产阶级一样。我外婆退休了，她享受社保金，我弟弟从他父亲的社保金里拿钱。然后是我姐姐——在她活着时，她也可以从她父亲的社保里得到钱，所以我们从来没遇到过问题。

穷人什么东西都买不起。他们缺吃少穿，不得不买便宜货。可我们比较中产阶级，不管什么，都可以随时买。

普莱姆在地下经济中的“未来事业”也是在学校时奠定或是学会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楼道里度过的，那里是粗暴的市中心学校唯一不受老师控制的地方。他最重要的课程是卖毒和吸毒。在另一个班的少数民族群环境下，幼年时代校园里酒精化的自传性回忆，很可能会引发出一些顽皮的恶作剧故事，偶尔也会冒出些进攻性的暴力事件。但在名人涂画天井院内，“正常”的青春期的反抗和严肃的犯罪之间的平衡却被彻底打乱了。

普莱姆：我经常被老师从教室里赶出来，站在楼道里。因为“我是狗娘养的”。我在课堂上太爱说话、爱骚扰女生、爱在课桌上乱画——我的整个课桌都被我画满了。

我们在过道上玩。一天我们在吸大麻，看见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泥土，刚刚被人送过来。我们说：“嗨，不就是些泥土嘛？”结果把它扔得满校园都是。

凯撒：（放肆地说）我们三五成群，在楼道里乱跑。有一次在第16出口，看见两个黑人小孩。他们是从街上过来的，很脏，地板上放着69块钱，我们二话没说跑过去就把他们赶走了。

普莱姆：我们那时候在学校可是什么都干。我们用一把控制灯的特殊钥匙，把地下室的灯一关，整个地下室都成了我们的。大家开始在那里闲荡，我还在那里卖烟，所以大家都吸，躲在更衣室里吸大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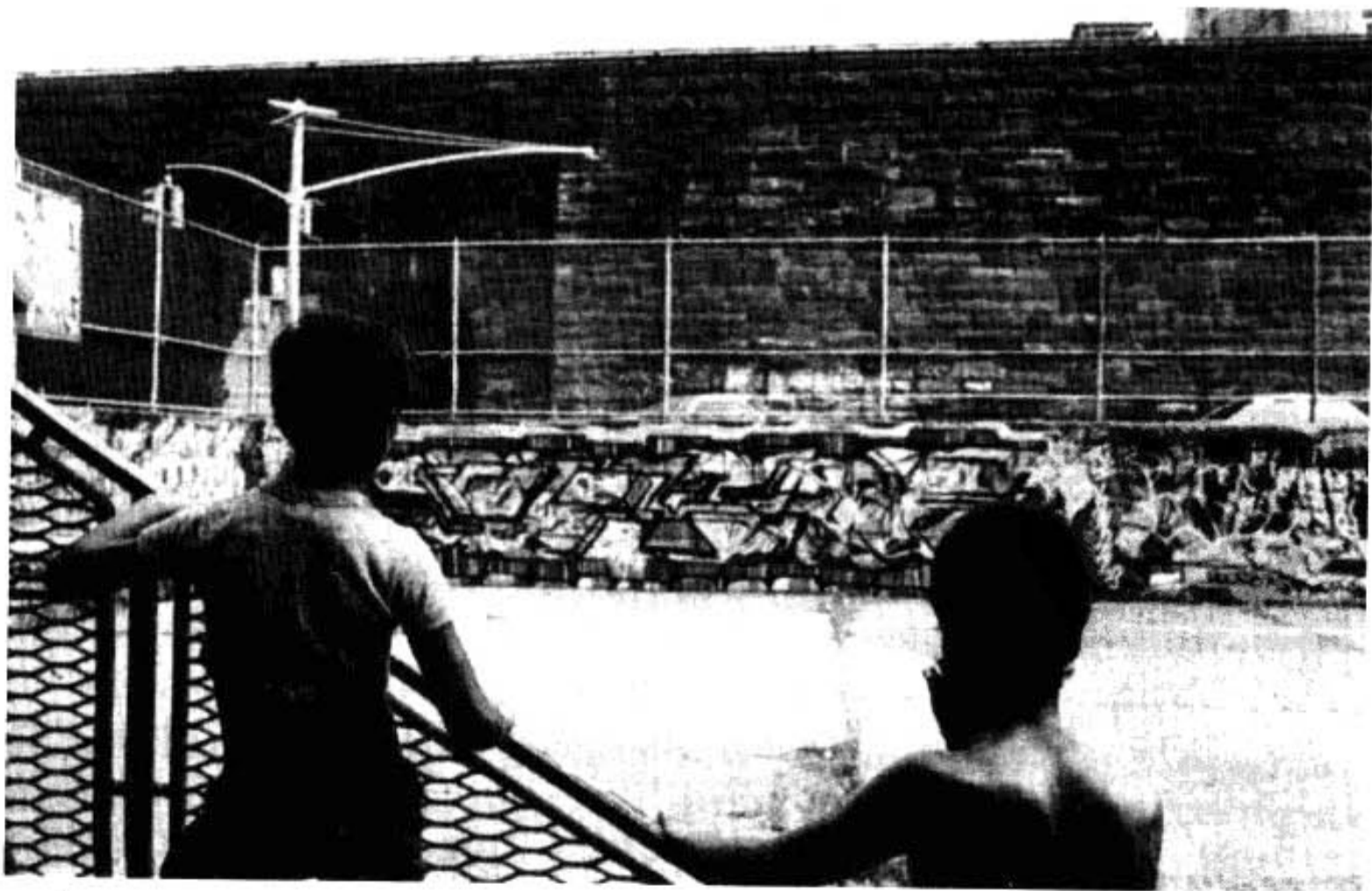
我经常带10包烟，能卖掉三四包，挣不了多少钱，剩下的都给我吸了，但不管挣多挣少，第二天我都会拿去为自己买烟。

菲利普：杰茜，你怎么样？高中上完了吗？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杰茜：不要吧！我也是到处浪荡。我怀孕后就不再上学了。

凯撒：（插话）我从来没用过含有大麻的香烟。我是个接受特殊教育的愚蠢的黑鬼。但那时吸毒挺厉害的，成了花花公子。我不再乱来，我有女人：我是个男人。我们一帮人经常在一起掷骰子玩。

普莱姆：我也是。我也喜欢掷骰子玩。有一次我们跑到屋顶上向街上的



观看 Fame 里面的涂鸦大厅。照片提供：Henry Chalfant。

行人扔苹果玩。

凯撒：(打断他)我在那儿还扔空瓶子玩过呢！有一次我在屋顶上拉屎。大家都光着屁股，我就说，咱来点吸引人的吧！

我们九个人都光着屁股，一字排开，我在那儿开始拉屎。结果引起全校人的愤慨，都想赶我们走。

除了“愚蠢的行为”这一主题，凯撒突然话题一转，说起了诸如用稀一点的流体把鸽子浸泡过后放在火上变成“哈雷彗星”和“跑动的烤肉”，在狗尾巴上绑上砖块扔到东河里淹死；把猫从屋顶上扔下来等一系列故事。他似乎是想让大家通过他的“人格失调”，进而对其暴力和侵犯做冷静分析。说实话，我在录制这些内容时，很担心我在本书中不仅不能分析出街道生活中暴力产生的社会环境，而且还会被迫发表一些个人的心理分析。凯撒结束他这次长篇大论之后问我，“怎么样？菲利普？你从来就没有杀死过动物或把猫从屋顶上扔下去后看它落地的样子？”(笑了笑)我只好说：“说真的，我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也太他妈的残忍了吧。”让我失望的是，普莱姆和杰茜却没有支持我对凯撒的谴责，只管一个劲儿地在那儿发笑。

当天晚上我们离开校园去喝啤酒时，我禁不住再次为周围水泥墙上的涂画所展现的精湛的绘画艺术和丰富的创造力和生动性所震撼。在过去两代人中，这所学校已经成功地把几百个像普莱姆、凯撒甚至杰茜这样的学生输送到毒品的经营、吸食、社保和单身母亲行列。普莱姆学会偷钥匙以控制地下室的电力系统，建起“卖大麻”的商店时，已经掌握了毒品买卖所必须的创业技术。凯撒通过承认他听到的某种声音，学会了吸氯丙嗪，为他的狂怒和暴力辩解，甚至杰茜也通过怀孕，学会了逃离失败、无聊和失业所需要的生存技巧。

同龄人群

显而易见，学校是把孩子们推向街道文化和地下经济的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但它无论如何也不是唯一的社会机构。当问起这些毒贩为什么会沦落到街道上来时，大多数人都抱怨他们的同龄人。说真的，从校园里与普莱姆和凯撒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他们几乎没上过课。上学期间倒是学了很多东西，但没有一样与学术有关。更重要的是，在粗野的学校氛围中，他们把时间都花费在培养自己的街道身份上来了。

凯撒：我们经常逃学，跑到商业中心去偷东西，什么汽车、轮胎之类的东西。

大家都很任性，个个性情暴烈。我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想做个乏味的人。我把狂野想象成精明，所以也就习惯了。我经常惹麻烦，干一些很恶劣的事情。

我一直想寻找一种形象，比如邪恶一点的。我们穿着肯加衣裙（Kangos，源于非洲妇女的衣着，用一条长布包缠身躯而成。——译注），戴着耳环、珠宝，穿着皮夹克，笔挺的筒靴、皮裤，手里拿着大大的收音机。我们抽雪茄，喝啤酒，在时代广场闲逛；心里充满仇恨；对着麦克狂吼等等。

从罪过的结果和作用来说，普莱姆比凯撒的罪过要更大一些。他不只是追求一种“邪恶”的形象和玩世不恭——比他大一些的同龄人，用近似学徒般的态度把他收编到街道犯罪的行列里去。

普莱姆：知道吧？我和我表哥的事？我还是个小黑鬼，他们已经在偷窃了。我大约 11 岁——不，错了，10 岁时开始偷抢，是个无知的傻瓜。我和表哥海克特（Hector）在自己住的生活区里偷东西。

我妈经常警告我别这样做，可我喜欢和表哥在街上混。他们教会了我怎样钻进汽车，怎样破门而入，怎样撬锁。瑞经常教我们这些本领。

当时我们一般都是偷汽车里的收音机。我和刘易斯塔帮，干得很成功。我们不再去自己的社区偷，而是跑到商业区……去偷那些黑人大款的大汽车。

我成了汽车盗窃中的一员，还有我表哥，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成了商业区令人头疼的一件事。

所以后来他们专门在车上放一个盒子，上面写着：“没有收音机”。

商业区的警察已经掌握了我们的情况，街区里所有的巡警都认识我们。我们有时还和他们聊天呢。

普莱姆唯一一次越过哈莱姆东区和上东部之间隐形的界线就是去偷窃。记得我们有一次闲谈，他说他知道惠特曼博物馆的地址，当时我很吃惊。我问他是怎样看待那里众多文化含量很高的现代艺术机构时，他说他没有进去过。“我经常和刘易斯一块去那儿偷汽车里的收音机。那里环境不错。郊区的笨家伙们把豪华的汽车停在角落，为偷车的人提供了很好的藏身之处。”

偷汽车是从少年成长为大胆的年轻人的一种值得记忆的仪式，也为他们报复既限制又挑逗哈莱姆东区的第96条街南边富裕的白人邻居提供了一些机会。

普莱姆：刘易斯经常让我做眼线，因为我没经验。可我光想着学成后自己单干。

有一次，当刘易斯把一辆大汽车上的扬声器卸下来后，对我说：“好吧！这下看你的了！”

第一次确实挺难的，我没卸下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刘易斯肯定是拿这个有难度的活来考验我。

我拿起一个长把钳子——这是偷汽车里的收音机必备的工具——还是不行。我就把钳子塞进放收音机的盒子里，用劲猛撬，结果把整个汽车的系统都搞坏了。最后我卸走了收音机旋钮，后来把它给扔掉了。

那个收音机相当不错，是布劳旁克特牌的——不知道你听说过这个牌子没有。车主肯定会说（摇摇头，很愤慨地说）：“见鬼！这帮狗杂种。”

当时我就想：“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那时我真是年轻无知而愚蠢的白痴。太刺激了，当时我们从车上跳下来后还大笑了起来。

尽管普莱姆的母亲责怪他的朋友对他的“坏影响”很及时，但强大的经济规则和以性别为基础来界定青春期男孩子行为尊严的事实，驱使他早已开始小偷小摸。正如前一章所述，普莱姆母亲作为一名缝纫女工的收入——不算她领的福利和食物券补贴——满足不了普莱姆孩童时对运动鞋、糖果，以及偶尔想要的美国北部郊区10—11岁孩子习以为常的漫画书的需求。偷抢富裕邻居的经济逻辑和街道文化身份整合在了一起。实际上，普莱姆离开家和他离开学校几乎是同一时间。

普莱姆：我整天想着钱，因为想买一些自己需要的小东西，知道吧？就是那些小玩意。没有的东西，你都想要。也就是一些垃圾玩意儿。比如一包威克斯止咳浆。我真的忘了，反正不是因为犯了毒瘾。（停下来吸了一次可卡因）或者想要一双新运动鞋……一些小零食，或者就想口袋里有钱花。

我那时挺节约的，用钱很省。多数情况下只买食物和衣服，我们没有毒瘾，但我们需要钱。

我们把偷来的东西一点点地卖掉，问别人要不要这个，要不要那个。

大伙都想有个无线电收音机，伙计。我们出售得很便宜很便宜。

菲利普：你母亲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吗？

普莱姆：她不允许。我不是那种张口要的人，只想自己挣钱买。

我是说她要看看我的运动鞋是不是很破了，不过我不会去求她。我姐姐们经常这样做，但我不会。

菲利普：她后来注意到你有钱买东西了吗？

普莱姆：我不会让她知道的。每次等她睡了我才进门，回来时带个包，把偷来的东西全放在包里。如果是上午回来，就很快溜进我的房间。

但后来还是被她发现了，她快气死了。有时我把房门锁上。她恨我、骂我，但我一点都听不进去。

菲利普：你整夜不回家她不担心吗？

普拉姆：当然担心了，还有我姐姐们——每个人都在担心我。她们对我说：“你最好回来吧，普莱姆。你已经三四天没回家了，回来换换衣服。”

菲利普：那你晚上都在哪儿过夜？

普莱姆：随便什么地方，和女孩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小房间，在俱乐部的顶层。有时还跑到楼房的后面去。我们在什么地方都有住的公寓，妓女也到处都是。太放荡了，兄弟。

凯撒和家的联系显得更脆弱，但他不干小偷小摸的事。事实上，大家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和那帮同龄人很稳定地打成一片。凯撒用他一贯的吸毒行为，以及作为年轻人无法遏制的坏习性，赞颂着街道文化中公开、粗暴的一面。他在炫耀性的消费方面表现得与众不同。请看下面的例子：

凯撒：对，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就想穿好的，想穿新运动鞋，想把头发梳得光光的，想去跳舞等等，我喜欢这些。

我不算奢侈，就是有点小钱而已，都拿去买东西了，比如磁带什么的。我买磁带上瘾。音乐！那可是我的第一瘾。我是伴着收音机长大的。衣服是我的第二大瘾，每周我都买新衣服。

菲利普：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干的？

普莱姆：我不是。我只干大男孩常干的事。因为我总跟在他们后面瞎混，我妈很在意这个。

从汽车里偷东西时，我脑子里总有一种声音：“我妈不喜欢我干这个。”当我把偷来的东西带回家时，她会知道那不是我挣来的，我还得把它们藏起来，万一让她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自己在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也知道回到家要是被发现会挨打的。

少年时的不幸和市中心的狂怒

尽管普莱姆事后回忆起来有种犯罪感，但犯罪对于他这样一位发育过早的11岁中学生来说可是家常便饭。比如偷收音机和玩耍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换成另一个班级和种族环境，普莱姆的行为很可能被当成无伤大雅的捣蛋调皮，他母亲无非也就是说他一句“太淘气了”而已。说真的，普莱姆的母亲说起她在甘蔗种植园里的成长经历时还真提到了这一点：

普莱姆的母亲：（用西语）小伙子，我们真的干过很多坏事。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有男孩，也有女孩，来到一家长着很多芒果树的农场。大概有十几棵，可我们家连一棵也没有。那里离我们家很远。

那是个私人农场，你知道我们一帮人是怎么进去的吗？我们结伙一起过去藏起来。

我们是背着爷爷去的，毕竟是偷东西。我们藏在芒果树附近，因为那个家伙有枪，有一次我们还差点吃到枪子。那些芒果长得真不错，粉红色的，香气扑鼻。我用石块把芒果砸下来，男孩们再去从地上捡回来。发现有人出来，我们就一起跑掉。

小伙子，我们真的没少干坏事！我们还偷过甘蔗，一般是等到天黑下来之后才去的，还会留下一人放哨。

我们得偷偷吃，如果被爷爷发现了，他会很生气。他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是让他知道了，非打我们不可。

所以说，我们不是小圣人，我们也做过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我们还偷过邻居家的玉米棒子。生上火，把玉米棒子直接放在上面烤熟吃。

但吃过的玉米很快会被发现，大人们都烦死我们了。

那时我十四、五、六岁，我是十七岁时来到这里的。

来自家庭和社区的社会控制和压迫，对于三四十年代波多黎各农村与70年代纽约市中心不守规矩的孩子来说，显然有着质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14岁的小孩来说，贪吃甜食、赤着脚去偷粉红色的芒果，与为了有钱买威克斯止咳浆或“时髦”的衣服、穿着肮脏的运动鞋去偷汽车里的收音机，其后果全然不同。然而这两种行为本身的象征意义却是相同的——早熟的幼年时代的调皮捣蛋。到了十五六岁年纪，当毒品很容易买到且成为颇受人们青睐的娱乐产品时，在相对而言生计艰难、商品紧缺的种植园经济条件下长大的孩子，和出生在美国城市中心工业衰退时期的城市金钱主义环境下的孩子之间的表现就会大相径庭。普莱姆作为一个青少年，在第二代城市移民环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很快就从幼年时偷汽车里的收音机过渡到真正地偷盗公寓房：

对，后来我成了盗窃犯。第一次去偷窃时我才11岁。当时我很兴奋，很想干。

我从来没被抓住过。我偷过一个舞蹈排练房、一个储备酒的仓库、两个药店。我们把那里一扫而光，现金、酒……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

那个药店的顶部是一座死楼，就是被废弃的楼房。我们带着手电筒从另一栋楼上面翻过去，在地板上掏了三个洞（用手比划着），从天花板上跳下去，结果警报响了，警察很快来了，主人也赶到了。

那是个无声警报器，带着枪的主人还没走远。我们是一些小孩子（举起双手假装害怕的样子），看见警察和枪，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我们赶紧跳出来跑走，等他们打开门从洞里往外望时，我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其实天黑之后没人敢走进那栋楼里，那是个完全被废弃的楼房，里面空荡荡的，很破旧，像个古迹，很古老。

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才跑出来，把偷来的东西藏在我表哥的小屋子里。很倒霉，我们出手时被抓住了，因为我们是一帮小黑鬼，我那时才12或13岁。

菲利普：兄弟，你那时还叫小孩吗？

普莱姆：我做的最后一件坏事是16岁那年干的。我和刘易斯、帕皮特，也就是瑞现在这位妻子的弟弟，我们计划好到商业区偷一家家电旁边的药店。

记不清是谁的主意了，当时我就想：“我不想去干，有点不太合适。”

结果到那里后，打不开锁。我们碰巧遇到从商业区回莱克星顿大街的瑞。他问我们：“你们在这儿干吗？”

我们给他说了，然后我还说：“见鬼！这帮人连个锁都打不开。”

瑞说：“小心点！小心点！”他拿来警察用的撬杠。（全身动了起来）砰！砰！两下，像切奶油似的把锁打开了。咯吱吱（大笑）地打开门，拿掉木板——窗户是用木板挡着的——放在一边，然后捡起一块石头，用布包住，向着窗户砸过去。

（停下来想了想）其实我也想那样干，就是用石头砸窗户，但不知什么原因，那时我没有那样的胆量。

可他们对我说：“不！”因为我还小，瘦儿吧唧的，根本砸不开；瑞砸第一次时，窗户根本就没烂。只是咯吱吱吱响，后来才发出爆裂声。

他再砸第二次，咚！咚！包着布的石头不会有太大的动静，你只能听见玻璃刺啦、刺啦的声音。

随后警报器响了，我们赶紧开始从窗户里抢东西。我看见一台盒式无线电电视机，很漂亮，是个彩电，但瑞“嗖”的一声从我的身下抢走了。我又去抢另一个，像个收音机和电视机，我上去拿，（慢慢举起胳膊让大家看他长长的伤疤，从腰部直到大拇指）结果我的手被玻璃划伤了。我知道我的手碰到了玻璃，但没想到会划伤。

后来我们赶紧跑，跑的时候我看见我手背上的肉往外翻着。我想：“我的上帝啊！皮没了。”

肌腱还连着——说真的，它们被卡住了，粘在收音机和其他东西上了，手怎么也伸不开。

我钻进汽车把东西放下，疼死我了。我坐在车的后排，把手背上的皮拉过来盖在肌腱上按着，说：“刘易斯，带我去医院吧，我受伤了。”

他说：“好的！帕皮特也受伤了。”帕皮特坐在前排，瑞坐在我的旁边，刘易斯开车。

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瓢泼似的。帕皮特疼得叫个不停。他的肌肉从这儿被撕开（指着他的手指），露出鲜红的肉。啊！（直打哆嗦）

我们来到第110条街瑞居住的地方，把赃物先藏起来，以免被调查发现。还算幸运，当时雨太大，现场没有一个人，太棒了！

我一直在流血，但那家伙根本就没流，可他却快吓晕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看见他的肉露出来给吓的。

但到了医院，没人理我，说是我还不到年龄。刘易斯和这些家伙们看起来很生气，他们并没反驳医生们不负责任。所以我只好忍着（假装用手捂着腰上的伤疤），帕皮特忍受不了都哭了。我说：“打住！你弄得我很紧张，狗娘养的！”

我开始谩骂起来，心里则在想：“耶稣上帝啊！这是报应，我不该干这种蠢事。”疼痛让我明白了我值得受疼，以后可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医院通知了我妈，于是我只能向我妈妈编造故事。我说我们在第110条街上和人打架了。你知道，有些家伙会拿刀子打架的。我还得把这些谎话写在医院的病历单上，说出真相前，我妈和姐姐们都被蒙在鼓里。

医生告诉我：“你的肌腱断了，撕裂了。”我不知道什么是肌腱，但可以确定的是需要做手术。他们选定了日期，给我做了手术，打上石膏。直到今天我这只手还不好使，弯不下来。

菲利普：从那以后你就没再偷过东西？

普莱姆：过了段时间，我不再干了，和我儿子他妈整天黏糊在一起。我们是青少年，但关系一直很稳定。我们找了份工作，就这样。

但瑞却一直在偷，自己单干。他比较壮实，有时可能还打伤人抢东西——或怎么样。

我的另一位表哥帕皮特在新泽西一带行窃，后来被关起来了。

我们穿过公建工程楼的院子去杂货店买啤酒时，听到从里面传来的枪声，便立刻停了下来，沿街绕道走了很长时间。有三个姑娘从我们身旁跑过，咯咯地笑着说：“这些黑鬼们简直是疯了。”

凯撒少年时的犯罪故事中弥漫着更凶暴的恼怒。他们缺少普莱姆偷盗汽车和行窃时那一明显的、几乎是仪式化的同龄人之间的团结互助，这一点象征性地表现为他们对行窃这件事的不同意见上。尽管普莱姆的一生中也干过几次偷窃的事，但他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每次谈到这个话题，凯撒都会嘲笑普莱姆的义愤填膺，并将其与其他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讽刺性地联系到一起。这一社会矛盾正是我想引导他们谈话指向的地方。他喜欢通过强调自己冷酷的精神变态，通过讽刺性地臆想出那个

种族化的概念“邪恶的波多黎各性”，来反驳我的结构和反种族主义的分析：

凯撒：我十五六岁时和表哥在一起鬼混，他那时刚刚从波多黎各回来。我们在纽黑文、康涅狄格州商业区的一个商场里蹓跶。我们当时很饿，又没有钱。于是我表哥说服我去抢钱包。

在一所医院旁边，我们看到一位老妇人，但我不敢下手。我对自己说：“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要上手了。”

我觉得时机不错，因为她正在等红灯。

我上前去抢，可她死活不放。我拽着她走了半个社区，她还是不松手。

我只好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她大概伤得挺厉害的，最后只好放弃了。

普莱姆：闭上你的臭嘴！凯撒。

凯撒：就像我说的那样（凑到普莱姆面前），我拖着她走了一会儿，她不松手我才用拳头打的。（比划着）后来我们跑了半个街区，来到一家人的后花园里，打开钱包一看，里面才有40美元。我给了他20，本来可以不给他的，因为是他不想干我才去干的。“狗日的！”

我们把那个狗日的白人老太太整惨了（脸扭曲成邪恶的表情，逗得我们全笑了）。

普莱姆：（生气地控制住笑）行凶抢劫，太无耻，太不像话了吧！

凯撒：（立即愤怒地回击普莱姆）你知道我为什么抢她吗？因为我绝望，我在康涅狄格，不是在纽约，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我还想杀了那个臭女人呢！——杀了她，因为我很绝望。

（提高嗓门）我是波多黎各人，我很可怕。我杀了那个狗日的，因为我需要钱痛快，需要钱吃饭。因为我是个狗屁不懂的疯子。那又怎么样？（对着普莱姆大叫。）

菲利普：她是个白人吗？

凯撒：（转过身躲着我）什么人都一样，我才不管他妈的波多黎各人、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我，（大喊着）就想杀死那个狗娘养的。

如果是黑人，我会待她更狠，就因为她是黑人，我恨黑人。

因为我一无所有。我他妈的是个种族主义者。^[4]

青春期的轮奸事件

见证了凯撒对暴力的称颂和无端的残忍至少让我很是困惑。然而我住在哈莱姆东区的第二年年末，就碰到了一件瑞社交圈子里的成员参与的更野蛮的学童社会化的一面——轮奸。我清楚地记得头天晚上，普莱姆告诉我，瑞和刘易斯以前经常在社交俱乐部毒品交易点所在的那栋楼里组织轮奸的事。游戏厅快关门时，他无意间谈起了这个话题，让我猝不及防。当时，这些少年性强暴事件让我陷入一种深深的沮丧和思想危机中。不仅如此，凯撒对于普莱姆赤裸裸的叙述所表现出的窥淫癖式的兴趣和庆幸，让我对这帮“朋友们”心生厌恶。我一直以为只有凯撒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所以总觉得普莱姆在我逐渐开始喜欢他并开始真正尊重他的时候欺骗了我。

普莱姆：我一人在外面闲逛，社区里没见一个人。我走在街上，四处静悄悄的。俱乐部在这儿（用手比划着），药店之角在那边，最后边有一栋公寓楼。

刘易斯站在窗前朝外望着：“普莱姆，想吃点什么吗？”我以为他会有比萨什么的。我说：“好的！”我马上就感到有点饿了。

但他朝窗外看看，然后把他那家伙从窗户里挺出来，吓了我一跳：“天哪！这狗娘养的！”

他们把钥匙扔下来，我上了楼。那里有萨博、刘易斯、Tootie、帕波、瑞，可能还有内格罗；五六个小伙子，还有那个女孩。

她全身裸着，手里拿瓶啤酒，那种40盎司大瓶装的，喊着、笑着。他们把她按在地上。

凯撒：唉！唉！这婊子在等着呢！

普莱姆：我打开门，帕波正在强暴她，其他人在围观。

（凯撒注意到了我极度厌恶的表情，转过身对我说）真的没那么严重，那个婊子手里拿着啤酒，还在那儿笑呢！

凯撒：唉！我的兄弟们是带着武力和仇恨强暴她的。

普莱姆：他走后——他不习惯和我们一起在外面浪荡，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重新锁上门，打开灯。她留了下来，免费的。就剩下我的同伴们了。

凯撒：你们这些黑鬼们在挑逗她。

普莱姆：(考虑到我的惊呆了的表情)她没有动，大家都把自己的家伙亮出来，扒拉下裤子，裸着下身在那儿等着。这帮人喜欢拿他们的家伙炫耀。

凯撒：(转身对着我，以为我不理解)他们是在逼她，菲利普。六个黑鬼在同一个屋里，同时挑逗她。

普莱姆：(看着我的身后)不包括我！他们让我上，但我说：“我才不想沾你们剩下的呢！不想染上淋病、疱疹之类的病。”

凯撒：上吧！

普莱姆：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一丝不挂。他们都对着我喊：“普莱姆，上！”他们按住她。

凯撒：上啊！

普莱姆：她体形很好看，兄弟。好极了。但我不愿意干这种女人。

最后我摸了摸她的胸和下半身，感觉还不错！但我是不会碰她的。

凯撒：他们是在故意挑逗她。

普莱姆：之后我洗了洗手，不过感觉蛮刺激的。

凯撒：(想再次挑起这个话题)他们那帮黑鬼们最喜欢玩漂亮姑娘。

普莱姆：她17岁了，已经是个女人了。她不是处女，只是一块肉而已——一块被弄脏的肉。

进行这次谈话时，尽管我已经在这条街上住了快三年，但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这一性暴力层面。我一直在反复地问自己，我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到底怎样才能可能严肃地对待这群“精神变态者”？从更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很迷惑，因为这帮强奸犯已经成了我的朋友。我开始喜欢这些老练的强奸犯中的大多数人了，这显然是个个例。我和敌人住在一起，它已经成了我的社交圈。不知不觉中，我被卷入街道文化的常识里，直到这些强暴事情出现我才不得不与他们划清界限。

从分析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想回避它或拒绝把他们的反社会行为视为反常规的行为已经为时过晚。我必须面对街道文化中强奸事件的盛行和正常化，面对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的社会化。无论如何，凯撒和普莱姆是我无法回避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像一层层剥葱头似的，他们给我讲起了一件件自己参与过的不同版本的性暴力事件。很少有人谈强奸——不管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一方。事实上，写强奸是一大忌，我试图删除对这部分的讨论以免引起读者对毒贩们的极度厌恶和愤恨，进而否定其人性的一面。作为男人，我也担心自己成为政治代言人。我所收集的这

些录音中，大部分来自于施暴者一方。我也录了部分受害者的陈述以便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我和这些个人之间认识和相处的时间有限，所以得不到他们足够的信任，因而也得不到一些有意义的细节和背景化的生活故事。^[5]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正如我在引言中提到的，我也担心无意间会开创一个侮辱穷人和无权利的人的论坛。美国读者潜意识中已经对其社会中的种族化习以为常，大多数人可能会把这些片段解读为某种对波多黎各社区的一种文化反映，但这种解读与本书的理论和政治论据是相抵触的，强奸与波多黎各人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作为一个白人男性科研人员，回避潜意识中的性禁忌，略去这一轮奸主题的讨论并不难。然而，我认为回避街道文化中的性暴力，无异于忽视性别歧视和与现状共谋。我们周围的强奸事件肆意猖獗，而社会却好像保持了一种可怕的共谋的缄默，从而更强化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受压迫的痛苦的一面。

学会做一个强暴者，是普莱姆成长历程中实实在在的一部分。跟在街上那些大男孩的身后，他一次又一次因年幼——或不想要——而被排斥在外。

普莱姆：那时候我还小，还没发育成熟。对我来说，干那种事太脏，所以不会为此而觉得失落，我没办法用。

他们和一个女孩上了楼，当然，他们都知道我不会太在意，于是问我：“你怎么办？回家还是……？”

去他妈的！我能做的就是走出来。“明天见，伙计们！”或者干脆就在楼下酒吧里等着。

可供普莱姆选择的，就是通过积极参与这一残暴的男性礼仪^[6]，和那些比他大一些的伙伴们混在一起。直到后来，普莱姆才学会了勃起。

我并没有真正参与他们的行动，但我也会野蛮，因为那婊子必须经过这一关。有时候我会用短棍之类的东西玩她，这样不管我们是谁，她都必须呆在屋里。

有时候那些大男孩会和她玩得很好，可一旦完事，她就惨了，得挨他们的打：“现在可搞定你了，婊子。”

我还在别人面前表演给他们看。人总会有好坏之分，兄弟。这位（抓着凯撒的肩膀）就是个卑鄙的家伙。你，我，（胳膊搭在我的肩上）是好人……我们不喜欢、不想打扰她。还有那边的刘易斯，（搂着刘易斯，他刚进来放下

新买的三大包“快克”，拿走收据）不坏也不好，但瑞（指着门口）绝对是最卑贱的家伙。

就这样，那婊子倒舒服了。我们解释给她听，我们就想玩玩而已。“那可正是你必须放弃的，你可得以自由为代价。”大家伙儿都在那儿；他们都说：“对！对！”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没有人再去干那种事了，现在想玩太方便了。

强暴者是在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比如普莱姆把他的同伴们强奸过的女孩划分为值和不值两类，还把他的那些男性伙伴的性堕落归罪到女孩身上。尽管他试图解释这些女孩中有的心甘情愿接受强奸——甚至很享受，就像他在这一节第一次提到的那件事一样——但当具体面对这件事时，普莱姆承认，最终还是暴力和身体的恐怖才促成这种事的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下面这段录音被一阵枪声打断，好像是在用一种与性别无关的行为阐释日常街道交往中危及生命的暴力无处不在。

普莱姆：我还记得是怎么回事，那时我还小。我觉得，很可能那些再也没回来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些创伤，他们会永远把它隐藏在心底，一辈子，永远也不会说出来。他们回到家，把它冷冻起来，当做一生的秘密。（防卫性地看着我）我有时感到很愧疚，有时也为她们感到很遗憾。

但有些婊子确实还挺实际的，她们还会再回来浪荡。我猜想那是因为在街上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现在想通了，随便：“我得放松一下。”

菲利普：（打断他的话）得了，兄弟。别胡扯了，谁会愿意重复那样的经历。

普莱姆：（慢慢地说）嗨，……那是她们的意思，菲利普。我是说，或许第一次她们不接受，有时还会抹眼泪，不想被强迫。

凯撒：（嘲笑普莱姆的慌乱和我的愤怒）她们是被逼的，但她们喜欢；还想再要点：因为她们上瘾了，习惯了：“我现在搞定你了，婊子。”

菲利普：你他妈的有病吧你！（枪声过后，听见有人的跑动声。）

普莱姆：不要这样！你得理解，菲利普。即便她们说不，实际上也很乐意。

凯撒：（在游戏厅门外插话）喂！喂！调查一下这个吧，菲利普。给我（从我手里拿走录音机），我要对着麦克说：杀人了，刚从我们旁边跑过去。

普莱姆：（没理他的话）有些女孩最后还和男孩好上了，或许还生了孩子

什么的。这都是整个完事后事情——每个人——都玩过之后。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母狗，她想要刘易斯，因为他能把她搞得要多爽有多爽。她是个年青的母狗，她喜欢刘易斯的大玩意。她爱上了刘易斯的那玩意。

……………（删去四行）

刘易斯干事时老爱说：“哒！哒！哒！梆！梆！梆！”¹⁷¹

他最喜欢的是：他做，让我们在一边看。我知道，有时我也会爬上去的。

菲利普：[再次打断] 闭上你的臭嘴！你见鬼去吧！

普莱姆没理会我的反应，接着讲起刘易斯和那个女孩是怎样调整姿势，以满足他的那些有窥淫癖的同伴们的兴趣。

普莱姆讲述的这些，证明了这帮强奸团伙中也有同性恋现象存在。

为了让他意识到他和同伴们对周围女孩带来的危机感和痛苦，我试着用家庭荣耀中的父权逻辑唤起他的良知。

菲利普：你难道没想到过这些事会发生在你母亲和姐姐身上吗？

普莱姆：见鬼！当然了。

但我知道她们是无辜的。我和刘易斯还讨论过这事，我们走在街上会说：“我们也有姐妹啊，兄弟！”

凯撒：所以如果我的女人怀孕，我永远都不想要女儿，我没法接受有了孩子，再看她成为婊子。我会自杀的。要是我有个小女孩，肯定会把她扔掉，连碰都不碰一下。真的！

普莱姆：（安慰我说）这样说吧！菲利普。那些婊子们都很年轻，也很蠢。如果她们老在外面游荡，应该知道我们很粗暴；如果她们还那样，我们就明白可以搞定她们了。

菲利普：你说的全是屁话！难道她们都是性变态者？

普莱姆：（很困惑没能说服我）我是说，看看她们的态度，如果她们在外面混的时间太长，相信我，她们肯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瑞和那帮小子会把她们推到一边，因为我们有她的信任；这样一来，也就比较容易让她跟我们所有人玩。

不过，如果她不愿意，会挨揍的。

在有些谈话中，特别是凯撒不在场时，普莱姆对我的公开谴责会表现得很懊悔。即使他的反应完全是为了不伤害我，但却仍然维护着他的同伴们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的逻辑。

普莱姆：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时，都会感到很心虚。回到家看到我妈和姐姐们，我会觉得很难过。

这帮该死的女孩子真不要脸。如果她们是好女孩，那我们不就把她们给毁了吗？现在想起来，她们大概也就是12岁到16岁之间。一堆蠢货！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小女孩没什么两样。

菲利普：让你不安了？

普莱姆：是的，一直让我不安，菲利普。我都快要烦死了，恨死了。我总听见有人说：“不，不要！”

但总也忘不掉。不过我从来没给任何人讲过。（闷闷不乐地）我真希望当时能劝劝他们不要那样做！

我还曾扮演过这群女孩的精神病医生的角色，真的，菲利普。我应该向她们收费才对！她们经常来找我，让我给她们一些建议什么的。比如“在你的生活被完全毁掉之前赶紧离开这里吧！”

但就像你说的那样（向刚走进来认真听我们谈话的凯撒点了点头），她们乐意。

普莱姆那些年长的行为榜样所精心策划的针对女性的暴力，最终给他们已被内化的卑微感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普莱姆：我们也常常谈论这个话题，这些女人们生来就是来捣乱的，因为她们想和我们鬼混。

而我们又能给她们些什么呢？什么也拿不出来！我们总想找到答案。

凯撒：我们什么也不干！那些骚货们真够笨的，竟然和我们混荡到一起。

第六章

重画街道上的性别线

我经常听信他的谎言。我甚至还支持他，但当我醒来，闻到像他们说的咖啡味（别的女人身上的味道）。我向他开了枪。

——凯蒂

上一章我们讨论过的轮奸事件并非一帮边缘群体病态的性施虐狂的野蛮行为，相反，他们为我们从知情者的角度认识街道文化中的厌女症和日常暴力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视角。在遍布哈莱姆东区的性暴力事件中，最令人想起来揪心的一件事情是由我们的邻居、11岁的安杰尔向我和我的妻子说起的。有一次我们随意谈到他上学及他母亲的身孕等无关痛痒的事情时，他告诉我们他希望母亲生个男孩，“女孩太容易被强暴了”。

危机中见证父权制

单独谈论毒贩们对轮奸的讲述可能多少会令读者感到恼怒或失望，但街道上的女性并不会因恐惧而恐慌。相反，正如她们处在美国大多数阶级和族群中，遍及大部分非基要主义的世界一样，在哈莱姆东区，她们也在为自己谋求更大的自主和权利。这里的女儿、姐妹和妻子，不再会为了适应街道生活或是为了在地下经济中追求事业而像过去那样畏惧权势，甘愿受欺凌、随意被打骂、经常“被送上楼”。正如历史上各种权势在对抗性的团体之间来回替换一样，女性为自己开辟新天地的复杂过程，充满着矛盾的后果和人类的苦痛，而并未改观的男性统治更是进一步恶化了这一苦痛。就像长期以来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所关注的那样，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妇女的斗争及其成果，皆被框定在个人权利之内，从而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



女孩们在玩棍球——为女性谋求空间。照片提供：菲利普·布儒瓦。

父权的“实践模式”。¹¹¹

随着街道上的男人丧失在家中的权威，他们对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妇女和孩子展开了猛烈反攻。男人们不接受女性正在获得的新的权利和角色，相反，他们竭力维持其祖父母们已经失去的对于家庭及公共领域的独裁统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哈莱姆东区或地球上任何角落的女性们，为了争取更大的权利而激发了男人针对自己的暴力。这种“受害者受谴责”的阐释，不仅是对以前父权现状的稳定性的吹捧，也使得全球范围内性别关系中长期以来宏大的结构转换更具个人特色，即使这种进步性的变化与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及大多数以盎格鲁为中心的霸权意识密切相关。

以波多黎各人为例，男女之间权力关系的转变，与因男人转变为农村乡巴佬身份之后由制度导致的传统意义上性别作用的突变混合在一起，威胁着后工业社会中美国城市所遭遇的失业和社会边缘化。单单以男人的生产力来界定波多黎各人在流散的过程中、特别是市中心贫民区中的老式的家庭经济，早已受到批评家的围攻和质疑。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意识在还没有摆脱农村平坦的甘蔗种植园、高原上的畜牧业社区，或是城市贫民窟的理想化的记忆之前，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禁锢在一个个独立的公建工程的塔楼中，被自己不认识或不信任的人包围着。纽约城的商业金融区和由公共服务部门控制的经济，是不会提供给高中辍学、想靠一项工资

收入来养活一个四口之家的工人阶级的待遇的。传统的、大型的、男性控制的“西班牙式的理想”家庭，被那些出生于纽约市、最具反抗意识的新一代男女们认定为是一种过时的观念。

在第四章讨论合法职业时我们已经指出，已经沦落成无能的、经济上失败的男性家长们，面对的是对自己男性尊严造成急剧冲击的历史性的结构上的快速转换。更糟糕的是，有望调节这一创伤的日益稳定的社区机制，在美国市中心是根本不存在的。男人们在敌对的真空中为维持其祖父母曾经拥有的权力，做着激烈的争斗。哈莱姆东区的父权危机具体表现为家庭暴力和性虐待两大方面。^[2]

我在尝试记录这一长期的性别关系的转换过程中，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男性，我如何才能与那里的女性发展一种像男人一样深厚的友谊，进而走进她们的世界，把她们的谈话录下来。在波多黎各街道文化的背景下，这种超越性别界线，与她们进行直接、公开而又不失礼节的谈话是一种更大的挑战，因为上一代人中以家庭为基础的男子独裁主义被重新界定为对性忠贞、乱交和公开展示男权几个方面的关注。尽管我和妻子在社区也有不少女性朋友，我也录制了至少12位女性的生活经历，但只有在和凯蒂的交往中，我才可以记录下她坦诚的、背景化的谈话，以探讨性别权利关系转换这一复杂的主题。选择凯蒂的优势还在于，她是瑞社交圈里仅有的两名女性雇员之一，也是瑞童年的好友。实际上，第三章讨论快克的经营管理时我曾提到过，凯蒂开枪射杀她的丈夫菲力克斯——游戏厅原来的主人——然后把游戏厅授权给瑞经营的事。

与此同时，凯蒂本身并没有什么“典型”的特质。相反，她颇具个人魅力，在生活中遭遇到的暴力比大多数人都要多。然而，作为女性的她，能在街面上赢得他人敬重的经历，却充分体现了性别权利转换在街道文化中被重新界定这一矛盾的过程。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遇到”凯蒂的那天晚上，那已经是我搬到那里一年后的事了。她驾驶着一辆超大的、装有染色玻璃的黑色轿车，斜侧着停靠在游戏厅前一个消防栓旁。要不是她那六个月的身孕，那条橘黄色紧身裤与那双黑色的高跟鞋还是蛮相称的。她骂骂咧咧地闯进游戏厅，压根儿就没注意到我的存在。她满口脏话，野蛮地甩动着她染过的金发的样子，我还以为她是为了钱的事在和谁吵架呢。我天真地认定作为毒贩妻子的她，肯定掌控着一大笔钱，以为她在街道上表现出的过分自信和安逸是用以炫耀她作为快克交易点的经理的能力。我仍然记得自己像个新手一样，根本搞不清她是在骂谁时的那种感觉。她连珠炮似的谩骂声中尽

是些“操他妈”、“狗日的”这样的词语和一些特别熟悉的绰号，像帕比托、帕皮、奈尔、波波斯、黑鬼、小子等混杂在一起，涵盖了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人。但让我放心的是，普莱姆似乎并没有被触怒，反而很同情地赞同着她说的每一句话。

我在街道上显然是个新手，我不知道如何识别当地“主要”毒贩的妻子的痛苦。我认识她最初的那几个月内，她总在生气。因为我妻子当时也有孕在身，我完全理解哈莱姆东区民俗理论中关于产前的心理压力。所以我落入性别歧视的圈套，认定她的恼怒只不过是纽约闷热的天气和产前荷尔蒙共同作用下的文化个例而已。

事实上，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与其生理上的变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她丈夫没有把钱花在可卡因，而是花在与他相好的女人身上，所以付不起3000美元的律师费。几个月前，他因向一个秘密特工出售可卡因被捕，巧合的是，就在事发前一天，一位宽厚的法官刚刚因他私藏枪支判他五年缓刑。他的监禁最后变成了立即执行，但他显然没有考虑给他怀孕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留下点积蓄。在非力克斯服刑期间，他的家人不得不依靠凯蒂的救济金和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养祖父亚伯拉罕的保险金维持生活。

后工业骚动中的家庭暴力

我用了两年时间才和凯蒂建立起一种信任和尊重的关系，得以用收录机记下她悲痛的生活故事，才意识到一个狂怒的孕妇在游戏厅的那些夜晚对着我们一群人威胁谩骂其实是那么的脆弱。最终打破僵局开始记录我们谈话的那天晚上，我小心翼翼地让自己待在游戏厅的眼线凯撒的视野之内，以免显得不太合适。事实上，在我认识凯蒂的这些年里，她从来没有单独来过我的住所和我谈话，让我录音。因为在她看来，那样做肯定会被人怀疑为不合适甚或是危险的行为。但这一点并没有阻止我们在街道上进行公开的、社会所允许的条件下安全而又很私密的谈话。凯蒂每次挥手让旁边的人走开时，他们都会尊重我们单独谈话的愿望，给我们以宽足的距离。在那些特殊的夜晚，坐在汽车的车棚上，我打开录音机放在我们中间，在夜半喧嚣的街道的掩护下开始交谈。¹³¹我伺机利用我们同为准父母这一背景，引导凯蒂讲起了她对母亲身份的乡巴佬式的赞誉。

凯蒂：我喜欢小孩，我相信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因为这个我才活到现在。

因为……你知道，你是怎样开始爱自己的母亲吗？直到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你才知道怎样去爱自己的母亲。我生过我的大女儿后才更爱我的母亲，那是我爱母亲的开始。

因为生过孩子后，……你看着他……那么一点儿，你会说，这么小的宝宝怎么会眨巴着嘴对你说：“妈妈，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他那么幼稚……那么天真。

你会看到很多虐待儿童的，可是孩子们懂个啥，他很天真、很无辜，所以我想生12个孩子。

（被我的表情逗乐了）真的，菲利普，我不骗你，我就是想生12个孩子。

第一次和凯蒂的单独谈话，话题很快就集中在她小时候受虐待的事情上去了。

凯蒂：我是个受虐待的女儿，我父亲经常打我。我们姊妹好几个，我是最丑的一个！

为什么？鬼才知道呢！

13岁那年，他狠狠地打了我一顿。他下手那么重，以至于我告诉他，“如果你再这样待我，我就结婚，离开你，我说到做到。”

于是13岁，我就开始在外面过夜，后来碰上了我的丈夫，怀了他的孩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怀孕，什么都不懂，那时才13岁。

在那个传统的小镇上，家庭或是整个社区或街坊可能都会遇到这种危机状况：当家长对女儿或配偶的暴虐变得难以忍受时，她会被迫出逃。浪漫的私奔在乡巴佬语境下是一种合法的文化现象，它容许女孩抵抗父权的控制，表达她作为一个个体所拥有的权利。只要这个私奔的女孩情愿顺从情人，并在怀孕后尽快与其建立婚姻关系，父母和她都不会觉得有任何文化上的耻辱感。事实上，新丈夫的母亲往往会庇护这对年轻夫妇，直到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经济实体为止。要是新丈夫胆敢对妻子不好，女孩还可以选择爱上另外一个人并与其再次私奔。这一传统观念下的私奔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把权利授予了农村社区、种植园背景甚或是在有凝聚力的城市街区中的女性们。^[4]

13岁时为了逃离父亲的虐待^[5]，凯蒂严格遵从了这一传统文化脚本。她甚至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和配合。就此而言，凯蒂的生活与过去农村的断裂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虐待她的父亲不能保护她，周围村民反而引导她走进另一个男性控制

的家庭。凯蒂面对的是一群市中心街道上的秘密团体，被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菲力克斯为首的一帮少年轮奸。

当普莱姆给我说起凯蒂的私奔以及后来和菲力克斯结婚的事情时，他又回到社区街道这一老话题上。他直接谴责菲力克斯和凯蒂父亲的虐待行为，把凯蒂童年时的创伤与当代城市的厌婚症联系到一起。凯撒在笑得把一口啤酒喷到游戏厅的地板上之后，感叹道：“菲力克斯抢先占了这些娘们的鲜，伙计！”凯撒和普莱姆立即开始争论起一个13岁的少女该不该表现得太主动的问题，这个话题并没有涉及凯蒂乱交的谣言以及她和菲力克斯结婚时已“绝对不是处女”的事实。

凯蒂则是用一种更传统、更自信的女性视角来看待这件事。她记得离开父亲是因为爱上了菲力克斯。她还回忆起第一次做母亲时激动的心情。但用来帮助凯蒂在新城市环境下生存的正规的政府机构，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她的行为。

凯蒂：我有了自己的女儿。法庭却因为我是个未成年人要把她带走。于是我14岁的丈夫想和我结婚，但法官却说：“不行，你们都还太小，自己还是个孩子！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这下可好，我们婚没结成，从家庭法庭面前消失了。

我不否认这一点。警察来到我们家时，我们和孩子一起藏在屋顶上。

我真的想要这个孩子，吓得哭个不停。我跟我母亲说：“他们不能把孩子从我身边带走。”

我记得我和女儿就睡在我母亲家门口的过道上，因为我带着孩子，无处可去。

于是他们告诉我母亲，“你的女儿这么小就生孩子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你所有的孩子都带走。”

我母亲把她的家具卖了，把所有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去了波多黎各，把女儿留下来给我，并对我丈夫说：“你要对我的女儿负责，她还是孩子。”

我们就住在莱克星顿和第三大道中间的第110条街上。

20年后，34岁的凯蒂对自己作为一个受虐待的女人有了一个精神分析学式的理解。她把已经被遗弃的天主教教义，与她在纽约市大都会医院精神病诊所所学到的个别有代表性的土语混杂在一起。菲力克斯对她的毒打和她无数次的自杀企图，经常迫使她住进哈莱姆东区公立医院的急诊室里。在那里，她接触到很多主流社会

服务行业里的官僚主义者，并学会了如何巧妙地应对他们。

凯蒂：我丈夫像我父亲一样，我是个施虐者的女儿，又成了施虐者的妻子。我逃离我母亲的家是因为受虐待，但后来又成了受虐的妻子。我以为那就是爱。

我不撒谎。我喜欢挨打，因为从孩童时起我已经习惯了，后来我丈夫从我13岁开始打我直到我32岁。所以我一直以为生活就该是这样——挨打。我经常找机会打架，就是想让他打我。

你知道，当你从8个月大开始到13岁先是施虐者的女儿，后又成为施虐者的妻子是怎么回事吗？你认为男人打你是因为他们爱你，因此（感叹道）我经常说：“我父亲爱我，所以他才打我。”

我很傻，因为从来没接受过什么治疗，从来没接受过精神病方面的治疗。从11岁开始我就试着自杀，最后一次是我33岁时，那次差点成功。

但你知道——经历了那段创伤的生活——我的生命依旧。上帝与我同在。

医生知道我是个受虐待的女人，不过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常常替我保密，于是我丈夫就往死里打我。

针对受虐女人综合征和代与代之间传承下来的暴力和毒品滥用的精神病治疗文献，都可以用到凯蒂身上。无论对她这种磨难所做的个体化的、医学上的解释从心理分析角度上来说是否合适，这种解释总归错过了她生活经历中一个关键部分，忽略了二战后大量波多黎各人从广袤的农村到城市（纽约城）的移民所引发的对家庭结构的系统性破坏。^[6]菲力克斯对凯蒂，特别是在她怀孕期间极端残忍的虐待，绝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变态的表现，那几乎是一种结构上的心理失调的漫画式表达。

凯蒂：菲力克斯打断了我的胳膊。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一次还打破过我的头。

他过去每天晚上打我三次，每天都这样。从13岁到21岁，我五次流产，都是他打掉的。

一个五个半月的，一个五个月的，一个四个月的，四个月以内的没有。他经常打我，所以才流产的。

说真的，你可能都不想知道。

尽管菲力克斯和凯蒂生活在高层的公建住宅工程楼内，但他们仍然维系着已经

过时的大型乡巴佬家庭的传统理想——菲力克斯的沙文主义或许是其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要是在上一代，菲力克斯的飞扬跋扈和横行霸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理解为父亲在家庭成员内部协调小型家庭农场中某些紧迫的劳动任务时的“合法”权利。然而，男人在波多黎各乡巴佬山坡上所要求的尊严的物质基础，在菲力克斯和凯蒂生活的新的后工业世界里已不复存在甚至过时，甚或还有点忌讳。这一点似乎很可笑，或许菲力克斯是在无意识中杀死了他和凯蒂不断生产，但却因为日益减少的工厂工作而不能体面地养活的孩子。尽管如此，凯蒂却仍然不顾一切坚守着男性至上的地位。

凯蒂：我想生 12 个孩子，但只生了五个——可我是想生 12 个的。我丈夫用他的拳头打掉了五个。

他让我失去了五个宝宝（举起右手五个指头）。

我拼着命保下来的是现在已经 21 岁的女儿塔巴莎（Tabatha）。后面那个，因为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他打我时把胎儿打死在肚子里了。

我见到那个婴儿，知道是个男孩，生下来就是死胎，成了血块。因为他打我，本来能长成婴儿的胎儿，变成了血块。

有一天我告诉菲力克斯，那时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如果你不打我，我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他向上帝起誓。瞧，那就是结果，我生下了朱内尔（Junior），我唯一的儿子（手指着在快克买卖点浪荡的 13 岁的儿子）。

女性解放与传统的性嫉妒

游戏厅前我第一次试探性地和凯蒂交谈的一个月过后，她朝菲力克斯的腹部开了一枪，她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当时我就认定那是一种反抗的解放行动，然而凯蒂却把它解释为嫉妒的女人对于自己无奈地爱上一个不忠诚的丈夫的传统式爆发。她拼命维持传统的家庭观念，认为性别冲突和主张个人权利是通过“性嫉妒”这一浪漫的词语来表述的。当然，市中心的语境使得这一过时的意识呈现出两极化。毒品和枪支的轻易得手，加剧了传统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斗争的风险和人类苦难的程度。

以私奔为例，婚姻关系中的浪漫爱情使得处于从属地位的女人能够满足自己的

需要，与此同时，也将其束缚在男性控制的核心家庭制的道德准则之内。凯蒂很清楚地认识到，菲力克斯对他们婚姻关系的性背叛是她枪杀他的主要因素。她一直都知道菲力克斯“在外面有女人”，但当他打破亲属关系的稳定性原则时，作为受虐者的凯蒂才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

凯蒂：女人都认为自己的男人与另一个女人厮混是你所能承受的最大创伤。但实际上不是。（拿起我的收录机）我要告诉纽约城所有的女人：你认为你的男人和别的女人鬼混太糟糕了。不，不是！你所能承受的最大创伤，是当你看到你的男人和你的亲妹妹——你的亲骨肉搞在一起。

我34岁了，我知道，是因为我妹妹他才开始疏远我的——我不想说谎。当你像我这样爱自己的妹妹时（放下录音机，眼睛湿润了）……那种痛到现在我也忘不掉。

菲利普：（握着她的前臂）说下去，凯蒂，从头开始。给我讲讲吧！

凯蒂：好吧，菲利普。人们常说，你是一个男人的妻子，你的丈夫就是你的生命。

一个男人的妻子！没错，当你长大成人后是这样的，但我那时才13岁，说他培养了我才对。因为就像你4岁时就开始从瓶里喝水一样，你喜欢上了这个瓶子。

我13岁时他占有了我，所以我说我是他培养大的。我被养得很愚蠢，因为我13岁，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影响我。（吼叫着）“做好你自己，不要交朋友，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向窗外看。”

我都不能朝窗外看！就那么糟糕。

我说的都是真的：以前我就发现他和一个女人有来往。后来当我发现他和我妹妹的事之后，我都快要气疯了。他们把我送回波多黎各，让我平静一阵子。我从波多黎各回来了，但至今还是忘不掉。

我发现我丈夫和我妹妹住在一家旅馆里两次。我想杀了他俩。我到那里时，已经晚了。我拿着刀向他刺过去，砍在他的腿上。^[7]

我不否认，即使将来我会受到牵连，（指着我的收录机）我也不否认。我试着自杀过很多次，还住过州立医院。因为自杀，我从11岁起就有了记录。他把我抓起来往墙上扔。

但现在，瞧瞧我，（张开双臂，身体随着附近收音机里的音乐有节奏地摆

动着，笑得喜气洋洋的)还是挺好的。我不知道，大概上帝想让我活下来吧！因为我是个善良的女人，对别人没有坏心眼；上帝想让我活着，或许是为了我的孩子才让我活下来的。

凯蒂所表现出的残暴和自杀倾向的狂怒，是为了维持自己对家庭的无比忠诚。四个月的虐待之后，她才下决心对准她的丈夫扣动扳机。她是在自己的母亲或祖母那一代人的文化准则范围内来惩罚她丈夫的。她通过嫉恨的歇斯底里来表达自己的绝望和愤懑，而这一切都是因她丈夫对婚姻家庭完整性的不尊重所导致的。与凯蒂作为一个个体是如何运用古典而浪漫的词汇来界定自己的权利一样，那个口红印成了最后的催化剂。

凯蒂：有一天，我到他母亲家去看他在那里干什么。我们在外面说话时，我看见他嘴上的口红印，我气坏了，知道吧！他在和另一个女人厮混——我、我妹妹、还有另一个女人！

我气疯了！我经常带着把手枪防身，就藏在我的手提袋里。

我就那样做了，掏出手枪对准他就是一枪。我气糊涂了！

我开枪了。我告诉你，菲利普，我开枪了。

我不知道，菲利普，太鲁莽了！我没有感到痛苦或遗憾什么的，什么感觉都没有。从手提袋里掏出枪就向着他开了火，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离开时，他对我说：“凯蒂，我爱你，记着，我仍然爱你，请救救我，救救我吧。”

我说：“我不会理你的。”

但后来，我有颗金子般的心，上帝般的善良。我返回去告诉他：“伙计，是你把我气疯了。”

他说：“凯蒂，你不理解。”我说：“我理解。我给你叫救护车吧。”

我为他找来一辆货车。他们把他拉到医院，后来侦探就来询问我。

但我不知道，我啥感觉都没有。我是说我是个善良的女人，但那时候我什么也顾不上了。

他伤我太深了，他毁了我，他带走了我的童年。我是说从13岁到22岁，我按照他的意愿、他的那种街头生活方式活着。

(从一品脱重的啤酒瓶里喝了口酒，酒里兑有当地仅剩下的几家意大利

熟食店里买到的“海滨之恋”的私酒。)我当了18年有名分的妻子。当他和
我妹妹厮混在一起后，他把我彻底给毁了(把啤酒递给我)。

菲利普：你开枪打了他之后都做了些什么？

凯蒂：我扔掉枪，一直跟着他。在医院里他们问我，我说：“不，是抢劫。”
我们都撒了谎。

他告诉我，“什么也别提，他们在做笔录。”

警察去了第110条街，那里的人们说是一位金发女人开的枪。而我们告
诉他们是一位黑人小伙子(笑了)，那是在说谎。

他们一直问我，我只说：“不知道；是个黑人小伙子。”(无辜地耸了耸肩，
喝了口啤酒，笑了。)

我跟他们说我不想蹲监狱，我有六个月的身孕，还和他有个女儿莉莲
(Lillian)，我的宝贝，所以警察待我蛮不错的，不再追究什么了。

(耸耸肩，笑笑，又喝了口啤酒)于是我逃掉了，那都是因为我信奉上
帝的缘故。

凯蒂身边的朋友、家人和她本人对她的过激行为都有一个传统的波多黎各民间
式解读：她有“神经病”，也即波多黎各岛上的人称之为“神经质”的病症在作怪。
波多黎各的精神分析学家把这种“质”解释为一种“关乎文化的波多黎各综合征”，
在从小就受男人虐待的女性中最为常见，^[8]相当于盎格鲁文化中的中产阶级恐慌症。
在波多黎各农村和工人阶级文化中，这种病症是女性对生活中处于主宰地位的男性的
虐待超过自己所能忍受的底线时的一种愤怒的爆发。直截了当的嫉妒是女性爆发
出的最常见的带有文化意味的挑衅性行为。换句话说，当凯蒂向菲力克斯开枪时，
她其实是把虐待生还者的传统遵循到了极致。当她以宣泄的方式挣脱了两代人之间
周期性的虐待枷锁，把子弹射向丈夫的腹部时，其实是对父权礼节的重复而不是冒犯。

康复——性、毒品和更浪漫的爱情

在菲力克斯被关监禁及随后在医院恢复的两个月之后，凯蒂生下了她的第五个
孩子莉莲。她深深陷入严重的抑郁症和经济危机之中。就是在这—惶恐时期，她因
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公共救助证件，“我的社会保险金数额被搞混之后”，四个孩子中

的两个的福利金都被扣除了。于是，她很快就把瑞支付给她的游戏厅经营权的3000美元花个精光。

凯蒂对普莱姆发疯似的爱和在瑞那里得到的一份卖毒品的工作，把她从抑郁症和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她把自信地改变生活周期的传统的女性策略（浪漫地谈恋爱）和哈莱姆东区地下经济的现实（卖毒品）结合在一起，开始了一段新的、浪漫的爱情生活。在私下回顾这件事的时候，凯蒂把她的康复归因于她爱着的这位新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单身母亲，尽管她已经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但依然把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幸福寄托在婚姻模式上。

凯蒂：要是没有普莱姆，谁知道我现在会在什么地方。也许将来我会随便和谁结婚，但普莱姆会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因为是他教会了我做一个像现在这样坚强的女人。

尽管男人之间对于以前恋情的叙述大都带有程式化的、色情的成分，但普莱姆对于自己和凯蒂之间恋情的回忆却并非如此，尽管其中也显露出一种特有的敏感。在普莱姆看来，他们俩是经过几个月亲密的、柏拉图式的谈话之后，才偶然开始两性关系的。

普莱姆：我那时确实替凯蒂难过。她经常哭，所以我尽量在她的屋子里多陪陪她。菲力克斯被关押后的四个月里，我每天都能看到凯蒂，那时她刚生过小孩——很漂亮的男孩！胖乎乎的，很可爱——很健康。

我在她那儿当听众，她给我讲起了我表哥的每一件事：他怎么打她，我就充当她哭泣时的肩膀^[9]，我知道她需要向人倾诉。

我对她说：“你必须走出去好好地生活。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那都是历史了，可不管明天会怎么样，你都必须为自己做点什么，这样才能活得更好一些。”

那天晚上那事发生时，我们都很冷静，就站在那里说话。我们没有服用可卡因，那一段时间都没吸毒。

我把她带到孩子的房间里，那里有张小孩床，我让她坐下来后我们就开始了。

不知道当时孩子们在哪里，可能在另一个房间或在她的房间睡着了。她

的房间有张大床，他们可能在那里看电视，挤在一起睡着了。

我们亲吻着，我脱掉她的内裤，她也很配合。

可后来她推开我，跑进浴室哭了起来。

我跟自己说（双手捂着脸）：

“上帝啊！她可能不想要，”我用手捂着自己的脸，“或者是在逼她。”

我觉得很尴尬，知道吧？一直在想“或许我们应该立即完全忘掉这件事，因为我们确信这件事永远不会再发生，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知道吧，反正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告诉了她，但她说（双手放在臀部，坚定地摇了摇头）：“不，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就做完吧！”

然后我们轻手轻脚地来到床上，（笑了笑）这次舒服多了，（舞动着他的双手）喂，我们做了。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抬头看看从游戏厅天花板上掉落的泥土。）

为抵消普莱姆叙说过程中潜在的敏感，一直站在游戏厅门口的凯撒笑了起来，吆喝道：“嗨，嗨！我喜欢听这个！大叔那天可是把她当成感恩节的火鸡了吧。”

毒品经济和普莱姆的爱情，为凯蒂带来了经济和情感上的独立，她终于摆脱了还在监狱里的施虐狂丈夫菲力克斯的掌控。瑞雇用她每天夜里12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在游戏厅上班，这样她就有时间早上赶回家打发大孩子上学，给小孩子喂奶。而这时留在家里照看孩子的亚伯拉罕，她前任丈夫的养祖父，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她还在蹲监狱的丈夫一样，凯蒂不甘心自己在“俱乐部”里卖毒品的角色。她甚至无法待在俱乐部里，等着客人来买20美元一包的可卡因和10美元一瓶的快克。她设法控制了外面整个角落，谩骂那些自由职业竞争者，赶走了那些自封的说客，说服、纵容那些身体强壮的男人，情愿为所有的朋友两肋插刀。她的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瞬间凸显出来：染成的金发根部是乌黑发亮的颜色，下巴左边有一个纵向的伤疤，细细的高跟皮鞋，黑色的紧身裤，丰满的身体，还有她在药店之角的大嗓门和最沙哑的声音。庆幸的是，低能而缺乏灵气的警察根本没注意过她。在她任职六个月内，从来没人到俱乐部搜查过。

当我问瑞那些吸毒者会不会在半夜进攻值班的女经理时，他的反驳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无知的性别歧视者：“凯蒂知道怎样赢得他人的尊重。难道你不明白？没听

说过她是怎样对付她丈夫的？”瑞对凯蒂的尊重和信心再次提醒我，在街道上可信用度建立的过程中，暴力是何等的重要。再者，从午夜到早上6点，凯蒂掌管着药店之角，为附近公立学校操场上体操房边那群吸毒者提供大部分注射用的可卡因。当地报纸随后以“魔鬼的操场”为题，对这个操场做了系列报道。^[10]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凯蒂吸入的可卡因多了，体重下降了，回家照看孩子的次数少了，挣的钱多了，和以前相比性生活频繁了，权利也更大了。

我有能力供养我的家和毒瘾，因为我是个毒贩。成了毒贩后，你可以为所欲为，满足一切习惯。

我吸可卡因，纯可卡因，吸了五个月。我还从吸可卡因过渡到注射快克，但我只是吸，从来不碰毒性太大的毒品。我告诉你，毒品可不都是坏东西。

我不吸了。看看我现在的身体。（张开双臂，转动着臀部）只有137磅。

父权倒置

丈夫被关起来后，凯蒂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春风得意。她有效地抗拒着那些从儿童时起就包围着她的凶暴男人。她甚至在自己的社交圈里，还团结了一批与她一样受虐待的女性。例如，她建议菲力克斯的哥哥刘易斯的妻子，如果刘易斯再因为她从八层楼高的窗户里朝窗外望而打她，就开枪打死他。

凯蒂：有一天我去了万达（Wanda）家，我站在窗前，看着下面的孩子玩，万达都急得差点要打我了。

“凯蒂，你干什么你？”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我问：“到底怎么了？”我是说……

她说：“小心点，那是个陷阱。刘易斯是按照他的方法放的窗帘，如果你打开了，他就会知道你从窗户里朝外面看过，在这里我们不允许朝外看。”

他在窗户上挂着一个厚重的毛毯，连太阳光都照不进来。

你知道我是怎样跟万达说的吗？她应该拿枪崩了他。但她没这么做，因为她是个受害者……

我也告诉过刘易斯，如果换成我，早已经杀他几回了。我肯定会把他干掉，你觉得我能受得了这些吗？

然而，凯蒂的团结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后她接受并参与了父权逻辑，也开始谴责女人与男人的乱交和暴力行为。

凯蒂：我告诉你，菲利普，我丈夫太像他了，可能是因为女人在家里喜欢作贱。所以菲力克斯以为每个女人都一样。

刘易斯经常和别的女人鬼混，包括他女人的姐妹们。记得（转向普莱姆）他跟露西（Lucy，他的第一个妻子）和她的妹妹干的事吗？

普莱姆：那时候刘易斯在背地里有很多女人。

凯蒂：对，刘易斯常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但他（从背后抱着普莱姆）不喜欢这样的事情。你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是吧？（笑笑）

万达在刘易斯那里确实没少受罪，嗨，别提这事了。自从刘易斯在那里遇见我丈夫（轻声笑笑）后，就不许万达朝窗外看。刘易斯看见他藏在床下面，差点把万达打死。

但刘易斯活该，谁让他老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当这件事发生在我和普莱姆身上时，刘易斯闹了很长时间，说他的弟弟和普莱姆是表兄关系，但不那么近。现在他告诉我不能和普莱姆在一起，当他睡了他妻子的妹妹，而他弟弟睡了他的妻子时，情况更糟了，你知道吧？成了妻哥妻弟，他们可是孩子的舅舅，有很强的基因关系。

他应该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妻子才对！

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凯蒂其实从来都没有摆脱施虐狂丈夫的控制。她跟从着他的足迹：买卖毒品、忽略孩子、炫耀自己性征服者的身份。普莱姆成了凯蒂固定的情人，继而也成了她对抗波多黎各街道文化性禁忌的工具。当时，普莱姆佯装自己在完成一个市中心男人的梦想，免费占了女人的便宜，但事实上，私下谈话时他却承认自己好像在创造着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人物（玛丽·雪莱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一个创造了怪物而最终被此怪物毁灭的医学研究者）。一个有着五个孩子的受虐狂母亲正在赶超着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男人。

普莱姆：那婊子简直是疯了，真疯了。从那时起，伙计，她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人（头埋在双手里）。

好家伙！她想杀死我！想打败我周围所有的女人和姑娘们。

我还必须忍受这一切，那婊子太不尊重我了。

普莱姆忍受不了性别功能的逆转——凯蒂公开夸耀她的性功绩，跟菲力克斯在被枪击之前带着他的女友在游戏厅门前招摇过市如出一辙。

普莱姆：凯蒂赚了不少钱。这婊子赚的比我知道的还多。

后来她开始在外面乱来……乱说我们之间的事。告诉别人我怎样怎样……暗示别人……我到过她家楼上的事情。

后来，菲力克斯来叫她，她说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像……“不怕你看见。”胡扯！

之后她还告诉了她家人，我觉得自己很傻，伙计。就像……简直不敢相信。我不想应对这件事。

只想做好自己的事，可她因为这事失去了理智。

后来我不想再去打扰她——在性生活方面——可她总说我“利用”了她。我说：“利用了！怎么讲？不都是因为你想要吗？”

她说：“我给你买东西。”

但我说：“那是你愿意，我又没向你耍。你不就是想借口发火嘛！”

半年后，普莱姆开始反抗凯蒂对父权的倒置。他用自己唯一可以支配的方法——身体暴力——来努力补偿他男性的尊严。从不愿满足凯蒂的性要求开始，他们的关系慢慢走向破裂。几年之后，在一个游戏厅生意萧条的晚上，普莱姆给我和凯撒详细地讲起了他和凯蒂分手的那个决定性的夜晚。他似乎是利用录音这段时间来治疗自己爱上凯蒂后对性禁忌的突破所产生的窘迫心态。同时，他更需要通过庆祝对这个不检点的女人的胜利与我们站在一起，即便我保持中立或持批评态度，至少凯撒会站在他的一边。

普莱姆：知道吧！她经常闹情绪什么的，我不想理她。

有一天，她换上那件宽松的睡衣。我说：“别碰我。”她就这样吼道：“你必须做！”

我让她离我远点儿，她没有走开，所以我把她推开了，结果她抓起一把刀。（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凯撒：哎哟，大叔！我不知道你还经历过这些事呢！那她太像那个《致命的诱惑》^[11]了。

普莱姆：闭嘴！凯撒！你就喜欢幸灾乐祸，滚一边去。（递给我一瓶酒。）

她威胁我，疯了似的。我对她说：“来吧！拿刀上来吧！我不怕你。”

凯撒：（再次忍不住激动起来）绝对像《致命的诱惑》上面的情节，伙计。

普莱姆：没错！我盯着她，看到她离我很近。准备好要煽她的脸，肯定够她受的，我想踢断她的下巴。

凯撒：（高兴得喝了口酒）耶！

普莱姆：（拿走啤酒瓶）我对她说：“别这样，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我把她的孩子们喊来，盯着她的眼睛，告诉他们看看他们的妈妈在干什么。

但她在孩子们面前，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这是干什么？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她看着孩子们说（很温柔）：“没什么，我在、在逗他玩呢！”

后来当我们走进房间后，她转向我压低声音（吼道）：“你这个狗娘养的！”跟着再次转向我。然后我（把头埋在自己手里），“呃，我的天啊！”

我气疯了（整个身体都在夸张地抖动），我揪住她的脖子把她扔到沙发上（拳头击打着手掌心），咣、咣、咣……使出全身力气煽她的脸。

但那婊子却笑了，我那么狠地打她，她还笑，伙计。

凯撒：（跳了起来）噢，她还笑。我喜欢！

普莱姆：（故意挑逗凯撒的赞赏）耶！她看起来非常野，穿着睡衣！

于是我撤退了，我是说这婊子疯了。然后我继续打她，可她一点事没有，好像还特享受。

我接着打她，她跑到另一个沙发上笑着。

凯撒：哦！哦！她活该！活该！

（转向我，或许是看到我脸上不太舒服的表情）你可以想象，和菲力克斯一样，跟她在一起的男人，那些大老爷们其实不都是坏人。

你，大叔，你认为她那样做是因为爱你吗？是吗？她是想占有你？

（又转向我）你想想，菲利普。她走过来对着你吼，（挥动着胳膊）“你这个狗娘养的！”

根本没看出来，伙计。我看着普莱姆和凯蒂好像处于冷战中的一对夫妻。

一点儿看不出他俩像他说的那样动刀动枪的。觉得他们关系挺好的，……挺正常的，两人一直高高兴兴的。

普莱姆：是这样！你不会知道，你那会儿一直在外出差。

（转向我，低下头）上帝啊！我真不想提这件事，菲利普。那时她一直在哭。后来孩子们都过来了，很害怕，都在哭。她太过分了，我有什么办法？孩子们在那儿看着，莉莲也在那儿，她还不到一岁。

凯撒：对！对！他们想挖掉你的眼球，谁让你打他们的妈妈来着。

（把啤酒递给普莱姆）大叔，她想让你留下来还是就想干那事？

普莱姆：（喝口酒）她就是想让我打她，她不想让我走。于是我在刚打过她的那个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在想，“她想让我和她在一起鬼混”，像个可爱的鸽子，我才不愿意呢！

但我坐在那里（把啤酒递给了我），就像你现在这样一动不动。突然，她跳起来，来来回回在我面前走，高跟鞋嘎、嘎、嘎、嘎地响着。

她醉了，知道吧？所以我觉得不对劲，她刚刚回过她的房间，我不知道她去干什么了，好像我不相信她似的。

凯撒：你害怕她？

普莱姆：当然！我知道她的房间里有枪。

凯撒：（吸过可卡因后问道）你以为她要杀你吗？

普莱姆：当然！别急，等会儿，让我先把这事说完。

（转向我，把啤酒要回去。）这时，我会为她做任何事的。后来她平静下来，看着我。不知为什么，她开始看着我，想等我找她的麻烦。

我忘了她当时说了什么，但我冷静下来，坐在那里等着那个重大事情的发生。

刚好，她开始谈到杰茜（普莱姆的前女友），说些“我知道，昨天你肯定吻过她”这一类的话。

我说：“没有！拜托！你知道……近几个月，我从来没有吻过她，什么事都没有干过。”

可不管我说什么，她都说我是在胡来，就这事说个不停。

后来我干脆说：“嗨！那好！我、我、我、我以前就吻过她。”

她立马站起来说：“我就知道你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她实际上是想打我。我一下子抓住她的手，要她“冷静！”

她尖叫着：“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好像我是她丈夫似的——“我知道

你在外面鬼混。”她开始大哭大闹起来。

我告诉她：“你不就想听这个吗？我说给你听。”

她又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高跟鞋吧嗒吧嗒的响。太不像话了！那时已经是半夜三更了。

接下来，你知道吗？……她穿上衣服想要去杰茜家去找她，和她拼命。我就这样（耸耸肩），“混账！”

她穿上运动鞋和外套。我说：“噢，该死！这下不就乱套了吗？”

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好像在等着我打她，等我找她的茬。

我告诉自己：不要！我就这样站在那里，（静静地站在那里）很平静。

她走进房间，我看见她把衬衣扣住了，但出来时，衬衣却敞开着。她对着我大叫：“嗨！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你想回家吗？”

她把衬衣那样敞开着（指着腰部可以藏枪的地方）。她在有意找事，脸朝着门站着，我面对着窗户坐在那里。

我害怕了，兄弟。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不想走。”

她说：“为什么？不要脸的货！”她对着我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

凯撒：（担心普莱姆的软弱）她到底想咋样？想让你干她还是什么？

普莱姆：（被激怒了）不是，兄弟。她想让我打她。

她朝着门站着，（用手比划着当时的位置）我面向窗户坐在沙发那儿，我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我心想：“我知道这个婊子，上帝！我输定了。她想让我干傻事，她想让我打她，这样她就可以开枪了。”

于是我对她说：“（平静的口气）为什么不坐下来，把枪放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再打你，但先让我看看你的枪，把子弹拿出来，让我看见你放在什么地方了。”

她说：“我没带枪。”

我说：“让我搜。”

她说：“不行！”

我说：“算了吧！（用安慰的声音）对不起。如果我以前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我请你原谅。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行吗？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不该这样对我。”

她终于叹了口气说：“好吧！”于是她把枪拿出来，原来她还真把枪带在身边，藏在衣服里。

她把枪一放下——我忘了她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了；但我看见她把子弹夹拿了出来。——我猛地冲过去，“你这个臭婊子！”（挥动拳头）抓起她一阵痛打。

一边打一边喊着：“来吧！臭婊子！我不会再跟你来往了。”

那婊子被打恼了，兄弟。但她还是不想让我走，眼睛里闪着邪光。

还好塔巴莎这时进来了。我告诉她：“你妈在和我闹着玩呢，她不想让我走。”

问题严重了。过了很长时间，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但我知道塔巴莎出去找刘易斯去了，因为刘易斯随后就过来了。我跟他说：“凯蒂不想让我走。”

知道吧？凯蒂在房间里追着我打，兄弟。她拿起东西对着我砸过来，东西摔得到处都是，连钟也给砸到地上了。她暴跳如雷，兄弟，一直这样持续到第二天下午。

后来直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哭了。我觉得塔巴莎好像是站在我的一边，她也不再乱闹了，她开始和她妈吵了起来，还打了她一拳。

凯撒：（生气地说）塔巴莎那是在添乱！她就是喜欢随心所欲。^[12]

普莱姆：不是，兄弟，是凯蒂太不像话了，塔巴莎是来帮我的。她很冷静，她能做什么呢？她一直在劝她妈妈平静下来。不过（担心的样子）她把她妈打得可不轻。

于是凯蒂开始哭叫，像个疯子似的。“我女儿打我，啊？啊？”然后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说着，孩子们都在哭。

菲利普：你为什么不一走了之？

普莱姆：知道吧？她有一把在里面上锁的钥匙，我出不去。她和塔巴莎打起来时，我就想试着拧开锁逃走，但被她看见后抓了回来。

最后，塔巴莎和刘易斯一起拽着她，我向她的胸部猛踢。

凯撒：好！

普莱姆：但她还是抓着我（抓着我的衣领），撕烂了我的衬衣，咬我的手，抓着我的手提包不放。

凯撒：像死亡之手，伙计。

普莱姆：没错！不管怎样，最后我还是挣脱她的手，向后挪了挪，然后出手（像空手道那样打人的脸）。

凯撒：把她打伤了没？

普莱姆：不算太重，但她放手了。刘易斯和巴塔莎也在那里，可他们不再帮我，可能是害怕了……我不知道。

他们回到门口那个卧室里去了，刘易斯看起来是要等我打完凯蒂后再找我算账。

他们看起来都像要打我，包括孩子们在内。这样说吧：孩子们知道是他们的妈妈不对，但我打了她，所以要来打我。

凯撒：（又来了精神）好！好！他们想把你的眼球给挖出来，谁让你打他们妈妈呢。

普莱姆：看着他们的表情，我知道自己要做好准备应对他们的还击。

但我转过身对着他们说：“她必须让我走，我想离开这里。抓住她。帮帮我！我想离开这里。”

他们抓住她后，我才脱身。

我都已经走到外边了，凯蒂还设法从窗户上用水泼我。

为维持她新的大男子气的街道毒贩的身份，凯蒂在公开场合碰到普莱姆时，没有表现得很神经质，反而像男人对待一个不值得尊重的前情人那样进行男人式的报复。她大肆渲染她和普莱姆的性生活，“你是我有过的最好的性伙伴！”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上升到大打出手，特别是在他们分手之后，碰巧遇到普莱姆和新交上的女友杰茜在一起时。

普莱姆：杰茜和我那天从他们大楼前经过，刚好被她碰上，她气晕了，对着我破口大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带着你的狗屎女友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她是指杰茜——“你为什么告诉她你玩过我？为什么不告诉她这些？”

太可怕了！大家都在叫着，“哇唔！”

那可是当着她孩子们的面。（递给凯撒 10 美元一包的可卡因让他碾成粉末。）

我看见她恶狠狠地冲着我们走过来，我很害怕。我在想她会不会带着枪！心跳得很厉害。

她说：“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实话，你这个同性恋？你不是个男人！”

周围还有一些维修工，所有的人都听到她的话了。“为什么不告诉她……（发疯似的挥动着胳膊）他玩了我！我感觉特舒服！（退后一步，手还在舞动）告诉他你干过我多少次。”（双手抓着他的裤裆，晃动着。）

我简直不敢相信，知道吧？好多人都从窗户里探出头看着。我可不想听这个（要回可卡因，就着啤酒几口喝下去）。我告诉她，“去死吧！你还想要吗？（又抓起胯部）但我不会再给你了，回你妈那儿找去吧！”

我拿拳头打她，她挡住了，她知道我会怎么做。如果是在她家，她肯定不会阻挡。我会把她揍扁的（用拳头打着手掌）。

我不该去踹她的脸，她其实就是个愚蠢的老疯子，需要心理治疗的婊子。

凯撒：（从正在吸的可卡因抬起头）她的枪呢？

普莱姆：（喝了口酒）我想到了，所以一看见她我就离她很近，我知道她要掏枪。我猛击她的头部。除非她比我快，要不她肯定会拿枪打我。然后我就抓住这个臭婊子，再去告发她。

女性斗争的矛盾背景

几个月后，我去了趟波多黎各，专程走访了凯蒂父母移民前居住过的那个风景如画的伊萨贝拉 (Isabela) 小渔村。坐在伊萨贝拉的中心广场上，看着年轻人在百年老树下唧唧我我，我更能理解凯蒂在街道上男人般的毒贩身份，理解她那近乎神经质的爆发和挣扎，还有她想生 12 个孩子的愿望。很明显，性别关系在波多黎各的乡村小镇上同样经历了深层的变化。^[13] 如果凯蒂的父亲仍然留在他祖父住过的小木屋里继续靠捕鱼为生，那么她很可能会在伊萨贝拉周边的某个服装厂或制药厂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日落时分，框定在洁白无瑕的西班牙殖民建筑的背景下，她将不得不面对在不断变化着的前乡巴佬社区压迫性的范围内维持新女性权利所不可避免的矛盾。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小城镇父权统治的语境下，在公共场合和家里与男权抗争这一错综复杂的过程中，凯蒂会发展得很顺利。移民和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再加上服务行业中制造业的重建，显然并没能建构起性别主义，更无法以一种简单化的方式去解读家庭暴力的存在。然而，在凯蒂 17 层高的纽约市公建工程楼的公寓里，甚至更严肃地说，在她在瑞的社交俱乐部里卖快可时，凯蒂的问

题因充满敌意的移民经历和地下经济两极化的暴力而加重了。换一种环境，凯蒂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颇有能力的人，她会为自己在公开、公共场合打造出一片天地。她决心要“得到属于我自己的那部分”。可问题是，她的行为、计划及改善经济的舞台，却被限定在哈莱姆东区的街道上，制约着她为自己新的公共权利去拼搏的客观力量，使她对自由梦想的追求过程变得苦不堪言。而且正如本章“父权倒置”一节所探讨过的那样，凯蒂为自主和权利的斗争一直是由父权的参数来界定的。虽然她最终逃离了丈夫的虐待，但却继续以自己的毒贩身份为荣，以有一个固定的情人为荣，以公开炫耀自己的性能力为荣，以强求自己的情人做爱为荣……

在重大的女性主义论证中，哈莱姆东区的女性一直在谋求什么样的自由、解放或自主，由谁来界定女性权利的内容，在阶级、种族双重压迫下女性的权利到底意味着什么等辩论，引发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过去的几代人中，波多黎各女性所获得的新的公众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体自由的开放的中产阶级标准来界定的，而不是以群体团结、集体自主甚或是反对父权统治来界定。普莱姆的母亲对于自己在纽约市单身母亲的身份和所取得的成就颇为不满这件事，使我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好的认识。作为哈莱姆东区的居民，她在体制上所受的压迫是不可否认的。作为一个未注册的女缝纫工，在家为一个服装商工作，经济上也深受剥削，住在被隔离的市中心公建住宅楼的公寓里，又使她在社会上被边缘。而一旦离开自己的社区，她还会经常遭受种族敌视，总得努力学习她永远也学不好的外语。

与此同时，普莱姆的母亲则在纽约市成功地变成一个独立的女人，而这在她的出生地社区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在那里她也同样受到经济上的剥削，但她的种族尊严感却不会因为某种文化意识上的偏颇而受到攻击：(1) 17岁时离开家，只身来到纽约；(2) 自主地选择了丈夫；(3) 丈夫嗜酒如命并虐待她时，毅然决然地和他分手；(4) 在一个自治的家中，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5) 作为成年人，自己选择了情人；(6)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有一份全职工作；(7) 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收入等等。但普莱姆的母亲对于自己被赶出家园来到纽约后所“获得的”自治并不满意，这首先与其个人的孤独不无关系。不过，她的这种孤寂感在现代美国城市里屡见不鲜。这种不满意还来源于她被迫用个人主义者的辞藻来界定权利和成就。她渴望着家乡波多黎各种植园里的那种女性/家庭/社区的团结。尽管她美好的回忆现在想来注定是理想化的，但这些回忆在她工人阶级的、市中心社会边缘化的语境下，在取决于每个人的自主能力和向上爬的中产阶级的、盎格鲁式的权力界定的

有限性语境下，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批评方法。^[14]

普莱姆的母亲：（用西语说）过去在波多黎各，如果女人生孩子，邻居们肯定都在跟前，助产士也在，大伙都过来帮忙。

整整一个月内，都会有人给你送汤，鸡汤或别的什么汤。但现在，什么也没有，没有人会来！连门都没有！不会有人给你送汤的。

我在纽约生了四个孩子，从来没喝过别人送的什么汤。出院的当天，就得自己下地做饭。有谁会帮我？没人！我得放下孩子，给自己做点吃的。

过去可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人们之间很友好，大家彼此都很尊重。

直面政府——福利政策锻造单身母亲

本章简要探讨了历史、政治、经济进程是如何内化到脆弱的个人生活中去的，个人情感经历这一更大的、长期的性别变革问题，也是本章的关注点。本章同时还对国家及其公共政策功能做了深入的探究。凯蒂生活中那种凶猛的情感爆发，可以被视作一种病态表现，但同样也应该被置于决定市中心穷人日常生存的具体的机制和国家影响力的语境下来解读。在美国，负责改善或者至少是管理贫民窟移民及其孩子困难的有关职能部门，事实上对其“客户”的困境持有一种公开的敌对态度，而且这一敌对态度至今还在重演。政策制定者和报业巨头们被称作穷人的依赖。诚如历史学家迈克尔·卡茨（Michael Katz）和其他许多人所说的那样，美国针对穷人的政策历来苦于难以区分“有价值”和“无价值”的穷人，历来都是在谴责个人的失败。最近一段时间，保守党也一直在谴责政府家长式的福利政策促成了穷人的消极和依赖心理。^[15]我根据自己自下而上的观察得出如下结论：从瑞社交圈里的毒贩的家庭成员起，没有一个是消极或懒惰的。相反，毒贩的母亲、妻子、情人们大部分都在同制度做着顽强的斗争。

凯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让我明白了这里的母亲是如何积极应对政府职能部门，以养活自己的孩子、保护自己不受牢狱之苦的。福利部门及刑法制度一直是影响凯蒂家庭稳定的最突出的政府机构。为了完成自己所认定的职责，她不得不铤而走险，在卖毒品、领福利金和找份合法工作之间忙碌，她甚至还保持了一种二等的、“干净的”社会安全成员资格，把自己的合法收入注册到国家内部税收服务行业，使其福利和医保资格不会受到威胁。^[16]

在凯蒂成为我的朋友的这些年里，她一直在和福利部门做着公开较量。福利部门的问题主要是其惯常的“搅局”，即每六个月要重新认定一次客户们的合法性，而在此过程中，官僚主义计划和组织还会不时地发生变化。地方福利部门认为，这项难以把握的制度是为了阻止欺骗行为和满足联邦政府不断变化的资金问题的文件精确性的要求。然而，最终受到影响的却是纽约市接受福利金的成员中10%—15%不能按文件要求出示合法“家庭住址”或社保卡的人。^[17]当客户被怀疑有欺骗嫌疑时，像凯蒂这种情况，异常狂热的官僚主义的严格特性会使这一重新认定过程变得异常苛刻。

在穷人的日常生活中，来自于美国政府授权的社会服务行业中特别敌对的体制上的困境，往往与个人的情感危机纠结在一起，凯蒂一家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范例。例如，在丈夫菲力克斯入狱后，凯蒂在把毒品交易点转让给瑞经营和与普莱姆有了恋情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和福利部门协商，想要回她两个小女儿增加的两周一次的福利金，但却没能成功。

凯蒂：我的社保号搞错了，所以他们罚了我五个月的福利金。知道吧？我就经历了每三个月一次的资格重新认定。到时候你必须去他们的办公室，拿着证明孩子上学的有关证据；住房证上必须有他们的名字——明白吗？——就是证明你仍然可以有接受公共资助的资格。可他们说我没有向他们提供我女儿和小宝宝的所有信息。

你能相信吗？他们跟我要宝宝的社保卡。我不明白为什么福利部门的工作人员会为一个两岁孩子的社保卡争论那么长时间？难道不知道两岁的孩子压根就不能工作吗？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社保卡会涉及他们？小孩子又不能工作。

你知道吗？除了自己去之外，你还得带孩子去他们那里给他们看，说：“瞧，给他一张社保卡吧。”你完全可以自己一人去，他们怎么知道你真的有孩子？你可以带着别人家的孩子的出生证明去冒名顶替。

但你知道，气死我了。他们后来又有了新规定。现在你再去认证的话，就得看孩子的社保卡了。后来我把那个可恶的婊子告上了法庭，我胜诉了。在法庭上，他们说：（模仿着法官毫无感情的语气）“噢，我们不再要看孩子的社保卡了。”所以她得把我的钱全补给我，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三月份。

凯蒂打赢官司领回的九个月的钱来得太迟了。那时候她已经成为瑞的全职卖快克和可卡因的工人，并且完全沉浸在毒贩生活的“成功”之中，还有了普莱姆做情人。当她再次错过认定时间，领到的福利金额减少了很多时，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正在瑞那里拿着一份稳定的收入。过了几个月与普莱姆分手之后，凯蒂这才意识到她正在通过毒品买卖毁灭自己和自己的家。于是她再次申请福利，希望放弃毒品买卖。为了给孩子们重新营造一个稳定的家，凯蒂竭尽全力，想在福利部门为自己争取权利。然而，她那咄咄逼人的、市侩气很重的单身母亲角色，在福利办公室里没有给她赢得可信度。这一切就发生在她在公建住宅楼的院子里对着普莱姆和其女友破口大骂的那段时间。在我录制下面这段谈话时，她和普莱姆已经重新开始了一种相互支持的、柏拉图式的友谊。

凯蒂：我给你说说关于福利的一些事情吧。最后一次申请时，我还在瑞那里干活，没能要回福利金。他们对我说：“这几个月没有福利金，你们是怎么过的？”那时候因为我还在做毒品买卖，所以不太需要福利金。

现在我不再干了，不再卖毒品了，我希望我和孩子们未来过得更好一些。

我曾经对那里的福利工作人员很无礼。我太沮丧了，因为我碰到的问题太多了。我不想再在瑞那里干了，我的神经也有点错乱；福利办公室的那位婊子对我说：“嗯，嗯！……（模仿着那种很官僚的口吻）你来是想取消你和女儿的预算。”

我说：（不相信似的）“我来是告诉你、把我的、预算取消？如果我还是孩子的娘的话，我他妈的跑到你这里来干什么？”

我气晕了（平静下来），我拿起诉讼记录给撕掉了。后来她叫来管理人员把我抓起来。

她一抓我，我就上前去打她（突然笑了起来，停下来喘口气）。

菲利普：快点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凯蒂：（耸耸肩，无语）他们终止了我的理由陈述。

凯蒂针对福利行业敌对的官僚作风所做的毫无感情色彩的讲述，把我和普莱姆都给逗笑了。当凯蒂模仿那个自鸣得意的工作人员的动作和语气，合起文件夹宣布“陈述结束！下一个”时，我笑得差点从游戏厅前停放的汽车前盖上摔下来。我们刚刚歇口气开始喝啤酒时，凯蒂又开始了她那官僚传奇，用的仍然是那种毫无感情色彩

的口气，害得我们把满口的啤酒都喷了出来。

后来他们重新打开卷宗。（最后打破她那麻木的表情和我一起笑了。）知道吧？他们说我，嗯，什么来着？对了，说我“攻击办案人员”。

我说的都是真的，大概是感恩节前后。感恩节的前一天我约了她，我对她说：“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感恩节的大餐。祝你也有个丰盛的大餐。”（苦笑了一下。）

后来圣诞节期间我又去了。我对她说：“祝你过一个很倒霉的圣诞。”

后来我威胁她，真的。（自个儿笑了）我告诉她：“我要拿枪去打掉她的脑袋。”（我和普莱姆都变得紧张起来。）

知道吧？我的神经实在受不了了。我没有丈夫可以依靠，孩子们只能靠我一个人的收入。菲力克斯那时还在监狱，就是他不在监狱也别想靠他（敏感地看看普莱姆），你明白我的意思。

圣诞节来了，那是我过得最糟的一次圣诞节，我急坏了，打电话给负责我案件的人，对她说：“我要去找你，我要拿枪打掉你的头；你好好想想吧。”

于是管理人员打电话给我，问：“你真的要打掉她的头？”

我说：“没错，她太欺负人了。”

菲利普：你真的打算去枪杀她？

凯蒂：那时我还没有枪，我正在想办法搞一支。我准备去做，我的情绪特别糟糕。

我是说，当想到你的孩子时，……如果我没有吃的，OK，没问题，但我不能让孩子挨饿，他们没有挨过饿，我可以用自己挣来的钱养活我们。因为那时我还在俱乐部干活，不享受福利金，但我们还是有东西吃。^[18]

身后传来六声枪响。（会意地抬起眼，不赞成地摇了摇头。）“噢，卡洛斯（Carlos）疯了，我得找他谈谈。”她指的是他们楼梯口卖毒品的那帮年轻人的头目。有时候为了挣点小费，她让卡洛斯去她的厨房“炒制”快克，再拿给楼下的同伙以三块钱一瓶的价格出手。^[19]

机制约束力的内化

凯蒂遇到的另一个个人处境危机迫使她蹲了大牢，这个危机始于丈夫菲力克斯在监狱里参加的一个活动。根据这项活动，他周末可以出来。具体来说，这意味着普莱姆和我出于对菲力克斯的“尊敬”，或更确切地说是“害怕”，不得不取消和凯蒂在游戏厅前的公开碰面。凯蒂已经拿到了离婚证书，甚至还从法庭上得到了限制其丈夫的命令——但她自己却没有执行。每个周五、周六的晚上，菲力克斯都会小心翼翼地回避可卡因、吗啡或鸦片制品，因为回到监狱后他要接受例行的尿检。他会去凯蒂的公寓喝得酩酊大醉，流着眼泪，哭着要见他的孩子们，抱过他们之后，立即瘫倒在以前全家人休息的大床上，和他们挤在一起。

凯蒂没能坚持自己单身母亲的合法权利所产生的感情危机，破坏了她原本就很脆弱的家庭经济的稳定性。以前养祖父亚伯拉罕每月的福利金还可以贴补凯蒂捉襟见肘的状况，但因为他受不了菲力克斯每周回到家后的吵闹，干脆搬到另一个养女家去了。我的录音里可以听得出凯蒂当时情绪是多么低落。她想找一份合法的工作，只要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就行。

凯蒂：你知道吧，菲利普？我感觉糟透了……总觉得天在下雨、下雨……我是说，下倾盆大雨。不过一切都会好的。对，上周，我就差3分没能通过资格考试。我还可以再去，但我有太多的问题要考虑……我心里还没有准备好。

我得先找份工作……这是大事……找份工作，……不管啥工作，只要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四五块都可以。

我期望这一周能找到，但就是不知道怎么了，……我、我、我必须买份工作——知道吧？你可以从职介所买来一份工作。但他们没给我找着。

福利部门官僚人士的搅局，使得凯蒂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知道吧？以前亚伯拉罕在经济上还能帮我一点，可他们把他从我这里带走了。

我的福利金真的不够花。因为社保卡弄混了，我的福利金不够我和孩子们花费。每两周我只能领106美元的补贴。也就是说，五个人一周只有53块。而他们只发给我们三个人的补贴，可我们是五个人，没有我和小宝宝的。

菲利普，我不说谎，你知道一家五口人每月只有106美元的生活费是什

么样的吗？想想！每周 53 块。你知道一周只有 53 块是什么样的吗？什么也不是。就拿我儿子朱内尔来说吧，就是那个最胖的，他一天就能吃掉 53 块。

可我的确就是那样生活的，我母亲是唯一能帮我的人，她可以从社保部门领取一点钱。她经常来帮我，每天靠捡罐头瓶、靠垃圾箱卖的 20 美元，拿到我这里对我说：“凯蒂，给你 5 块或 10 块钱吧。”

我母亲患有哮喘，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她老人家每天早上 6 点起床出门，一直到夜里 11 点才回家，就是想多捡些瓶瓶罐罐卖了钱来贴补我。

太难了！我没有情人，没有丈夫，没有人给我钱，只有我，我自己，养活四个孩子，太难了。

社保部门会让你经历一些最艰难的变故。你还不能跟他们说实话，他们不值得你那样诚实，因为我有自己孩子的监护权。

有一件事你得知道，菲利普。你必须去了解一下那些像我一样的母亲，她们不吸毒，像爱婴儿那样的爱自己的孩子，送他们去天主教的学校去读书，把最好的都留给他们——有时我们这样做，都是他们（用手指点着）让我们这样做的。

这次谈话没过几天，凯蒂就被捕了。她接受了一份管理不善的毒品买卖的活。她是在工作时被抓走的。

所以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就是那会儿我又回去买卖毒品了，但我不想干这个，不想毁了我的记录。

我找到了瑞，对他说：“瑞，他们把亚伯拉罕带走了，我需要一份好一点的工作，至少一周干两次的活。我不在乎干什么，但我要一周至少两次的活儿。我必须为孩子们挣点钱，150 块就行了。”

瑞对我说：“我愿意让你回来，但得等我开了新地盘才行。我们要重新开一家游戏厅，再等等吧。我会让你上白班，但现在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但我太需要钱了，于是找了份工作，为马汶（Marvin）卖 25 块钱一包的可卡因。一天干五小时，他每周付给我 75 美元——不对，是每天。我是说，那钱可是不少！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站在那里当眼线而已。

知道吧？都是福利金的错，是福利金逼我那样干的。哦，今天是 7 月 19 日，因为那个文件他们还在惩罚我。

凯蒂他们两人一组，她作为眼线在第 105 条街和莱克星顿街卖可卡因的几小时内，就因亲自卖毒品给纽约市策略高超、手段高明的缉毒警察而被捕。

凯蒂：我们工作的那条大街天气特别得热，真倒霉，我被抓了。那个买卖点的老板马汶告诉我不要干了，天这么热；但楼前面还有三个男人，所以吉诺 (Chino) 对我说：“好了，求求你了，凯蒂。咱把那三个人的钱给挣了，我上楼去拿，然后我们就关门。”

于是我们开始卖，后面的那位是他妈的警察，一个黑人小伙子。前面的那两个人我都认识，但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警察。他长得像街面上的一个老家伙，卖给前两人后，我就被他抓了。

他们抓我时，我还说：“放开我！”（用她的肘部使劲往后推）我还以为有人在做傻事呢……这时，警察开始抓我的头发。还问我：“钱放在哪里了？让我们看看你的钱包。”我把钱包递给他们，他们竟然连我的钱都拿走了。

我说，见鬼！这时吉诺也被抓住了，他们拿走了他的钥匙，检查了所有的邮筒，把钱全都搜了出来。因为警察之前在钱上做了记号——25 美元——他们在邮筒里找到的，他只买了一包可卡因。

OK，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塞进一辆大篷货车上，里面全是男人。然后带我们去别的地方去拉继续抓捕的人。他们其实是在抓那些吸毒的人，大篷车里的另一位女人还有身孕，她是个吸毒的。

货车装满后，我们被带到第 137 条街的警察局。

似乎是在用诗学里的象征来标示凯蒂的霉运，警察来抓她时，她还在用传统的波多黎各行行为在为瑞的小宝宝祈福。这一点我们是从这个小宝宝的母亲吉吉 (Gigi)，瑞以前的女友那里了解到的。

吉吉：其实凯蒂是在第 99 条街上被抓的，没错，我在第二大道上亲眼看到的。她跑过来与瑞·朱内尔打招呼，他当时还躺在婴儿车里。

她就这样（弯下腰抱起一个想象中的孩子）“好乖乖，太可爱了！上帝保佑你！”

正在这时，侦探抓住她的胳膊，给她戴上手铐，把她塞进车里去了。

我当时就在现场，吓得跑开了。

凯撒当时在游戏厅前面的街道中间，庆幸没被凯蒂的女儿塔巴莎从屁股后面推一把。他幸灾乐祸地说凯蒂作为眼线，不该冒险直接卖毒品“服务”客人。他以一个职业工作者的傲慢取笑她，因为他当时也在给普莱姆管着的游戏厅当眼线。

凯撒：她可真傻，傻瓜一个！太蠢了！每一个消息灵通的人都会知道99条街那里特别热，离高加索地带很近，那里的太阳能把鸡蛋煮熟。

太笨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笨的人！有点太莽撞了，也不想想自己是干什么的，该在什么地方藏身。她没有必要亲自卖毒品，她只是个眼线。

哦，不对，凯蒂不是！她必须自己干。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凯蒂在候审室和她的律师的交流中，用她那坚定和痛苦的声音压服了我对她被捕一事所做的落井下石式的闲聊。“去他妈的！我都是为了我的孩子们。难道你不明白吗？我是为了我的孩子们才被判了B等重罪。”说真的，孩子们的福利金问题是凯蒂在拘留和监禁期间最关心的事情。

凯蒂：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和那个有身孕的吸毒者拉上车后，我非常担心：“天啊！我的孩子们不知道我在监狱。如果有人知道了怎么办？如果有谁看见我进了监狱怎么办？他们会说：“这可是抢劫她家的绝好机会。”这怎么办？或者他们还会杀死我的孩子，抢劫我的家……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侮辱我的女儿？满脑子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你知道吧？菲利普。

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在想，如果警察知道我的孩子还小，他们会设法把他们带走的。他们在货车上还问我：“你有孩子吗？”我说：“有。”他问：“多大了？”我脑子一转，说：“最大的20岁了。”他说：“你的孩子没事。”

事实上，我家里最大的孩子15岁，最小的才2岁。

谢天谢地！多亏有我嫂子帮忙。她知道后，立即把我的孩子们接到她家里，送他们上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真的待他们很好。

与凯蒂的嫂子不同的是，凯蒂的老板可没站出来帮她。

凯蒂：可恶！我的老板没有来保释我。一句话！一团糟！我可是因为他们进的监狱。吉诺没人保释，在那里待了两年……太不像话了！听说吉诺是那里最好的销售员，还是吉诺为他挣了大钱。

他的保释金只有2000美元，他们却说他们没法保释他！他的妻子和孩

子该怎么办？

我是说，如果他们不理我，我是准备好过苦日子了。但如果他保释我，帮我找个律师，法官会给我判刑。如果他们把我放在这儿不管，那就试试看！见鬼！我不是个告密者，但我绝对会说出他们的幕后是谁。

我是说如果你不保释我，那我们走着瞧，因为侦探会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他会告诉你：“如果你说出幕后人物，我们倒可以做笔交易。”所以，如果老板不来保释我……像现在对待吉诺那样……我向上帝起誓，我会把他们一个个都供出来，从马汶开始一直到下面，最后一个不漏。

后来我找了法官，“好吧！判我1到3年的刑吧，法官。”这次我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我刚开始为他们干活，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

是瑞寄给了凯蒂2000美元的保释金后，她才被释放出来的。

凯蒂：我为马汶干活被捕后，没让任何人转告瑞来保释我，这不关他的事。我不能让他来帮我，又不是为他干活而被捕的。

但后来，我在法庭上见到我哥时，他对我说：“瑞让我天天来看看你，说不管多少钱，他都会为你出的。”

瑞这样做完全出于他那颗善良的心。

这次痛苦的经历，为凯蒂的扩大型的家庭及朋友们的爱心和团结提供了一个平台。^[20]

凯蒂：我从监狱出来后，他们已经在我家炒好了豆角和猪排等我。

不过，你出来后，根本没有什么胃口，吃不下去饭。我的朋友格兰迪斯(Gladys)过来了，他们出去给我买了鸡翅，他们知道我喜欢吃鸡翅，但我还是没有胃口。

两三天后，我吃饭才正常。因为心里总有那种感觉。洗澡也一样，洗过后还能闻到那种臭味，像粘在身上了一样洗不掉，就是监狱里的那种味，我一想起来就想吐。

监狱里的母亲们

在凯蒂的重罪案被一位宽怀的法官宣告取消后那些焦虑的日子里，我和普莱姆

花了很多个晚上，听她讲那些发生在监狱里的战斗故事。她讲述的候审室这个女性空间里的抵抗和侵犯的故事，从个人层面上，让人想起了美国呈螺旋式上升的女性犯罪数据所呈现的制度上的紧张关系。

刑法部门太过拥挤的状况，反映出街道文化中性别革命的另一面。具体而言，传统的乡间监狱里的男性空间，如今受到了代表美国重刑犯上升最快的一群女性的“侵犯”。^[21]我在录音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这种紧张局势的存在，因为普莱姆在凯蒂讲述的过程中，用颇似小孩子式的令人厌烦的方式不停地打断她，好像是在嫉妒一个女人在这种以男人为主题的场合竟成了专家。

凯蒂：监狱可不是人待的地方，都是些垃圾废物，那绝对不是干净的女人去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去那里。一句话！管你有罪无罪，他们都把你和别的犯人关在一起，和犯人一视同仁。那是活该去那里的女人才去的地方。

我是说，和你关在一起的女人都很下流恶心，你需要好好应对。有些是妓女，有些是吸毒的，有些是同性恋。

别提了！那里不能刷牙，没有肥皂洗澡。因为心情特糟，什么都咽不下去。他们倒是提供红肠和奶酪什么的，但太难吃了。

普莱姆：我可不这样想！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包括面包屑，我才不想挨饿呢。

凯蒂：还有，那里的男人对着你乱吹口哨。去我的牢房得先穿过关押男犯人的地方。当他们拿着我的照片时，其中一个小子出来问：“你丈夫会怎么想？”

我对着他骂道：“嗨，操你妈！”知道吧？我真的不在乎他……“去他妈的！”

他们把我带上楼，男犯人们都在打着口哨。

普莱姆：（手捂着嘴朝她笑着说）现在你丈夫会怎么想？婊子！

凯蒂：（没理会他）后来在牢房里遇见一个同性恋的女孩，她走上来说，（模仿着她的粗嗓门）“想按摩吗？”

（很讨厌地说）“这种鬼地方，我他妈什么都不要！”她回到她的女人那里去，用她的全身揉按着她。

随后另一个黑人女孩走过来说：“走开，我要睡觉了。”

我对她说：“你想怎么样？想干什么？这里明明是我先占的。”

然后另一个女人走过来，长得像猪似的，头发胡乱的蓬在头上。我对她说：“离我远点儿！我可不想头上长虱子。”

普莱姆：(咧咧嘴)你挨打了吧，啊？

凯蒂：我们能做的就是拿一个垃圾桶扔来扔去。

一些妓女连裤头都不穿，她们抬着脚，张开腿躺在那里。那些同性恋者更是恬不知耻地又抱又亲，像在她们卧室一样。好恶心！

普莱姆：(在后面噓了一声)就像来到一个四方的水泥大楼里，到处都是尿和呕吐物。

凯蒂：那是个……告诉你吧！每个正派的人都会想到自杀，像我那样。知道吧？我用内衣上的铜扣，对吧？于是我想，如果是金属的，就可以用来割断血管，对吧？但我扯下来后一看(用手比划着)，原来是塑料的……

普莱姆：你疯了，你可不能自杀！

凯蒂：我想如果我流血了或什么的，他们会把我带出去到医院，那里干净多了。知道吧？很正规的地方，吃的也肯定会不错。

普莱姆：没成功，是吧？

凯蒂：后来直到最后一天，也没有看守喊我的名字。我是说每天都会有人出出进进的，但我呢？“我怎么办？要永远待在这鬼地方吗？”(远方响起了枪声。)

普莱姆：是烟火吧？

凯蒂：我听着有点像 UZI 枪的声音。

普莱姆：不是，是 9 口径手枪。

凯蒂：后来我想会不会是他们把我的记录给弄丢了。

我抓住牢房的栏杆开始大喊，“放我出去！”像疯了似的喊叫个不停。

普莱姆：我告诉你，那里还真有人逃跑的。

凯蒂：那是个疯狂的地方，候审室更是放荡不羁，我不会给任何人推荐去那种鬼地方。

但知道吧？菲利普，那里可是你采访最好的去处。那里有很多女孩子，她们会说出自己的故事经历，不过她们经常会用很下流的语言。

还有个女骗子……

正当凯蒂开始讲那个女骗子的骗术时，普莱姆迫不及待地说起了他在监狱里听到的一个故事。我的录音变得模糊不清，分不出谁在说什么，他俩争相讲着街道上暴力犯罪的故事。我很奇怪普莱姆为什么不愿让凯蒂把她的故事安静地说完，于是

我打断他，把话题转到凯蒂的孩子身上。这一句话让凯蒂立即起身飞快地往家跑去，她两岁半的孩子还独自一人在她 17 层高的公寓里呢！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普莱姆对凯蒂的恼怒变得更加明显。凯蒂用她的神能操纵着负责她案子的律师和法官，最后还真的有了结果。她从都市医院里拿回可以在法庭上证明她精神健康状况的档案，上面记录了她 21 年来被虐待的历史、她的自杀倾向及母亲的身份。最后主管案子的那位律师不仅帮她解除了对她的重罪判罚，还让政府支付给她当护士助理需要交纳的职业培训费。

然而，凯蒂在法庭的最后胜诉开始得并不顺利。第一次开庭时，法官几乎因为她的着装问题无端地定她侮辱法庭罪。这是对于一位悔过自新的母亲在公共场合如何着装的不同阶级、不同文化阐释的冲突。严格按照律师的建议，在开庭时凯蒂穿着一身“质量上乘的、新的”血红色套装。事实上，这身衣服还是她借钱特意为这一特殊场合买的。那个快要退休的保守派白人女法官认为，一位 34 岁的波多黎各女人，头发染得乱七八糟的、穿着一身鲜红色的少女套装出现在法庭上是有意气她。更糟的是，这个市侩气十足、嗓门粗重、下巴上有伤疤的被告，还请求宽大处理，声称自己是个经常受虐待的五个孩子的母亲。

凯蒂自认为自己穿着“醒目”的衣服是为了表示对法官的尊敬。她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于是她立即把这位法官的告诫与性联系起来，认为那是一个年老色衰的老女人对自己的嫉妒。

凯蒂：我的第一个法官因为我的穿戴根本就不尊重我。

去死吧她！我还因为她的穿着不理她呢！她不喜欢我的衣服，为什么不给我钱，让我买身好点的衣服？她随便给我什么穿着，肯定都会比她好看。因为我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我有五个孩子要照看，没时间为了法官专门买身衣服。

给你说吧，那个法官肯定有问题：她的乳房耷拉着，她丈夫可惨了。如果我有那样一个女人，每天……哼（发出鼻音）“我讨厌你的内衣……我可不愿跟你睡在一起……不喜欢你的睡衣……我讨厌跟你上床。”

那里整个制度都很垃圾，告诉你吧，你再也不会到那里去了。如果我杀了人，我会逃跑——消失……。一句话！我会把头发一染。告诉你，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我得找一个好点的律师，我得和瑞商量一下，他的律师就很了不起，会把你的案子保留好多年。看看刘易斯和瑞，他们之前犯的可都是重罪，可现在一点事都没有。

普莱姆：没错，但如果你犯了罪，那就得准备好过苦日子。

看看吧，凯蒂，我请求有罪。（指的是他一年前被捕的事）尽管来查吧……我在做这个买卖，我在捣乱，是吧？一次重罪，五年缓刑。

如果我再捣乱，再犯同样的错，就会判最重的刑了。

凯蒂：普莱姆，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可不能判重罪，我不会去请求重罪。我只想要个轻罪，我不想犯罪记录上有个C级罪。我必须找一个律师把我的案子给结了。

普莱姆：我被抓进去后可不想再找事了，我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准备。

凯蒂：如果我请求重罪，就不能起诉那家伙（菲力克斯）了。我已经把材料准备好了，就等找个人递上去就行了。

普莱姆：我可没有什么好律师。（故意找事似的）我那时可是在替你丈夫干活，但那儿有谁为我找律师呀，我没告诉任何人，没人会有那么多钱。

再说了，我有罪，我做了那种事。

凯蒂：你们这些人态度就不对，我讨厌这个，别说了。

我们陪同凯蒂一起走在她公寓楼第17层的楼道里，她一把抓住普莱姆的肩把他推到打开的电梯里。我赶紧随后跳进去，凯蒂却从快要关上的电梯里挤进一条腿，深情地抱着普莱姆的腰，小声对他说，

普莱姆，你从来都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可是我唯一的爱，抱抱我吧。如果你想早上五点钟来找我我就来吧，我没事。

我礼貌地把头转向一边，但看见的是三个刚用过的快克瓶子，扔在一摊尿上面，这种场景，在周六晚上两点钟的哈莱姆东区纽约公建工程楼的每个电梯的角落都可看到。我闭上眼睛，想象着他们的亲吻声是来自那个遥远的乡巴佬时期的泥土里，宣告着未来女性解放斗争的开始。

第七章

家庭及其痛苦中的孩子

你知道现在这些女孩子们都怎么了？她们只替自己着想，只想着她们的性快乐，想着她们的兴趣，她们的幸福，根本不把孩子放在心上。

——凯蒂

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一般被视作幼童社会化和家庭暴力方面的“专家”。他们针对处于危险境地的孩子的考察研究，涉及人数过百万，跨越好几代人。他们的考察结果和统计数据表明，成人的性格是在婴儿期形成的；大部分6—8岁受虐待的孩子实际上是无药可救的。他们同时还认证，孩子们不一定是因为身体受到暴力的摧残才在情感上留下伤疤，有时单是亲眼目睹暴力就会在心里留下长期的创伤。^[1]

换句话说，根据幼童社会化的权威分析理论，住在哈莱姆东区的大部分人，当然也包括瑞社交圈里和我经常光顾的快克买卖点里的所有人，可以不被视作反社会者，因为他们都有着童年时被社会化的经历。20岁的塔巴莎，14岁的朱内尔，10岁的杰克，1岁大的利莲，都亲眼见证过凯撒和普莱姆之间动刀动枪，他们自然也会遭受到情感上的苦痛与悲伤。然而，这种特定的心理决定论，却再次忽略了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忽略了历史的进程和围绕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影响。发展心理学家趋向于仅关注个体的神经机能病，他们的数据和分析工具也受其具有文化和阶级偏见的调查方法的局限——为了收集一些可信的调查数据，他们的典型病例中绝大多数都是白人中产阶级家庭。

纽约市的经济重建和波多黎各移民的历史，已经深深地改变了哈莱姆东区的家庭结构模式。对于大多数贫困家庭来说，这些变化是毁灭性的。而在家庭解体过程中，孩子们理所当然地成了最终的受害者。从整体上来讲，这一问题与我在上一章中论

述过的性别权力关系不无瓜葛。母亲的作用依然如故，但女性的权利和传统家庭结构却发生了深层次的、长期的转变。母亲们，特别是那些单身家庭的母亲们，依然是养育孩子的唯一力量，尽管她们不再愿意为了自己的后代而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自由。但当她们走向街道后，养育孩子就成了一句空话。忽视、虐待孩子的事件与日俱增，毒死胎儿的数字急剧攀升。^[2]责任的缺失迫使破碎家庭里的孩子走上街道寻找庇护，街道文化也随之演变为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化的力量。

美国的政治家、新闻界和一般公众，都将城市儿童所面临的这一突出问题视为“家庭价值观危机”的结果，但持续的贫困、种族隔离以及变化着的性别权力关系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公众讨论中却很少被人提及。人们在政策辩论中，从未涉及直接的政策干预，诸如对于那些不知所措或有毒瘾的母亲的孩子们提供一些日常力所能及的照顾之类的话题。同样，针对女性生活的水深火热、有效的戒毒设施、或有意义的职业培训和职介服务等解决措施，更是无人问津。

街道文化中的孩子们

哈莱姆东区的孩子一直过着艰难的生活。对于最初两代移民来说，他们的四邻永远都是一个贫困的被隔离的家。正如历史文献所证明的那样，学术和社会服务界谴责年轻人不断“恶化”的境遇和日益加剧的街道暴力事件，颇像上世纪末对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预言。例如，20年代后期，距游戏厅有两个街区远的意大利天主教堂的牧师就告诉过一位大学生，“鲁莽的年轻人的毁灭性特质变得越来越明显，对财产权利变得越来越漠视。这都是因为缺少对宗教和权威的尊重。”^[3]

同样，在50年代中期，有个社区服务团在关于游戏厅对面的社区条件所写的报告中，抱怨“骚乱的街坊里，孩子们感到很不安全。”作者这样总结道：

家长、老师及学校监督员，还有青年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普遍反映，“这些孩子们没有任何选择。”……长期生活在充满骚乱和毁灭的环境里……使这些青少年有种侵略性的行为。……养成了一种反社会的习性。^[4]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居住在哈莱姆东区街道上最具压力的层面，就是我亲眼目睹了许多朋友和邻居家的孩子们走向毁灭的事实。我住在那里，有足够的时间亲眼见证了几十个女孩、男孩从儿童期到青春期被毁灭的过程，眼看着这些充满朝气、

聪明伶俐的孩子被推挤到美国社会所谓的最底层。在短短五年时间内，每年都送我情人节礼物的邻居吉吉，从一个直爽、漂亮、招人爱怜的8岁女孩，变成了有身孕、无家可归、吸食快克的13岁的“少女”，而她的哥哥海科特，则从一个害羞的、爱咯咯笑的、矮小的12岁男孩，变成了一个“持危险武器袭击人”^[5]的少年犯。

我刚搬到这里时，看到快乐的孩子们一天到晚在我的公寓前跑着、跳着、喊着、笑着，心里感觉暖融融的。有人在20年代对这些街区所做的人种学分析，到了90年代同样确切：

街道口……成了孩子们玩耍的主要场所。一群群的孩子……有的在踢球，有的在掷玻璃球玩，有的在打牌。他们成了躲避交通的专家。……仅1927年一年内，第二、三大道上就有15个孩子死于交通事故。^[6]

我早先的实习笔记上也记录了刚来这里头几个月所结识的几十个少年朋友：

1985年5月。

我喜欢孩子们不管我什么时间回家，都高高兴兴地跑来找我。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拥抱我，给我讲故事，问我问题。每当有人抱着刚出生的小婴儿从我跟前走过，我都会很自然地弯下腰，热情、温柔地说句祝福话（愿上帝保佑你！），即使这位母亲不认识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其他人那样，心安理得地接过这个孩子，抱在怀里。^[7]

然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里到处都能听见小孩子的号啕大哭声，以及从邻居家窗户里传来的萨尔萨舞曲和RAP音乐的吵闹声。

时隔两年，怀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埃米利亚诺(Emiliano)走在大街上，引来无数的祝福声和柔情的低语，我仍坚信哈莱姆东区的人们对待小孩子有一种特殊的能量和爱。我甚至还学会了去欣赏当地一家超市的无章法和破旧不堪。每当我从前面的人行道穿过，至少有三四个收银员会从她们的机器边跑过来敲敲窗户，送个飞吻，扮个鬼脸，逗得小孩咯咯咯地笑个不停。要是按照商业区社会里工业化的泰勒式(Taylor)逻辑，这些多情的未来妈妈们早都被经理解雇了。我带着埃米利亚诺去商业区参加以盎格鲁人为主的聚会时，注意到他对大人表情的失望感，他期待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更具欣赏性能力的身体反应，但我的白人朋友和熟人中几乎没人知道怎样自然地抱孩子，没有一个像住在非商业区街道上我的那些熟人一样，习

惯性地跑过来，从我的怀中接过小孩抱抱并给他祝福。事实上，这里的朋友邀请我去他们家时，还叮嘱我把孩子丢在家里让保姆看着。

当我儿子16个月大学会的头几个词是“顶级、顶级、顶级”时，我对街道生活中两代人之间的情感和融洽不再那么欣赏了。我一直试图打入一个新的特别活跃的快克买卖点，所以经常带儿子去那里，以打消他们对我身份的怀疑。那个街角有四个竞争激烈的“买卖点”，都在卖三块钱一小瓶的快克。当班的毒贩们向着他们的客户大声喊叫着，宣传以瓶塞颜色代表的不同品牌：“灰色顶级！灰色顶级！粉色顶级！粉色顶级！黑色顶级！黑色顶级！”几周过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被挤在一群人当中，他们包围了出于个人动机打死一个黑人的两个白人警官。人们高喊着“释放黑人！杀人犯！杀人犯！”在场的唯一两个“杀人犯警察”正对着他们的对讲机疯狂地请求支援。^[8]这时，坐在我肩上的埃米利亚诺却高兴地拍着小手，和着那些愤怒的喊叫声，把周围的人群都逗笑了。

作为家长的我正在汲取着社区里其他母亲们的教训，要么对街道文化持反对态度，不来公共场合，把儿子关在窄小的公寓里；要么让他每天面对毒品和暴力现实。10岁的安杰尔和8岁的曼妮(Manny)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孩子，当他们的妈妈艾丽斯(Iris)因用快克而精神崩溃、身体怀孕后，我对自己身边这群孩子的未来前景失望了。有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坐在黑漆漆的天井院里（因没钱交电费家里停电），从一个空空的瓶底刮花生酱吃，而他们的母亲则昏倒在床上，还没有从前一天的“使命”中恢复过来。从那之后，我和妻子也就不再随便去拜访他们的公寓了。

我开始为他们和街上其他游荡的孩子安排两周一次的旅游。越过纽约看不见的种族隔离带，我带他们去参观博物馆和其他一些世界有名的小资天堂，像FAO Schwartz玩具店和Trump Tower。他们对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的沃霍尔展览很感兴趣，安杰尔甚至还自信地对我说弗雷克博物馆里的德国藏品“一点儿都不乏味”，但对惠特尼博物馆里“非传统”的多媒体/说唱乐/涂画/奇形怪状的滑板反而没什么印象。

限定哈莱姆东区这群孩子的种族和阶级的所有力量，在这次外出活动中表现得昭然若揭。比如博物馆里的监管人员，手拿吱吱作响的步话机，经常告诉我们别靠近展品，还不时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好像我是个恋童癖，正在猎获自己的牺牲品。安杰尔对于古根汉姆的琼·米洛(Joan Miro)展览很害怕。当他问一位波多黎各老乡守卫为什么跟他那么近时，他说：“防止你抬腿。”

从米洛展览馆回来的路上，我带他们去了母亲那里玩。我母亲住在丝袜区最东

边，离我们的公寓不到20个街区远。¹⁹¹安杰尔简单而纯真的愿望“等我长大挣了钱也让我妈妈搬到这样的房子里来，我希望她也能住在这样的地方”，引起了我的许多反思。当他又说“这里的学校肯定也很好”时，我赶紧借此机会让他说说教育体制在结构上的欠缺问题，但他的回答却集中在他们作为受害者自身毁灭性的行为方面。

菲利普：怎么了？你在说老师吗？

安杰尔：不是，我害怕那里的同学。他们老在楼道里行凶抢劫。

那天晚上安杰尔还向我抱怨说，他妈妈的男朋友打碎他的存钱罐，把他在超市替人送货挣来的20块钱小费拿走了。安杰尔还指责他妈妈不该唆使她的男朋友打她、抢劫公寓，而她自己则请另一个男人来她卧室。“我一直告诉我妈就交一个男朋友，可她就是不听我的。”我被迫站在这些孩子们一边，从这些天真无邪的言谈中我认识到一个野蛮的动力，而这些弱小的受害者，就是借此把支配着他们的社会结构内化到最终支配他们自我毁灭的程度。天黑后，我给了他们一些纸和画笔，让他们趴在我的车上画画，画面中表现出的挥之不去的悲痛和残暴，更有力地明证了这一点。

随着我这群年幼朋友的成长，游戏厅或社交俱乐部这种地方逐渐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主要建筑，他们已经适应了毒品买卖的“正常性”。在哈莱姆东区，快可买卖处几乎成了青少年们唯一的去处，因为那里冬有暖气夏有空调。除此之外，如果想参加什么娱乐活动，根本找不到比较健康的活动场所。哈莱姆东区的许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公寓房都相当拥挤，臭虫成灾，冬天寒冷，夏天炎热。因此，街道或快可买卖点反倒给大家提供了一处舒适的起居室。

凯蒂的儿子朱内尔是我见证的第一个变成快可贩的男孩。他13岁时，我第一次问他长大后想干什么，他说想“有汽车、女孩和金项链”。有次谈话中，他还梦想当“警察”。那是个午夜，我们坐在瑞停放在游戏厅门前的林肯车车盖上。

普莱姆：(喝得醉醺醺地说)不会，你将来也就是像我和凯撒一样的傻瓜。一个没用的、罪行累累的、浪费生命的人。

朱内尔：(急了)哎，哎！我能当警察的，如果我愿意的话。

普莱姆：对！对！一名性暴力的警察——去强暴女人——因为你有徽章也就有了权威。(从凯撒那里传来奇怪的笑声。)

安杰洛(Angelo)：(朱内尔的好朋友，笑着说)没错！没错！

朱内尔:(还是很认真地说)不,我就当警察,逮捕人的那种。

普莱姆:(严肃)对,抓我这样的人。

朱内尔:不,抓那些抢劫的,如果他们犯了罪的话。

菲利普:(转向安杰洛)你长大后想干什么?

普莱姆:(打断我)男妓还是毒贩?

安杰洛:不,我想当法官。

随着时间推移,朱内尔越来越多地被卷进游戏厅的生意中。毫不夸张地说,在他自己弄明白之前,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快克速递员,而他还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在干一些简单的“差事”。朱内尔很想成为一名对大人有用的人,普莱姆经常让他去某个地方拿10美元装的可卡因粉,或是去不远的酒馆买几罐啤酒。朱内尔不吸毒,他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只是喜欢和大人一起干活。朱内尔16岁生日前,由于凯撒无节制地喝酒吸毒而不能按时上班,他开始替代凯撒当上了眼线。不久,瑞就提拔他周末长期在俱乐部里做眼线,取代了因滥用快克而不能胜任的刘易斯。这时朱内尔已经辍学,而且已经有了青少年开车的经历,但他严肃地戒了酒,成了一名很忠实的雇员。因为母亲凯蒂经常让他在白天照看小妹妹,所以他只有在夜里当差作眼线。

当我试着让他明白自己正在卷入毒品买卖时,我们之间的谈话却转变成快可买卖点的逻辑是如何在那些想学好的孩子中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的。

菲利普:朱内尔,既然你不想当毒贩,为什么还在晚上为普莱姆干活?

朱内尔:没有啊,我只是当眼线而已。我不会去碰那些东西。我妈妈是知道的,她说我可以干。

还有,我知道毒品很要命,它们会把你送到医院去的。

菲利普:(对着普莱姆笑笑)朱内尔,那你以后怎么办?想变成普莱姆这样地球上的渣滓,一个卖毒品的吗?(用严肃的口气说)继续卖毒品直到有一天被抓起来。

朱内尔:不,不会的。如果我再被抓起来,麻烦可就大了。

普莱姆:(打断)不,第一次不会抓。

朱内尔:因为车上有那些东西,但我会被送回家的。

普莱姆:(用恩赐的态度说)如果你现在卖毒品被抓,不会有问题,可第

二次就不同了。

（转向我安慰道：）他得有人替他担当点，有人保释他——（笑了笑）很可能。

惩罚街上的女孩

我离开纽约后，朱内尔开始吸起毒来，刚开始吸的是大麻，但他还没有因买卖毒品被抓过。他12岁的妹妹杰茜，小小年纪却以对女孩来说一种野蛮的方式，完全步入了街道文化的航道。这件事发生在她父亲菲力克斯从监狱里出来之后恳求回到凯蒂家的那段日子里。杰茜学着她妈妈的样子，回避着父亲回来后的吵吵嚷嚷，跟着她的男朋友跑了。但她未来的保护神王子，却叫来他的好几个哥们儿在车里把她强奸了。她72小时没有回家，尽管凯撒后来骂她“破鞋”，普莱姆也把她被强暴的事简单地评价为“她那里痒痒，被人给抓了”，但他俩在杰茜被劫持后却始终和凯蒂和菲力克斯站在一起。这件事实际上让菲力克斯以一位父亲和丈夫的身份永久地回到了凯蒂的家。

凯撒和普莱姆对杰茜“私奔”的那天晚上的讲述，变成了表达相互间的痛苦和脆弱的绝对诚实的论坛。

普莱姆：我们刚刚买了一些可卡因粉回来，就去了凯蒂家。

菲力克斯在那儿哭着。他服用了过量的可卡因，在一边哭个不停，鼻子里还有可卡因。“我只想让我的女儿回来。”

（假装拿起装有可卡因的火柴盒放到鼻子底下去吸）吸一次，再吸一次。

大约是早上四点多钟的事。

凯撒：我想起了我姐姐。

普莱姆：（打断他）他们还给了我们几张照片好让我们去找杰茜。

我们下了楼，在所有的楼层上去找，去问。

警察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全知道了。

我们回到楼上去看看有没有人打电话什么的。我们说了很多，那个家伙（指着凯撒）还哭了，他肯定还记得。

凯撒：（着急）对，对，我哭了。

普莱姆：他想起了在楼区被人刺死的姐姐。

凯撒：那会儿我觉得很难受（猛地转动了一下眼睛），因为我想到了一些愚蠢的事。

我跟凯蒂说——因为我在房间里很伤心——“见鬼！我觉得很恶心。”

她对我说：“你应该去看看医生。”

那时大家的表情都很严肃。菲力克斯就这样（凯撒抬起眼睛，眼珠子转来转去）……一个字！（晃动着两个手腕）眼球都吐出来了。

我们都在场。

普莱姆：（温和地对凯撒说）我不知道你当时在哭，后来听菲力克斯说，“别哭，凯撒，别哭！”我看看你，看看周围的人，说了句“见鬼！”

凯撒：对，因为我想起了我姐姐是怎么被杀的。那些狗日的刺了她17刀！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普莱姆：（把手搭在凯撒的肩上）后来塔巴莎（凯蒂的大女儿）来了，她开始大声哭起来，她有歇斯底里症。

警察打过几次电话，凯蒂也核查了每个该死的机构，甚至包括女王州和新泽西州，看看杰茜会不会在那里的监狱里。

她回来后真的快崩溃了，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一直在哭，根本就没睡过觉。

那是个星期五，到了星期六，杰茜还没有音信。凯蒂出去贴告示去了，她在附近也贴了几张。

凯蒂在找你，菲利普。她想和你谈谈；让你帮她在电话里给人家说清楚，因为她在第23管辖区受蔑视。

他们只是说：“嗯，哦，有一个离家出走的波多黎各臭婊子。”

凯蒂现在想见你。她想用她的方式把情况给你说说。

女儿的痛苦经历让凯蒂很难过，但却增进了她作为一个有过同样遭遇的母亲和他人的团结协作。不顾街道文化对这种暴力形式双重的否定标准，她毫不隐瞒地让我们接受了杰茜被轮奸的事实。

凯蒂：菲利普，你不知道当时我都崩溃到什么地步。吃不下，睡不着；……不知道女儿在什么地方，会不会被人折磨、被人杀害。就知道她现在需要你。

你的孩子在叫你，可你却去不了，你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她走后的三个晚上，我都是躺在她的床上睡觉的，看看上帝会不会给我什么启发。

他们把她带回家后，其中一个男孩对我说那是个误会，杰茜本来是想去参加一个聚会，可聚会取消了。

他们没有强暴她。但她吓坏了，离家太远——牙买加，女王州。你想想！一共三个男孩，还有另外一个女孩。

她说她太害怕了，不知怎么办？糊里糊涂的——所以屈服了，她只有12岁。

我带杰茜去了趟医院，她需要心理辅导。但我没有再带她去，他们给她做检查时她疼得厉害，不想再去了。

我想让她知道那不是她的错，即便是她情愿。她觉得生命受到了威胁，所以她做了。

谢天谢地！她没有怀孕！

普莱姆和凯撒坚决反对凯蒂对女儿被欺负所做的解释。接下来的几周内，他们的谈话中心都是对强暴者免罪和对杰茜的指责。事实上，他们第一次把这件事说给我听时，凯撒还在街对面笑着把我叫出来，“菲利普，你听说了没？杰茜现在可成了妓女了。”当我争辩说杰茜只是被轮奸时，普莱姆用年轻时他和刘易斯、瑞一伙人“在俱乐部里操练过一个女孩”做对比来反驳我。他认为这是“因为受影响而被强迫”，但不是强奸。尽管他也承认她是被迫与两个男孩发生性关系的，但他坚持“我认为那不是强奸。依我看，她不是被人拖住……被迫做的。”

为谴责杰茜的性淫乱，普莱姆还援引女人透过窗户看男人这一象征性的犯罪——哪怕这个窗户有17层高。

看起来她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经常看见她站在窗前，喊着街区里几个男孩的名字。

杰茜就是想在外面浪荡，不想回家。

强奸犯最终免受责备是因为杰茜并没有后悔，没有依照传统的办法与其中一个劫持她的人组成一个核心家庭。

普莱姆：(吸了口可卡因)杰茜看起来很平静，根本不像个受害者。

而且她还和那个男孩子说话。我问她他是不是长得很好看，她说：“是的。”
（耸了耸肩）她一点儿也不伤心。

凯撒：如果她被人强暴了，自己乐意，你怎么办？

普莱姆：对，她很可能怀孕，因为她欲望挺强的。

菲利普：你在说屁话！普莱姆。

凯撒：她只是很多事例中的一个，孩子生孩子。

普莱姆：（喝了口啤酒，吸了次可卡因）你不明白吗，菲利普？因为她想去，这事才发生的，是她想要。现在杰茜表现得那么不在乎，这事已经不是什么悲剧了。

凯撒：（吸过可卡因后）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次错误而已。要是她有个男朋友，他们没准住在一起，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

（又吸了一次）我认为，她如果能和这个男孩把关系定下来，这件事就这么着了。

他们最后谴责凯蒂违背了性别角色，酿成了有错误的女人的下一代。

凯撒：还有，即使她是偶尔做爱，……或者被强奸，她妈妈也不该那样对她说：“好了，你得学会避孕。”这样就等于告诉她：“你可以继续，但只要不怀上孩子。”凯蒂认为女孩是圣人。

普莱姆：（再次吸了可卡因，又喝口酒说）她就是个骚货。知道吧？淫妇一个！

凯撒：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吗？不怪别人，是她妈妈给她做的示范，她妈妈就很不安分，她姐姐也一样。

凯撒把街道上性别角色转换这一不断发展中的危机归总为厌女症的基础，结束了这次特殊的讨论。

凯撒：所以我才真的不想要女儿。

我受不了别的男人碰她，所以我一直对女人有偏见。

在脆弱的猎物如何互相欺凌，并将其在结构上边缘化相内化这一经典事例中，凯蒂为了她12岁女儿的利益所能采取的“积极”行动——给她提供避孕药除外——就是动用她生活中的全部男人，对另一个被强奸的女孩的母亲进行猛烈攻击。

普莱姆：凯蒂应该撕烂她的嘴，因为她说：“你女儿是鸡。”这个女人说：“什么？我女儿？”凯蒂朝着她的嘴上煽去。

这位母亲说：“我得把我女儿叫来，咱们比个高低。”但那时候，凯蒂的朋友卡洛斯和其他人都赶到了，带着枪，还有其他家庭成员以及塔巴莎丈夫家的弟兄们，一大帮人都来了。

寻找意义——在哈莱姆东区生孩子

目睹了街道上这些孩子在其最为脆弱的年纪受折磨这一极度混乱状态，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做母亲的还要生那么多的孩子让他们来受苦受罪？我住在哈莱姆东区的五年里，那里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实际上都至少有一个孩子。普莱姆的女友玛丽亚就是其中一例，她怀孕后不愿去做人工流产，尽管普莱姆当时因第二次买卖毒品还在重罪审判中。仅仅两个月前，玛丽亚和普莱姆才被赶出她姐姐的公寓。玛丽亚姐夫的毒贩同伙死在车里后，姐姐全家逃往康涅狄格州的大桥港。玛丽亚怀孕时，她重 250 磅、整日郁闷不堪的酒鬼母亲和她住在一起。我的实习笔记上这样写道：

[1990 年 3 月]

普莱姆带我去看了玛丽亚家。家里到处都是垃圾、破家具和空酒瓶。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吐出来的酒精的臭味，蟑螂在地上爬来爬去，盘子里还有吃剩的煮白菜和煮肉，客厅里撒满了玛丽亚的继父还未吃完的饭。玛丽亚一般只能躺在很垫背的沙发上睡觉。

普莱姆告诉我，这些比起玛丽亚的母亲晚饭喝醉后的鬼哭狼嚎好多了。显然，她经常和丈夫打架，责骂他的不忠。据普莱姆讲，有时她还用刀子刺他，“但不敢使劲，轻轻碰碰而已。”

今天，她的脸看上去有点肿，因为昨晚在公立学校看门的酒鬼丈夫对她进行了还击。“她挨揍了。”

怀孕后的玛丽亚显得特别高兴，那是我见到的她最高兴的时候。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正是她那不幸的生活条件使她如此渴望当一位母亲，她是在用一种浪漫的方式来逃避真正的困境。她的怀孕同时还巩固了她对普莱姆的一往情深。我们都相信，这次普莱姆肯定至少要被判 4 到 6 年刑，玛丽亚如今有了普莱姆的孩子，

在她看来这可以证明普莱姆在服刑期间他们的关系仍然很好。她开始写诗来赞美她和普莱姆的关系及其他他们未来的后代。那一时期玛丽亚高度的自尊感，实际上来自于她拿给我看的日记。例如在下面这段日记里，她对自己身体的欣赏内化并战胜了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模式化的理解。

我有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猫眼一样的性感；我有一个标致、肥硕的屁股，活力充沛。……我有一对灵巧的双唇，恰当地长在脸上；我有一头卷曲的长发，随意飘散。

她对自己肤色偏白^[10]的男朋友更是欣赏有加。

我 18 岁，他 26。他明眸皓齿，双唇透着诱人的美。他的臀部很性感……他的头发弯曲发亮。^[11]

然而，普莱姆对玛丽亚却既挂虑又恼怒。他被他的案子搞得焦头烂额，痛苦不堪，又苦于找不到一份合法工作。他很绝望，恳求玛丽亚把孩子打掉。当她给他看自己写的爱情诗时，他还出人意料地辱骂她，“该死的臭婊子，长得像米其林男人一样的黑。黑鬼！”

玛丽亚的怀孕同样还出于物质上的诱惑，因为怀孕意味着在纽约住房紧缺的条件下，可以得到一套政府补贴房，营建起自己独立的家，而且租金不贵。我住在那里时，登记要房的人已经排到 18 年前了。^[12]根据一项旨在减轻紧急收容所和公建工程公寓人满为患的压力而特别制定的扩大方案，怀孕后无家可归的女孩子有权先得到一套公寓。玛丽亚打造一个独立家庭策略的“唯一”的缺点是，她被安置在“青年行动”修复过的经济公寓之前，还得在临时收容所过上长达三个月的无家可归的日子。事实上，小普莱姆就是在那里生的。

而在同一时期，玛丽亚的姐姐卡门与她的男朋友凯撒也有了孩子。凯撒对她的虐待并没有减弱卡门的乐趣和爱情。当然，凯撒还逼迫卡门让她的大姐当她六岁女儿的养母，并且经常打骂她两岁的儿子帕勃（Papo），说他不听话而且“反应迟钝”。^[13]卡门怀孕之前，凯撒还向她发出最后通牒，“要帕勃还是要我？”她也一直和她姐姐协商收养帕勃的事。

卡门的怀孕解了她的燃眉之急，不仅凯撒同意当帕勃的继父，他姥姥还邀请卡门搬进她的公寓和凯撒一起住，并且替她在公建工程住宅机构注了册，认可了她的

身份。但凯撒自己为了逃避计算租金时连他的保险份额算进去，从来没有以一个居住者的身份合法注册过。

卡门和玛丽亚顺应传统，借助和自己理想的男人的一段浪漫爱情，逃出了一个充满感情危机的家。

卡门怀孕后不久，给我看了她写的周记，她对凯撒的迷恋比起玛丽亚对普莱姆的爱情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把自己与凯撒的关系描述成“岛上的天堂”：

见到凯撒的那一刻起我就对他着了迷。但当第一次真正和他在一起时，又觉得我们是一见钟情，直到今天我还有这种感觉。我想你可以说我爱上了他。当我看见他时，我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他一走近我，我便有种晕眩的感觉。

我真的爱他，我会永远关心他，不管发生什么。我知道我的儿子帕勃也喜欢他。

玛丽亚和卡门都还年轻，她们对于做母亲的渴望不应该被视为不成熟女孩那种一闪而过的浪漫念头。街道上成熟女性可选对象的有限性，不仅使女孩子年纪轻轻就做了母亲这一现象很普遍，而且还极具吸引力。

拿凯蒂来说，她与普莱姆之间的恋情以暴力形式结束后，对孩子们的爱让她的感情稳定下来，她也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作为一名能够自我约束的34岁的母亲，凯蒂全方位地发挥出她的“乡巴佬”作用，把自己及其家人从瑞的街道买卖里最具自我毁灭的结局中解救了出来。

凯蒂：我吸了五个月的毒来自杀，然后我醒悟了，对自己说：“我太爱我的孩子了，我不能死。”因为，如果你确实爱你的孩子，你就不会干错事。

我变得精瘦，顾不上去关心他们。尽管我不打他们，可也不想让他们来打扰我。我会粗暴地对他们说：“我不想听你们吵闹。”

他们经常问我：“妈咪，你怎么了？妈咪，告诉我们！别人都以为你服用快克了。”不错，上帝与我同在。那时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快要死了，看到唯一的儿子朱内尔在哭，看见两个女儿怪模怪样的。（突然停下来）上帝保佑，别让我再去想它，因为我反对毒品，我担心孩子们将来也会有毒瘾。

但别误会，我其实是个严厉的母亲，我相信最好的教育。我绝对是个严格、坚强、善良、有爱心的母亲。

菲利普，当你每天听见孩子对你说“我爱你”时，你会怎么样？我是个经历过很多磨难的人，从13岁起每天挨打，一天三次。为什么还要把这些转嫁到孩子身上呢？绝不！

所以我爱孩子，现在仍然想要12个。婴儿对我来说意味着纯洁——天真。你不会在他们过来求你“妈咪，别打我”还这样做。我反对虐待孩子。

我现在已经34岁了，还想再生五个孩子。因为我的孩子会走过来对着我说：“妈咪，爱你，爱你。”

现在的孩子身上很少能看到这些了。他们都很俗气，比如我妹妹的孩子——安杰洛，那都是因为他父母没有爱心造成的。

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我的孩子们从一年级开始都去天主教学校上学，我负担他们的一切。

快克与母亲的魔鬼化

凯蒂重又把自己的生活界定在孩子们的需要上。单身女性家庭这一情势的讽刺意味在于，与从前有婚姻关系的农村家庭一样，它取决于对父权制的顺从。街道文化把在地下经济中寻找刺激和快乐的父亲对孩子的遗弃视作寻常事，其中丝毫看不到母权或以母权为中心的成分，它仅仅代表着对母亲们更大的剥削，因为她们被迫无条件、全身心地投身于男人不愿分担的照顾孩子的责任中。

当这些被遗弃的母亲因为孩子而无法满足个人需求时，她们不稳定的家庭就会变得雪上加霜，没有人会留下来去安慰她们、呵护她们、照顾她们。哈莱姆东区街道上的孩子成了被遗忘的人：建构了以女性为主的家庭的旧时父权正在崩溃，当母亲们在地下经济或毒品中步父亲们的后尘，去寻找独立生活时，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家庭破裂的命运。

在凯蒂为瑞卖可卡因并有普莱姆这一固定情人的那几个月里，街道文化对于性别的双重标准在我面前开始变得明晰起来。瑞圈子里的人都诋毁凯蒂成为一个单身母亲，做了一家之长，但却完全忽略了她尚在监狱里的丈夫菲力克斯扶持这个家的职责。没有一个人主动向凯蒂的孩子们提供食物、住处和关爱。他们对凯蒂的非难之一就是，她需要一个强壮的男人来调教。

普莱姆：这个女人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孩子们像没妈似的，自己照看自己，因为当妈的得来来回回在俱乐部和家之间跑，像这个（用手比划着溜溜球的动作）。

丽莲还不满一岁。见鬼！朱内尔倒成了妈妈，替她换尿布。

有时候我觉得过意不去，也会去帮她，替孩子换换尿布什么的。

凯撒：白痴菲力克斯被关起来后，那个女人就崩溃了。

普莱姆：还有亚伯拉罕（养祖父）；他也经常为孩子换尿布，但他经常说，“真受不了。”

凯撒：这个混蛋，她男人一走，她就没辙了。

普莱姆：我是吃不下她做的饭。你去她家看看她的厨房，她做饭时手忙脚乱的，你根本就不想吃，我是指那些蟑螂。

女性们越来越不甘接受传统父权对家庭作用的界定，这一点在瑞的快克买卖点表现得尤为突出。那里的女人和女孩都在努力为自己寻求一片新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街道文化却竭力维持这些女性以母亲或不独立的女朋友身份处于从属地位。我的实习笔记上写着这样一段话。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

[1990年7月]

社交俱乐部门口，离台球桌不远的地方，停放着三辆崭新的婴儿推车，里面分别躺着刚刚出生的小婴儿，攥着拳头，睡得很香。

他们年轻的妈妈们却在争相博取小皮特的注意。他刚刚和自己的女友分手。

穿着紧身短背心的15岁的妈妈们在她们的宝宝睡着后，在生意的间歇时间，轻吻着台球手们的脖子。其中一个妈妈还踩着萨尔萨舞曲的拍子疯狂地跳着舞。

将会有多少人在今年夏天染上快克瘾？又将会有多少人怀孕？

当我问玛丽亚俱乐部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年轻的妈妈和婴儿时，她说：“这里有空调。”我无法和她争辩。当时那里正在经历一场热浪袭击，我敢保证这些女孩子即使有私人房间，也没有谁家里会有空调。

正如我在本章开始时所指出的，纽约市官方统计数字表明，虐待、遗弃小孩的现象已经泛滥。从80年代中期快克—可卡因流行以来，被安排收养的孩子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在攀升。^[14] 政界、新闻界及流行文化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是，80年代末到90

年代初盛行于美国的反毒品声浪的性别化。毒品恐慌对美国，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疲软时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不管流行什么样的非法毒品，都会有人恒定不变地将其描述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社会崩溃。^[15] 记者、甚至医生也经常把无力抗拒某一特殊药物，解读为当代社会结构中不管哪个社会阶层或种族群体都是容易受攻击的缘由。这一点颇似 19 世纪 80 年代发生在加州的对中国鸦片的恐慌。20 世纪初发生于南部的可卡因风暴也是如此：那里的行政长官要求增大“他们地盘上”的手枪口径，因为那里的黑人因吸食过量可卡因而很难打死。同样，30 年代西南部的墨西哥人在大麻恐慌中也受到过非人化的对待。^[16]

然而，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快克盛行的最突出的特点则在于，它不仅影响到某一族群或某个社会阶层对麻醉药品的癖好，女人、家庭和母亲也受到了冲击。有人谴责市中心吸快克的女性失去了“母亲的养育天性”。不言而喻，这是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女性首次占据街道上有毒瘾的人中的大多数，也是因为强加于以女性为主的家庭中的父权式的性别责任，因为陪同她们走进快克买卖的还有她们蹒跚学步的孩子和刚刚出生的婴儿。

女性公开吸毒，使得街道文化中的厌女症日益恶化。以男人为中心的地下经济，把女性从买卖、走私和抢劫这些有利可图、自主性更大的企业职位上驱赶出来。^[17]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街道文化这一暴力领地，这一现象正在发生变化，而在此变化过程中，女性仍然不相称地被迫以卖身来养毒、养家。大批女性走向了性市场，恶化了妓女的工作环境，从而导致市中心少女和婴儿性病的流行。^[18] 有快克瘾的女性更容易受到公开的性侮辱，因



当地一位快克贩的涂鸦艺术，上面有 80 年代的反毒流行语“向毒品说不”。照片提供：Charo Chacón-Méndez。

为她们为了那 60 到 90 秒钟短暂的兴奋，不得不忍受身体和口头上更大的侮辱。

新闻界、学术界及主流美国社会和市中心贫民区的居民，都喜欢去幻想吸快克的女性的“神秘”。有的人从道德层面谴责女性家庭价值观念的淡薄，有的则围绕对女性特有的皮下注射针头的憎恶，进行随心所欲的空谈。最为流行的解读，则不顾已被完全证实过的大部分人在注射大剂量的可卡因后会变得性无能的事实，大肆渲染快克—可卡因所谓的“春药”功效。记者、社会工作、毒犯及吸毒者自己都认同，女性大肆吸食快克是因为她们对性生活的不满所致。性想象有效地遮挡了美国社会中正在发生的性别作用及家庭组成中更深层的权利冲突。^[19]

因介入快克买卖而破坏了男性禁忌的母亲们，被指责成失去了母爱天性的动物。《纽约时报》还因此发起了一场以“变成魔鬼的母亲们”为主题的讨论，发表了题为“快克是母性的丧钟”的文章；《华尔街日报》还引用护士和医生的话，“滥用快克最明显、最可怕的一面似乎是母性的丧失。”^[20]

当公众对快克引起的药理学上的母爱丧失的关注达到高潮时，我意识到，自己为了追求街道文化而让儿子面对这里的林林总总，也该被谴责为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在一次关于毒品滥用的会议上，听到一位愤慨的人种志研究者的一番话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在拿自己的亲骨肉冒险，把他们带进快克买卖点来掩饰自己的行为。”听众中传来一阵阵的叹息声和交头接耳，再次明确了市中心与中产阶级社会之间的鸿沟。主流社会根本就不理解市中心街道上的毒品买卖有多么的“正常”。实际上，只要人们呆在街上，就不可能不把孩子带进快克买卖点去。比如，撇开我和这些毒贩的交情，我也会成为喜欢公共场合的几十个喜欢交际的邻居当中的一员，“不负责任地”让儿子每天面对毒品交易和暴力事件。在我居住的这个街区，碰到毒贩的几率与每天看日落、散步或在当地的熟食店里买冰淇淋三明治一样多。我抱着儿子走在街上，时常会有毒贩用波多黎各传统的方式礼貌地祝福他，或热情地恭维他的漂亮。在这种环境里散步的父母们，虽然坚决反对毒品滥用，但有时在上夜班前也会在此停留，或者带着孩子在毒品买卖地点逛荡一会儿。^[21]

我对主流社会对家庭危机的道德谴责的解构，敌不过看到推着婴儿的母亲在快克买卖点拼命寻找摇头丸时的痛苦的惊恐。有几次在游戏厅，我告诉过有快克瘾的孕妇只管自己寻找快感的后果。我时常跟瑞和普莱姆辩论，批评他们不该把快克卖给这些孕妇，他们应该为新生儿生命的创伤负责。

起先，游戏厅的毒贩们不知道我对这件事如此反感，他们竟公开拿光顾这里的

孕妇开玩笑。普莱姆和他的眼线及同伙大奔在一栋公建楼房的楼梯间喝酒、吸毒、聊天时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大奔：(递过一罐啤酒，打开一包可卡因)罗斯突然尖叫着我的名字，“大奔，大奔，我要生了！过来帮帮我，帮帮我！大奔，求你了。”

然后她又喊，“啊，出来了！出来了！看，快帮帮我！”

我朝着她的下身一瞅，看见一个头。菲利普，我一看见那血糊糊的头露在外面，吓坏了。我的脑子“嗡”的一下，说：“我不敢，我不敢！”因为我在吸快克，我胆小，快要吓死了。看着小孩头和血一起从那个地方流出来，我一下子震惊了。

她还在喊我，“大奔，大奔，帮帮我，帮帮我。快出来了。把我的腿分开，快点！”

我跑到大厅，大声喊着叫急救车。(吸了次可卡因)

菲利普：哎，小子，你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不去帮她？为什么不去把婴儿的头拽出来？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小子！

大奔：(咧了咧嘴，把啤酒拿走了)让我歇一会儿，伙计。先别问了，菲利普。

我告诉你，如果当时你在那里，她叫你去帮忙，你也是第一次看见一个血糊糊的头从她的下半身露出来，从来没见过，你敢吗？你肯定也会害怕。

你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我是说(模仿上层及中产阶级白肤色男人的口气，僵硬地晃动着头)“嗯，啊，好，当然。我来帮你，把婴儿的头拉出来是吧？”

后来，菲利普，你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太可怕了，我受不了。

(拿钥匙尖取了点可卡因猛吸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一方面我想帮她，但看见婴儿的头——像个头骨——和血一块往外流。她的阴部撕裂开了，疼得哇哇大叫，求我帮忙。

(可能是注意到我的表情)太可怕了，就发生在我眼前。

急救车来了，他们要热水之类的东西。热水有，可没有破布，知道吧？找不到包裹婴儿的东西。

普莱姆：(笑了，手伸向海洛因)你知道婴儿出生后会先咽什么东西吗？几粒胶囊。因为那里只有这玩意儿。婴儿出生后，就这样，(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眨巴着眼睛)一小粒快克被放在他嘴里了。

大奔：(吸了一次海洛因后，继续用严肃的口气说)罗斯就是在那里生的，她用帮她接生的医生的名字给婴儿起了名。

可是你知道我生什么气？她看起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好像还在等着什么。

她被送到医院，但第二天就出来了。我记得两天后——她去出差了。因为我在游戏厅做买卖，她过来问我：“怎么了？为什么不帮我？”

我对她说：“小子你听着，我太害怕了。我都吓哭了，大声叫喊着，连气都出不来，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

但罗斯很冷静，她没有讨价还价。她不是那种诡计多端的人，是个蛮不错的吸毒者。

怀孕期间她一直在吸毒，但从来没有让我们给她让过价。实际上生过孩子后，她很快又吸上了，当时婴儿还在医院里呢。

因为是个快克婴儿，所以留在了医院。

我至今还特别清楚地记得这次特殊的谈话，因为那时候医生刚刚通知我，我儿子患有脑麻痹症。解剖子宫了解快克副作用的首次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快克婴儿”有时候会出现脑瘫现象——就像神经病症一样。^[22]因此，我一想到母亲贪图一时的快活而让后代患上脑瘫就觉得特别郁闷。我曾与来快克交易点的每个人都交谈过，普莱姆和其他多数毒贩最后至少当着我的面不再把快克卖给孕妇。尽管我和瑞进行过激烈争论，但瑞却从来没就此事禁止过他的雇员。从某种意义上说，极度保守的天主教教义让瑞相信堕胎就是“谋杀”，所以他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阻止送上门来的生意。

瑞：我不管，菲利普！我只管挣钱！我不会考虑你说的那些事。再说了，她们不从我这里买，也会去别的地方买。^[23]

同样，当我谴责凯蒂在为瑞干活期间把快克卖给孕妇时，她却一反平日的正义感说：

怀孕后，身体就不属于你了，属于婴儿的。所以如果做母亲的不在乎，我又有什么办法？

我请同事伊洛沃斯·邓拉普 (Eloise Dunlap), 一位美国黑人社会学家帮我与那些有身孕的吸毒者直接谈谈这件事——凭她的性别和种族身份, 可以广泛接触街道上各个阶层用快克的女性。通过在大街上和吸毒孕妇的谈话, 了解到她们对自己未来的宝宝和自己的母亲角色持有一种矛盾态度。有些人已经认识到她们在“照顾自己”的同时会影响到肚里的胎儿。一位年轻女性保证她会只在白天吸, 这样可以让她们的宝宝夜里好好休息。另一位声称快克对胎儿是有益的, 因为他们可以“睡得安稳一些”, 吸毒可以让她的“懒宝宝”醒过来, 像个健康的胎儿那样踢她。好几个妇女还谴责街道文化的虚伪, 一直想从她们身上赚钱,^[24]可就是没人谴责拒绝为她们提供服务的社会部门——戒毒中心。事实上, 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些已经成为朋友、有毒瘾的孕妇推荐到戒毒所, 因为当时纽约城 24 个国家资助的戒毒所中, 只有两个接纳吸毒的孕妇。^[25]

直到搬离哈莱姆东区之后, 我才意识到吸毒的母亲是一些绝望地寻找生活意义、并拒绝在市中心牺牲自我去养育自己孩子的女人。有快克瘾的孕妇与那些残忍而麻木的魔鬼般的母亲相反, 也可以被划归为自我毁灭式的叛逆者行列。一位医学人种学研究者南茜·斯奇波-休斯 (Nancy Scheper-Hughes) 通过对巴西贫民窟中食不果腹的母亲们的调查, 对工业化世界里对母爱的庸俗的理想化描述做了点评。在贫困潦倒中生存的母亲, 一大半孩子在三岁前就夭折了。斯奇波-休斯告诉人们, 这些母亲是如何学会让身体最虚弱、最多病的婴儿早早“离世”。她们抑制住自己的情感, 有时还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脱水而死。当母亲们与这些规避不了的死亡抗争, 并把更多的个人悲痛投注到每一个幼弱的婴儿身上时, 她们何尝不是在冒着毁灭自己精神的危险。如果每天面对病情日益严重的孩子却无能为力, 她们何尝不会因悲伤而枯萎, 她们还怎么去扮演为人父母的一贯角色, 还能觉得自己是个人呢?^[26]

在后工业化的哈莱姆东区, 缺少卡路里和可饮用水不会致婴儿于死地。相反, 毒品滥用、种族歧视、公共部门职能衰退、经济对工厂职业的调整则是罪魁祸首。在美国, 市中心贫民区孩子的死亡和毁灭, 主要发生在青少年期而不是婴儿期。下面这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90 年代中期, 年龄在 18—24 岁之间的男青年的死亡率, 比二战中勇敢杀敌的士兵还要高。^[27]或许, 我在毒品买卖点看到的那些吸毒的母亲, 只是放弃了与历史造就的不利于她们的形势抗争。母亲们疯狂地寻找个人快感时遗弃自己的孩子或毒死胎儿, 只是加快了其后代早已命中注定的毁灭。^[28]通过违背所谓的母亲养育天性, 让孩子在最为幼弱的时候夭折, 脆弱的母亲们避免

了眼看着孩子逐渐长成健康活泼的青年，但最终却变成受害者和暴力、毒品事件中的主角这一漫长的折磨过程。

显然，并非“女权主义”和“女性的自我实现”让母亲选择了遗弃孩子或毒死胎儿。相反，谴责的矛头应该明确指向父权对“家庭”的界定，指向那些把培养和支持孩子的责任转嫁给真正唯一的个人，特别是女性身上的公共职能部门。是父亲，更是那些建构了社会边缘化的更大的社会，必须共同承担起这一重负和再生产的责任。在过去几百年里，世界范围内的性别权利关系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本章开头所述，所有快速的历史权利转化过程，都注定将会充满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在母亲的维权活动，特别是追求自我的斗争加速发展的语境下，市中心贫民区街道上的孩子们，注定会在短期内备受煎熬。

第八章

脆弱的父亲们

一想到儿子，我就想见他。我很难过。我希望——不，不是希望，因为不可能了——如果我还有希望的话，我希望没有和老婆分手，我们还像从前那样，一家人住在一起，就他、她和我。我工作那会儿就是这样。除了桑德拉，我不想要任何人。“我就想和儿子在一起。”

——普莱姆

以市中心贫民区养育孩子方面的不力表现为主题的道德辩论，深为家庭中父亲的缺失表示惋惜。据说父爱缺失会破坏一个孩子的道德品质，尽管贫困问题才是困扰女性单身家庭的最大难题。^[1]依我对为瑞干活的父亲们的了解，公共政策劝告贫困男人回到核心家庭中去的努力纯属误导。问题刚好相反：核心家庭中太多的虐待狂父亲反而威胁着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女人一旦有了孩子，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为单身，而且还得经常忍受超乎想象的虐待。^[2]

在稳定和充盈着爱的家庭里，父亲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原因有明显的物质基础原因：他们作为高中还未毕业的吸毒者，在纽约根本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也就不能以传统的父权方式、凭借单个人的收入维持有婚姻关系的家庭。1979—1982年，全国范围内的贫困家庭从12%上升到18%，上升幅度达50%。^[3]然而，这一经济“逻辑”不单反映出人们对物质的急需，还有一种逼近性别歧视的强大的历史文化重负，直接造成父亲对孩子的忽略和虐待。一直以来，移民的经历、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对于不同性别的人有着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农村家庭的遗风，即具有无上权利的男性家长通过其妻子、很多孩子、还有邻居给予他的“尊重”来界定自己的价值，严重影响着纽约市中心贫民区的第二代男人。他们从个性伙伴飞栖到另一个个性伙伴的家，但却发现自己其实无处可去，没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家，也

没有可以在经济上独立存活的社区。

正如第二章所述，世纪交替之时，中央政府很少控制到圣胡安（波多黎各首府）以血缘为基础的波多黎各农村扩大型的社区。内陆高地上那些粗狂、独立的居民，根本不把城市的掌权人物放在眼里。^[4]他们依从性别、年龄和家族关系的种类建立起自己的等级制度、社会秩序和威望的定义，可是到了哈莱姆东区的街道上，这些却以矛盾的形式定格下来。在美国社会，理想化的乡巴佬身份意识还在弥漫，或者至少与拒绝边缘化的一小部分街道文化产生共鸣，进而生发出一种以反抗为基础的尊严感和敬重。然而，相对于长期的殖民地依赖、移民、城市化和聚居区的破坏性的经历，由类别产生秩序的父权制的遗风却围绕着性别、年龄和血缘在不断变动。而问题成堆的街道文化的物质基础，更是强化了这一点，即初级劳动力市场和地下经济迫使其参与者陷入贫困、无经济保障、高层次的制度暴力和个人暴力之中。

赞赏父亲的无能

快克买卖点的老板瑞的圈子里的大多数男人都做了父亲，但却没有一个定期为他们的后代提供金钱和父爱。相反，很多人还经常对其所爱的人施以暴力，好像是在发泄自己养活不了这个家的郁闷。街道文化和地下经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平台，让其用淫乱的生活、触目惊心的暴力和疯狂的毒瘾来重新界定自己的男性尊严。在没有能力维持一个家还自以为是这方面，凯撒表现得最为坚理直气壮。^[5]

凯撒：我们其实和大自然一样。各自干自己喜欢的事。

就像加拉帕格斯（Galapagos）那些绿色的海龟一样，从壳子里钻出来后
就爬向大海，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它们过着自己的生活，搞了别人或被别人搞了，生了孩子却从来看不到
它们。

对于那些我搞出来的孩子，我没有负罪感，压根就没有感情，菲利普。
我会随时跟任何人上床。

再说了，现在这些婊子都他妈的疯了。

在彰显男权的性生活方面，普莱姆表现得更实用，他从感情和经济两方面控制着那些女人们。追逐着街道文化中对男妓形象的赞赏，他把没有能力维持一个家的

羞耻转化为做街道经济中的寄生虫，去占女朋友的便宜。他没有能力像祖父那样养育孩子，但却残酷地延续着其过时了的雄性的日渐颓废感，成了一个超级男妓。有天深夜，在社交俱乐部的台球厅里，我们几个没事可干，在那里看着小皮特在为那些憔悴的客户一直服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普莱姆指着三个正在玩台球的女人——弗劳拉、杰茜和玛丽亚。他一边笑，一边跟她们打招呼，操着老式的波多黎各口音，用西班牙语说：“瞧瞧我的女人们相处得多好。”尽管我们离她们只有六英尺远，但说唱乐太大，她们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我知道普莱姆同时在和玛丽亚和杰茜好，但还真不知道他和弗劳拉也“有一腿”。

菲利普：嗨，你小子是不是又和弗劳拉好上了？

普莱姆：（严肃地点了点头）上个月。她在一家食品超市包装肉，只有周末很晚才有时间玩。周五她和罗西在一起——你应该认识罗西，她过去在游戏厅干过，现在和凯撒有来往。¹⁶¹

今晚我要和杰茜在一起。这个女孩（指着玛丽亚）今天去过我那里了。她给我打电话，我不让她去，因为我已经和杰茜说好晚上一起度周末的，可她还是来了。

我洗完澡出来一看，她已经在那儿了；我说：“来吧！你先来，然后是杰茜，可以吗？”后来她说：“不，明天吧！”

她明天一早准打电话给我，我会这样对她说（抬起眼睛眨眨）：“我正忙着呢！”

菲利普：你明天不是说好要给职介所打电话吗？忘了你的监管给你说什么了吧！

普莱姆：见鬼！菲利普，你说得对！可你知道吗？我一看见她的脸（是指玛丽亚），就知道该干什么了。

（耸了耸肩）在这么多女人中，我就喜欢玛丽亚。

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有一天在游戏厅门口，我看见几个女孩在聊天，一大帮人。我一看，“天哪！她们每个人我都干过。”我的前妻桑德拉、凯蒂、玛丽亚和杰茜，还有几个我忘了。

菲利普：你怎么会感觉那么——好？

普莱姆：不，只是觉得好玩儿。（注意到凯撒在偷听）对，先是感觉好，然后才是好玩儿。

我告诉你，菲利普。我那玩意儿超壮实，我的表兄们的也一样。

我开始和瑞的圈子里越来越多的人就性生活的伦理问题进行交谈。刘易斯的角色，可以通过他站在社交俱乐部门口朝着街道对面那些吸毒的女人喊话的语调上来总结。这些女人为了在他的快克烟斗里抽上一口，以与他口交作交换，“喂！嘴，我的嘴！过来！”^[7]快克交易点的其他人，特别是小伙子们，都认可女人拥有和男人一样乱交的权利。这也是18岁的小伙子佩德罗（Pedro）的观点。他曾在圣西奈医院给一位护士当助手，后来被抢劫他的天使乐贩子们“打了10枪”后死了。凯撒尽管也受佩德罗的性平等主义逻辑的诱惑，但他还是回到性暴力中来寻求庇护，重新确定其更传统的、合适的性观念。

佩德罗：如果我是个女孩，我就去当女色狂，我要让他们付钱给我。

我要做妓女，整死那帮臭男人，向他们要钱，不会让他们白占便宜。我要钱，钱！

凯撒：对，我要割掉我的睾丸，好好活着。我会紧紧抓住邻居那些迫不及待的家伙们……如果他们想要，我就给……

直到我发泄完毕，然后我要吸取教训。毕竟，我最终只要和一个人好就行了，不光为了钱。^[8]

只有凯撒的黑人表兄埃迪把阶级和种族压迫联系在一起，系统地分析了他对性的认识，尽管他并没有依照自己的认识去积极行事。

或许是甲状腺失调，或是自我之类的东西，我经常向朋友们显摆我有多少女人，但依我看，那都是在逃避现实，让自己感觉还没有垮掉，我没有孩子，我不想那么早就要孩子。

我是说我们没钱，所以用女人来补偿。如果你有10万美元，所有的朋友都会嫉妒你。现在你一无所有，就有五个女人，你也会觉得很满足。我就是这么做的。

可如果你有了钱，就不必用女人来衡量自己了。比如说你是百万富翁，你做事的时候可能会慎重得多。

再说了，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中，女人比男人多，三比一，特别是现在，黑肤色的男人都这样被毒品给害死了（指着当时正在普莱姆那里买毒品的客户）。

历史危机中的男性

除了凯撒和刘易斯外，瑞比他的所有雇员年龄都大。他们这一代人与农村（或者说乡巴佬）家庭和男性观念有着更传统的关系。在其祖父母那一代传统的农村经济中，孩子也能为经济保障做贡献：六七岁就成了自家农场有用的劳动力，保障着长期的社会安定和其父母的退休金，因为农村经济中不存在正式学校教育费用，吃的也能自给自足，所以多生孩子的益处要远远大于孩子的花费。对男性的尊敬，主要以其家庭成员多少以及他能否负担得起这个家为评判基准。瑞、刘易斯、甚至一心想生 12 个孩子的凯蒂都三十多岁了，受到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他们都想要更多的孩子，尽管从经济上来说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这么大的家庭。

瑞和刘易斯都和不同的女人保持着性关系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尽可能多地和不同的女人生尽可能多的孩子。矛盾之处在于，他们没能力扶养这些孩子这一事实，却被否认或被虚伪所掩盖。他们经常谴责做母亲的遗弃孩子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不该从经济上给予她们支持。刘易斯就很喜欢夸耀在自己青春期中的九个月里让多少个少女怀了孕。他称她们为“外面的鸡”。二十年过去了，30 多岁的他对于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为四个女人生的 12 个孩子当中的七个提供任何感情和经济上的支持，却满不在乎。

刘易斯：去他妈的！我可没有什么给他们，为什么还要去见他们？

开始时他们的母亲很生我的气，但我对她们说：“你得学会自己处理生活中的事。”

但瑞在经济上很富足，他不能以破产或吸毒为借口不给孩子提供生活费。菲力克斯入狱后，他正和凯蒂协商买断游戏厅的那段时间里，我和他就为人父的问题进行过一系列说教般的交谈。我从来没有勇气把瑞的谈话录下来，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坚持认为，孩子“有个模范父亲”，他们才有可能“健康成长”。他说这些话时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在一家超市当保镖。他声称为了孩子们“好”，他唯一能为他那些分散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波多黎各的孩子做的，就是全职卖快克。每星期 150 美元的保镖工资不可能让他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他说，他的梦想就是挣足够的钱，然后把他所有的孩子带回哈莱姆东区同一个屋檐下。

四年过去了，先后交过三个女友、生了三个孩子之后的瑞，变得和他那些终年

不名一文的街道毒贩同事一样，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然而，他社交圈内的人却看不到他经济上的成功和他的孩子们岌岌可危的母亲们的凄惨、孤独、贫困之间的谬悖。事实上，他们用列举瑞的汽车数量同样的口气，钦佩他繁衍过那么多的小孩。一个有这么多分散在各地的后代、有如此突出的生意嗅觉的男人是值得尊敬的，可他那些一贫如洗的怀孕的女人们，却不断遭到诋毁。

普莱姆：他有辆梅塞德斯，又买了辆绿色的大陆。他把卡玛洛卖了，但考维特还在。他才花了六百美元就买了这个新货车，还买了辆新的、四开门的马克第四代。

菲利普：他关心车胜过关心自己的孩子。他到底有多少辆？

普莱姆：现在好像有九辆吧！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孩子长得啥样。我是说，或许，如果孩子的母亲来求他的话，他还会给她们一点。给她们买身衣服什么的，但很少。

他就是不想被女人缠住，所以干脆就忘了她们。我猜——即使她们需要他。我知道他不管娜塔莎的孩子（从10元一包的海洛因里吸了一下）。

凯撒：瑞一旦玩过，就把她们从他的名单上删掉了。

普莱姆：拿南茜这个婊子来说吧，她可是个十足的小人。她胡搅蛮缠，所以他离开了她。她现在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瑞跟我说，她还加入了一个戒毒计划，她事实上还是我义子的母亲呢。

他和南茜生过孩子后，说了句“去他妈的！”就走开了。现在娜塔莎是刘易斯的女人，可刘易斯被抓后，她又变成瑞的人了。

凯撒：他们经常在大白天玩她们。

普莱姆：但他们打过架后分手了。瑞经常让她待在家里不让出门，自己出去到大街上找有毒瘾的女人玩。但娜塔莎也不对——这个可耻的婊子。

他在布隆克斯和几个女人好过，生了一个女儿，但从来没见过面。有一次，这个女孩说她怀孕了，瑞说了一句“他妈的！”他和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巴西女人也生过一个孩子。

但其他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他们的母亲都不要求抚养费，他干吗还要给呢？

瑞的女人们对瑞变得厌烦起来。她们甚至不再请求他的关心。有的甚至还抢劫过他。瑞或许会去照看她们，但她们得来找他，好好求他才行，可这

些女人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和其他女人生过各种各样的孩子。

但格劳丽亚是唯一幸运、漂亮的女人，他现在的女友。他们经常打架，因为她老是缠着他，她妒忌他，知道吧？伙计。

不过她确实不错，他和她以及她四岁的儿子本尼住在一起。

菲利普：瑞在外面到底有多少个孩子？

普莱姆：让我想想……两个女儿，南茜的儿子，还有吸快克的那个女人的孩子，再加上他被监禁之前的那几个，共八个。

凯撒：还有个婊子，叫什么来着？

普莱姆：你是说娜塔莎吧？

凯撒：没错。怎么是八个，如果他有四个，后来还有五个，还有将要出生的这一个。

普莱姆：哦，对了，我忘了，格劳丽亚怀孕了。那个跟屁虫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共九个。她一直缠着他，他没有把她像娜塔莎那样丢在家里不管，他听她的。

尽管年青一代的男人对瑞和刘易斯这种繁衍了这么多后代的男人多少有点敬意和羡慕，可男人的身份已经不再以此来界定。界定男性与变换着的性别—家庭格局关系的文化历史影响，清楚地表现为瑞、刘易斯和凯蒂这一代的繁殖冲动，与普莱姆、凯撒和其他年轻快克贩子追求性快感的不同上。比如普莱姆就在女友怀孕后一直要求她去做人工流产，但瑞却认为堕胎是极大的罪恶，普莱姆同时还对瑞在要孩子方面所表现出的传统观念感到困惑不解。

普莱姆：瑞告诉我把能要的孩子都要上，因为我会变老。废话！我现在为什么要生孩子呢？组织军队用？

凯撒和普莱姆这群20出头的年轻人，是从其农村祖父母的大家庭里脱胎出来的另一代人。我把他们关于家庭结构变化的随意谈话录了下来，概括出他们正在经历着的家庭人口学方面的历史—结构转变。

凯撒：我的直系家庭很小。我姥姥有八个孩子，可那时一般家庭都会有很多孩子。

普莱姆：我姥姥也一样。生过十八个，只活下来八个。

凯撒：我可不能要八个。我会疯的。

普莱姆：那太多了。我的表兄弟们都有很多孩子。那时养这么多孩子肯定比现在容易一些。

男性身份和家庭结构之间关系的转变，同样与从前组织并控制着女人和孩子的扩展型家庭的以血缘为基础、以年龄为等级、唯性别为特权的社区的消失有很大关系。以稳定的大家庭为理想对男性所做的传统界定，关涉到许多支持男权的文化机构和价值观。尽管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波多黎各农村种植园经济还很薄弱，但男性家长却有义务从经济上养活全家人。这一点可以从普莱姆的母亲对其理想化的童年时代的回忆中得到证实。

那时候的波多黎各，大家都很穷。大人们会告诉你，生活会更美好，更健康。你可以相信他们的话，可现在，谁的话你都不能信。即使你手里有钱，也不能求人帮你的忙。

关于波多黎各的生活，我最喜欢的是我们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在外面的村子里，每个人都有叔叔和姑姑。和长辈们碰面，你得祝福他们，这是一种尊敬。

那时的孩子们都很尊敬人，大家都讲礼貌。我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家里来了客人，他只用眼神和我们讲话。孩子们是不允许待在屋子里的，他只需用眼神就行了。

客人一进门，他就用眼神示意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我们小孩子可不能像大人那样陪客人。

他用眼睛这么一看，我们就走开了。不到客人离开，我们是不能走出房间的。有时我们用扫帚示意客人走。知道吧？那是一种萨泰里阿教，通过它提醒客人早点离开。

我一直努力教会我的孩子我父亲教给我的东西。

有些人来到这里后变好了，但很多人都没有。从我们的聚居区来到这里就是想找一个好的环境。有些夫妻，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找个好氛围，但找到的却是灾难。丈夫后来跟着别的女人跑了。

哈莱姆东区的男人已经不再用“眼睛”和他的孩子“讲话”，并希望他们听话了。^[9]在有婚姻的家庭或以血缘为基础的扩展型的社区里，尊敬男性的旧模式已经荡然无存。好几代男人都已陷入家庭结构和性别霸权这一基本文化嬗变的不同阶段中而被击垮。普莱姆引起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他对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男人命运的关心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波多黎各人的飞散意识中，社会边缘化经历所特有的性别形式。

告诉你，我得检查检查身体了。我跟我妈说过，我们家所有的男人都有精神病。

我妈的哥哥就有，他经常站在窗户上自言自语。

我妈的大哥——我的另一个舅舅——走起路来像个僵尸，谁也不看。我是他的外甥和义子。他经常写稿子，但事实上写的狗屁不是，他写在笔记本上，乱涂乱画的。不过这家伙有工作，他保住了工作，保住了职位，可脑子出了问题。

如果你在街上看着他走，那绝对像个流浪汉。低着头只管走自己的路，精神出问题了。

我跟我妈说，我觉得我们家人，所有的男人将来都会得精神病。我想我将来没准也会患精神病的。

她说：“你不会的，你爸爸是病死的。”

但不知怎么了，我姥爷没有得精神病，他去世了，但没有疯，是病死的。

我又问我妈：“我还有什么未来可期待的？我肯定会遗传上我爸爸的高血压和糖尿病！”

她说：“如果你做事再冷静一些，你会很出色的。”

知道吧？菲利普。我是个很神经质的人，爱紧张，很容易心烦。如果我干不好一件事，我就想把它毁掉，可我不想发疯。

普莱姆的父亲是我住在哈莱姆东区的后期去世的，他的去世让我进一步认识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的失败，曾让人们承受过多么深重的伤痛。普莱姆的一个姐姐曾去过波多黎各西部一个小镇上去看望她快要死去的父亲——他来哈莱姆碰运气之前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我姐姐说我父亲的老家卡巴洛基 (Cabo Rojo) 是个很穷的地方，是个小

社区……那里太可怕了，就像……没法说。

她说她看到了父亲出生的那个小屋。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屋子破旧不堪。……很可怕，实在是太穷了，也很肮脏。她一点儿都不喜欢那里。

她给我讲，那里的人，那里的人就住在这种地方……

她说，他们好像每天起床从小屋子里走出来，走不到两个街区那么远。

我问她：“卡巴洛基和阿罗约相比哪个更好一些？”阿罗约是我母亲的老家，我14岁时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说，哦，阿罗约稍好一点，更有生气。

前一年我亲自去过阿罗约，拜访过普莱姆的姥姥和他母亲的家人。我把两者的对比整理了下来。他姥姥、表兄弟、舅舅、姨姨们住的那个村子，位于一条狭窄的地方，上面林立着由混凝土建成的黄灰色的、屋顶由锌片打造的多层公建住宅楼，四周全是甘蔗地。我难以想象世上还有比这里更沉闷的地方。然而，透过卡巴洛基外观上的这些破旧和肮脏，普拉姆的姐姐捕捉到了在这一波多黎各农村边远地区一直延续下来的扩展型家庭的团结。

她告诉我，卡巴洛基那里有人长得像我。还说：“那些小伙子们想见见你，很希望能看见你，普莱姆。他们跟你长得特像。”

我想他们肯定是我的表兄弟，和我长着一样的胡须和脸型。唯一不同的是，我遗传了父亲的头发，灰暗无光，他们则留着长发，我喜欢的那种，不像我这样的卷曲。

我姐姐把一个表兄的头发辫成辫子，这样看起来更像我了。他们还记得我的大姐。她在那里取笑我说，如果我有他们那样的头发，一定看起来像耶稣。

她说，他们也喝酒，行为很潇洒。人也特别、特别好。他们就像我一样。还告诉我他们是怎样开玩笑、怎样混日子等等。

不过在那里找份工作挺难的。

总而言之，普莱姆的父亲是个贫困潦倒的人。在普莱姆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普莱姆回忆起他父亲的很多事。游戏厅关门后，他买了15瓶粉状可卡因和10元一包的海洛因和成强效兴奋剂，在曼哈顿科技中心后面第115条街那个吸引人的中学和东河大道上吸着。^[10]他似乎是在努力遗忘他父亲是如何冲破波多黎各传统禁忌而变得很无礼这段痛苦的记忆。好几个晚上，小皮特都和我们在一起。社交俱乐部因为

没有紧急出口被消防部门给查封了。小皮特父亲毁灭的故事比普莱姆的父亲更凄惨。像普莱姆一样，他也从来没有孝敬父亲的机会。那时，普莱姆和小皮特作为单身汉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他们的父亲没给过孩子任何抚养费。

普莱姆：我父亲现在病了，得了糖尿病。他是个酒鬼，抽温斯顿斯烟。有一次我做梦梦见他死了。

他是个不要脸的酒鬼。一喝醉就撒野。不是什么好人，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呢？所以我母亲经常让他“滚开！”（突然咧嘴笑了笑，用他的大拇指猛撞自己的肩，像个棒球裁判那样。）

每次我去看他，他们曾经分居过一段时间——从来没离婚——每隔一周去一次，他手里都拿着啤酒瓶，喝得酩酊大醉，哇哇大哭。

他一般不打我们，但经常骂。我们几个在一起玩，他和他的老朋友们在一起喝着酒聊天。

我们是孩子。我们想，“狗日的，我不在乎。”

他经常买糖果给我们。我们拿着糖，心里却很害怕。后来他来找我，问我一些我母亲的事。可我从来不告诉他，因为我一说，他会哭的。

我不傻。当他问我有些事时，我会直接告诉他。

他问：“你妈妈和谁在一起吗？”我记不清我说什么了，“是”或随便什么的。他喝醉了，很愚蠢。

或许他是在为自己做过的事后悔。他其实可以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我记不清了。后来他崩溃了，全身发抖。我烦他那样。

普莱姆的父亲在得知和自己分居的妻子已经有了男朋友时的那种嫉妒的神情，很可能与波多黎各经典的焦虑是同样的症状。凯蒂拿枪射向菲力克斯的时候也是这种症状。但重要的是，因嫉妒、受虐待和失宠而引发的焦虑往往只限于女性。普莱姆的父亲在自己的孩子和朋友面前所表现出的女性化的绝望和无奈，证明了他在美国作为一个失败的移民所感到的男性的无能感。好像一根发条装置，这个失败的男人要通过殴打离他最近的一个脆弱的女人来恢复自己，他不再需要她的尊敬了。

普莱姆：然后他开始打我姐姐，随后再打我。

小皮特：（打断他的话）我也怕我爸，因为他吸海洛因，他经常发飙，我

还是孩子。经常有人跟我说他的坏话，他们对他的印象差极了。我很害怕，但从内心来讲，我爸是个好人。

我看到他时，他总处在兴奋状态。后来我长大了，经常在街上碰见他。我和他打招呼。我说：“爸，照顾好你自己；别做这个，别干那个。”

他人不错。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小的时候，他是一艘商船上的船员。我出生后他一直在海上，他是在海上开始吸毒的。我从六个月大开始，是由另一个男人抚养大的。

长大后人们告诉我：“这才是你亲爸。”那时他已经有瘾了。我终于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了。不管怎样，挺不幸的。

后来他服毒过量，死了。是海洛因。

普莱姆：（眼睛望着东河大道）我父亲突然不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他可能病重了，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的样子。

性暴力两极化的物质基础

如前所述，凯蒂的生活经历和普莱姆、凯撒青春期的经历都表明，当代父权危机不仅表现为个体的自我毁灭，还表现为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两极化。这一看起来属于个人痛苦的病态表现，同样需要放在历史、政治经济的语境下来解读。从个人心理层面来讲，它只不过是家庭暴力模式在两代人间传承的结果。但这一对病理学的个人主义的、心理上的理解及其失败，并没有解释、更没能为突破这一家庭“轮转”提供一个现实的路径。普莱姆对他“烦人的酒鬼父亲”最早的记忆是他毒打母亲这件事。比这糟糕的是，他母亲后来生活当中的男人却为普莱姆树立了一个同样残暴的男性榜样。

普莱姆：我小时候讨厌所有跟我母亲在一起的男人，我不想看着他们发脾气、失控、打她。

我一般只是低着头，心里想着要杀死他。我们几个只有我姐姐敢跳出来劝架。我从来没参与过。我是个胆小鬼，我不敢……

当我妈的男朋友打她时，我从来没有站出来过。只是想：“厨房！菜刀！我要杀了你。”

我常常会把手举起来。记得有几次（郁闷地放慢了语速）有时他们会过火，打出血来的。

菲利普：什么？

普莱姆：（安慰的口气）没那么要紧。

他可能会打青她的眼睛什么的，我烦。

我经常把头埋在枕头下，说：“哦，哦……我恨死妈妈了。”

但我姐姐们会跑过去对着那个家伙说，“滚你妈的蛋！”就这样（挥动着他的手臂）。

然后他会冷静下来。我想他要是先打我姐姐，那就没事了。因为通常都是先打我妈，然后是我姐姐才算结束。我想我也会这么去做的。

（吃惊地抬头看着我）说实话，这要因人而异，菲利普，你母亲肯定只会和一个人好，对吧？

菲利普：不完全对。你已经知道我母亲的事了。（停顿了一下）不过那个男人挺好的。

普莱姆：但告诉你，我不在乎。

还有个70多岁、叫刘易斯的男人在和我母亲约会。他经常欺负她，打她。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她不愿离开他，连我姥姥都说，“早点离开那个不要脸的无赖。”

我现在在街上偶尔还能看见他，他就在第三大道上一家卖小孩玩具的商店上班。但我装作不认识他。

有一次他对我母亲发火。这个狗日的和我母亲在争论什么，后来越来越激烈。

我妈想叫警察来赶他走，可他不想走。我正在睡觉，被吵醒了。

那是第一次我站出来帮我妈。我妈叫了警察，那家伙抓起一把刀对着我妈挥舞着。我当时吓得心都不跳了，我站在他们中间。

他手里握着一把大刀。我想他要杀了我、我妈，杀死我们全家人。他看起来真会这样。

但后来，他想了想，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我们都在尖叫，他才走开了。

普莱姆在凯蒂的孩子们面前打凯蒂，重现了同样的野蛮和残暴。如前所述，用

心理学分析或个性化的语辞去理解性暴力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毒贩中很多人都承认自己渴望有个理想的核心家庭，而且也有相当长的时间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的。我和普莱姆、小皮特在校园里谈论父亲这一主题时经常会提到诸如失业、个人痛苦、家庭不稳定、劳动力市场结构上的脆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那是普莱姆的父亲去世前他们经常吸毒和喝啤酒的那几个月里的事。

普莱姆：我19岁时有了孩子。他是83年5月二十几号出生的。我们那会儿还小，但关系挺稳定的——我和桑德拉。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日子过得还算行。我们还有个婴儿床，我挣的钱不算少。

我这个人还行吧，兄弟。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收音机。她怀孕了，我们其实不想要，但我告诉她：“我会对你们负责，如果你把孩子留下，我会承担一切后果的。”所以她把孩子保了下来。太糟糕了，不过还行。

我们没结婚，她父母想让我们结婚，可我知道我们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我想要的东西还很多，比如上学、工作等。我们俩老吵架，我想暂时先忍着，或许10年后就好了。可现在回想起来，那都是在无事生非，没事找事。现在她也明白了。

我经常抱怨的一件事就是工作、钱之类的东西。我不想后半生一直住在布隆克斯街这种地方，那个公寓太小了。

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想要人和事都很完美。我经常跟她说：“我有工作，你最好也去工作，或者领救济金。我们雇一个保姆，咱们省点钱搬离这个鬼地方。”

我没有卖毒品。我是个好人的好人。银行里有存钱，家里有花销。桑德拉从来没受过罪。她个头高，又怀孕了，挺胖的。

帕皮托出生时，我在美国平版印刷厂上班。我是个不错的工人，经常加班。不管他们让我干什么，我都去干。我就想挣钱买房子。

看着儿子一天天地长大，我戒了毒。有一天我儿子想和我一起玩，我坐在摇椅上不想理他，说了句“离我远点儿”之类的话。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意识到我错了，有一次我竟流泪了。

有一天，我下楼换了个硬币扔进洗脸池里。我说：“不，不能这样。”那

不是我，我经常对孩子挺好的，教他唱歌，教我小时候在学校里学的儿歌……

我常常坐在摇椅上，教他识字、数数，想开发他的脑袋瓜。你必须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教他读书写字，几个月大就开始，这样他才会有知识。

小皮特：(从一小摊可卡因里吸了一下)我儿子还不到一岁，我也教过他 A、B、C。

我对家人很好，还算得上个不错的主。我常常说，“家是第一位的”，我才不出去瞎混呢。我对我的孩子也很好，你记得不，普莱姆？我过去是怎样打扮我的孩子的？

普莱姆：后来我上班的时间调到了凌晨两点到上午10点。我对他们说：“这个时间不合适，我有家。”

我经常上班时打瞌睡，因为我有儿子。桑德拉，我儿子的妈妈也找了份工作。她上班一走，我就得回来抱孩子，陪他玩。他那时已经睡醒了，所以我根本没时间睡觉。

那时候我开始瞎搞了。开始服“渥拉斯”(含快克的大麻)，有时也喝点酒。我整天不睡觉，后来慢慢地就不想去上班了。

我抽过烟，醒过来后再去上班。你想想，凌晨两点到上午10点。他们可把我给坑惨了，美国平版印刷厂的人。要是他们不调换我上班时间的话，我现在肯定还在那里干着呢。我干得不错，是他们毁了我的社交生活，兄弟！凌晨两点到上午10点。

兄弟，就像、像、哦，上帝！我下了班，不知道该回家睡觉还是在外面瞎逛一会儿再睡。我儿子在那里，精神正好着呢，他才两岁，想让我陪他玩。

所以我上班的时间打瞌睡，结果被他们给开除了。他们对我说：“我们必须让你走，因为你有家。我知道你想和家人在一起，你上班的时间又是这样，我们又不能给你调到白天。我们需要别的人干这项工作，你显然不合适。”

他们当时似乎在找借口解雇每个人，当时的生意不怎么景气。

从那以后，我没有了工作，开始吸起了快克。

知道吧？菲利普。现在我儿子六岁了，一想到这些我就很伤心。我没能和他一起生活，就像我父亲当年没有和我们一起生活一样。

我儿子喜欢跟我在一起。有时我在家修理东西，这小家伙经常拿着工具，跟着我学，看着我，学着我的样子。太可爱了。

所以第一次离开他时，我经常哭。那是我被解雇后一两个月的事了。

我经常躲在卫生间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了，那意味着不再有孩子了。

我老婆让我留下来，暂时先住在公寓里。见鬼！不行！我们分居了，不再有爱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开始得太早了吧！互相都厌烦了。她那个骚货，大概开始烦我的一切了，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对她说：“不，我不想留在这儿。”后来她哭了。

我不得不告诉她：“我们会把对方害死的，所以我要搬走。”你知道吧？那样做对我来说挺不容易的。最后我还是带着箱子走了。

我搬回我妈妈那里。我妈张开双臂欢迎我回来，她说着“你是我儿子。”

我儿子帕比特那时还小，但他知道了。我告诉桑德拉别再给我打电话或几个月内别跟我联系，因为我受不了。“如果你打电话给我，我会受不了的，还是我给你打吧。”

过了两三个月，我打电话给她，她的号码变了，我把以我的名字申请的号码取消了，所以她换了号。我可不想让其他人——其他男人——把账记在我的名下。

小皮特：我们有孩子时我20岁了。知道我为什么和她分手吗？她老催着我结婚。我一直努力维持这种生活，这样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然后结婚，可她绝望了。

让我惊诧不已的是，普莱姆用一种家庭病理学的阶级分析法打断了小皮特对他那些琐事的回忆。

普莱姆：一般来说，当一个贫困的女人把自己交付给一个同样贫困的男人时，问题就出现了。人一穷，一切都不顺。要是孩子，那就更糟。

因为你穷，你无能为力。你试过了，但无济于事。穷的时候，你什么事都干不成。

不同的是，普莱姆的姐姐们——他没有兄弟——却都顺应了街道文化的规程。她们要么有一份稳定的低工资工作（比如在麦当劳、服装厂或当护士助手），要么生过孩子后建立起长期的婚姻关系。姐姐们的成功为普莱姆带来的自豪感，不仅说

明了女性的作用被限定得如此刻板，而且再次证明了在哈莱姆东区贫困的成长经历对他们的影响有何等的不同。

你知道，我妈是很了不起的，她养育了三个本分、漂亮的女儿。

或许她们结婚是早了点儿，但与街道上的毒品决不沾边。她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她们都很贤惠，从来不会在街上胡混，从不。

只有我二姐在少年时怀了孕，但她还算行。我妈知道她的事后，把她赶出了家门。她就搬到她男朋友家直到把孩子生下来。

孩子出生后，我母亲就这样，“哎哟……”（拍手表示庆贺）那可是她第一个孙女，她把她抱回了家，我姐姐也跟着回来了。

她后来离开那混蛋了，他是个大色狼。从那时起，我母亲和她俩人像伙伴一样，形影不离。

她还不错。现在和她另一个孩子的父亲结了婚。我的另一个姐姐，她想当护士。告诉你吧，菲利普，我们的家庭生活挺好的。尽管我母亲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她把我们教育得都挺好。她其实蛮了不起的。

渴望当父亲

我们的谈话好几次都说到普莱姆当时的经济困难是怎样从客观上伤害到他儿子的。这个话题引起了为人父的普莱姆和小皮特的感情波动。

菲利普：想想你的父亲，再想想你儿子现在的境况，你作何感想？

小皮特：这可是个难题，菲利普，我们对自己的儿子有什么感觉？

普莱姆：我一想起我儿子，就想见他。因为他现在和我当年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一个破碎的家庭里走出来的。

就像，我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很为此伤心，所以我不想让我儿子经历那些，我想看着他长大，和我一家人一起。

我当时还有工作时就这样。我已经说过了，我是个好人，我待在家里，还没有被卷进街道生活中去。

小皮特：你这个问题，菲利普，我还真的没办法说。我和老婆共同生活了五年，儿子一点点地长大了。现在我喝糊涂了（停下来从信封里装着的海

洛因里吸了一下)，你再问这个问题我会哭的，会很伤心。

我是说，你瞧，我现在就剩下三个孩子，别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他们的未来。我自己还没长大，但我仍然很努力，想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可我干得不太好，知道吧？我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头脑不笨，心底也不错。但像我说的，我吸上了毒，这下就很难清醒了。太难了，太难了。你是知道的，我知道你明白这个，你跟哥们在一起已经有段时间了。

普莱姆：(吸了次可卡因)我儿子也爱我，他喜欢跟我在一起。

小皮特：(也吸了次可卡因)他想跟着我过，可他还小，不知道选择。等他长大了，我会带他到法庭上让他做选择的。

普莱姆：(又换成海洛因)不，我不会带他去法庭，我了解我老婆。我可以去见他们。她现在的丈夫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我和她的关系。

我让他坐下来，和他谈。我跟他说：“你看，我不想要你的女人；我不会蔑视你；我不会不尊敬你；也不会做傻事。我只是来看看我的儿子。”

可他总是给人那种感觉，“滚你妈的，普莱姆，别再来了。”

桑德拉，我前妻告诉我，我在那里时，他伪装得还好。等我一走，他们就开战了。

(可卡因让他来了精神)你知道吧，菲利普！我相信……我相信你和人家在一起，有了小孩，你就应该尽量让他们过得好一些，不管你做得好还是不好，你都得有个承诺。

我说的这些全是屁话，因为我根本就没管过我儿子，但那是因为我……现在，我没有管我儿子，但……

(海洛因的后劲过后，他平和了许多)事实上，上个周末，就是我们谈起这件事时我哭了的那次，那是我最后一次流泪。上个周末，我想起了儿子，本来打算周末把他接过来玩的，但我去得太晚了。我气恼了，吵起来了。

(又振作了一些)其实，记得我父亲曾对我母亲说，他经常哭，因为他想我，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但我想让儿子过来，让他看看我怎么样，可我觉得对他来说，最好……

(咕哝着说不清)我不知道，兄弟，我不知道……

小皮特：(吸过海洛因，抑郁地说)我有两张信用卡，户主卡、威世信用

卡(美国购物卡——译注),我还有城市卡。我正在申请玛赛卡,但没成功。对,我有,我没有。我想说,我失业了。

你不是已经知道我没有和我的女人、三个孩子一起住吗?我不像以前那样还有个落脚点。

(吸了一次可卡因)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没有时间想毒品,没有时间出来瞎混,就想跟家人在一起。

(又来了精神)人们说女人可以成就一个男人,男人也可以成就一个女人。我老婆帮了我很多忙。后来分手后,我经历过许多不幸的事,变得懒惰起来了。

普莱姆:(还处在恍惚期)我父亲是个酒鬼,他每次一喝醉都打我妈,所以他们分居了。

(精神又来了)但一切都还过得去,没有影响到我的成长。

(平静下来)我能说的就是,唯一影响家庭的是家里只有一个父母,像缺了点什么似的。我真这么想,我是想说,我们经常纳闷他为什么不在家,我也觉得很伤心。

菲利普:那你现在是怎样待儿子的?不是在重复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吗?

普莱姆:不,不是。我根本就想不到和他一起生活过。

菲利普:你儿子想你吗?

普莱姆:(喝了一大口啤酒)当然!我儿子可想见我了。

上周日我跟他说了。我告诉他:“儿子,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你,拿纸笔来。你下周五一放学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

他说:“别挂,爸爸。”他马上给他妈妈说了。他说:“别挂,先别挂。”他在电话那头喊着:“(用手捂着听筒,模仿着小孩的声音)妈咪,爸爸让我下周五放学后就给他打电话,他要来接我去曼哈顿他那儿去玩。”

他很高兴,兄弟。现在他肯定还在想这事呢。因为周五我不在家,没去接他。我不想让他失望,现在我没法打电话,因为我没有车费,他妈妈不会把他送过来的。她会说:“你来接他吧。”他肯定会说:“哎,爸爸,你说过要……呜呜呜(发出哭声)。”

一想到我和儿子当初在一起的日子,我也哭了。现在觉得很难受,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可我什么礼物也买不成,我没钱了。

菲利普：你花 25 美元买海洛因和可卡因，就没钱给儿子买生日礼物？

普莱姆：嗯，如果我有钱，有钱放在那儿，肯定会去买的。可一旦我在街上，就是说，我有了钱就想花完。

小皮特：（打断了他的话）像现在，我没了工作。但我工作那会儿，每月都给老婆寄钱过去。我老婆把我的社保卡号提供给了法庭，可他们也不该把我的钱全取走。我以前经常通过邮局寄钱给他们的。

普莱姆：我不会花钱，不管怎样。这个周末我不能去看了，我破产了。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每周末都去看他，但我不想那样做，因为这个周末见了，下个周末还想去。

不，无论如何我一定要送他礼物，这个小家伙太可爱了。

普莱姆没有给儿子帕皮特的七岁生日买任何礼物。事实上，那个周末他根本没去见他。巧合的是，就是在那几天里，在我家公寓门口，我的两个小邻居曼尼和安杰尔让我朦胧地意识到由父亲的轻率所造成的两代人之间的隔阂。

安杰尔的眼里闪着亮光，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周末我们要去见爸爸了。”他的弟弟曼尼却马上用他那又黑又亮的眼睛告诉我：“我可不去看他。”像是编排好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一个名叫帕比特的小男孩高兴地欢呼着。他是我邻居三岁的儿子。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有点害羞地晃悠过来抱起他，深情地咕哝着：“哦，我的儿子。”可做母亲的却木讷地站在那里看着。帕比特的父亲因参加一项吸毒人员康复治疗及职业训练活动，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有一个下午的自由时间。大约一小时后，帕比特又大哭起来，这回是因为伤心，原来他爸爸赶天黑前必须回监狱去汇报。我们公寓楼的看门人后来跟我解释说，帕比特的父亲就是两年前抢劫他妈妈公寓的那个人。那时他才半岁，因为之前说好去公园见他，他父亲知道家里没人。新的女朋友替他放哨，他从儿子的公寓偷走了一台摄像机和一台电视机。

此时此刻，午夜后的时分，小皮特回到楼梯口，眼睛望着东河大道，可卡因带来的快感让他激动万分。当时在我看来，他跳起来赞美的正是其父母理想化的乡巴佬过去的历史印迹。

小皮特：如果我现在 60 岁了，你知道，真正让我活下去的勇气是我的孩子。我想为他们而活着，我想爱他们，想教他们点什么，这是唯一的原因。我向上帝发誓，发自我的内心，唯一让我活着、有精神生存下来的理由就是我的

孩子们。

普莱姆的父亲死后，我和凯撒再次把他带到那所中学后面去安慰他，他用火柴盒面盛了点可卡因放在鼻孔里吸过之后，用严肃的、断断续续的语气给我们说：

普莱姆：我装着没什么事，其实心里很难受。我开始想这件事，我父亲连一个孙子都没见过，我就觉得像、像……像我的一部分离我去了。

可我母亲一点儿也不在乎，因为父亲对她不好，是个十足的混蛋，经常打她，喝个烂醉，把她打个半死。

凯撒：我爷爷死后，我奶奶也一点都不在乎。她说：“去死他吧！不是什么好东西。”

普莱姆：我姐姐打电话通知我时，玛丽亚当时也在。

玛丽亚这样对我说：“你，你们一家人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告诉他：“你想让我怎么样？现在就开始大哭，也把他哭不回来。让他留下来的唯一办法是在心里记住他，就是这么回事。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他的面了。”

如果我们这些年一直生活在一起，我肯定会歇斯底里，可我们真的都没见过面，我就觉得心里挺难受的，但不……

凯撒：没错，如果是我父亲，我也不会觉得什么，“嗨，埋了他得了。”我是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不生他的气，他只是个不可能接受的爹。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如果我的继父去世了，我会伤心的，因为他才是我爹，我是跟着他长大的。他一直在我身边。

现在我不像以前那样经常能看到他了，但……我小时候他可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会为他伤心。因为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爹。

我现在这么大了，还叫他“爹”。我经常对他说：“嗨，这是我爹。”这就是我爹，我爱他。^[11]但他也发脾气，可他对我一直很好，从来没打过我。我长大后，发现他就是有点小气而已。

普莱姆：对，我爸也是个小气鬼，但我从不和他作对。

凯撒：对，我爹经常会说：“都有工作了，还……”

普莱姆：（郁郁寡欢）我让姐姐给父亲照张相，在棺材里。但她说那太伤

心，不想照，我给她说我去冲洗。

凯撒：那肯定是迷信，我们家人也信这个。

普莱姆：没错。她生我的气了。肯定是我父亲的姐姐给她讲过萨特里阿教。我老外祖母去世时，她给我妈妈家的人照过相；我姥爷去世后，她也照了；她也给我表兄……

我是说，她没必要跑去医院，我父亲身上插着管时给他照相；但照一张他躺在棺材里的照片，这样埋他时我可以看看他，如果我在那儿的话。

正在那时，五六个小伙子穿过东河大道朝我们这边走过来，我心里猛地一惊，从普莱姆的伤痛中清醒过来。我意识到，这可是凌晨三点，他们比我们人多。一年前，一位35岁的男子被人用棒球拍、刀子、切肉刀杀死在东河的空地上。几个月后，在同一个地方，又有一位从哥伦比亚新移民过来的30岁女子被强奸后，被人勒死。^[12]凯撒看到普莱姆在黑暗中哭泣，也弯着腰闷闷不乐。我在想，没准自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伙伴们会使此时此地想抢劫我们的人退避三舍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小声说：“喂，别说了（用下巴示意那些向我们走过来的人）。你们不觉得这里有危险吗？”普莱姆很平静地小声说道：“不。”他和凯撒那副无赖的外表绝对不会让我有危险。

顺应父权

瑞的雇员们的妻子和女友，最后大都和虐待他们的男人分了手，并把他们赶出家门。但她们会爱上另一个同样无清偿能力、对她们孩子不负责任的男人。这一系列组建家庭的过程形成了街道文化的一个逻辑：父亲可以部分地免除对自己子女的抚养义务。凯蒂在我“指责”周围这些男人不养活他们的孩子时，经常和我辩论。

凯蒂：你不懂，菲利普。有些男人就那样，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像话，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暂时不管孩子，没准以后会的。

假设当妈的有了另一个男人。我是说，我肯定会被诅咒的，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会给女人钱让她帮另一个家伙，就是因为她乐意——原谅我的粗话——找性快乐；或许因为她就想和另一个男人鬼混。

我告诉你吧，如果你的女人有了孩子，你又想要她，那就得把一家人打包带走。（凯撒对着普莱姆笑笑）这是个一揽子生意。不管谁想要我，那就

得打包，把我们一家子五个都要了，我和我的四个孩子。

我的男人最好不要对我说，“我不会给你 20 美元去给你的女儿买鞋……那不是我的孩子。”不，那不行。你得为一揽子负责（指着游戏厅对面的两个孩子，朱内尔推着童车里的小莉莲）。

我最近没有和别的男人来往，因为他们都想不劳而获。我可不想那么干，肉太贵了。（把普莱姆的手拉到她的大腿根）听到了没？肉太贵（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经常能听到这种证明男人和女人组建家庭的合法化这个话题。比如刘易斯，每当他孩子的母亲向他要钱时，他都会理直气壮地骂她。

我告诉她们：“不管你和谁在一起，他们最好能照顾好我的孩子，他们不能白占你的便宜。”

你知道，如果你成天和一个女人进进出出的，那就意味着如果她有孩子，你就得抚养他们。他们不是你的，那可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不管他们。

我和第 104 条街那个女人好了三年，她有五个孩子，都不是我的，可我也得照顾他们，兄弟。我经常在上学第一天给他们买校服。这下你明白我当初像疯了一样偷人家汽车收音机的原因了吧。

砸开车门，一晚上偷三四个或五个——就是为了给她的孩子们买运动鞋。

现在有些女人会说：“去他妈的，只要他爱我，不一定非爱我的孩子。”那不行！老兄。我说：“小子，……如果你不爱我的孩子，那就说明不爱我，趁早给我滚开！”

还有些男人会打骂女人的孩子，因为不是他亲生的。

尽管很多毒贩都公开承认他们只是觊觎女友的钱财，可实际上他们经常会在危急关头或在过节时拿很多钱出来。说真的，或许凯蒂对大男子主义的迁就，除了感情和文化因素之外，还有物质上的原因。倘若她生活中没有这些男人，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和她的孩子们孤独地生活在一起。她对此的看法甚至更激进，可以称得上是对母爱的女性主义本质的赞美。最终，她的理解为自己提供了性生活和家庭财力方面更大的自主。

凯蒂：你不理解，菲利普。他们是我的孩子，我十月怀胎生出来的。我当然认为当父亲的和他的妻子在一起时，应该有责任照顾他们。但他离开后，

母亲就得自己养活这些孩子了，因为当妈的和孩子更亲近——是我们生下了他们。我们受过疼，那种感觉在肚子里就有。

而男人们所做的——原谅我的用词——就是给我们精子而已。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孩子生下来。生个孩子并不容易，对吧？很疼痛，很艰难，会出人命的。

你还认为我经历了那么多之后却应把抚养孩子的责任留给他们的父亲吗？

不，他们是我的孩子。我把他们怀在这里（指着肚子），他们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你知道，那可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凯蒂把对母亲和做父亲的权利的赞美并置在一起，不管他爱不爱自己的孩子。

凯蒂：如果父亲离开孩子，孩子被父亲遗弃，本身就够糟糕的。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去恨他们的父亲？没有了父亲对于孩子来说已经够难受的，对吧？我不会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是个混蛋，他不是人！”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他们会反对这个母亲的。提醒他们的父亲多么不是人会让孩子们恨我的。还是让他们自己学着去理解吧。

关于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男权，凯蒂或许只是表现得现实一点而已。当孩子们在有限的文化层面去无限地尊敬男权时，在无能的境况下抵抗男权会极度扰乱孩子们的心理。然而，凯蒂通过迁就男性对待孩子的特权而把男人包容在自己的生活中的努力，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比如菲力克斯入狱后，她把自己家男人的缺失当成印证自己作为母亲品质变坏的证据，这是一种过时的父权逻辑的两难处境式的胜利。

凯撒：凯蒂可不是什么好模范，也不是好妈妈。她对养孩子知道个屁，不就是因为她有五个孩子嘛，可那并不说明她会养孩子。

如果凯蒂是个好妈妈，她肯定会找一个丈夫，对吧？如果你当真想对孩子好，父母就不要分开。

她为什么不找个丈夫呢？

第九章

结 论

喂，菲利普！你让我们这帮毒贩听起来好敏感。

——凯撒 [对我手稿的评论]

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救赎本书中主人公们的痛苦和自毁。公共政策针对市中心贫困和毒品滥用问题所构想的对策要么太天真，要么太过理想化。鉴于美国国家机制的压迫，期望单凭政策计划甚或是短期的政治改革来暂时或长期医治美国城市中心穷人的困境，无异于纸上谈兵。美国的种族和阶级隔离取决于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力量、历史遗产、文化霸权以及个人行为共同影响，任何试图解决问题的简易方法都显得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同时，政策的可行性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限制因素。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美国针对贫困问题缺乏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意愿。但我祈望通过自己对哈莱姆东区社会边缘化经历的陈述，从对瑞的快克贩子们及其家庭成员努力寻求尊严和生存为切入点的探究，从具体的实践层面，引起人们对美国城市中心持续存在的贫困和种族隔离悲剧的重视。我不能放任地球上最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界权力机构，把自己如此多的公民禁闭于贫困和监狱之中这一悖谬的现象存在，因此，最后我将就某些短期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探讨，尽管这些思考最终也只不过是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的附带性的对抗而已。^[1]

直面种族和阶级不平等，而不是毒品

毒品滥用或许是市中心贫困问题中最易受短期政策干预的一个方面。这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毒品充其量只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的附带表现，并非本书

所探讨的问题的根源。自毁式的毒瘾只不过是绝望的人们内化自己挫折、抵抗和无能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大可不必为席卷全美的周期性的毒品恐慌大惊失色。相反,倒是应该把我们的道德关怀和战斗能量,聚集到市中心大规模持续存在的贫困所引发的矛盾上。同时,我们还需认识并揭穿美国大地上的阶级和种族隔离之谜。

快克—可卡因—海洛因的泛滥,比起上一代大多数人的麻醉品和酒精中毒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当代美国人口中某些人滥用毒品现象的恶化,几乎与其所涉及的特殊毒品的药理质素没有任何关联。历史告诉我们,吸毒的结果或至少是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建构的。最为重要的是,在美国,它还与阶级不平等和种族上的意识形态霸权不无关联。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下:由于导致这些毁灭性的行为及犯罪活动的结构根源的两极化,90年代美国毒品的滥用现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传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削弱,美国人口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社会边缘化了。跨国合作、金融资本、电子技术以及代表穷人利益的公共部门对社会民主模式干预的缺失所引发的世界经济的重新调配,更是深化了阶级、种族和性别上的不平等。^[2]

1990年对美国社会边缘人口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的结果,显示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现象,这是美国1968—1992年间长期发展趋势的一部分,其间贫困人数上升了三分之一。具体而言,这些年内人口最贫困的扇区贫困线上升的幅度最大,与此同时,富人却在此基础上增长了40%。孩子们遭受的痛苦最深,生活在1968—1992年官方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数量翻了一番。^[3]不管是在不同阶级之间还是同一族群内部,都存在两极化现象。例如,在80年代很多族群(包括波多黎各人在内)的总体政治经济统计数字提高的同时,被遮掩的阶级、性别和地域内部的不平等和社会困难却增加了。美国黑人的阶级分层早已被证实,同样的情势在移居美国的波多黎各人中正在形成,^[4]并处于地域上的活跃状态。居住在纽约市的波多黎各人,比起生活在美国内陆其他地方的波多黎各人要贫困得多。^[5]即使在纽约市内部的阶级、性别和代与代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的两极分化现象。例如,80年代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提高了28.5%,但女性单身家庭的收入却下跌了6.1%,老年人的家庭收入下跌了7.6%。纽约市已婚波多黎各人的收入急剧增长了40.6%,比处于中间的波多黎各家庭高出70%。或许更重要的是,一半以上纽约市的波多黎各儿童都处于官方的贫困线以下,而住在纽约市的波多黎各总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则只占38%。^[6]

美国贫困两极化的世俗化趋势和世界经济结构的长期转换，需要追溯到本结论开始我所提及的公共政策这一讨论话题，也即毒品滥用问题。任何针对“毒品问题”的实际探讨，都必须致力于改变合法经济和地下经济间利益的不平衡性。以毒品零售买卖（街道经济中对男性来说机会最为平等的雇用者）为例，它就需要来自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毒品经济的经济活力必须降低。第二，初级合法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和敌对性需要改变。

从具体而短期的公共政策层面来看，要消灭街道文化中最残暴的犯罪部分的物质基础，唯一简便的方法就是让毒品合法化，以此摧毁非法贩卖毒品的盈利。据有关专家估计，生产1盎司的纯可卡因粉大约需要8—10美元^[7]，而同样重量的纯可卡因粉掺杂后再包装成重4克价格为10美元的小瓶装，在哈莱姆东区可以卖到2000美元以上，多出来的1990美元的利润就是被卷入地下经济中最残暴、最具毁灭性层面的经济动力。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毒品合法化使市中心贫民区街道上的年轻人更容易买到毒品，因为毒贩们不再需要花费精力、财力在街角兜售小量的毒品。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毒贩们将会被迫停止非法营业。如果非法毒品合法化，毒品零售的利润不再是天价，哈莱姆东区每天步行去上学的学生也不会再受到毒贩对其心理防线的狂轰滥炸。政府也不必再浪费上亿美金把吸毒者监控和限制在毫无意义、价格昂贵、荒唐的监狱里。有毒瘾的人一旦不再需要为其日常用毒花过多的钱，暴力案件、财产盗窃、医药花费也将会大幅度缩减。毒贩们也不会再为了高额利润而相互残杀。当然，把每个人都关押起来也是个选择，但监禁费用不仅昂贵得令人唾舌，而且不可避免会侵犯人权。90年代，美国已经背上了世界人均监禁率最高的臭名，监狱的人口从1980年到1994年上升了3倍。^[8]

只要美国的大、中学的辍学者通过合法途径找到一份有尊严的、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收入的工作依旧困难，那么，还处在真空世界里的毒品合法化就不会大幅度降低市中心贫民区的暴力和自毁。在过去几代人中，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在物质和情感上已经没有能力创造有益的初级工种。提倡为处于社会边缘的工人阶级提供经济机遇，雄心勃勃的政治干预很有必要。另一个更简单、更短期的方法是，揭开有合法工作的穷人受处罚的敌对的官僚主义迷宫。这意味着把应付的金额转移到那些明摆着的人类需求——世界上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已经习以为常的诸如健康、住房、教育、营养等方面，而不是在贫困家庭有了额外合法收入时，机械地让其受处罚。写到这里我又一次想起了几十个可以帮助重新平衡追求合法职业奖励机制的具体计

划和方案：从允许下岗工人在接受定期津贴的同时报名参加各种教育课程，到继续给那些离开公共资助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和家庭发放食物券、收入补助金和适当的医疗补助金。长期而言，主流社会将会得益于这一大批选择依赖毒品而不是底薪工作的精力充沛、具有创业精神的市中心贫民区的年轻人，巨大的人才外流和抑制人潜能的现象也可以得到遏止。向上爬的“美国梦”将会随着合法经济可信度的提高而不是犯罪被重新修订。从理论上讲，显然，没有一个社会是单靠“价值”向前推进的，但从实践角度来说，在美国文化高度物质化的语境下，否定犯罪企业简单的经济逻辑也是完全不现实的。如果企望改变什么的话，那就是：生活在贫困中积极向上的年轻人必须拥有具体的物质选择。

美国工人阶级穷人日益严重的物质上的无奈和政治上的无权，理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哈莱姆这样的市中心贫民聚居区中贫困、毒品滥用和犯罪的关注，即之前讨论过的烙印在空间上的社会不平等的上升趋势，是国家政策和自由市场共同



哈莱姆东区公共区域的衰败。
照片提供：菲利普·布儒瓦。

作用的结果。更确切地说，以美国北部街道文化为中心的城市衰竭而导致的两极化现象，引发了一些观察者所谓的“美国种族关系危机”的预言。中产阶级及其精英们，完全有能力割断与住在市中心种族特质明显的贫困城市工人阶级和失业人群的关系。政府预算的削减和财政紧缩已经加速了城市贫困地区公有企业的倒闭，与其形成对比的是，盎格鲁裔美国人占统治地位的富裕郊区的社区服务机构，反而增加或至少维持了原有的水平。

心理学简化论及文化本质主义，通过对美国习以为常的社会边缘化的分析，制定、构想出了针对个人“不端态度”进行短期干预的解决种族主义和贫困问题的办法。比如，

大多数贫困干预政策的最大的社会单位是核心家庭。职业培训方案强调态度和个人自主。旨在促进多元文化感受性的研讨会，在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很时尚。当这些方案措施没有危害，甚至可以从表面上帮助边缘群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种族主义言论——美国实际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市中心公共行业的倒闭——倒是应该成为政府政策和私人行业的慈善行为关注的焦点，如果想要最终发生大的改变的话。

换句话说，借用体育上的一个经典比喻，美国需要公平竞争。具体来说，不管是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还是拉美人、黑人、亚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社区，垃圾都需要清理，学校都要有教师教，法律法规都必须执行。超越阶级和种族界限，改善不平等的公共资金分配和服务并不特别复杂或微妙。我立即可以想到上百个短期政策及合法的改革措施：从税收改革开始——比如对中上等阶层的家庭的抵押借款收税，免除联邦和各州对穷人受益的转让税，到简化社会福利津贴的申请渠道，让教育机构民主化——比如有相同的、负担得起的健康保险，免费的日常管理，为大、中学校提供平等的资金等等。

嬉蹦舞乡巴佬——走向一种相互尊重的政治

快克贩们向我清楚地传达着这样一条信息：他们不单受经济利益所驱使。像地球上大多数人一样，除了物质需要，他们也在寻求尊严和成功后的自足感。在波多黎各的文化语境下，这意味着，“尊重”的文化定义，应以不断变化着的以血缘、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社会身分等级中个人对自治、自信和社区的关心为基础。美国社会的边缘群体要想获得主流社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遵从的相互尊重，贫困政策就必须致力于远远超出物质和后勤需要的复杂的文化、社会层面，即重新评估公共政策的主动性，评定更大范围内非个人化的政治经济力量是如何与快速变化着的性别和家庭的文化定义相呼应、相互动的。女人、孩子和老人占据了美国贫困人数中的多数，公共政策干预因而应首先关注女性和儿童的需要而不是将其边缘化。最重要的是，贫困女性更不应该为了有房住、有食吃、有衣穿、有健康的身体而不惜一切地寻求与男人的联盟。在这种情势下，美国针对儿童的安全可行的关怀的缺失，使母亲们无法去合法经济中找事做，而只能呆在家中，生育更多的孩子，因为她们挣的钱远远不够雇一个保姆的费用。

到目前为止，我所推荐的政策在美国没有一个在短、中期内有政治可行性。我

只想尝试以次引发一场大讨论，奢望在未来几年里，在新的反贫困、反种族歧视、反性别不平等的政策方案不可回避的盛衰和中断中，我的某些观点可以挤进公众辩论的主题，某些方案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实施。从更深层面来说，对于谴责失败的受害者、对制度上的矛盾只提供个人主义及心理学基础上的解决办法的美国常识，必须予以抵制和改变。我们必须走出自由主义政治家和保守派间政治辩论的死胡同——政治家提倡让市中心贫民区充盈着治疗精神病的社会福利工作者或家庭治疗学家，而保守派则只希望监狱建得更大一些，社会福利开销再缩减一些，向大企业和富人的税收征得更少一些。“头脑启动(Head Start)”计划是目前广为大众接受的、最成功的干预贫困的一项措施，但它恰好表明了美国政策大讨论的陈腐和平庸。实质上，“头脑启动”计划是在异想天开地把市中心贫民区那些住在老鼠成群、缺少稳定的暖气和热水设备的灰色高楼里的学龄前儿童，脱胎换骨成聪明伶俐的中上等阶层的超智商的学生。这一计划很好地阐释了政策决断能力的长期不足，它只关心社会悲苦中的个人症状，诸如没有自尊、人格残暴或学术技能欠缺，而对导致经济脆弱家庭中孩子被遗弃、受虐待或挨饿的物质和政治力量却置之不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改变从60年代后期开始的适当提高贫困率、逐渐增大种族和阶级隔离的趋势，美国市中心贫民区种族隔离的痛苦症状将会继续滋生出更多的吸毒人员、暴力犯罪和情感扭曲的愤怒的年轻人。

鉴于联邦政府在政策改革上的黯淡前景，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解决美国市中心贫民区的问题进行政治动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美国的公敌变得人性化而不奢望将其净化和美化。通过深入挖掘源于持续贫困和制度上的种族主义经历的个人痛苦，我期望读者大众能够更好地了解美国社会压迫的根本性过程和发展态势。更详细地说，我祈望把毒贩和街面上的犯罪人员放置于美国社会冲突中正确的位置上来观察。他们不是一群来自无理性的下层社会里的“外来的他者”，相反，他们是正宗的“美国制造”。正是出于对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美国梦的信奉，¹⁹¹目标明确、野心勃勃的市中心年轻人人才会在八九十年代深受飞速传播的、上亿美元的毒品经济的蛊惑。

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毒贩和街面上的犯罪人员也在尽力找寻属于自己的那块馅饼。事实上，在其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他们也在严格遵循着向上爬的正统的美国模式。他们以私人企业的身份超自信地追求着自己的事业；他们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祈祷好运当头；他们是最后一群粗鲁的个人主义者，凛然面对着一个不可预知、

被人穷追猛打、财富、名誉和毁灭并存的新领域。在波多黎各特定的语境下，对主流社会控制的抵抗和对街道文化身份自豪感，饱含着一个抱着抵抗态度的乡巴佬的新构想：拒绝屈从于西班牙和美国殖民主义特权社会。而对农村乡巴佬形象嬉蹦乐式的极度城市化的重现，则标识出飞散的波多黎各最边缘人口的新的文化意识的胜利。悲剧在于，他们决心寻找文化尊重的物质基础却被框定在街道经济中。

与此同时，书中主人公的成功和失败，并不仅仅是波多黎各人的专利。相反，“主流美国”也应该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辨认出自身与他们的关联。市中心贫民区代表着美国国内最大的失败，它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喻指随时可能会有大祸临头），悬挂于社会上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阻止这一利剑掉落的唯一力量却来自于毒贩、吸毒者及街道犯罪人员把自己的愤懑和绝望给内化，将自己的凶残和野蛮指向自身或自己最亲近的社区而不是机制上的压迫者。相比而言，在历史背景下，像普莱姆、凯撒、凯蒂及其孩子这些人长期以来痛苦的自我毁灭既是残忍的，也是不必要的。专业而权威的解决办法是不存在的。任何尝试走出这一困境的长期方案，都必须在探讨社会边缘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机制的根基的同时，探讨结构和政治经济上的根源。走出这一绝境的第一步，首先需要对社会经济模式和人类价值做出根本上的伦理和政治重估。

后 记

晚上有些时候，我站在儿子面前，就这样看着他，流着泪。我在想：“我根本就不值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家伙。”要不是菲利普，他会怎么样呢？我已经26岁了。我是说我他妈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没有方向。你得帮帮我，菲利普。求你了！

——凯撒

1994年的春天、夏天的部分时间和秋天，我再次回到了纽约，对本书稿进行最后修订，并打算写这篇后记，为本书的出版做准备。

三年多来，普莱姆和瑞断绝了来往，没再卖毒品，也不再吸可卡因，他甚至滴酒不沾。有一次，游戏厅的一位熟人执意给他买了瓶啤酒，竟被他直接泼入水沟。

第三个夏天，普莱姆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晚上在上东区一座豪华的高层公寓做清洁工，税前工资是每周300美元。有时赶上有些全职工人暑期休假，他还可以替代他们干点活。普莱姆在公寓楼维修设备时，因对垃圾过敏突发气喘，住了一周医院，为此他错过了好几天工作时间。普莱姆恳求医生不要在诊断书上写“气喘”二字，他担心管理人员会因他的身体条件将来不雇他做全职。

普莱姆身上唯一一个突出的法律问题是，代理机构一直想要回他用贷款支付的职业培训学院的学费。这个学院现已倒闭，他没拿到维修工程专业毕业证书。最初那2400美元的贷款利息已经让他负债4000美元，代理机构没收了他1700美元，这可是他1994年收入税退款的全部。

因为普莱姆与另一个女人的不正常关系，玛丽亚把他赶出了家门。普莱姆现在和他大姐都住在母亲那套公寓里。尽管与玛丽亚断绝了关系，普莱姆还是定期去她家拜访，看望他3岁的小儿子小普莱姆，他与儿子关系很亲密，经常带他出去散步。

普莱姆59岁的母亲得了艾滋病，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他一直想弄清楚，她脑子出了问题是否与几年前她的男朋友用纽约市警察用的工具打她并致她昏迷有

关，“你知道那种长长的金属棒，栽在地上，顶在门中央以防门闭合的那种——他就是用那玩意打的她。”她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医生说可能会引发长期神经错乱。

纽约城公建工程房的行政管理部的督察员，利用普莱姆母亲的精神病症进行了一次私人采访，想证明她儿子的收入以及他在她公寓里借住的时日。他们威胁说，普莱姆因不愿公开他的合法收入，所以重新核算后，要征收他几千美元的手续费。

普莱姆也担心他 11 岁的儿子帕皮托的安全和福利问题。帕皮托在南布隆克斯一所教会学校上学，没通过五年级考试，现在和他母亲及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住在一起。四个月来，帕皮托的母亲桑德拉不准许普莱姆去见帕皮托。桑德拉的新男友——她第四个孩子的父亲——打了帕皮托一顿后，帕皮托随后住进普莱姆母亲的公寓。为此，普莱姆的母亲把桑德拉告到了儿童福利办公室。不过，这一矛盾却因帕皮特暑期在普莱姆的母亲那里住了六个星期后缓和了许多。

玛丽亚失去了补贴给她的公寓，和小儿子不得不搬回酗酒的母亲的公寓。她一直在竭力为自己找寻一个独立的地方，但现在连私人公寓楼的安全保证金的钱还没攒够。几次尝试在快餐店（包括普莱姆的大姐给她介绍的麦当劳）的工作失败后，玛丽亚继续接受救济基金和食物券。普莱姆有了份合法工作，主动承担起供养孩子的费用，但还是没能改善她经济上的拮据状况，因为他的失业保险金受纽约城家庭纠纷法院监管，会从玛丽亚领的单身家庭援助和食物券的数额里扣除。尽管玛丽亚一直希望能和普莱姆言归于好，建立一个有婚约的家庭，但普莱姆长期以来的性背叛让玛丽亚最终还是把他拒之门外。

凯撒不再卖毒。他继续接受每月一次的社会安全保险金，与卡门和他们 3 岁的儿子小凯撒、卡门 7 岁的儿子帕波、9 岁的女儿珍珠住在游戏厅对面他祖母以前的公寓里。凯撒祖母的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她离开自己住了很久的家，搬到附近另一所公寓里她妹妹那里去了。

凯撒一月一次的快克瘾仍会花去他大部分的社保金，他还在吸可卡因。卡门卖雅芳产品补给自己福利金的不足。最近家里来了一位儿童福利署的督察员，调查学校老师反映的关于她大女儿戴蒙德有身心虐待迹象的事。显而易见，戴蒙德有忧郁症，在班上很少讲话。卡门时不时地带着孩子去她姐姐玛丽亚家躲避凯撒的毒打。

当我和妻子去拜访凯撒和卡门时，他们的小儿子小凯撒和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表现出一个 3 岁男孩应有的健康和快乐。他的哥哥姐姐则“去佛罗里达看望他们父亲的姥姥去了”。那是 6 月初，学校还没放假，他们很可能是为了躲避继父的虐待，

永久性地搬往他们父亲的亲戚家。

凯撒和卡门及他们的儿子小凯撒一起来玛丽亚的公寓里参加父亲节聚会。小凯撒的右脸颊上有块新伤疤，他们解释说是他从床上摔下来磕破的。凯撒因普莱姆不借钱给他买海洛因，一赌气提前退了场。5月份卡门已经给凯撒在凤凰屋举办的戒毒活动报了名，凯撒也表示同意，可是在等到8月份还没有名额时，凯撒卖掉了她的电视机，卡门一气之下把凯撒赶出了家门。凯撒的姨妈给他买了张去佛罗里达奥卡拉(Ocala)的火车票让他去找另一位姨妈，并希望他能借此机会戒掉快克瘾。

凯蒂不再卖毒品，也没有工作。她从法院指定的护士助理培训班毕业后很失望，据说是因为她工作的那个商业区治疗脚病的诊所的医生是“一帮臭名昭著、暗箱操作的阴谋家”。他们故意误导病人，为其脚做不必要的手术挣钱，还指使病人把一沓沓的账单提交给医疗补助和其他私人保险公司。凯蒂在那里干满一年后，再也无法忍受老板的不法行为。不过，她用的是自己的假社保号，所以并没影响她的福利金。

凯蒂和她的丈夫菲力克斯以及五个孩子中的四个还住在原来的公寓里。到了周末，两人都喝酒、吸可卡因，但菲力克斯好像不再打凯蒂了。按普莱姆的说法，“绝对不会了！菲力克斯不再打凯蒂了。那家伙吸取了教训，伙计。”三年前，刘易斯被监禁，妻子旺达整日吸快克被儿童福利署抓走后，凯蒂还做了他们四个孩子中两个孩子的义母。

菲力克斯继续做着他拆换窗户的活。每周200美元的工资尽管没有记录在册，但确实也没危及他的家庭福利款项或医疗补贴的合法性。最近他还为电视明星琼·里弗斯(Joan Rivers)的公寓更换过窗户，他声称她送给他一个镀金的别针，还邀请了所有干活的人吃了顿午餐。

菲力克斯和凯蒂21岁的儿子朱内尔，分别和两个姑娘生了两个孩子。据普莱姆说，“朱内尔真是个白痴。”他15岁辍学，母亲受雇于脚病医治中心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家照顾小妹妹莉莲。母亲凯蒂帮他逃学，向权威部门许诺他16岁后会加入保护资源的特种部队。可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因“那里的黑鬼实在是太野蛮了”而离开了部队。随后几年里，他整天吸大麻。曾经有段时间，他不得不打劫身边所有的人，直到后来因两次向便衣警察出售快克犯了重罪而被捕。朱内尔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半时间，在那里他碰巧遇见了他的叔叔刘易斯。普莱姆告诉我，刘易斯曾试图给朱内尔一个武器，“知道吧？就是那种铅笔之类尖尖的东西，别人欺负时可以用来自卫。”朱内尔没有要他叔叔的武器，普莱姆说：“他开始哭了。”朱内尔最后不得

不被关押在“监护室，那是单独关押虚弱的黑人的地方”。

从监狱出来之后，朱内尔主要干一些有线电视安装的活儿。据普莱姆说，他现在“有时还卖毒品，但他确实怕蹲监狱。”他仍然和父母、妹妹们住在他们的公寓里。有一次，我在夜里一点钟在他母亲公寓门口碰见他。要不是他喊我，我还真没认出来。他长了胡子，头上缠着一个蓝色的班丹纳印花大手帕，较流行的那种，以前的婴儿肥一点也没了，看起来还挺瘦的。我邀请他参加托尼为他六个月大的孩子举行的洗礼聚会，他很不好意思地拒绝了。后来一个毒贩来找他，我有意回避开了。我突然意识到，他其实是不想让我知道他在为卡洛斯当夜班。卡洛斯就是那个曾经付钱给凯蒂，用她家的厨房炒制快克再拿到楼梯间去卖的毒贩。

朱内尔与他的表兄安杰洛仍有来往，安杰洛也辍学在家，开始吸上了大麻。因为他的父母毒瘾都很大，经常出出进进于监狱，所以他现在和奶奶住在一起。

凯蒂的大女儿塔巴莎单独住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她刚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已经和孩子的父亲断了关系。普莱姆认为她做得对。现在和她住在一起的新男友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和他们的母亲共同抚养他们。她找到了一份合法工作，同时还在布鲁克林的一家服装店做工。杰茜现在17岁了，在商业区的一所公立学校念完十年级，她的男朋友最近刚被关进联邦监狱。

凯蒂的哥哥得了艾滋病，接受福利救济。有天深夜，我还看见他行色匆匆地朝着一个很火的快克买卖点走去。

直到1994年6月，大奔一直都在商业区一家保健俱乐部里当厨师，这个工作他已经干了五年，现在周工资是税前320美元。我和普莱姆还一起去城市医院看望过他，去年他和凯撒、普莱姆晚上酒后驾车出了车祸，脚被轧成五块，现住在医院准备取出里面的七个钢钉和一个金属盘。他现在和女友还住在布鲁克林那所公寓里，女友在哈莱姆东区一家出租车服务中心做调度员。大奔出院后，用1500美元的车祸赔偿金在离游戏厅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投资”新开了一家大麻买卖中心，雇了两个朋友帮忙。

威利和一个黑人女子结了婚，住在弗吉尼亚。他哥哥帮他找了一份“部队里干文书的工作”。最后一次来哈莱姆东区时，他纵情地闹饮作乐，花光所有钱后，据说还是设法回到了弗吉尼亚。

托尼在附近开了一家海洛因买卖点。这之前他已经不再为瑞干活了，在他母亲那栋楼上开了家店卖快克。他和3岁的女儿、21岁的妻子克拉拉住在一起，克拉拉

最近刚生过孩子。托尼为他的新生儿在当地一家公建工程住宅楼社区中心举办的洗礼仪式，比当年瑞办过的那次聚会还要排场。

人们在附近时不时地也能见到瑞，“驾着一辆豪华汽车，旁边每次都坐着不同的女人。”据普莱姆说，“看起来像个退了休的大毒枭”，但普莱姆又讲，“他如今在布隆克斯做生意”，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住在一所警察拍卖的房子里。当普莱姆问瑞为什么从不回来拜访时，瑞傲慢地说，他现在在布隆克斯有很多朋友，没时间、也没必要再来哈莱姆东区。

小皮特因向便衣警官兜售快克被判重罪，蹲了监狱。他被监禁之前的六个月内，有六次被拍到在布隆克斯的电话亭里，和一个黑人商量合伙开一个独立的快克销售点的事。和母亲住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他吸毒的继父刚刚患艾滋病离世。

内斯特因持枪抢劫一位墨西哥移民正在监狱服刑。新墨西哥移民不顾针对他们的暴力攻击，依然大量搬进哈莱姆东区。90年代中期，学校的行政区内非本国出生的小孩子中，有一半来自墨西哥。他们在官方统计的人口总数中的比例比起80年代增长了332.9%，比纽约市其他地方的墨西哥人口比例高出两倍多。普莱姆曾用手指着前面一位正穿街而过的墨西哥人说：“我看见他们就恶心，他们的劳动力比起我要廉价得多。”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刘易斯因买卖快克被判两年半的监牢。他在服刑期间已经报名参加了一个戒毒活动并被提拔为顾问，因此有了缓刑四个月的休假，暂时和一个妹妹住在以前的公寓里。他一直在找一个住处但尚未找到。不过，他已经答应接受商业区一家医院的针刺疗法，做门诊病人。他承认自己“一旦口袋里有了钱”就想吸毒，但可以预料的是，在他提早释放的缓刑期到来之前，他还是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不需要每周都去做尿检。现在“如果尿检呈阳性”，他就得回到监狱完成剩下的刑期。

据普莱姆说，“刘易斯甚至说过他想工作”。刘易斯的妻子旺达曾在公园路上段卖身养毒，现在和住在同一公寓楼里的情人一起生活，她已经签署了一份离婚合约，并向刘易斯提出了一份合法的个人保护诉求。刘易斯认为她在街上碰到自己时忘情地拥抱她的情人是有意奚落他，他烦透了旺达的新男友，发誓在他刑满释放后要狠狠地揍这对狗男女一顿。刘易斯和旺达的四个孩子已经被分开，分别跟着三个不同的养父母生活，13岁的大儿子已经不去上学，大女儿在市中心医院接受输血后，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凯蒂做她的义母照看她，1995年2月死去，年仅12岁。普莱姆建议刘易斯找回他所有的孩子，“他与别的女人生的孩子，”“陪着他们散散步”，以

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情义。

普莱姆的前女友杰茜仍在酗酒吸毒。她和 12 岁的儿子在哈莱姆东区她母亲的公寓以及新男友（一个哥伦比亚人）位于西区的家之间搬来搬去。她的男友是买卖毒品的，经常打她。

安杰尔和曼尼仍然和母亲艾丽斯住在租来的公寓里，这里也是艾丽斯在楼梯口和楼顶上卖快克的新男友储藏快克的地方。他们的母亲还在那家夜间俱乐部里当服务员，曼尼则为母亲卖快克的新男友当信差。安杰尔曾在凯蒂开的一家快克买卖公司卖快克，就在他们公寓对面的公建工程住宅楼里；“尽管我经常和波多黎各人来往，但却在一个黑人开的公司工作，这就有问题了”。他和另一个眼线每人每卖出 50 瓶（每瓶三美元）就可以提取 10 美元的回扣。他说，有的晚上 45 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卖出 50 瓶，八小时的工作可以赚到 100 美元。但他最近不再卖快克了，他在一次认罪请求协议时，因“公然威胁”一位法官而被判了五年缓刑。他拦路抢劫一位出租车司机并向其开枪，被警察逮捕。他设法说服警察，他是因为酒喝多了而且是无目的地对着空中放的枪。实际上他是这样给我解释的：“我疯了，瞄准出租车的后面开了枪，但司机开走了。”他的好友莱斯特，就是那个曾经和我们一起参观过博物馆并在我的公寓里画画的男孩，最近因枪击对面楼梯口的一帮对手而被判 10 年监牢。安杰尔最近还清了债务，在商业区一家饭店做清洁工，他弟弟有时还去给他帮忙。他的女友在 1994 年 4 月他们的儿子出生后搬来和他同居。她享有社会安全保险金。

凯撒的表弟埃迪（年轻时和凯撒一起在劳教所呆过的那个男孩）还在干着纽约市公交汽车司机的工作，已经和不同的女人生过好几个孩子。

亚伯拉罕，普莱姆的养祖父，于 1994 年因年老嗜酒过世。他过去一直和凯蒂的姐姐及其孩子们住在为老年人盖的公建工程楼房的公寓里。凯蒂的姐姐一家在亚伯拉罕去世后，被房管部门赶出来，最后被安置在离游戏厅几个街区远的公寓里。在此期间，凯蒂的姐姐还因神经错乱住过一段医院，她的男友当时获准照管她没有被别人收养的三个未成年的女儿，但她的两个女儿在此期间却都怀了孕。

普莱姆的大姐不再去市区内的麦当劳干活，她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一半，以便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和药店之角其他 120 人一样，她经常买《纽约时报》星期天版。普莱姆说：“她是为了看上面的广告，每周送出去几百份的自荐书。”我还帮她改写过自荐信的封面，尽管已过而立之年，但她除了在麦当劳工作过之外，没有别

的工作经历。她还拒绝了我建议她“夸大”工作经历的建议，一心想从这些广告中找一份“办公室工作”。她最近贷款买下了一部新切诺基吉普，就停在他们那座公寓楼的前面，从来没被抢劫或破坏过。普莱姆解释说：“我认为那是因为人们知道她，也尊敬她。”

普莱姆的二姐最近从哈莱姆东区的公建工程公寓楼里搬到新泽西州一家私人公寓。因为忍受不了丈夫“言词上的侮辱”，已经和他分手。他姐夫还在华尔街一座办公楼里当行李搬运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普莱姆的姐姐则正在为她的三个孩子寻找薪金不高的保姆，以便自己能继续在曼哈顿市区那家医院做护士助理。

普莱姆的小姐姐刚从南布隆克斯搬到纽约的庞科普西(Poughkeepsie)，她和丈夫用17万美元的“退伍军人贷款”，在那里买了一座房子。她丈夫还在为那家联合包裹速递公司开车，而她不得不放下哈莱姆东区一家小百货公司的工作，因为她怀了第二个孩子。

我住过的那个街区除了1992年游戏厅关闭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游戏厅的地皮现在由一家合法影像光盘出租店占用。社区里现在有两个新的快克买卖点：一个在从前合法的理发店里，另一个在安杰尔和曼尼的公寓楼房里。这两个由青少年经营的快克买卖折扣店分别位于不同的公建工程楼房的楼梯间，生意依旧。街区里那个假冒的波多黎各人还在卖可卡因粉。一家完全合法而善于经营的新酒店在街区开张。公建住宅区对面那个废弃的公寓楼，用公共基金被重新整修后，供那些从前无家可归的家庭居住。曼尼和安杰尔住的那个公寓楼却自从那个意大利房主死后严重失修，几乎无法住人。

药店之角除了瑞的社交俱乐部永久性的关门之外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后来那个占据社交俱乐部地盘的巴勒斯坦人经营的杂货店，在一次大火灾中，烧毁了上面那座废弃的楼房，也停业了。还有一家比利时人经营的水果店，每周日还会卖出120张《纽约时报》，有时甚至还会留出65张在其他时间出售。面容憔悴的吸毒、贩毒人员仍然每天24小时聚集在药店之角，叫卖着大批违禁的毒品。

我还见到了从前经常出入游戏厅的那个怀孕的女人，在一家新开的卖快克的理发店的围栏边徘徊。她又怀孕了。凯撒说，自从她吸上快克以来已经生过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和她一起生活。1994年春夏之交重新回到哈莱姆东区的那几个礼拜内，见证过她的状态，亲眼目睹了好几起父母虐待孩子的事件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允许街道上的人们“正视”个人疾苦和暴力的防卫机制。比如，至今仍

难以忘怀回到那里第二天晚上夜里两点钟，和普莱姆躲避一场暴雨时看到一个5岁男孩看着母亲在公寓的楼梯间和毒贩讨价还价时那副惊恐的表情和无助的眼神。后来我和普莱姆谈起这个孩子的困境时，普莱姆耸耸肩说：“是的，菲利普，我明白，我也恨看见的这一切，太不像话了。”

2003 年版后记

本书第一版出版之后，我和普莱姆之间的友谊日渐加深。每年夏天，我都会抽出几个礼拜的时间去拜访他一次。他会告诉我之前给瑞卖快克的人的近况，我们通常都会设法去看望一下以前的熟人和朋友。2002 年夏季的那次拜访是这样的：

普莱姆的母亲去世了。普莱姆则因私藏（不是贩卖！）海洛因罪，按照“一日吸毒，终生受控”的规则，被赶出母亲的公寓，在凯蒂的姐姐埃斯皮朗泽（Esperanza）的公寓里住了五年，和女儿贾丝明（Jusmine）的关系进一步稳定下来。贾丝明在一家折扣店当了三年收银员后，去南布隆克斯一家社区银行当咨询员，享有全额津贴。普莱姆继续保持与毒品买卖和酒精或可卡因的距离。街道上一位卖走私光盘的塞内加尔人，说服他皈依了穆斯林教，他不再吃猪肉。但偶尔还会吸上一口海洛因并说自己依然很喜欢那种兴奋的感觉，尽管与此同时他还正在服用从一种长效镇痛药拉阿姆（LAAM）中提炼出的半试验性的戒毒药品。他是在那个夏季晚上为一家豪华大楼当行李工时染上海洛因毒瘾的（Bourgoise, 2000）。现在他私下为一个没有执照的包工头干些零活。这个包工头在为一位同性恋主顾维修厨房和卫生间，可他长期吸大麻，再加上工作计划不周，工具不足，资金短缺，还经常忘记按时订购材料和仪器，因而普莱姆正在和他解约，想成为一名独立的承包商。我最后一次见到普莱姆时，他正在用新买的手机和别人协商一座公寓内 13 间卧室维修的分包合同的价格。

几天后，他在加利福尼亚打电话给我，听起来很失望。他争得了这个分包合同，但苦于找不到自己信赖且有经验的工人帮忙。普莱姆 15 岁的儿子帕波对此也很失望，因为他父亲答应过他来纽约，帮他一起做这个较大的维修工程。帕波上九年级时辍学，是从佛罗里达州他母亲的家里逃出来的。他母亲和另一个新男友搬回纽约住，她告诉普莱姆不会再让帕波回到她身边去了：“他一点能耐都没有，整天在街上瞎逛。”普莱姆向我吐露，他很惭愧不能为在佛罗里达州“瞎混”的儿子帮什么忙。

2001 年元月，我邀请普莱姆参加了我奶奶的葬礼。我奶奶过去到过那个游戏厅，

那群毒贩大都为能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奶奶说上话而颇感荣幸。他安慰过我之后，带着自豪和期望，让我猜他的好消息。我一下子就猜对了：“贾丝明怀孕了？”

“是，终于怀上了！太了不起了！你知道，她的身体好像就等着银行那份好工作似的。对！她身体很好。”

普莱姆的小儿子小普莱姆现在7岁，和母亲玛丽亚及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继父住在康涅狄格州。因为他继父犯的是重罪，所以他们也从纽约的公建工程楼里被赶了出来。玛丽亚的姐姐卡门也是因为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凯撒曾和他们同住过一段时间，被赶出了公寓。凯撒当时打卡门12岁的女儿时，卡门并没有责怪他，可邻居听到女孩的尖叫声后叫来了警察，抓走了凯撒，依据新的强制性的家庭暴力执行法，判了他三个月监禁。释放回来后，凯撒去佛罗里达州投靠亲友，希望戒掉毒瘾，卡门和她的孩子们也跟了过去，希望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们现在暂时住在康涅狄格州玛丽亚的客厅里。凯撒最后一次犯毒瘾，卖掉了普莱姆为小儿子买的生日礼物——游戏机和自行车，所以普莱姆起誓不再给玛丽亚抚养费，除非她把凯撒赶走。

凯蒂一直为老年人做家政服务，有一次搀扶老人时不慎滑倒，脊椎受了伤，现在困居在家，忍受着慢性病痛的折磨，有时甚至连“电话本都拿不动”，越来越依赖止痛药。普莱姆说，她沮丧极了，非常痛恨这个世界的不公。她丈夫菲力克斯继续干着拆修窗户的活儿。因为周六不用上班，他只在周五吸点可卡因。周日清洗身心，为周一上班做准备。大家都坚持认为，自从那次凯蒂神经错乱向他开枪后，他再也没打过她。他们的儿子朱内尔因卖快克再度进了监狱。几年来，他们的家庭收入因收养了几个小孩增加了不少。据说，两个大一点的男孩（刘易斯的两个儿子在刘易斯入狱后，因母亲也有毒瘾被法庭判给凯蒂做养子）一直在对儿童福利署委托给她家的两个女孩进行性骚扰。收养部门的有关工作人员在调查了此事后，不再在凯蒂家安置小孩。

让人意想不到的，刘易斯从监狱出来后不再吸毒，和一位黑人女子交上了朋友，安心地过起了日子。他还没有恢复五个孩子的监护权，这五个孩子如今分别被安置到三个养护家庭里，但他和他的新伙伴有了两个新生儿。他俩都享受社会安全保险伤残金，他私下还为普莱姆的包工头干活以贴补家用。事实上，还是刘易斯极力说服普莱姆增强进取心和独立，这样他们可以共同努力，挣更多的钱。他还“开始学电脑，经常把他的电脑拆拆装装，以增加其功能”。

托尼不再卖毒品，成了一名有工会会员资格的看门人。和毕业于社区学院的女

友克拉拉分手后，他搬回母亲家住。托尼向一位便衣警察卖海洛因被判处重罪，克拉拉为了防止自己享有补贴的公寓被没收，把托尼赶出了公寓。托尼至今都不愿原谅她，并拒绝为孩子提供抚养费。

小皮特和他的弟弟内斯特还在监狱服刑。

安杰尔、曼尼和他们的母亲搬到了西区一所工程公寓里。据说“过得不怎么样，但相处得还算好。”

普莱姆的姐姐们都搬到纽约城的郊区去住了，而且都有了工作。大姐在一家商报当秘书，另外两个姐姐都在医院工作，一个正在业余时间上夜校，想成为一名注册护士。

大奔还在市区那个健身中心帮厨，和做出租车调度员的女友住在布鲁克林。

瑞不再造访哈莱姆东区。普莱姆认为他已经彻底不干毒品买卖了。他用卖毒品赚来的钱买了几栋半废弃的楼房，装修后向外出租，靠收取房租养家。他几乎没花多少钱就从警察没收的毒贩财产拍卖会上买到了这些楼房。

我每次来哈莱姆东区，都不得不面对针对小孩子的日常暴力，这种暴力已经融入美国市中心社会苦难遭遇的脉络里。因此，我的倒数第二次实习笔记是这样写的：

2000年7月

埃斯皮朗泽的孙子布朗安斯托 (Briancito) 今年5岁，他的智障变得越来越明显。埃斯皮朗泽告诉我，他长到3岁才开始学说话，经常表现得很狂躁。上个月，他用椅子打伤了一名特教老师。她担心孙子遗传了他父亲的脾气。他的父亲布赖恩 (Brian) 先生 (埃斯皮朗泽唯一的儿子) 还在联邦监狱里，他的照片贴满了整个一堵墙。因与多起贩毒案和团伙谋杀案有牵连，他被判终身监禁，不能假释。照片中的他穿着一身不协调的白色网球衣，看起来像个无任何恶意、胖乎乎的游客，只是那张照片的背景，坚固的灰色水泥墙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埃斯皮朗泽不愿提起此事，但很显然他是因一桩毒品债务用手枪打死了受害者。埃斯皮朗泽是布朗安斯托的合法监护人，她非常爱他。当她说道“我要感谢上帝——带走了我的宝贝后，又给了我另一个宝贝”时，眼里满是泪水 (并把布朗安斯托紧紧抱在怀里)。

埃斯皮朗泽一直在为她其他三个孙子的福利担忧。她说她没办法再为他们的母亲——她的两个大女儿帮什么忙了。当我问起埃斯皮朗泽对本书

的看法时，她突然转移话题，给我讲起了她的邻居虐待孩子的事。有位母亲就住在她家楼下，经常在公开场合殴打她两个14岁、5岁的儿子和9岁的女儿。这位母亲在等电梯时，经常恶狠狠地尖声叫骂她的女儿是傻瓜，又丑又笨。普莱姆打断她，“天哪！那个小女孩其实很可爱的”。他轻轻地摇着头说，“我认识那个小女孩，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然后用拳头猛击他的手掌。埃斯皮朗泽回答说，那个女孩在等电梯时经常低着头，眼睛很害羞地盯着地面，时不时偷偷抬头看看有没有人听见母亲对她的痛斥。那个5岁男孩头上长了瘤，去年做的手术。因为14岁的儿子告诉楼里其他人是母亲经常打弟弟头部的同一地方才导致病瘤出现的，母亲也很记恨他。埃斯皮朗泽说，这位母亲在儿子动手术后依旧打他的头。最后有人叫来儿童福利署的管理人员，可他们却因为找不到“虐待的痕迹”，所以没把她的孩子带走。埃斯皮朗泽气得举起了双手，“你又能做什么呢？”她说，那位母亲现在吹嘘她根本不怕儿童福利署的人，因为她压根就不在乎孩子被带走。埃斯皮朗泽忽然不着边际地叹息到，她认为母亲应该在孩子睡着后吸可卡因，当“孩子们的头脑正常时，你知道……否则，她们就该去打胎。你相信打胎吗，菲利普？”

埃斯皮朗泽还抱怨她邻居的暴力行为。最近有一次，邻居家10岁的女儿尖叫着求救，所以她叫来儿童福利署的工作人员。她说：“我不主张把父母都关起来，可要是墙那边求救的孩子被打死，我会很难受的！声音那么大，我告诉你。”她谴责虐待儿童——用了那个词——说自己正努力在孙子布朗安斯托的身上打破暴力的怪圈。可每次孙子犯错，她也会忍不住大叫：“别做了，想让我打你吗？”我努力忍住吃惊的表情，因为当她尖叫时，声音确实也不小。

埃斯皮朗泽很伤心，因为她必须把21岁的女儿撵出家门，她犯了袭击人和私藏毒品的重罪，公建住宅工程的管理人员来检查埃斯皮朗泽的公寓以保证她的女儿不再住在那里。这位被赶出门的女儿有一18个月大的女儿，如今还和埃斯皮朗泽住在一起，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家伙，深得周围人的喜爱，尽管刚刚蹒跚学步，就会把周围的人，甚至包括我，差来遣去的。

一个满脸怒色、身高两米多的年轻小伙子走进来，是给埃斯皮朗泽的二女儿（19岁的女儿桑德拉）捎口信的。桑德拉没有工作，和她6岁的女儿住在母亲的公寓里。我很为这个孩子担心，她很少笑，也很少与别人交往，是

这个家中唯一一位体重超常的人。桑德拉的新男友在邮局工作，夜里负责分发邮件，她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的钱是他给的。

这位愤怒的年轻人是去楼下找人要账的。他脖子上挂着一串金项链，两臂刻满纹身，其中一个是用波多黎各旗装饰的蝎子，左手拿着一个网球拍，像拿着一个牙签似的，双腿分开站在那里，粗暴得超出了我的想象，显得我又老又矮……我庆幸自己是在埃斯皮朗泽的家里碰见他，而不是在午夜后的街上和他相遇。普莱姆问他要去和谁打网球，他笑了，“黑鬼的头”，拿着球拍假装朝电视机前傻笑的布朗安斯托的头部晃去。我又一次失常的反应，让这个貌似打向布朗安斯托头部的网球拍显得更加滑稽可笑。在我看来，这个高大的小伙子没有再生气，他开始炫耀他的拳击训练进行得多么顺利，他如何在教练的要求下戒掉大麻和一切含糖分的酒。普莱姆和他谈起了有关拳击的事，我插不上话。他把普莱姆当做对手，用刚从体育馆学来的招式在我们面前比划着，大家都盯着他看。他向我们神秘地眨眨眼，不让告诉他的教练，还说他正在加强肌肉训练，力争拳头一出手就可以打断人的脖子。他向我们展示慢动作，那个想象中的进攻点正是普莱姆的脖子。

普莱姆最后把我介绍给了眼前这个卖大麻的、未来的拳击手，他看起来怒气全消了。原来他就是刘易斯的大儿子，今年19岁。我告诉他我有一张褪了色的宝丽来一次成像的照片，是他10岁时和父亲及三个弟弟妹妹在普莱姆母亲公寓举行的元旦晚会上照的。照片上他们紧紧抓着父亲不让他去“出差”（吸快克），我没有告诉他，我六年前最后一次实习笔记上记录了他在夜里两点钟还站在公共汽车站牌顶上的事：“1994年6月。他该怎么办呢？父亲刘易斯刚刚进了监狱，母亲为了吸快克正在公园街高架铁道下面卖身。”他现在也有三个孩子了。普莱姆向我保证说，小伙子是个“蛮不错的、顾家的人……挣来的钱至少一部分会交给老婆”。刘易斯的儿子有点怯懦地告诉我说，他还记得我。他仿佛又回到过去那个害羞的小男孩，还非常正式地跟我握了握手。

午夜前从埃斯皮朗泽18层高的公寓往家赶，和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同乘一个电梯。她手里推着婴儿车，最大的孩子看起来还不到三岁，一不小心把外衣丢到电梯角上一摊尿里，母亲大发雷霆，强压着嗓门抬起手要打他。男孩吓得蜷缩着身子，母亲在最后一瞬间把手放了下来。我突然意识到，她

只是假装生气想让男孩蜷缩得更合适一些而已。她大声吼着，用声调的万千变换劈头盖脸地骂他。男孩低着头，盯着地上那滩尿发呆。回家的路上，地铁在第116条街出了点问题，我可以有时间好好地揣摩一下我的这位同路人。地铁里似乎没有人会觉得，深更半夜有这么多消瘦的孩子跟在迷糊而憔悴、很明显是为快克而来的母亲的身后有什么异常。有好几个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母亲都推着婴儿车。坐在我旁边的两个穿着讲究的女性很明显没有毒瘾，她们是去市中心俱乐部跳舞的，俩人怡然自得地聊着她们的男友，其中一个男友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2001—2002年我实习笔记最后延长的那部分，是一些访问和电话谈话，主要记录了哈莱姆东区街道上实施的针对“生活质量犯罪”的新的全景式的制度暴力。笔记开头写的是，奶奶的追悼会结束后，我去了原来住过的街区。悠然地走在街上，我希望能碰到一些老朋友和熟人。我发现我的房东刚刚过世，旁边那栋楼的看门人跟我说起了我曾经常带着去参观博物馆的那些孩子们的事。笔记对业已提高的工人阶级的能见度和活力赞赏有加。可是那天傍晚，我买了一听取名于生活在波多黎各濒于灭绝的蛙的5角钱60盎司的东区麦芽酒，犯下了“生活质量罪”。笔记被便衣警官发来的一张传票突然终止。我在公共场合喝酒，行为不端，被警告必须马上离开，这同时也是美国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另一个小小的范例。

你他妈的以为你在跟谁讲话！我们知道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们一直在跟踪你，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你在这里四处乱窜，找人谈话，煽动闹事。你到底在找谁？说！找谁？

好吧，好吧！继续装聋作哑。不想对我们讲可以，但你也别想离开这里。你还算幸运，我们不是新手，否则要全面调查你，那可就不是给你张传票了事。你在下一个街角被其他便衣抓住，那就与我们没关了——这个街区可是个热门地区，伙计。

别以为你从加利福尼亚来就可以逃避这张传票上的出庭日期。他们会发一张法院拘票，下次你不管什么事受阻，电脑马上会有你的记录档案，走着瞧吧！他们会踢烂你的屁股——我可不在乎你是从加利福尼亚还是夏威夷来的（大笑）。

两个月过后，听从监管的告诫，我回到了纽约的法庭上：

法庭判罚了我 10 美元，可整个过程却延续了四个小时，比我想象的还要一团糟。法庭似乎更像是由看守和警官的个人魅力来操纵的，他们移押着这些或惊恐、或迷惑、或愤怒的罪犯从一个审判室到另一个审判室，碰见工作人员或同事就大声打着招呼，有时甚至在过道里吹着口哨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嗨，你！帮个忙好吗？把这个家伙放在你的等候名单上吧。”或者会问：“你还剩下几个？还能多加一个吗？”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楼道里等着，看守则需要根据每个审判室人的多少来决定该把我们带进哪一个。室外等着的一位很和气的黑人大声给我支招，想让我后边的那位女士也可以听得见：“别承认，千万别承认。给你发传票的那个警官不在场，法官肯定得放你走。”我向他表示了谢意，他很成功地和我旁边那位女士聊起了她的案例。

一位工作人员帮忙把我的名字挤进午饭前他的当事人名单上。在答应他会请求“辩护有罪，我发誓”后，我终于来到一个审判室。他眯着眼睛示意我坐下，骂骂咧咧地说：“好的！……你可说过你是有罪的。”我很执着、很反讽地接连点了几次头表示感激后坐了下来。前面五个人犯的都是私藏大麻罪，没经讨论就全部立即释放。事实上，纽约市大麻的合法化，是市长朱利安尼反对“生活质量犯罪”举措的结果。审判室后面有一位无聊的看守，专门看防我们不让读报或睡觉，我就是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看到我在每个大麻案审判结束后的吃惊表情，他小声对我说：“法官必须释放所有的大麻案的罪犯，因为调查这类案子的代价太昂贵，所以只要被告说那不是大麻就可以释放。”

与此相反，我前面那位年轻的黑人却因随地吐痰被罚 35 美元。在过道里他跟我说过，一个星期六晚上，警察来抓他时他手里拿着一个空杯子：“他们要给我开罚款单，但我已经喝完了，我知道自己的权利，他们无权干涉你手里拿着的空酒瓶。和他们争辩时我骂了那狗日的，还向地上吐了痰。他告诉我随地吐痰是违法的，我又吐了一次，这次是吐在他车旁。告诉你，我得搬到佛罗里达去了，在纽约城你走在人行道上也会被抓起来的。”

我终于来到法官面前，签署了一张不太合法的影印的弃权声明书，表明

愿意听从因人手不够被召回的那位退休人员的申诉。两分钟谈话结束后，我请求“有罪辩护”，法官开了10美元的罚单，还就我奶奶的去世表示了慰问。

在过道里又等了45分钟，警官才带我去付罚金的地方排队。我和排在我前面的一位波多黎各年轻小伙子交上了朋友，他也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喝酒被送到这里来的。我们对警察现在不得不如此严格地执法表示同情。轮到他付钱时，他恳求出纳员给他开具一份特殊的收据以便能走出审判室：“我破产了，我告诉你我破产了，我没钱，我他妈的破产了。”他看起来很难为情，也很沮丧。我似乎应该在他第二次强调自己破产后很自然地替他付那10美元的罚金，但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担心他会以为我期待有性方面的回报。

从法庭出来之后，我去了市里，看见埃斯皮朗泽正在她家楼下的院子里和其他母亲一起，等着接送孩子的特教学校的校车。埃斯皮朗泽的女儿桑德拉也挺着大肚子站在人群里，等她6岁的女儿。她告诉我：“菲利普，你一定得留下来多住一段时间，我要告诉你前几天我做的关于你的梦。”

埃斯皮朗泽比起先前感觉好多了。儿子布赖恩终于被移交到宾夕法尼亚的一座监狱，探望起来方便了许多。孩子们以其特有的活力从校车上挤出来，爬过楼与楼之间的水泥墙，在护栏围着的草地上玩，好几个母亲威胁要打他们。可他们似乎根本就不在乎母亲的大喊大叫，径自在禁止踏入的草地上蹦来跳去。

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遭遇大难后不久，我打电话给普莱姆，告诉他我想去拜访他。

普莱姆再三建议我不要坐飞机，并说他因担心恐怖活动，连乘市区地铁去戒毒中心都不敢去了。他正在说服护士和医生给他开点回家服用的药，这样就可以不用冒险去坐公交车了。电话里我听到他的小宝贝的哭声，普莱姆告诉我他得去扶他的奶瓶了：“我现在照看孩子，因为贾丝明又回去上班了。”她本来是想休产假，但银行的人说如果她继续工作，会提拔她当监管。她遵从了，可是现在五个月都过去了，他们还没提拔她。普莱姆的大儿子帕皮托也不错，搬到郊区和普莱姆的姐姐一起住，现在一家地铁三明治商店干活。

普莱姆的包工头正在说服他回去工作，但没人照看孩子：“至少那个混蛋会把欠我的那部分钱给我并答应给我加工资。他现在也比较尊敬我，不过

我还是想等等再说。我是穷，但我不是奴隶，我是为了孩子才去那儿的。他现在四个月大了，他需要我。”普莱姆特别激动，因为他现在每天服用的拉阿姆剂量减少到了30毫克。很显然，是拉阿姆造成他“严重的心律不齐”，这种药物已经帮助很多人戒了毒，他希望自己也能尽快彻底戒毒。有时他会吸一点点海洛因，但每次总记得要带一管贾丝明或儿子干净的尿样以应付抽样检查。他的尿样检查已经一年多没出什么问题。

几个月过后，普莱姆给我留了个紧急信息。埃斯皮朗泽给她在监狱里的儿子送了一本我的书。监狱里的领导“没收了你的书，还说要调查这个作者，查一查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认为这本书会帮他们查出和布赖恩有关的几起谋杀案中几个嫌疑人的身份。他们恐吓布赖恩，要他说出所有人的名字，既然有了你的书，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我马上和埃斯皮朗泽通了电话，安慰她书中没有任何关于布赖恩和他的同伙的报道，我实习那会儿他还不到6岁。我还提醒她联邦机要证明会依法阻止我的调查数据不会用于法庭作证。

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把这个后记送给一位专门从事联邦毒品和谋杀案的律师朋友。她保证这个后记里没有任何可能受到牵连的证据，但建议我删除公建工程楼房内部的毒品交易资料：“联邦局调查人员现在很疯狂，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毒品。”

我上一次去纽约拜访埃斯皮朗泽时，她的情绪特别糟糕：

埃斯皮朗泽的儿子布赖恩提出上诉，要求他们就没收我的书所造成的骚扰事件展开调查。他们威胁他如果不撤诉，就把他转回得克萨斯。他撤诉后，被移交到哈德逊河一所更近的监狱。贾丝明被提升为首席出纳员：“她正在向A级努力。”他们又为她提供了一个提升的机会，但她没有接受，因为她不愿监管人。县医院为埃斯皮朗泽介绍了另一位拉美精神病医生。这位医生告诉她，过去十几年对她的精神治疗只是辅助性治疗：“她说要给我用最新、最好的药物和有效的疗法。”埃斯皮朗泽很有希望痊愈，她告诉我三个月前她还处理过她母亲的后事：

我们当时都在场，她所有的孩子，还有我的女儿们。除了我弟弟菲力克斯外，所有的人都在场。那是个周五，周五晚上菲力克斯都会吸一点可卡因，你是知道的。

我给监狱里打了电话，捎信给我儿子让他争取来医院看看他的外婆。他们容许他多打了一次电话。电话来时，她的眼睛已经合上，不能说话，只有微弱的呼吸。

电话线到不了她耳边，于是他让我转告叫外婆保佑他。我在另一间屋子对她喊道：“妈妈，布赖恩让你保佑他。”她好像一直在等着这个信儿似的，睁开了眼，呻吟了几声就去世了。

我们回到凯蒂那里，菲力克斯也在。他觉出有点不对劲，但我们不想告诉他，因为他刚吸过可卡因。他一晚上都在问我们外婆怎么样了，他已经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尽可能地对其敷衍搪塞，还做了些吃的。

第二天我才告诉他，他感谢我在他吸毒时没有告诉他实情，要不然他可能会控制不住的。菲力克斯过去每天都会去看我母亲，现在他经常会跑来看我——天天如此。

我问埃斯皮朗泽，住在她家隔壁挨父母打时喊救命的女孩怎么样了，她停止了笑声：“我不知道，菲利普，城市儿童福利署来人把她带走了。”我答应在这篇后记里写上这个小姑娘。是为后记。

于圣弗朗西斯科

2002年4月

注 释

绪论

- [1] 在纽约，“Barrio”一词一般不再像美国西部或西南部那样用于描述工人阶级的拉丁街区。“El Barrio”在纽约市是指哈莱姆东区。
- [2] 快克是由粉状可卡因加工而成。把可卡因放在热水里溶解，加上炒好的苏打，再让其冷却成坚硬、冒烟的颗粒，点燃后能够平和地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在纽约，快克是放在五英寸长、周长大约为一英寸的玻璃圆筒中，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烟枪”。这些特殊的烟筒在街角的食物杂货店里卖一美元一个。快克被放置在一个弯弯的有网眼的金属条上，放进朝上翘着的烟枪一端一英寸的地方。人吸后能带来一分半钟的强烈“兴奋”，类似于把可卡因直接注射到血管里——但据说要比后者效果强得多。长期吸快克的人可以不吃不睡接连几天几夜的“兴奋”（Williams, 1992）。同样，注射一次可卡因可以有几十次的“勃起”，身体变得像针刺似的感觉、血红而又青肿。
- [3] 我们街区警察管辖区内的暴力犯罪（凶杀、强奸、拦路抢劫）在1984—1988年间增长了41%。在曼哈顿，仅地狱厨房（位于第42条街时光广场附近），有时再加上华盛顿高地，暴力犯罪率比哈莱姆东区要高很多（《纽约时报》，1989年1月23日18版）。
- [4] 见《纽约时报》1993年8月8日A1版、A18版。1991年，我离开纽约城后不久，之前考察过的快克买卖点中有两个改卖海洛因。海洛因的市面价格是10美元：装在长1.5英寸，宽0.75英寸、有邮票标记的玻璃纸信封里，像糖粉一样呈白色粉末状。1994年，哈莱姆东区一家卖海洛因的公司把每包价格降低了5%，但实际上海洛因的纯度却提高了。90年代中期从卖快克、可卡因到海洛因的转变，只不过是销售一种非法物质转变成另一种而已，对于地下经济来说并没多大意义。
- [5] 我对于我们街区里贫困人数的统计参数，结合了两组数据：一是1990年人口普查及人均住房统计；另一组来自于1993年纽约市城市规划署（3月份）。
- [6] 1989年的哈莱姆东区，大约37%的居民接受公共资助、社会保险收入补贴和医用补贴（见纽约城市规划署，1990年（12月），第221页；纽约城市规划署，1993年（3月））。
- [7]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南美的可卡因和亚洲地区鸦片生产的急剧繁荣，验证了国际毒品经济的爆炸性扩张。
- [8] 天使粉，也叫PCP或Zootie，一种动物用的镇静剂，是从薄荷叶子里提取出来的。当时也有人吸。天使乐在70年代中期较为流行，如今在哈莱姆东区仍有人用。

- [9] 纽约城官方统计的无业人口比例是：男性为 10%，女性为 5.7%。
- [10] 劳动力之外的很多女性，理所当然地在照看孩子，有一些人还在上学。
统计数字来源：1990 年人口及居住条件普查，及 1990 年经济发展指标调查（皆是按地域分析出来的），1993 年纽约市城市规划署（三月份）。
- [11] Cf. Bourgois (1990), and Robinson and Passel (1987).
- [12] Personal communication, Kevin Kearny, Assistant Director of Research, NYCHA, see also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Policy Development 1988.
- [13] Starobin (1994).
- [14] 1990 年的经济发展指标调查是按照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出来的。参见 Edin (1991)。
- [15] 爵士乐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形式，产生于街道文化，后被高雅文化所接纳。
- [16] 哈莱姆东区最活跃的毒品买卖点“主流”人口出现的象征性标记是，快克盛行期间，在第 110 条街和莱克星顿由巴勒斯坦人经营的杂货店里，《纽约时报》周日版可以卖出 120 份。
- [17] Rodriguez (1995).
- [18] Benmator, Torruelas, and Juarbe (1992); Katz (1986); Rainwater (1994); Stansell (1987); and Ward (1989).
- [19] 人类学家南希·斯奇波-休斯在谈到巴西贫民窟的人种起源学时这样说：
人类学家否认这一点，是因为其中隐含着—个特权地位的问题（试比较旁观者对一种疾病或错误的命名），也因为并不光彩，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在多大程度上与其支配者的作用等同，……取决于将其与权利和沉默的关系联结在一起，让毁灭继续存在。
- [20] 录音资料很难编辑，再加上他们说的都是些街道习语，语法、用词和规范的主流学术用语完全不同，但编辑时我遇到的最大问题，则是无法把街道用语的表演成分演绎进印刷体中。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特定程式的身体语言、面部表情、语调所提供的标点符号，快克贩们的很多话就显得很乏味，有时甚至用书面语无法表达。因此，为了表达得清楚而有诗意——我会经常把一些重复、冗长的字词、不完整的想法，有时甚至一页一页的原对话全部删除。为了把意思阐释清楚，有时候我会给一些不完整的句子加进一些语词，甚至包括主语和谓语动词；有时也会把一些相同的事件和主题的对话编排在一起，使其连贯一致，尽管有时是发生在几个月内或几年内的事情，为了简便，有时也会把几个小人物压缩为一个人来写。
处理完这些事情后，我尽可能多地保持语法形式、用词，以及纽约出生的波多黎各人丰富的、直译过来的、已经变成街道文化一部分的西班牙语的语言形式。尤其重要的是，我希望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们的信息。我们经常用英语对话，时不时加上西班牙语的词汇以证实波多黎各人的身份。为此有西班牙语的对话或部分句子，我都做了解释。
- [21] Rodriguez (1995), citing G. Lewis (1963).
- [22] Harvey (1993); Katz (1986); O. Lewis (1966); Moynihan (1965); Rainwater and Yancey (1967); Wilson (1987).
- [23] See Bourdieu (1980); Devine (1996); Foley (1990); Fordham (1988); Gibson and Ogbu (1991).
- [24] 事实上，我确实把几个自己认为带有明显贬低快克贩及家人形象的对话和观察删除了。我“审查”过的大部分是性描写的内容。我觉得有几个事例可能会被人误认为是色情描写。同时，为了不涉及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隐私，我还做了大量的删节。对此我和他们做了大量详尽

的讨论。实际上，只有一个人要我把他从后记中删去，我当然照办了。选择、编辑和审查关涉巨大的政治、道德和个人影响问题，这些仍然是人种志学者们需要继续面对的，尽管他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怎么自信。

[25] Scheper-Hughes (1992: 25); Wolf (1990).

[26] Nader (1972).

第一章

- [1] 有一段时间，第 110 条街和莱克星顿交界处曾被国际和地方新闻界称为城市中的“魔鬼操场”或“龌龊的毒品之角”。1990 年一年的时间，《国家地理》（1990 年 5 月）、《美国律师报》（1990 年 3 月）和《纽约日报》（1990 年 10 月 19 日）都刊登了整版的照片。当我在合法的不动产登记表上查找瑞的社交俱乐部时，发现它已经因为拖欠税从原来的意大利主人那里收走，赠送给城市运作管理部门——一个非赢利性并交得起各项费用的住宅联合会。预算紧缩使这一非赢利组织无法对其进一步开发。但瑞还在继续为那个不再合法拥有这块地皮的意大利主人交着房租。
- [2] May 4, 1989: 4.
- [3] 可笑的是，药店之角那场大火的劫余生者是两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他们在经营瑞的社交俱乐部——快克买卖点里的小杂货店。这些中东难民甚至已经进军当地不动产行业，买下了沿街几栋固定的公寓楼，啤酒、糖果和毒品配件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包括玻璃做的快克烟斗及塑料做的快克和可卡因小瓶。
- [4] “Cheeba”是纽约人用语，“大麻”的意思。
- [5] La Mafia Boba 很难翻译。从字面上讲，boba 或 bobo 都是“反应迟钝或笨”的意思。但普莱姆一帮人却用这个词的反语，表达他们劫掠不认识的人的能力。比如：
他们以为我们很笨，但我们敢作敢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瑞过去一开始喊“La Mafia boba a botellazo”，我们就抓起瓶子朝人砸过去——比如同性恋、或小流氓、或随便什么人——反正都是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 [6] 在纽约市，“捆”是指零售给个人的定量的、包裹好的毒品。一捆含量的多少因毒品和价格的多少而定。比如一捆海洛因里有 10 包共 10 美元的玻璃信封，一捆快克包含 25 管 5 美元和 55 管 3 美元。街道上的毒贩根据他们卖出的捆数计算利润。比如，游戏厅对面公寓楼里的眼线和售出 3 美元一管的服务人员，可以从他们卖出的一捆 55 管的快克中提取 20 美元。
- [7] 街角附近一家卖粉状可卡因的黄金当铺，老板是牙买加人，得知一个雇员瞒报收据后，向其膝盖开了一枪。普莱姆告诉我：“牙买加人不像波多黎各人，他们一般不胡来。”实际上，街面上的牙买加人以极端野蛮而著称（参照 Gunst, 1995）。
- [8] 这里是指一座巨大的、不间断的公建住宅工程楼区的一部分，此楼区覆盖了周边 32 个街区，从哈莱姆东区一直延伸到哈莱姆中区，约有 17800 人。
- [9] 两年后，我和提托交上了朋友，这才有机会进入这个买卖快克的角落。提托是一位 21 岁的小伙子，曾为控制这一地带向他的哥哥开枪并致其终身残废。他是一位出众的涂画艺术家，他的喷涂壁画覆盖了他们社区 6 栋砖砌的公寓，描绘的都是他在毒品世界里的辉煌——包

括带着金项链的自画像。他和祖母住在一栋废弃的楼房里，父亲是被人杀死的，有可卡因瘾的祖母有次来拜访时他把我介绍给她。这位老人很紧张地掩盖着手上针眼留下的疤痕。正是在她的热情鼓励下，我试着为提托联系了市区的一次艺术展。在纽约市艺术世界中，我们遭遇到很冷淡的接待，展览过了一半时间，提托的地方就被人占了。他为此很绝望，用吸食天使粉来消愁。

- [10] 我是1985年搬进哈莱姆东区，1990年夏季搬走的。经济上的原因迫使我们在纽约城外度过了几个学期，所以，我们实际上在那里住了三年半——其中有两年是完整的。搬出哈莱姆东区的第一年，即1990年9月到1991年8月，我们住在哈莱姆西区（晨边公寓一带）。我每周有两个晚上的时间继续和瑞快克圈子里的人在一起。1991年后半年搬到圣弗朗西斯科后，我依然和好几个毒贩保持电话联系。每次去纽约，我都会去见普莱姆。1994年春季和夏季的部分时间，我在纽约城几乎住了两个月，定期拜访普莱姆和哈莱姆东区的其他朋友。
- [11] 本森赫斯特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工人阶级层次的美籍意大利人街区。1989年8月23日，一群白人男孩在街区杀死了一位16岁的非裔美国小伙约瑟夫·霍金斯（Yusuf Hawkins）。霍金斯看到一家当地报纸的广告，来这里买二手车，却被误认为和住在附近的一位美籍意大利姑娘约会（《纽约时报》1989年8月25日，第A1、B2版）。
- [12] 黑社会集团波多黎各派最终取得了哈莱姆东区那家热那亚犯罪家族非法彩票赌博控制权。这个3000万赌博帝国的波多黎各经理于1994年被逮捕。
- [13] 有一次，一个跳弹袭击了我们身边的场外证券市场，当时我们正在附近闲逛。我很犹豫要不要把这件事写进来，因为担心自己对亲身经历过的暴力事件的过分敏感，会被认为是一种自我炫耀式的男子汉行为。实际上，我们并没觉得有会被殃及的危险。同时，我录音机的内容经常被枪声打断。最初编辑这些材料时，我觉得离这些材料如此接近，实际上我没有记录这些枪声，只是把它们当成一些静态的干扰或交通噪声来对待。
- [14] Taussig (1987)。
- [15] 法国社会学家华康德（Loic Wauquant, 1993a）在他的芝加哥南部调查中，把这种情势称作“日常生活中的不安定”因子。他将其与结构经济及政治因素联系起来，比如解决工业化初期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衰退现象。也可参见John Devine (1996)对纽约内城高中学校暴力文化的讨论。
- [16] 在1990年一次纽约市人口普查报告中，我提到的那部分孩子是最富有的。其平均家庭收入（249556美元）要比哈莱姆东区的平均家庭收入（21000）高11倍多，其中值家庭收入则要高13倍（《纽约时报》，1994年3月20日，第A6版）。
- [17] 夏普顿A1是指非裔美国人住的市中心，这里的居民在纽约市颇受尊重。他们在90年代初期对种族主义的严厉痛斥以及社区层面的总动员，引起了媒体关注。
- [18]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90: A1, B4.
- [19]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1988: A1, B5. 1994年早些时候TNT策略宣告失败并被取消。
- [20] 事实上，凯撒对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席卷美国的反毒呼声、“家庭价值”和堕胎大讨论的骗局和虚伪很了解。

我可以是个卑鄙十足的小人，有足够的钱拉动我的竞选运动。我只要提到“毒品”，他们肯定立马选我。

堕胎和毒品对政客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了，伙计。

你以为他们凭什么被选上？看看艾达豪 (Idaho) 和他们那群官僚代表们所做的关于停止堕胎之类的诺言就清楚了。

纽约存在毒品问题，所以只要你说“我要禁止毒品流通，要雇用更多的警察”之类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份工作，伙计。

90年代中期，“暴力犯罪”、“未婚妈妈的福利”或“非法移民”等问题完全可以被凯撒谈话中的“毒品”来替代。

[21] 那一年，玛丽亚住的那个公寓楼是整个曼哈顿地区工程楼中凶杀案发案率最高的。

[22] See Rodriguez (1989), chap.3.

第二章

[1] Marsh (1932): 362.

[2] Melendez (1993): 43-44. 事实上，只有40%的波多黎各人可以享受食物补贴，因为那里的推选条件相当苛刻。

[3] Quintero-Rivera (1984): 5-12.

[4] 我要感谢 Eric Wolf 与我进行的关于改变 jibaro 想象与分类的谈话。

[5] Cf. Bonilla and Campos (1986); Dietz (1986); Centro de Estudios Puertorriquenos, History Task Force, 1979.

[6] *New York Times*, 1995: A4.

[7] Robinson and Passel (1987).

[8] Rodriguez (1989).

[9] Romo and Schwartz (1987).

[10] 1990年11月29日《加勒比海商报》报道：纵向跨国公司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生产车间以较高的税率通过所谓的“转换价格”，把利润转换到他们在波多黎各的子公司，再通过非波多黎各的子公司用高价购买他们在波多黎各的子公司生产的東西。

“1988年，美国公司在波多黎各创造了8.9亿美元的利润，也就是说，他们公开的全球利润大约19.7%直接来自对外投资活动。”

[11] 直到1934年，美国政府才准许在波多黎各学校五年级以上的学生中，用西班牙语进行教学。

[12] 从游戏厅开始到街对面的公建工程住宅公寓楼这一地带的家庭收入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国家统计数据中波多黎各人贫困的事实。据1989年权威的住房统计数字——当然是相对准确的，因为房租是按照收入的百分比来计算——非裔美国人家庭每年平均收入要比波多黎各人多3000美元(12557对9301美元)。

[13] 取“地狱之门”这一不祥的名字，是因为东河河流在此处有漩涡和阴沟形成。

[14] Bolton (1922).

[15] Bolton (1922): 68-74; Janvier (1903): 79-81.

[16] Rubinson (1989); *New York Times*, May 3, 1931: 14.

[17] Fischler (1976); Rubinson (1989); Tilley (1935).

- [18] Cf. Concistre (1943): 16, Corsi (1925): 90-92, Marsh (1932): 50, and Tilley (1935): 32.
- [19] Tilley (1935): 32, citing Corsi (1925): 90.
- [20] Tilley (1935): 199.
- [21] Cordasco and Galatioto (1970): 31; 309-10. citing Mayor's Committee 1937: 16, Meyer (1989): 7.
- [22] Orsi (1985): 14.
- [23] Marsh (1932): 186.
- [24] 意大利人为了报复爱尔兰和德国种族主义教区的居民，从意大利南部引进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皇视为圣物、由珠宝雕刻成的圣母玛丽亚的雕塑。这一古老而神圣的雕塑，使他们的教堂变成一个官方的、有治愈创伤权力的神圣教堂。一年一度的朝拜吸引着来自整个纽约的信徒，他们游行穿越哈莱姆东区的各大大街道，来此陪伴这一古老的雕塑。
- 我在这里亲眼见证了一系列的种族冲突。我带着一岁的儿子来接受当地意大利裔美国牧师的洗礼时，很少见到波多黎各人的影子。周围上了年纪的意大利裔美国妇女相互公开抱怨波多黎各堂区居民的粗俗。他们对最近发生的海地朝圣者的“侵犯”尤为恼火。这些来自海地的朝圣者是特意从布鲁克林赶来景仰这个雕塑的。他们声称很为这个雕塑的安全担心，并讨论怎样才能限制海地人进入教堂的中殿。
- [25] 1990年，欢乐大道最后两个社区，即我的公寓楼前一地段，有一个废弃的电缆厂因非法排放有毒污水被关闭，由此在代理人、投机商和当地意大利裔美国黑社会承包商之间，引发了一个拖延了相当长时间的敲诈和重建丑闻的诉讼案。在此期间，一伙无家可归的快克吸食者占据了巨大的厂址，将其改变为他们自己的快克室。像1900年这里的原住户把“各种垃圾和废物夹裹在报纸中一起卖”一样，当代吸快克的人把工厂里腐朽的水暖设备拆卸下来当废铁卖。
- [26] Orsi (1985): 160.
- [27] *New York Times*, May 16, 1893: 9.
- [28] Marsh (1932): 65, 64, 49.
- [29] Thrasher (1936): 74.
- [30] Orsi (1985): 161, citing Covello (1958): 43.
- [3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种族主义者的父母，颇具阶级意识的犹太人，不仅是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因为上一代人的“种族不纯的特质”，促成了白人的逃离。“德国人……都搬走了，就剩下12个。他们搬到布隆克斯……和其他地方去了。据说是因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迁入而导致的不良居住环境所致。”(Marsh, 1932: 356)
- [32] Archives of the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facilitated by Frank Vardi.
- [33] Marsh (1932): 49.62.
- [34] *Time Magazine* November 4, 1946: 24-25. 关于种族暴力的原因，可以参看 Meyer (1989): 123-24; Covello (1958): 237-43.
- [35] Schepess (1949): 56, citing Chenault (1938): 123.
- [36] 1898年入侵后，美国正式把 Puerto Rico 改为 Porto Rico，反映了一种英语化发音。
- [37] Marsh (1932): 55.
- [38] Cimilluca (1931): 30.

- [39] Tilley (1935): 38, citing Leonard (1930): 9.
- [40] Schepes (1949): 57, citing Armstrong, Achilles, and Sacks (1935): 57.
- [41] Lait and Mortimer (1958): 126-27.
- [42] Tilley (1935): 34, 48-49.
- [43] Marsh (1932): 49.
- [44]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5, 1946: 36.
- [45] Marsh (1932): 431-22.
- [46] Thrasher, 1927, 1932, 1936.
- [47] King (1961), Levitt (1965), Levitt, Loeb, and Agee (1955).
- [48] Cf. Rivera (1983); Rodriguez (1992); Thomas (1967).
- [49] Tilley (1935): 192, 32.
- [50]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1957: A1, 29, 30.
- [51] Camilo Vergara 曾经证实纽约的贫困方案是如何有意在 80 年代后期把贫困家庭聚集到南布隆克斯的。
- [52]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 1956
- [53]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 1956: 11-12.
- [54] Concistre (1943): 74.
- [55] Marsh (1932): 61.
- [56] Reed (1932): 18.
- [57] Marsh (1932): 61-62.
- [58] Tilley (1935): 32-33, citing Cimilluca 1931: n.p.; Durk (1976).
- [59] Reinerman and Levine (1989).
- [60] Frankel and Freeland (1990); Van Dyck (1990).
- [61] Dumpson (1951): 42, 43.
- [62] *New York Daily News*, October 19, 1990: A1.
- [63] Ibid.
- [64] Dumpson (1951): 40.
- [65] Concistre (1943): 66, citing Thrasher (1936).
- [66] Reed (1932): 32.
- [67] *New York Times*, May 16, 1893: 9.
- [68]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1947: A4.
- [69] Reed (1932): 32.
- [70]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5, 1946: 36.
- [71] Marsh (1932): 354-55; see also Kisseloff (1989): 367.
- [72] 一名波多黎各人最终从“胖子托尼”那里夺回了彩票赌博控制权。
- [73] “胖子托尼”付了 200 万美金的保释金，敦促美国高级法庭改变了联邦保释金数额，允许不用交付保释金，预防性地拘留危险的罪犯。
- [74] 在 50 年代《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文斯·罗承认了以前从未招供过的六起杀人案和一些

重大的盗窃案。

[75] O'Brien and Kurins (1991);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87; A31;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88; 34;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1988; B3;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1990; B3; *New York Times*, March 5, 1990; B1;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1991; B3.

[76] O'Brien and Kurins (1991); 335.

[77] 1988年毒品监管部门。弗兰西斯·豪尔(战术缉毒队的发起人和一位在纽约警署缉毒分队工作35年的退伍兵),在1990年5月的一次论坛中就毒品问题告诉纽约州立大学的学生们:

除了新闻发布会上你们所看到的案例——我参与了其中好几起——今天的纽约街道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可卡因还多,这一点毫无疑问。

去年8月,在女王州森林山区一所公寓里发现的5000磅可卡因,让人惊恐不已。搜出这么多的可卡因对街面上的可卡因买卖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影响吗?没有,一点都没有。正如现在,我们在警察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而在这座楼一步之遥的街道,也会有人在卖可卡因。

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1981年在当时的副总统布什的指挥下,由里根总统亲自组建起来的南佛罗里达州的特种警察部队,导致了更多的可卡因流入美国。我这样说,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大麻被运进南佛罗里达,大麻贩子因而不再做大麻生意。一公斤的可卡因,即2.2磅,只有5磅重的一包白糖一半的大小。

第三章

[1] 007在这里是指一种大型折叠刀的品牌。

[2] 后来,凯蒂向我解释说“与菲力克斯厮混的”那个女人是她妹妹。他的脚蹠不是因跳楼致伤的,是她用刀把他砍伤的。

[3] 参见Wolf (1956)关于 *compadrazgo* 与农村劳动关系的讨论。

[4] Moreno的字面意思是“皮肤黑的”,这里用来指黑皮肤,以区分非裔美国人和肤色深的波多黎各人。

[5] 私下里,凯撒承认他也受到街道上暴力的威胁。事实上,他甚至还提供了受创伤后紧张紊乱的证据:

凯撒:天气越热,人们的脾气变得越坏。有时我真的害怕上街。

哎呀!我本来想着今天不来,因为外面太乱。我可不想为买包薯条在路上遭遇跳弹。

真没想到!前几天我听到一个鞭炮响,吓得赶快趴在地上。当时我正和女朋友卡门在散步,忽然听见“嘣”的一声响。我说了句“见鬼!”我吓坏了,那声响把我的魂儿都吓跑了。

看到一些黑鬼在我的面前被枪杀了,太过分了,可你没别的办法自卫。

我知道,有一次我跟女朋友在杰斐逊公园散步,见到过这类事的发生。我们正穿过一座小桥去河那边的瓦德岛上玩。你知道那座桥,万圣节前夜一个家伙就是在那里被人用切肉刀砍死的。

菲利普:对,不就在上个月有人勒死并强奸那个哥伦比亚小姑娘的地方?

凯撒:没错。我们想从桥上过去,到那边去玩,是吧?

有三个小伙子走在我们前面，大约有15英尺远。

他们在说着什么，我和女朋友也在说话。突然，三个小伙子中个子最高的那位拿出枪递给最矮的那个——两个矮的，一个高的。这个小个向着另一个小个的头上就是一枪。

我们吓坏了，不知道该跑还是不该跑，都吓呆了。

中等个的已经倒地上了，他还向他的头部开了两枪。

我们俩吓得直喊“见鬼！”我女朋友吓哭了，我赶紧制止她“憋住！别出声！”

他们朝着我们这边走过来，我想我的末日到了。你知道我说什么了吗？我只抱紧女朋友，我很害怕。但他们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走开了，没有跑，大摇大摆地往前走。

现在我每天都能见到那小子。他真有种！在街上晃来晃去，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 [6] 回到哈莱姆东区之前，大奔得和瑞通过一中间人协商好究竟要赔付他多少“债务”。
- [7] 不幸的是，亚伯拉罕把医院给他配制的玻璃眼球掉进医院咖啡厅他正在做着的一桶汤里。医疗补助制度后来拒绝为他付第二个玻璃眼球的钱。
- [8] 以前在洪都拉斯移民那里，经常发生1990年元月幸福园俱乐部舞厅的那种纵火案。我们街区一家经营海洛因的公司在这场火灾后将其更名为“欢乐园”。
- [9]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纽约市警察管辖区不时发生的腐败案例阐释了流行但基本上属于随意性的、街道毒贩层面的缉毒警的腐败现象。警官们距离社区比较远，因而他们只管巡查，而不拿贿赂款，他们精通于精心策划一起假的袭击案，借机把他们没收的毒品和钱装进自己腰包。直到1994年中期，纽约市的警官们因为故有的小腐败的诱惑，明确打消了抓捕毒贩的念头，普遍认为缉毒应该由那些受过专门特殊训练的精英们去管。
- [10] 见识一下地方警官的无能：我在隆冬去警署报我的公寓盗窃案时，看见总办公室墙上的黑板上涂着这样的字样：“不供暖，不抓贼。”
- [11] 关于纽约城法院在1989年“反毒战争”高峰期变得如何不知所措，请参见1989年5月31日的《纽约时报》B1版。

第四章

- [1] 纽约市城市规划局，1993，1：37。表6。

1950年工厂的职位数占纽约市职业数量的30%；到90年代早期，只占10%。相反，1950年服务行业的职位数只占15%；到了1992年，服务行业的职位数则占整个城市职业的30%。仅在80年代，制造业行业的职位数就下降了31%，而“生产服务行业”却提高了61%，“全方位服务行业”提高了16%。

- [2]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1991; D1.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1990; D17.
- [3] 和男性相比，波多黎各女性劳动力的数量从1980年的34%提高到1990年的42%。
- [4] *New York Daily News*, October 30, 1990: 1.
- [5] “为权力而战”是1990年黑人“公敌组合”最为畅销的一首打击乐歌曲。
- [6] *Salal*在标准西班牙语中被拼写为*salar*——字面意思是“虚报”。但波多黎各西班牙语却把“r's”拼写成“l's”。
- [7] Romo and Schwartz (1993).

- [8] cf. Colburn (1989); Scott (1985).
- [9] Becker (1963); Hebdige (1979).
- [10] 根据 1990 年纽约市人口普查结果, 22.6% 的拉丁人在建筑行业工作, 而非裔美国人中只有 8.8%。1980 年到 1990 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 纽约市建筑行业的职位数所占比例从 2.3% 提高到 3.2% (纽约市城市规划局, 1993 年 1 月, 表 6)。
- [11] *New York Daily News*, August 13, 1991;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91; A29; *New York Times*, March 5, 1990; B1;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88; A34.
- [12] 不同寻常的是, 这一出价几百万美金的特殊的窗户合同的老板却被告发 (比较 1991 年 8 月 13 日的《纽约日报》第 20 页; 1991 年 7 月 28 日的《纽约时报》第 29 页)。他不是别人, 正是“胖子托尼”, 是从前在哈莱姆东区驻守的热那亚家族犯罪团伙的黑手党头目。小皮特的转承包商在这一系列腐败案中够不上起诉条件。
- [13] Bourgois (1989a).
- [14] Covello (1958): 223.
- [15] Berlin (1991): 10.
- [16] 没登记注册的新移民对纽约市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公开乐意接受这些没登记注册的移民在纽约生活和工作。而在同一时期 (90 年代中期), 美国其他州, 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则还处于反移民的歇斯底里中 (1994 年 6 月 10 日的《纽约时报》A1, B4 版)。
- [17] Smith (1992).

第五章

- [1] 萨亚德 (Abdelmalek Sayad, 1991) 分析法国第二代阿尔及利亚人的文化拘禁问题时, 提出了“初次少年犯罪”的观点。
- [2] 纽约诗人忒托·拉维埃拉 (Tato Laviera) 在其诗作“纽约人”中讽刺性地提到过这一点。
- [3] 凯撒在都市医院的精神病专科接受治疗时, 我去看望过他。他告诉我希望自己“被关起来”, 一直到预防他自杀的四星期的强制观察疗程结束为止。他还抱怨心理分析医生不听他的请求, 不给他强效的药物。不过, 随着他的情绪逐渐缓和下来, 凯撒对他脆弱的心理状况等闲视之。
- 对, 我在高级安全病房, 像弗雷迪·克鲁格 (Freddy Krueger) 电影里的场景。我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像个疯子。我在那里很害怕, 晚上总觉得那些疯子会出来杀我。我变疯子, (弯着双肩) 开始四处乱跑, 跑到那些因吸毒变疯了的人那里。
- 那里有个犹太人, 那时我叫他伍迪·艾伦。他已经在那儿待了两年了, 伙计。你应该认识伍迪·艾伦吧? 他是个有名的犹太小伙子, 这家伙说起话来就像艾伦——狗日的猥琐的犹太人。我想杀了他。等我从收容所出去, 就去杀了他, 伙计。
- [4] 凯撒喜欢在我录音时让他的社会批评带点讽刺意味。他完全明白我的理论方向是竭力揭露个人病症和社会结构压迫之间的关联。他也许还会嘲笑我对社会边缘化和种族主义问题怎么会如此关心。

[5] cf. Bourgois and Dunlap (1992).

[6] Sanday (1990).

[7] 我认识刘易斯时，他30多岁，已经是几个女孩的父亲了。他经常很富正义感地抱怨年轻人对性太不负责任，尽管他自己也时常陶醉在对乱交和快克瘾的公开夸耀中。

刘易斯：我告诉我女儿，“我可不想让那些小子占你们的便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一走了之。我不想让他们说你们是鸡或别的什么。”

现在事情变得更糟了，出现了新一代的妓女。原来根本没有快克，这类的东西也都没有。可现在！别提了，伙计。现在街道上的那些男孩子，就想毁掉女孩的生活，你知道吧。女孩们本来还有个不错的前景，可这些男孩子过来了，糟蹋了她们。他们从楼上下来还说：“嗯……我搞了那个婊子。”

第六章

[1] Jaggar (1983), Hooks (1994).

[2] 以大男子主义、家庭结构、妇女权利以及市中心贫民区的文化为主题的电影，见纽约电影《我就喜欢那样》(*I Like it Like That*)。这部电影用讽刺和悲剧的形式描述了附近一个公建住宅公寓内两极化的家庭暴力问题。一位单身母亲的前男友出于嫉妒，残暴地杀害了一家六口人。杀人者是位下岗工人，因和前女友争吵几个月后，失去了对孩子们独裁的能力，于是用屠刀砍死了这一家人(1993年5月4日《纽约时报》B1, B3)。

相反，一项针对60年代以来墨西哥农村大男子主义家庭生活的社会学调查研究表明，成功的家长要保持其在家中的稳定和威信，是不必对其家庭成员诉诸公开的身体暴力的(Hunter, 1971: 116)。

[3] 我们所坐的这个栗色的Renault Alliance车的车棚上，至今还有好几个枪子留下的凹痕。那是今年夏初，一位3岁孩子的母亲被枪杀后留下的，就发生在我住的公寓窗前，我停好车抱着孩子去二楼的套间几分钟内发生的事。凯蒂还曾因这位母亲偷用过她卖的快克而把她解雇了。

[4] 在对这个古巴家庭所做的历史性分析中，Verena Martinez-Alier (1974, 135)把私奔视作选择个人自由的行为。她论证了浪漫私奔是个体对古巴社会中的种族主义进行反抗的一种形式。

[5] 有天晚上，我在药店之角附近的杂货店里确实看到过凯蒂的父亲。普莱姆若无其事地指给我看一个衣衫褴褛、瘦弱不堪的老人，他就站在后面的黑暗处，脚不停地晃动着，喝着我们想买的啤酒，尽量回避着其他客人的视线。普莱姆小声对我说：“那就是凯蒂的父亲。”我很难相信这个潦倒的、畏畏缩缩的酒鬼就是给凯蒂的童年带来创伤的残暴的家长。他看起来如此孤单弱瘦——像离开水后张大嘴巴的鱼——要不是他嘴里流着口水唠唠叨叨说个不停，我还不至于那样吃惊。普莱姆被我吃惊的表情逗笑了。他有点伤感地说：“对，你会相信吗？要是他不背井离乡来到纽约的工厂找工作，说不定还生活在他们那个小渔村，肯定还是个酒鬼，还会毒打凯蒂，但最起码后果不会这么惨。”

[6] See Davila (1987), Scheper-Hughes (1992), Singer (1986), Singer et al. (1992).

[7] 迫使菲力克斯雇用普莱姆暂时当游戏厅经理的原因正是基于这件事。为了减少与妻子的妹

妹厮混而被妻子砍了一刀的羞辱，菲力克斯谎称自己是从汽车旅馆的阳台上跳下来后伤了脚踝——至少开始时普莱姆是这样告诉我的（又见第三章注释2）。

[8] Guarnaccia, De la Cancela, and Carrillo (1989); Lewis-Fernandez (1992).

[9] Literally, a "towel for tears".

[10] Cf.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1990: 1.

[11] 《致命诱惑》(*Fatal Attraction*) 是 1987 年好莱坞的获奖影片，它讲述了一个女人胁迫她前情人及其家人的故事。

[12] 凯撒对塔巴莎特别反感，因为她几年前曾是他的女友。塔巴莎经常在公共场合羞辱凯撒，这一次对话三周前——普莱姆当着凯撒的面提醒我——塔巴莎在游戏厅前的大街上，“一脚把凯撒踢得趴在了地上”。更糟的是，在瑞租来离游戏厅不远处的社交俱乐部为他的两个儿子办生日聚会时，她用同样的办法教训了凯撒。我没有看到塔巴莎对凯撒的这一传奇式的蔑视，当时我在俱乐部里领着一岁半的儿子玩，小家伙当时对地板上的打击乐、爵士乐、萨尔撒音乐很是着迷。参加这一生日聚会的人来自不同的年龄段，有的是刚出生的婴儿，有的已经是曾祖母了。

[13] Seda Bonilla (1964).

[14] Benmayor, Torruellas, and Juarbe (1992). Hooks (1994). Jaggar (1983). Acosta-Belen (1993).

[15] Katz (1986). See also Rainwater (1984).

[16] 凯蒂应对福利金问题所表现出的应变能力，连凯撒都妒忌和羡慕：

普莱姆：凯蒂在公交车上为弱智儿童服务，她通常是负责打考勤卡。她有两张社保卡，一个用于工作，另一个用于领取福利金。后来她又有了亚伯拉罕的钱——他的社保金，每个月都有。她能挣不少钱呢，伙计。

凯撒：没错，她还干过税收的事。

普莱姆：对，她也在那儿干过（指着游戏厅的隔壁），那边原来有个保险公司，她在那里负责填写纳税表。

凯撒：这娘们真行！

普莱姆：都是几个小时之内的事情。孩子们出门前她挤时间回到公交车上工作，孩子下车后她再到这里来上班。

凯撒：嗨，她像个骗子，一个犹太骗子！伙计。

普莱姆：那家伙还有存款，她把挣来的钱存进银行。记得几年前我有点个人所得税，就是让她帮忙存在她的账户上的。

她还不错，伙计，从来都没从那里取过钱。

凯撒：有一年她还帮我办了所得税，给了我 15000 块钱，可我连五块钱都没敢想过，那是我第一次拿所得税，我赚了，伙计。她什么东西也没要我的。

普莱姆：她也帮我做过。

凯撒：她太笨了，她应该继续留在公交车上为弱智儿童工作，那活儿不错，为市里干活，福利也行，又有工会会员证。

[17] 调查显示，因没有履行官僚主义者重新认证的要求，家长们档案册上的福利被中止，这成了纽约市无家可归现象唯一常见的原因。而为他们提供的应急住房和社会服务花销，远远

超过联邦政府用来处罚市里以维护这些不精确的档案所相匹配的基金数额。

1988年芝加哥对25个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进行滚雪球式的问卷调查，没有一家能完全达到社会福利部门救济的要求，每一家都有别的收入来源，仅靠官方提供的福利，他们根本做不到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在纽约市，真正的福利津贴在1970—1992年间下降了30%（《1994年8月30日《纽约时报》A14版》）。

- [18] 在街面上，特别是女性间的谈话中，福利金调查人员的粗鲁成了她们的一贯话题。普莱姆最早的童年记忆，是母亲与福利金调查人员就收入来源的增补问题的冲突。虽然结果基本一样，但她母亲对官僚们的反抗却没有凯蒂那样强烈。她成功地利用地下经济赚来的钱来弥补自己处于贫困线之下的养家费。

普莱姆：我父亲走后，我们就只能靠公共资助了。母亲独自一人养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相当紧。我小妹今年25岁，那时她还躺在童车里。

我母亲那时在卖化妆品，当福利调查人员来敲门时，她就把那些化妆品藏在童车里。

我那时还是个孩子，经常纳闷这帮人到底是谁？我恨他们。他们一来敲门，母亲就说，“等会儿！”跟着便赶紧满屋跑着把那些化妆品藏起来。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我还是个孩子，什么也不懂。我母亲会告诉我，“调查人员！”她说，（挥动着胳膊，皱着眉，尖叫着）“调查人员！调查人员！”

家里很破烂，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他们还是会来调查，她还得把那些玩意儿藏起来。

那好像是1969、1970或1968年的事。

现在他们不再来了。我和桑德拉住在一起时，从来没人来过。我第一天就和她住在一起，还总是让她领取福利金（嘿嘿一笑）。

我想他们大概没钱再派人来调查了吧！

- [19] 和卡洛斯的谈话没有见效，因为她的公寓楼里六七个少年在接下来几个月内被流动的炮火击中。幸运的是，没有人丧命。争端最终中止了。但结束前，我先后三次碰到枪击案发生。第一次是和妻子在当地一家饭馆吃饭。枪声迫使我们不敢抄近道，只能绕过这个街区才到达目的地。
- [20] 瑞不得不让凯蒂的哥哥妹妹一起去为她付保释金。这一点可以诠释凯蒂支持系统本质上的脆弱。他不信任她们任意一个单独去送钱。凯蒂的弟弟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也是个吸毒者。她小妹是个靠福利金生活的单身母亲，对粉状可卡因和酒都很着迷。
- [21] *New York Post*, April 11, 1989: 5, 30-31;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89: A1, A16; *New York Times*, July 3, 1994: E3.

第七章

- [1] Farrington (1991).
- [2] 80年代，纽约市虐待儿童的统计数字上升了将近700%，从1985年到1994年提高了232%（试比较1990年12月19日的《纽约日报》第5、10版与1988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的B3版和1989年12月19日的B1版），而且我们还无从得知这一增长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或这一增长报告的程序是否一样、虐待儿童的社会内涵是否已经变化。

- [3] Marsh (1932): 361.
- [4]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 (1956): 25.
- [5] 关于更多的孩子毁灭的例子, 参见后记中的曼尼、安杰尔、莱斯特、朱内尔、安杰洛的生活状况。
- [6] Marsh (1932): 48.
- [7] 巧合的是, 几年后我在《纽约时报》看到同一个地点的照片, 这是张纪念一位 52 岁的老人的鲜花照片, 老人是前去接 5 岁的孙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谋杀的 (1993 年 12 月 1 日 A20 版)。
- [8] 第二天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 受害者的年龄为 44 岁 (1989 年 11 月 16 日 B2 版)。
- [9] 我是在离曼哈顿和哈莱姆东区交界处七个街区远的地方长大的。正如第一章注释 16 中讲的那样, 我小时候生活的社区, 中等家庭的收入比我现在住的游戏厅街区统计出来的数据高出 13 倍。1990 年我住的社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和哈莱姆东区我的公寓附近社区的 47% 相比还不到 1%。1989 年在我们那个统计区域内只有三个波多黎各人, 尽管这里离全美波多黎各人居住密度最高的地区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车程 (见 1990 年人口和住房统计)。
- [10] 波多黎各西班牙语中, java 是个贬义词, 专指那些有非洲人特征但肤色“偏白”的人。
- [11] 我很认真地选编了玛丽亚的诗歌, 唯恐超出了其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材料范围而夹杂太多的个人观点。
- [12] 1991 年, 在纽约等待政府公建工程房的人口数量 (189000 户家庭) 和已经住在里面的 (600000 人) 的数量几乎一样多 (见 1991 年 8 月 19 日的《基督教科学报》第 14 版)。
- [13] 凯撒向普莱姆坦白, 他有时候会在孩子睡着时抓起他的脚在空中晃。卡门听到哭声跑进卧室时, 他就装着在哄刚从噩梦中惊醒而号啕大哭的帕波。还有一次, 凯撒在为他洗澡时破裂了他的包皮, 最后不得不将其送往市医院的急救室。
- 我开始想到底要不要把凯撒虐待孩子的事写下来, 但这时,《纽约时报》开始报道, 单在 1990 年, 领养孩子制度是如何造成 45000 个孩子等人领养。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有记者报道, 儿童福利院收容所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睡的都是孩子, 兄弟姐妹因这一领养制度而不得被分开。(请比较 1989 年 7 月 3 日的《纽约时报》B21-22, 1989 年 10 月 23 日的 A1 版, 1989 年 12 月 19 日的 B1 版, 1992 年 3 月 29 日的 A1, A20 版, 1989 年 2 月 9 日的 B3 版。)
-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解读从我家的暖气管道里传来的孩子们的尖叫声。是出于种族的优越感不理睬市中心贫民家庭里这个有特殊意义的、野蛮地养育孩子的方法还是应该下楼去干涉?
- 最后, 有人告发了凯撒虐待儿童, 但调查人员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反而向凯撒吐露了告发者并引发了两人之间长期的敌对关系。
- [14] *New York Daily News*, November 19, 1990: 5;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1988: B3;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 1989: A1, B9;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1989: A1, B4;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1989: B1;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90: A8;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1990: B3;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1992: A1, A20.
- [15] Bourgois and Dunlap (1992).
- [16] 20 世纪前 10 年, 一位美国医生在一家颇有影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在文章脚注中他向大众保证, 可卡因影响下的非裔美国人越来越走向残暴的事实已经在 1897 年的临床实验

中得到证明……一系列可卡因试验都是通过皮下注射进行的。这位医生同时还告诉读者注射可卡因后，性欲会增强或反常，平静的黑鬼们变得好斗，胆怯的黑鬼们则变得颇有“荷兰勇气”。最近几年南部大部分的杀人案件都与可卡因有直接关系，而这些罪犯曾经都是些无害的、遵纪守法的黑鬼。另外，黑鬼们一旦养成习惯，似乎无药可救。

……一两次尝试吸毒就可使其染上毒瘾——除非将其消灭，否则会对社区造成永久性的威胁。(Williams, 1914: 247)

[17] 比如我住在哈莱姆东区时，为瑞工作的 30 多个毒贩中只有两名女性。

[18] Althaus (1991); Bourgoise and Dunlap (1992).

[19]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8, 1989: A1, A6; Bowser (1988).

[20] *New York Times*, May 28, 1989: A14;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90: A8;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8, 1989: A6.

[21] 说到在快克买卖点的外面闲逛，我有好几张照片，都是妻子抱着儿子在那里照的，尽管她也反对毒品买卖和滥用。

[22] 1990 年 5 月 25 日《纽约时报》的 A1、B5 版：事实上，医学文献对子宫内存留的酒精和毒品效应的描述模棱两可，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有的婴儿受到的伤害很严重，有些则很健康，医生们对此的解释前后不一。90 年代中期的研究表明，受快克影响的婴儿大多数在孩童期如果有足够的社会关怀和及时的医药治疗，是会完全康复的。

[23] 就瑞把毒品卖给孕妇和天主教虚伪的教义问题，我和他进行过激烈的争辩。凯撒的话缓和了我们的争论，他支持瑞的观点，抨击说美国更大的虚伪其实是军事工业情结。

凯撒：我也不支持堕胎，菲利普，那肯定不对，也是罪过。

还不如等他们长大了让他们去打仗，所以时不时地有战争爆发，每四年一次。那可比孩子出生前就把他们扼杀要强很多，每四年打一次仗，人口数量不就降下来了嘛。

战争可是笔大生意，伙计，最有权威的生意。那些该死的航空母舰要花去好多个亿，毒贩（指着瑞）可没那么多钱。不过（笑了笑）——可能会有上千万，但不到一亿，他们肯定不会有部队挣的钱多。

[24] 我们和一个吸毒的孕妇交上了朋友。在离游戏厅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我们见过她在隆冬天揭开大衣给另一个名妓看，并解释说，她怀孕后生意好多了，“他们就喜欢找孕妇”（见 Bourgois and Dunlap, 1993）。

[25]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 1987; *Newsday*, October 29, 1990: 8, 30; *Village Voice*, April 3, 1990: 11-12.

[26] Scheper-Hughes (1992).

[27] Majors and Billson (1992).

[28] 美国印第安人类学家迈克尔·多里斯 (Michael Dorris, 1989) 讲到 he 收养的一个苏人 (美国南部和加拿大北部的印第安人) 孩子时写道：随着传统的性别关系意义的变化和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权或至少有选择地公开饮酒，胎儿酒精中毒综合征在本土美国孩子中增多了。波利特的评论 (Pollitt, 1990: 426) 表明，多里斯没有把印第安人在制度上受压迫的事实充分考虑进去。她抨击他不知不觉中落入了“胎儿权利”的陷阱。库克林 (Cook-Lynn, 1989) 作为一名苏人，也批评了道瑞斯对自己孩子的悲剧所做的中产阶级的、盎格鲁式的曲解。他

还指出，苏人长期以来一直在通过文化的恢复和治愈作用来应对酗酒问题。

第八章

- [1] 两组围绕我的公寓附近的统计数字表明，70% 多的单身母亲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对同一地段所有家庭的这一调查数据只有 47%（1990 年人口及住房统计）。
- [2] 在一本论文集中，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 1991: 291）说过，“一个未婚且能干的母亲家庭要比父亲只是个附属物、父母齐全的家庭健康得多”。
- [3] 1994 年 3 月 31 日的《纽约时报》A18 版：对于年轻工人来说，家庭贫困率上升得更快一些。年龄在 18—24 岁间的工人的工资（每小时 6.5 美金）较低，还不能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保持在贫困线之上，这一比率从 1979 年的 23% 上升到 1984 年的 47%。
- [4] Quintero-Rivera (1984)。
- [5] De la Cancela (1986). Paredes (1971). Ramirez (1993)。
- [6] 罗西在瑞那里干了六个月，直到她挣的钱可以支付租用公寓补贴标准的第八条。她刚刚生过孩子，急着从她母亲拥挤的公寓里搬出来。在游戏厅里，她用大部分时间为婴儿织毯子，她母亲在家里替她照看孩子。
- [7] 刘易斯和一位卖身养毒的妓女共用 5 美元一管的快克时，他坚持要用他的“烟斗”，这样他可以多得一点松脂（参见 Bourgois 与 Dunlap, 1992）。
- [8] 一位在游戏厅这一街区长大，现在一所职业培训学校当秘书的波多黎各人抱怨说，她和朋友谈起他们的不安分时，她的朋友告诉她不要太“白人化”了。
- [9] 讨论一个墨西哥村子里的大男子主义时，亨特（Hunter, 1971, 116）说过，和那些老套的出于自卑感的大男子主义者的暴力淫乱和毒品滥用相反，“真正的大男子”对自己的掌控权是相当自信的。他们可能是“高度禁欲的，往往很忠于自己所谓的进步、诚实和正直。按照他们的文化规范，完美父亲的典范应该是：宽容、贤明、公正、诚实”。
- [10] 六个月过后，就在同一地点，一名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了他 3 岁的侄女被捕（1991 年 1 月 7 日《纽约时报》B1 版）。
- [11] 几个月前，我亲眼见证了凯撒对继父少见的屈服。一个炎热的周日晚上，我们碰到了他的“伯伯”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他们就坐在附近公寓楼院子里一个冷饮店旁的长凳上。他的继父 40 来岁，矮个、偏胖。他咧咧嘴抓住凯撒的裆部，朝着跌坐在地下的他的朋友们喊着：“你们，看看我儿子的家伙有多大，这是我儿子，他的家伙可大了。”凯撒严肃地笑笑，但让我吃惊的是，他表现得很顺从。正常情况下，他绝不会容许别人这样侮辱他的身体。我想或许他很感激一个男人公开承担起基因责任，而且争当他父亲这件事。相反，凯撒的生活中从来都没有过一个稳定的继父，或许这才是他为什么和“养祖父”亚伯拉罕的关系那么亲的原因。亚伯拉罕有时会在游戏厅收拾录像机里的 2 角 5 分的硬币，普莱姆把亚伯拉罕监管得像个“骗子”，确保他晚上来这里喝酒不能超过 3 听 16 盎司的麦芽酒。普莱姆还经常护送他回家，有些晚上当他用“偷”来的小费喝得酩酊大醉时，普莱姆还得一路扶着他回家。普莱姆很尊敬亚伯拉罕，尽管他又老又衰。普莱姆：亚伯拉罕挺酷的，他原来和刘易斯的母亲住在一起时，从来不打小孩。如果

说挨打的话，也是他挨打，因为他好喝酒，伊娃(Eva)经常打他。

[12]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1990: A 39,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1991: A27.

第九章

- [1] See Devine's (in press) call – despite his postmodernism- for policy engagement in the field of critical, inner-city education.
- [2] Cf. Phillips (1990), Sassen (1991), Wacquant (1003), Wilson (1987).
- [3] Rainwater (1994), *Business Work*, August 15, 1994: 78-83.
- [4] Cf. Collins (1983), Wilson (1987),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3 (March).
- [5] Rivera-Batiz (1994).
- [6]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3 (March).
- [7] Blachman and Sharpe (1989-90): 154.
- [8] Smolowe (1994): 58, *New York Times*, July 9, 1994: A19. 俄罗斯在1993年超过了美国——美国则是在1992年超过了南非——成了世界上监禁率最高的国家(1994年9月13日《纽约时报》A8版)。
- [9]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 1994)在30年代就芝加哥街道犯罪这一问题提出了他关于“社会结构与失范”的观点。

后记

- [1]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3 (March).

参考文献

- Acosta-Belén, Edna. 1992. "Beyond Island Boundaries: Ethnicity, Gender,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Nuyorican Literature." *Callaloo* 15(4): 979-98.
- Acosta-Belén, Edna. 1993. "Defining a Common Ground; The Theoretical Meeting of Women's, Ethnic, and Area Studies." In Edna Acosta-Belén and Christine E. Bose, eds., *Researching Wome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p.175-86.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Althaus, F. 1991. "As Incidence of Syphilis Rises Sharply in the U.S., Racial Differentials Grow."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23(1): 43-44.
- Armstrong, C.P., E.M.Achilles, and M.J.Sacks. 1935. "A Study on Reactions of Puerto Rican Children in New York City to Psychological Tests."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 Becker, Howard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 Behar, Ruth.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 Benmayor, Rina, Rosa Torruellas, and Anna Juarbe, 1992. "Responses to Poverty Among Puerto Rican Women: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New York: Centro de Estudios Puertorriqueños, Hunter College. Report to the Joint Committe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Hispanic Issues of the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Latino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 Berlin, Gordon. 1991. "The Poverty Among Families: A Service Decategorization Response." New York: Manpower Demonstration Research Corporation. Photocopied report.
- Blachman, Morris J., and Kenneth E. Sharpe. 1989-90 (Winter). "The War on Drugs: American Democracy under Assault." *World Policy Journal* 7(1):135-63.
- Blumstein, Alfred, and Joel Wallman. 2000. "The Recent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Violence." In Alfred Blumstein and Joel Wallman, eds., *The Crime Drop in America*, pp.1-1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lton, Reginald P. 1922. *Indian Paths of the Great Metropolis*. New York: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Heye Foundation.
- Bonilla, Frank, and Ricardo Campos. 1986. *Industry and Idleness*. New York: Centro de Estudios Puertorriqueños, Hunter College.
- Bourdieu, Pierre. 198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gois, Philippe. 1989a. "In Search of Horatio Alger: Culture and Ideology in the Crack Economy." *Contemporary Drug Problems* 16(4): 619-49.

- Bourgois, Philippe. 1989b. *Ethnicity at Work: Divided Labor on a Central American Banana Plantation*. Studies in Atlantic History and Culture Ser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ourgois, Philippe. 1990. "Hypotheses and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Concealment in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The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Dynamics of the Census Undercount." *Ethnographic Exploratory Research Report #6*.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the Census, Center for Survey Methods Research.
- Bourgois, Philippe. 2000. "Disciplining Addictions: The Bio-politics of Methadone and Heroin in the United State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24(2): 165-95.
- Bourgois, Philippe, and Eloise Dunlap. 1993. "Exorcising Sex-for-Crack Prostitution: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from Harlem." In Mitchell Ratner, ed., *Crack Pipe as Pimp: An Eight-City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Sex-for-Crack Phenomenon*, pp.97-132.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Bowser, Benjamin. 1988. "Crack and AIDS: An Ethnographic Impression." *MIRA, Multicultural Inquiry and Research on AIDS* (Spring), 2(2): 1-2.
- Business Week*. 1994 (August 15). "Inequality: How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urts the Economy," pp.78-83, by Aaron Bernstein.
- Cabán, Pedro. 1993. "Redefining Puerto Rico's Political Status." In Edwin Meléndez and Edgardo Meléndez, eds., *Colonial Dilemma: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Puerto Rico*, pp.19-40.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Camp, Camille Graham, and George M. Camp 1998. *The Corrections Yearbook 1998*, pp.246,248. Middletown,: Criminal Justice Institute.
- Centro de Estudios Puertorriqueños, History Task Force, Hunter College. 1979. *Labor 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The Puerto 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ESAR FAX. 2001. "Current Cocaine-Positive Rates Among Male Arrestees Remain Dramatically Lower than Historic Peaks," no.10: 39.
- Chenault, Lawrence. 1938. *The Puerto Rican Migrant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91 (August 19). "New York City's Oases of Safety,"p.14, by Lucia Mount.
- Cimilluca, Salvatore. 1931. "The Natural History of East Harlem from 1880 to the Present." Master's thesis, New York University.
- Colburn, Forrest, ed. 1989.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Armonk, N.Y.: M.E.Sharpe.
- Collins, Sharon M. 1983.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Middle Class." *Social Problems* 30(4): 369-82.
- Comfort, Megan 2002. "'Papa's House': The Prison as Domestic and Social Satellite." *Ethnography*, 3(4), 467-499.
-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 1956 (September 20). "Interim Report on Jefferson Site Service Pilot Project." Manuscript. File in Box 347 of the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 Archives,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 Concistre, Marie J. 1943. "A Study of a Decade in the Life and Education of the Adult Immigrant Community in East Harlem."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 Cook-Lynn, Elizabeth. 1989. "(Review) The Broken Cord." *Wicazn Sa* 5(2): 43-45.

- Cordasco, Francesco, and Rocco G. Galatioto. 1970. "Ethnic Displacement in the Interstitial Community: The East Harlem Experience." *Phylon: The Atlanta Review of Race and Culture* 31: 302-12.
- Corsi, Edward. 1925 (September 16). "My Neighborhood." *The Outlook*, pp.90-92.
- Covello, Leonard, with Guido D'Agostio. 1958. *The Heart Is the Teacher*. New York: McGraw-Hill.
- Davila, Richard D. 1987. "The History of Puerto Rican Drinking Patterns." In Merrill Singer, Lani Davison, and Fuat Yalin, ed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lcohol Use and Abuse Among Hispanic Adolescents*. Hartford, Conn.: Hispanic Health Council.
- Day, N. L., and G. A. Richardson. 1993 (September 1). "Cocaine Use and Crack Babies: Science, Media, and Miscommunication." *Neurotoxicology and Teratology* 15(5): 293-334.
- DaySpring Cards 2004. "DaySpring Donates 50 Millionth Card for Prison Ministry." <<http://www.dayspring.com/corporate/pr.asp?id=16>>.
- Dehavenon, Anna Lou. 1989-90. "Charles Dickens Meets Franz Kafka: The Maladministration of New York City's Public Assistance Programs." *New York University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17(2): 231-54.
- De la Cancela, Víctor. 1986.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uerto Rican Machismo: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Psychotherapy* 23(2): 291-96.
- Devine, John. *The New Panopticon: The Construction of Violence in Inner City High Scho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íaz Valcarcel, Emilio. 1978. *Harlem todos los días: Novela*. First edition. San Juan: Ediciones Huracán.
- Dietz, James L. 1986. *Economic History of Puerto Rico: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etz, James L., and Emilio Pantojas-García. 1993. "Puerto Rico's New Role in the Caribbean: The High-Finance/Maquiladora Strategy." In Edwin Meléndez and Edgardo Meléndez, eds., *Colonial Dilemma: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Puerto Rico*. pp.103-18.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Dorris, Michael. 1989. *The Broken Cord: A Family's Ongoing Struggle with Fetal Alcohol Syndrome*. New York: Harper & Row.
-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1988. "Crack Cocaine Availability and Traffic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Cocaine Investigations Section.
- Dumpson, James, 1951. "The Menace of Narcotics to the Children of New York: A Plan to Eradicate the Evil." New York: Welfare Council of New York. (Manuscript report, in Narcotics file, Box 370,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 Archives, Columbia Race Books, p.43.)
- Durk, David, with Arlene Durk and Ira Silverman. 1976. *The Pleasant Avenue Conne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Edin, Kathryn. 1991. "Surviving the Welfare System: How A F DC Recipients Make Ends Meet in Chicago." *Social Problems* 38(4): 462-74.
- Fahrenheit 9/11 2004. Directed by Michael Moore. DVD, 122 minutes. New York: Columbia Tristar.

- Farrington, David. 1991. "Childhood Aggression and Adult Violence: Early Precursors and Later-Life Outcomes." In Debra Pepler and Kenneth Rubin, eds., *The Development and Treatment of Childhood Aggression*, pp.5-29.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Fischler, Stan. 1976. *Uptown Downtown: A Trip Through Time on New York's Subways*. New York: Hawthorn/Dutton.
- Flores, Juan. 1993. *Divided Borders: Essays on Puerto Rican Identity*. Houston, Tex.:Arte Publico Press.
- Foley, Douglas. 1990. *Learning Capitalist Culture: Deep in the Heart of Teja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Fordham, Signithia. 1988. "Racelessness as a Factor in Black Students' School Success: Pragmatic Strategy or Pyrrhic Victor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3 (257): 293.
- Foucault, Michel 1981.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Random House.
- Frankel, Alison, and Lisa Freeland. 1990 (March). "Is Street-Level Enforcement a Bust?" *The American lawyer*, pp.100-9.
- Gans, Herbert J. 1991. *People, Plans, and Policies: Essays on Poverty, Racism, and Other National Urban Problem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nd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1992 (July). "Food Assistance Nutritional Conditions and Program Alternatives in Puerto Rico."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GAO/RCED-92-114.
- Glachello, Aida L. 1991 (March). "Selected Health Characteristics of Hispanic Children and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Fact sheet presented to the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Latino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Grantee meetings, Miami.
- Gibson, Margaret, and John Ogbu, eds. 1991. *Minority Status and School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mmigrant and Involuntary Minori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 Golub, Andrew, and Bruce Johnson. 1999. "Cohort Changes in Illegal Drug Use among Arrestees in Manhattan: From the Heroin Injection Generation to the Blunts Generation." *Substance Use and Misuse* 34(13): 1733-63.
- Guarnaccia, Peter J., Victor De la Cancela, and Emilio Carrillo. 1989. "The Multiple Meaning of Ataques de Nervios in the Latino Community." *Medical Anthropology* 11:47-62.
- Gunst, Laurie. 1995. *Born Fi'Dead: A Journey Through the Jamaican Posse Underworld*. New York: Holt.
- Harvey, David L. 1993. *Potter Addition: Poverty, Family, and Kinship in a Heartland Communi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Hebdige, Dick.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 Hooks, Bell.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Hunt, Robert C. 1971. "Components of Relationships in the Family: A Mexican Village." In Francis L. K. Hsu, ed., *Kinship and Culture*, pp.106-43. Chicago:Aldine.
- I Like It Like That*. 1994. Directed by Darnell Martin. 35 mm. 105 minutes. New York: Columbia Tristar.
- Institute for Puerto Rican Policy. 1992. "Puerto Ricans and Other Latinos in New York City Today:

- A Statistical Profile." Pamphlet.
- Institute for Puerto Rican Policy. 1994 (June). "Puerto Ricans and Other Latino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1993." *IPR Datanote* 16: 1-2.
- Jaggard, Alison.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 Janvier, Thomas A. 1903. *The Dutch Founding of New York*.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Katz, Michael. 1986. *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 A Social History of Welfare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Kelling, George, and Catherine Coles. 1996. *Fixing Broken Windows: 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 King, Ben E. 1961. *Ben E. King's Greatest Hits*. New York: Atco.
- Kisseloff, Jeff. 1989. *You Must Remember Thi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Koren, Gideon, Karen Graham, Heather Shear, and Tom Einarson. 1989 (December 16). "Bias Against the Null Hypothesis: The Reproductive Hazards of Cocaine." *Lancet* 2(8677): 1440-42.
- Lait, Jack, and Lee Mortimer. 1948. *New York: Confidential*. New York: Crown.
- Laviera, Tato. 1985. *Ame Rican*. Houston, Tex.: Arte Publico Press.
- Lee III, Rensselaer W. 1991. *The White Labyrinth: Cocaine and Political Pow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Lemann, Nicholas. 1991. "The Other Underclass." *The Atlantic* 268(6):96-110.
- Leonard, Caroline. 1930. "A Descriptive Study of Social Settlements of East Harle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ew York University.
- Levitan, Mark 2003. "It Did Happen Here: The Rise in Working Poverty in New York City."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A Comparative View*. David Halle ed. Pp. 251-26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vitt, Helen. 1965. *A Way of Seeing: Photographs of New York*, with an essay by James Agee. New York: Viking Press.
- Levitt, Helen, Janice Loeb, and James Agee. 1952. *In the Street* (motion picture).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 Lewis, Gordon K. 1963. *Puerto Rico: Freedom and Power in the Caribbea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Lewis, Oscar. 1966. *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ewis-Fernández, Robert. 1992 (December 2). "Ataques de Nervios or Panic Attacks: An Embodied Contestation of Puerto Rican Ethnicity." Paper prepared for AAA session on "Healing, Bodily Practices, and Caribbean Ethnicity," San Francisco.
- Macallair, Dan, and Khaled Taqi-Eddin. 1999. "Shattering 'Broken Windows': An Analysis of San Francisco's Alternative Crime Policies." San Francisco: The Justice Policy Institute.
- MacLeod, Jay. 1987. *Ain't No Makin' It: Leveled Aspirations in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Majors, Richard, and Janet M. Billson. 1992. *Cool Pose: The Dilemmas of Black Manhood in*

- America*.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 Marsh, May Case. 1932.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Churches in an Interstitial Area."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 Martinez-Alier, Verena. 1974. *Marriage, Class, and Col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uba: A Study of Racial Attitudes and Sexual Values in a Slave Socie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ayor's Committee on City Planning. 1937. "East Harlem Community Study." New York: East Harlem Council of Social Agencies.
- Meléndez, Edgardo. 1993. "Colonialism, Citizenship, and Contemporary Statehood." In Edwin Meléndez and Edgardo Meléndez, eds., *Colonial Dilemma: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Puerto Rico*, pp.41-52.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Meléndez, Edwin, and Edgardo Meléndez, eds. 1993. "Introduction." In *Colonial Dilemma: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Puerto Rico*, pp.1-18.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Merton, Robert K. 1994.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e Emergence, Diffus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a Sociological Concept, 1930s-1950s." In Fred Adler and William S. Laufer, eds., *The Legacy of Anomie Theory*; vol. 6 of *Advances in Criminological Theory*, pp.3-78.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Meyer, Gerald. 1989. *Vito Marcantonio: Radical Politician 1902-195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ohancy, Chandra Talpade. 1984 (Spring/Fall).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Boundary 2*, 12(3)/13(1): 333-58.
- Moore, Joan, and Raquel Pinderhughes. 1993. "Introduction." In Joan Moore and Raquel Pinderhughes, eds., *In the Barrios: Latinos and the Underclass Debate*, pp. xi-xxxix.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Morgan, H. Wavne. 1981, *Drugs in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1800-1980*.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Moynihan, Daniel P. 1965.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 and Research, U.S. Department of Labor.
- Nader, Laura. 1972. "Up the Anthropologist-Perspectives Gained from Studying Up." In Dell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pp. 284-311. New York: Pantheon.
- News day*, 1990 (October 29). "Pregnant Addicts, Aborted Funds," pp.8, 30.
-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85 (December). "The Puerto Rican New Yorkers: Part II-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1970-1980."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0 (September). "Community District Needs."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3 (January). "Citywide Industry Study: Labor Force Technical Report."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3 (March). "Socioeconomic Profiles: A Portrait of New York City's Community Districts from the 1980 & 1990 Censuse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93 (December). "Puerto Rican New Yorkers in

- 1990."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Population Division. 1992 (August 26). "1990 Censu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ors (Poverty Status, Unemployment Rate and Per Capita Income). New York City, Boroughs and Census Tracts. (Summary Tape File 3A)."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Photocopied Report.
-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Population Division. 1993 (February). "1990 Census: Industry Classifications of Employed Persons 16 Years and Over. New York City, Boroughs and Census Tracts. (Summary Tape File 3A)."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Photocopied Report.
-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les obtained through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n October 15, 1990, concerning the former Washburn Wire Company factory site.
-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Policy Development. 1988 (December 28). "Summary of Overcrowding in Authority Apartments." Photocopied manuscript.
-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Policy Development. 1989 (January 1). "Special Tabulation of Tenant Characteristics." Photocopied pages.
-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Policy Development. 1993 (January 1). "Special Tabulation of Tenant Characteristics." Photocopied pages.
- New York Daily News*. 1989 (January 23). "Violent Crime in the City: 1984-1988," p.18.
- New York Daily News*. 1989 (September 8). "Mob Boss Up to 175 Years," p.1.
- New York Daily News*. 1989 (October 18). "TV Center Finds Life Taxing," p.37.
- New York Daily News*. 1990 (July 10). "Toxic Cleanup Will Have to Wait," p.22.
- New York Daily News*. 1990 (October 19). "Devil's Playgrounds," p.1.
- New York Daily News*. 1990 (October 30). "Child's View of Hell Devil's Playgrounds," pp.1, 3.
- New York Daily News*. 1990 (November 19). "'She Had Sad Eyes': Abused, and Dead at 5," pp.5, 10.
- New York Daily News*. 1991 (August 13). "N.J. Corpse is 'Windows' Witness," pp.1-5.
-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946 (December 15). "Inquiry Focuses Spotlight on Ills of East Harlem," p.36.
- New York Post*. 1989 (April 11). "Babies Who Spend Their First Year in Jail," pp.5, 30-31.
- New York Post*. 1989 (May 4). "Calm After the Storm," p.4.
- New York Times*. 1893 (May 16). "Mafia's Code in New York: Italians Who Avenge Their Own Grievance in Blood," p.9.
- New York Times*. 1931 (May 3). "The East Side is Awakening to Its Glory of Olden Days," p.14, by R.L.Duffus.
- New York Times*. 1947 (January 29). "Marcantonio May Sue Wallander to Bar 'Harassing' Harlem Clubs," A4.
- New York Times*. 1957 (March 18). "Housing Projects Make Bitter D.P.'s," A1, by Charles Grutzner.
- New York Times*. 1957 (November 18). "Rao, Lanza Knew Public Officials," A1, by Emanuel Perlmutter.
- New York Times*. 1986 (June 15). "East Harlem TV Deal Unraveling," sec.8, p.6, by Anthony De Palma.
- New York Times*. 1987 (February 9). "Crack Addiction: The Tragic Toll on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B1, B2.

- New York Times*. 1987 (March 21). "Major Mafia Leader Turns Informer," A31, by Arnold Lubasch.
- New York Times*. 1987 (May 28). "Dangerous Until Proved Innocent," A22, editorial.
- New York Times*. 1988 (April 30). "Mob Role in New York Construction Depicted." A34.
- New York Times*. 1988 (October 14). "Salerno, Now 100 Years, Gets 70 More in Bid-Rigging Case," B3.
- New York Times*. 1988 (November 16). "Crackdown on Drug Sellers Is Expanded to East Harlem," A1, B5, by George James.
- New York Times*. 1988 (December 28). "Domestic Violence Arrests Quadruple in New York City," B3, by Celestine Bohlen.
- New York Times*. 1989 (February 9). "Destroyer of Families, Crack Besieges a Court," A1, B9, by Felicia R. Lee.
- New York Times*. 1989 (April 17). "Number of Mothers in Jail Surges with Drug Arrests," A1, A16, by Celestine Bohlen.
- New York Times*. 1989 (May 28). "Crack: A Disaster of Historical Dimension, Still Growing," A14, editorial.
- New York Times*. 1989 (May 31). "Attack on Crack: More Arrests, Fewer Long Sentences," B1, B3, by Felicia R. Lee.
- New York Times*. 1989 (July 3). "For Child Welfare Agency, Small Gains and Big Flaws," L21, L22, by Suzanne Daley.
- New York Times*. 1989 (August 11). "Link to Mafia Is Investigated in Union Deaths," B2.
- New York Times*. 1989 (August 25). "Black Youth Is Killed by Whites; Brooklyn Attack Is Called Racial," A1, B2.
- New York Times*. 1989 (September 29). "For Pregnant Addicts, A Clinic of Hope," B1, B2, by Howard W. French.
- New York Times*. 1989 (October 23). "Treating Kin Like Foster Parents Strains a New York Child Agency," A1, B4, by Suzanne Daley.
- New York Times*. 1989 (November 1). "Bush and Congress Reach Accord Raising Minimum Wage to \$4.25," A1.
- New York Times*. 1989 (November 16). "Police Kill Harlem Gunman; Drug Suspect Shot in Bronx," B2, by John T. McQuiston.
- New York Times*. 1989 (December 19). "New York's Sinking Child-Care System Awaits Help," B1, B4, by Suzanne Daley.
- New York Times*. 1990 (January 23). "Organized-Crime Turncoat Testifies in Gotti Prosecution," B3.
- New York Times*. 1990 (March 5). "New York City's Biggest Concrete Supplier Facing U.S. Inquiry," B1, by Selwyn Raab.
- New York Times*. 1990 (March 17). "The Instincts of Parenthood Become Part of Crack's Toll," A8, by Michael deCourcy Hinds.
- New York Times*. 1990 (March 23). "Trapped in the Terror of New York's Holding Pens," A1, B4, by William Glaberson.
- New York Times*. 1990 (May 8). "He Wore a Badge, Then He Sold It for Crack," A1, B10.

- New York Times*. 1990 (May 25). "Crack Babies Turn 5, and Schools Brace," A1, B5, by Susan Chira.
- New York Times*. 1990 (June 15). "AIDS Travels New York-Puerto Rico 'Air Bridge,'" B1, B4, by Bruce Lambert.
- New York Times*. 1990 (September 6). "Dollar Off in Heavy Selling on Talk of Fed Rate Move," D17.
- New York Times*. 1990 (October 19). "Addicted Parents' Children Pose Foster Care Challenge," B3, by Thomas Morgan.
- New York Times*. 1990 (November 4). "Youths Are Sought in Killing of a Homeless Man," A39, by James C. McKinley, Jr.
- New York Times*. 1991 (January 21). "Unions at Javits Center Are Accused of Abuses," B3, by Selwyn Raab.
- New York Times*. 1991 (January 26). "Girl, 13, Is Raped and Killed on Way Home from School," A27, by James C. McKinley, Jr.
- New York Times*. 1991 (February 13). "Bush View Upbeat on Economy: Recovery Expected to Begin in Summer in Economic Report," D1, by David E. Rosenbaum.
- New York Times*. 1991 (July 17). "Man Seized in Rape of 3-Year-Old in Public," B1, B4, by Lee A. Daniels.
- New York Times*. 1991 (July 28). "Informer Insists Bid-Rigging Testimony Was Truth," A29, by Arnold H. Lubasch.
- New York Times*. 1992 (March 29). "Collapse of Inner-City Families Creates America's New Orphans," A1, A20, by Linda Gross.
- New York Times*. 1993 (May 4). "6 Are Found Slain in a Harlem Home That Was Set Afire," B1, B3, by Ian Fisher.
- New York Times*. 1993 (August 8). "With Supply and Purity Up, Heroin Use Expands," A1, A18, by Joseph Treaster.
- New York Times*. 1993 (December 1). "Woman Lives, and Dies, for Her Family in East Harlem," A20.
- New York Times*. 1994 (February 18). "An Evolution in an Economy: Jobs in Thinking, Not Making," A1, A12, by Tom Redburn.
- New York Times*. 1994 (March 20). "Two Census Tracts, at the Extremes," A6, by Sam Roberts.
- New York Times*. 1994 (March 31). "Sharp Increase Along the Borders of Poverty," A8, by Jason DeParle.
- New York Times*. 1994 (April 21). "Using Fax Spells Arrest for Numbers Ring," A13, by Selwyn Raab.
- New York Times*. 1994 (June 10). "New York Officials Welcome Immigrants, Legal or Illegal," A1, B4, by Deborah Sontag.
- New York Times*. 1994 (July 3). "Women Doing Crime, Women Doing Time," E3, by Clifford Crauss.
- New York Times*. 1994 (July 7). "Excerpts of What the Commission Found: Loyalty over Integrity," B2.
- New York Times*. 1994 (July 7). "Giuliani Announces Assault on Quality-of-Life Crimes," B3.
- New York Times*. 1994 (July 9). "Billions for New Prisons? Wait a Minute," A19, by Philip B. Heymann.
- New York Times*. 1994 (August 30). "Researchers Find a Diverse Face on New York's Poverty,"

- A14, by Celia W. Dugger.
New York Times. 1994 (September 13). "More Inmates in the U.S. Than Ever Before," A8, Associated Press item.
- New York Times*. 1995 (February 20). "The Irish Revisit the Terrible 1840's," A4, by James F. Clarity.
- New York Times*. 2000 (January 19). "Widest Income Gap is Found in New York," B5, by Nina Bernstein.
- New York Times*. 2000 (September 28). "Effect of Prison Building on Crime Is Weighed," A16, by Fox Butterfield.
- New York Times*. 2001 (September 16). "Poverty Rates Fell in 2000, But Income Was Stagnant," A12, by Katharine Q. Seelye.
- New York Times*. 2002 (March 27). "Justices Rule Drug-Eviction Law Is Fair," A20, by Linda Greenhouse.
- O'Brien, Joseph, and Andris Kurins. 1991. *Boss of Bosses: The FBI and Paul Castellano*. New York: Island Books.
- Orsi, Robert A. 1985. *The Madonna of 115th St: Faith and Community in Italian Harlem, 1880-185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aredes, Américo. 1971. "The United States, Mexico, and Machismo."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 8(1): 17-37.
- Phillips, Kevin. 1990. *Wealth and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in the Reagan Aftermath*. New York: Random House.
- Pollitt, Katha. 1990 (March 26). "A New Assault on Feminism." *The Nation*, pp.408-17.
- Portelli, Alessandro. 1991. "Introduction." In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pp. vii-xvi.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Quintero-Rivera, Angel. 1984 (August 28-September 1).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Class in the Hispanic Caribbean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Puerto Ric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New Perspectives on Caribbean Studies: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and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Rainwater, Lee. 1994. "A Primer on U.S. Poverty: 1945-199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Working Paper #53.
- Rainwater, Lee, and William L. Yancey, eds. 1967. *The Moynihan Report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rovers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Ramírez, Rafael.1993. *Dime Capitán: Reflexiones sobre la masculinidad*. San Juan: Ediciones Huracán.
- Reed, Dorothy. 1932."Leisure Time of Girls in a 'Little Italy,'" Portland, Ore.: Published by author. (Copy available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Fayetteville.)
- Reinarman, Craig, and Harry L. Levine. 1989. "Crack in Context: Politics and Media in the Making of a Drug Scene. *Contemporary Drug Problems* 14(4): 535-77.
- Rhodes, Lorna 2004. *Total Confinement: Madness and Reason in the Maximum Security Prison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ivera, Edward. 1983. *Family Installments: Memories of Growing Up Hispanic*.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Rivera-Batiz, Francisco L. 1994 (April 22).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Puerto Rico, 1980-1990."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Consejo General de Educacion, Hato Rey, Puerto Rico.
- Rivera-Batiz, Francisco L., and Carlos Santiago. 1994 (April). "The Labor Market and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Puerto Ric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0-1990." Monograph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Puerto Rican Coalition, Washington, D.C..
- Robinson, Gregory J., and Jeffrey S. Passel. 1987 (April 30-May 2). "Evaluation of Coverage of the 1980 Census of Puerto Rico Based on Demographic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Chicago. (Available from the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 Rodríguez, Clara E. 1989. *Puerto Ricans: Born in the U.S.A.* Winchester, Mass.:Unwin Hyman.
- Rodríguez, Clara E. 1995. "Puerto Rican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James A. Banks and Cherry A. McGee Banks,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p.223-44.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and Macmillan.
- Rodríguez, Victor. 1992. *Eldorado in East Harlem*. Houston, Tex.: Arte Publico Press.
- Romo, Frank, and Michael Schwartz. 199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Revisited: Manufacturing and the Prospects for a Service-Based Economy." In Richard Swedberg, e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Sociology*, pp.335-73.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Rosaldo, Renato. 1980. "Doing Oral History." *Social Analysis* 4: 89-99.
- Rosenberg, Terry J. 1987. "Poverty in New York City: 1980-1985." New York: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 Department of Research, Policy and Program Development.
- Rosenberg, Terry J. 1990. "Changes in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Income Strategies of Poor Women in New York City." Madis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Discussion Paper #924-9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Rosenwaiké, Ira. 1983 (March). "Morality Among the Puerto Rican Born in New York Cit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4(7): 375-85.
- Rubinson, Karen. 1989. "Stage IA Documentary Study for the New York City 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ttee, CEQR #89-048M, Police Service Area #5 of the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ew York: Key Perspectives. Manuscript.
- S.,Tina, and Jamie Pastor Bolnick. 2000. *Liv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A Teenager's Survival in the Tunnels of Grand Central St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anday, Peggy R.1990. *Fraternity Gang Rape: Sex, Brotherhood, and Privilege on Campu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c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Koob, Saskia. 1986. "New York Cit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m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85-119.
- Sayad, Abdelmalek. 1991. *L'immigration ou les paradoxes de l'altérité*.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 and De Boeck Université.
- Scheper-Hughes, Nancy. 1992. *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epers, Erwin. 1949. "Puerto Rican Delinquent Boys in New York City." *Social Service Review* 23(1):51-61.
-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da Bonilla, Edwin. 1964. *Interacción social y personalidad en una comunidad de Puerto Rico*. San Juan: Ediciones Juan Ponce de León.
- Singer, Merrill. 1986. "Toward a Political-Economy of Alcoholism: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Anthropology of Drinking."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73(2): 113-30.
- Singer, Merrill, Freddie Valentin, Hans Baer, and Zhongke Jia. 1992. "Why Does Juan Garcia Have a Drinking Proble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14: 77-108.
- Smolowe, Jill. 1994 (February 7). "... And Throw Away the Key." *Time*, pp. 55-59.
- Smith, Robert. 1992 (April). "Mexican Immigrant Women in New York City's Informal Economy." Conference Paper #69. New York: Columbia-New York University Consortium,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 Stansell, Christine. 1987 [1982]. *Cit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tarobin, Paul. 1994 (June 18). "The Economy You Can't See." *National Journal*, pp.1407-10.
- Stringer, Lee. 1998. *Grand Central Winter: Stories from the Street*. Berkeley, Calif.: Seven Stories Press.
-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00. *Summary of Findings from the 1999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on Drug Abuse*. Rockville, Md.: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 Taussig, Michael. 1987.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homas, Piri. 1967. *Down These Mean Streets*. New York: Knopf.
- Thrasher, Frederic M. 1927. *The Ga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hrasher, Frederic M. 1932 (December). "Ecological Aspects of the Boys' Club Stud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6(1): 52-58.
- Thrasher, Frederic M. 1936. "The Boys' Club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1): 66-80.
- Tilley, Margaret Campbell. 1935. "The Boy Scout Movement in East Harlem."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 Tilton, Edgar. 1910. *The Reformed Low Dutch Church of Harlem, Organized 1660: Historical Sketch*. New York: The Consistory.
- Time*. 1946 (November 4). "Veto Vito?," pp.24-25.
- U.S. Census Bureau. (1990). *1990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Block Statistics (Summary Tape*

- File 1B*). CD-Rom. 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Data User Services Division.
- U.S. Census Bureau. (2001). *Money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60-213*, by Carmen DeNavas-Walt, Robert Cleveland, and Mark Roemer.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Van Dyk, Jere. 1990 (May). "Across the Line in East Harlem." *National Geographic* 177(5): 52-75.
- Vergara, Camilo. 1991 (March). "Lessons Learned, Lessons Forgotten: Rebuilding New York City's Poor Communities." *The Livable City* 15 (1): 3-9.
- Vergara, Camilo, 1991 (June 17). "The View from the Shelters: New York's New Ghettos." *The Nation* 252(23): 804-10.
- Village Voice*. 1990 (April 3). "Pregnant Addicts Turned Away," pp.11-12, by Jan Hoffman.
- Wacquant, Loïc. 1993a. "Décivilisation et démonisation: La mutation du ghetto noir américain." In Christine Faure and Tom Bishop, eds., *L'Amérique des français*, pp.103-25. Paris: Editions François Bourin.
- Wacquant, Loïc. 1993b. "Urban Outcasts: Stigma and Division in the Black American Ghetto and the French Urban Periph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366-83.
- Wacquant, Loïc. 1994. "The New Urban Color Line: 'The State and Fate of the Ghetto in Postfordist America.'" in Craig J.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231-76.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Wacquant, Loïc. 1999. *Les Prisons de la misère*. Paris: Éditions Raisons d'Agir.
- Wacquant, Loïc. 2000. "The New 'Peculiar Institution': On the Prison as Surrogate Ghetto." In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4(3): 377-89.
- Wall Street Journal*. 1989 (July 18). "Born to Lose: Babies of Crack Users Crowd Hospitals, Break Everybody's Heart," A1, A6, by Cathy Trost.
- Ward, David. 1989. *Poverty, Ethnicity, and the American City 1840-1925: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lum and the Ghett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Edward Huntington, M.D. 1914 (February 7). "The Drug-Habit Menace in the South." *Medical Record* 85:247-49.
- Williams, Terry. 1992. *Crackhouse: Notes from the End of the Line*. New York: Addison-Wesley.
-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Aldershot, U.K.: Gower.
- Wilson,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lf, Eric. 1956. "San José: Subcultures of a 'Traditional' Coffee Municipality." In Julian Steward, ed., *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 pp.171-264.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Wolf, Eric. 1990. "Distinguished Lecture: Facing Power-Old Insights, New Question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2(3): 586-96.

中文版后记

失业虐待的机制性恶化

邮件格式：

From: Jasmine Gomez <smiley9@hotmail.com>

To: bourgois@dahsm.uscf.edu

主题：问候

近来可好？好长时间没收到你的信了！！！！！！就想写信给你问声好，并告知你，我们又添儿子了。他的名字叫普莱米提沃·“普莱姆”·伽西雅，7月14日出生，重6.13磅……祝愿你和儿子一切都好！

另：

妈妈让你打电话给她，因为她把你的书送给我在狱中的哥哥一本。他们以各种理由没收了你的书，并把他关进禁闭室。他们还想调查书作者……所以她想和你谈谈，并帮她为我哥找一些文件。谢谢！

现在距贾丝明（普莱姆的性伙伴）写这封邮件给我的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她如今又多了一个名叫“力力”的小男孩，成了一位骄傲的母亲。贾丝明的哥哥大布莱尔在联邦安全监狱里再次被关了单独监禁，但这次不是因为我的书，而是因为打群架。联邦监狱的官员们针对我的书的调查，最终证明是个假警报。或许是因为他们读过此书，并认同其中的学术批评观点。本书出版后，我告诉普莱姆，我有点担心本书的政治观点趋向于对“不足道的穷人”的尊重时，他说：“不是我不尊敬你，菲利普……你尽可以随意写我们，根本没人去读这类书，至少我认识的人中没人会去读。”埃斯皮朗泽（贾丝明的母亲）很是善良——没准她只是想讨好我而已——她说她那因团伙杀人罪被多次判终身监禁的儿子大布莱尔，“因为此书还得到了敬重。人们告诉他，‘嚯，不知道你家原来还是这样子的’”。我猜想，布莱尔那些满怀敬

畏的监狱伙伴们，可能是受本书封面上那张照片的误导，照片上展示的是一个装有金银珠宝的箱子，书出版时还有“拉丁国王”的徽章（我和摄影师苏珊·梅斯拉斯都不知道此事）。90年代以来，“拉丁国王”是指监狱里有权势的波多黎各人团伙。

2005年夏天，我最后一次拜访哈莱姆东区。我问普莱姆，在本书意大利语版的后记中我该写些什么，他说：

普莱姆：告诉他们我不再买卖毒品了，现在搞房子维修……也干一些婆婆妈妈的家务活。说实话，菲利普，我永远也不想再碰女人了，照看孩子实在太辛苦。一个哭着要奶瓶时，另一个要换尿布。我基本上做不到同时喂他们吃饭，并使他们在一起时相安无事。早上我连咖啡都不喝了，我知道，那会让我对孩子失去耐心的。

我想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弥补亏欠另外两个孩子的（用手指着在电视机前蹒跚学步的两个男孩子）。我没有为两个大儿子干过什么事，我欠他们的太多，我不会忘记的。

普莱姆：不过，我的儿子们还都不错。二儿子托托不怎么样。他和他妈住在康涅狄格州。他可是个天才，认识芝麻街所有的门牌号。

本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孩子，都赶上了经历美国城市贫穷这一趋势。事实证明，当下的历史时代依然如旧。冷战后期，军事帝国观念日益约束爱国志士的物质活动和意识形态观念，并把守纪的军人和正义的牺牲者锻造成投身正义斗争的爆破弹药。与此同时，公司的垄断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全球化成了军事干涉、市场经济导致的贫穷和生态破坏的代名词。用马克思的话说，世界人口以前所未有的大比例失业。越来越多的人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部门中的剩余人。因而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失业虐待理论（lumpen abuse），来解读从宏大机制到精神动力等多重相互关联层面上操纵野蛮行为的复杂性。世界上唯一一个军事和经济超级强国中迂腐的失业人员，被迫过着一种封闭、竞争激烈、人与人暴力相抗、情感焦虑和强迫吸毒的生活。

普莱姆：我的大儿子朱内尔一直过得不怎么样，不过现在好多了。他当兵了。

普莱姆谈到伊拉克战争中期大儿子自愿当兵的事时，显得很高兴，这让我颇为吃惊。因为我知道，小普莱姆刚满18岁，他反对战争，恨共和党，特别憎恶小布什。

普莱姆就儿子的事谈起了政治：

菲利普：你难道就不担心小普莱姆在伊拉克战争中被打死？

普莱姆：当然担心了。但我宁愿他战死，也不愿看见他死在这里（用手指着窗外）。如果他战死在伊拉克，他可是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死的。

菲利普：你有没有看新闻？他们正在轰炸。

普莱姆：即使死在那里，也比他一辈子出入监狱强。

菲利普：你想让他为布什的石油而死！

普莱姆：哎，伙计。你在说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电影《华氏 911》（*Fahrenheit 9/11*）吧。你认为他会讲真话？

菲利普：你认为民主党对待恐怖主义太软弱？

普莱姆：当然了。

停止辩论后，普莱姆向我解释了他儿子自愿当兵的事。选择去当兵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妥协，以免他在审判期间再犯新的“家庭暴力”而加重其突出的“犯罪指控”，这在少年法庭是容许的。他的儿子正面临漫长的监狱刑期。尽管普莱姆经过多次尝试，还是没能在合法经济中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多也就是在建筑工地上找一些临时工干，不过很少能持续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他偶尔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在申请工作时把我写成他的推荐人，但从来没有雇主联系过我。今年夏天，在一位房客的推荐下，一家建筑公司的公寓大楼雇用普莱姆修空调，时间是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普莱姆曾私下为这位房客非法买过一个有线电视分线盒。“我一小时挣 14.75 美元。如果我是正式工，每小时可以挣 20 美元。可我不得不辞职，因为一个月内他们开始扣罚我的工资，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我或许一文不名，但我不是奴隶。”康涅狄格州认定，普莱姆的社保号欠福利部门为他第二个儿子托托的母亲提供的 2 万美元的福利金。

普莱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没法去申请工作，除非把所有的福利金都还上。另外，我儿子和他妈妈还得不到我偿还的任何钱。他们的福利支票被中止了。他出生那会儿，我就不该给他们出示我的社保号，我应该直接把钱给他母亲才对。

好几次，普莱姆只好雇他的大儿子朱内尔帮忙，做转包合同的维修工，但他对

这一代年轻人职业道德的缺失颇感失望：

普莱姆：朱内尔为我干活时，特懒。我告诉他：“如果你真有份工作，他们肯定会解雇你，把你赶走的。”可他一点儿也不想下力气，根本就不在意。他行动太慢，干不成油漆活，一天下来才油漆一间壁橱和书架，还经常为工资的事和我闹别扭，总问我什么时候能给他涨工资。

我没有解雇他是因为他是我儿子。但工作结束后，我没再给他活干。几个月内他没事可干，直到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普莱姆为主要依靠贾丝明在银行的合法工作所得而生存感到很惭愧。“我坐在家里无所事事不太合适。我希望她不是个被迫工作的人。可要没了她的工作，我们一家人就得挨饿。回想起来，过去我一周可以挣好几千块，每天可以存200块，不费什么事——我年轻，笨嘴笨舌的！我告诉他们贾丝明的工作成绩最优秀，她被提拔为银行的出纳员，我现在无事可做，所以想待在家里照看儿子们。”

作为普莱姆、埃斯皮朗泽和贾丝明的老朋友，我可以对他们公开地表示同情。有时我会邀请女友劳利·哈特和我一起去哈莱姆东区，以便能听到一些不同的观点，因为她也是一位人类学家。她认定普莱姆很不错；埃斯皮朗泽是个“坚强、稳重——严重依赖药物的高雅的老妇人”；而贾丝明“看起来是个完全自立的人”。

我们两人共有的笔记本上，记录有许多普莱姆对埃斯皮朗泽临时照看的小孩很温柔亲切的事。我的一篇笔记上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工作了一天疲惫不堪的母亲，因生气出手打自己孩子，这位两岁半的孩子号啕大哭。普莱姆走过去，轻轻地把这位母亲推到一边，说：“别打他了，大妈。你没看见他在哭吗？”说完，他开始逗孩子玩，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另一篇笔记上记录了他叫我到公寓楼外面去吸烟，以免“伤害到孩子们”。有一次，普莱姆甚至打电话向我道歉，说“我刚刚把孩子哄睡着，我可能要迟到两小时。”

有时候我在想，从住在公建住宅工程公寓里的孩子们身上，人们或许能看见一缕希望之光，但我随即就省悟了。

2005年8月。实地记录：

一次和埃斯皮朗泽在电话中聊天时，电话里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不要那样跟我讲话，安东尼。我打死你。”这一刺耳的威胁声又重复了五次，一次比一次慢，一次比一次声大。“你想找死啊？”

埃斯皮朗泽中断了和我的谈话。在一片喧嚣声中，我听到她用温柔而坚定的声音向对面的屋子喊：“到奶奶这儿来。到妈咪这儿来吧，过来，帕皮托。”我知道，她正在努力保护邻居家一个1岁零8个月大的孩子安东尼。她亲切地叫他帕皮托。可她还是晚了，接着传来连续的拍打声，还有那位恼怒的母亲和孩子越来越大的尖叫声。最后，在嘈杂声中，我又听到埃斯皮朗泽在说：“过来吧，宝贝。到奶奶这儿来。”她放下了电话接筒，但我仍可听见她跑过房间的声音。

10秒钟后，电话那头传来强烈的咳嗽和吐痰声。埃斯皮朗泽怀里抱着安东尼回到屋中。他哭得太厉害，出不来气。她用不时中断的声音说着：“来奶奶这儿，帕皮托，到奶奶这儿来吧。”我听到啜泣的孩子钻到埃斯皮朗泽怀里。他哭得很厉害，抽噎着。最后总算把气换顺了。

埃斯皮朗泽回到电话旁，接着和我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每说半句话她都要停下来安慰怀里的孩子。“对，菲利普，昨天贾丝明被银行解雇了——来奶奶这儿来，帕皮托——她监管的一个女孩出了错——到奶奶这儿来吧，帕皮托——他们认定是她的错。来奶奶这儿吧，帕皮托。”

写本书时，我没有借用福柯关于生命权力或治理术这样的洞见，但在我2000年中期对哈莱姆东区造访的实地记录中，无法无天的身体和思想规诫事例随处可见。然而，心理分析学家、社会工作者和监狱里的看守们，在稳定这些快克贩子及其家庭方面却枉费心机。事实证明，生命权力针对失业人口的不均衡的效能，可能是冷战过后新自由主义时期一个主要矛盾：

普莱姆：我看过精神病医生五次。那些药让我觉得好多了……更有能力照看我的孩子了。但今天我没用药。事实上，我还要打电话取消今天的约定。

菲利普：他们给你吃什么药？

普莱姆：我忘了，但埃斯皮朗泽读过说明书。就是那些印在小纸条上几乎看不见的字。据说是专治精神分裂……有双效功能。[痴痴地笑着说]你相信这些废话吗？菲利普。

埃斯皮朗泽：他们把我看得很紧。有时认为我有自杀倾向，那都是因为神经太过紧张。我失去了三个宝贝。上个月我神经错乱，不得不去看急诊——一天犯了三次。我从布莱尔的一位朋友那里接到一个电话。他是个不错的人，只会讲西班牙语。他告诉我我儿子又被关了监禁。他们在联邦监狱里喜欢打弹子球玩，波多黎各人和黑人在监狱里打了起来，他们说是我儿子领的头。他在那里也得到了不少尊重。我想让你写写他，菲利普。

但现在我不能去见他，我不想带着布朗安斯托去，因为他只能隔着玻璃看到他爸爸，那会让他不安的。知道吗？布朗安斯托的智商很低很低，他们说他有智障……又有孤独症。每个周三我都带他去咨询。

菲利普：为什么要带布朗安斯托去探监？

埃斯皮朗泽：他喜欢去看他爸爸。我一般带60块钱零钱，这样他在探监室的机器中可以买吃的东西。还有20块，留着回来路上去麦当劳吃快餐。每两周我们可以乘坐从工程公寓楼区开往监狱的专门货车。大人50块，小孩40。但上一次，我们坐的那辆货车翻了两次。所幸没人受伤；第二天我全身疼得像散了架似的。

埃斯皮朗泽的同伴被女儿毒打了一顿，满脸都是可怕的瘀血。当埃斯皮朗泽告诉她如果自己的女儿这样打她她会杀了她，之后她就从公立医院集体治疗活动中被赶了出来：

埃斯皮朗泽：……或者把她关进上锁的心理治疗室……把她的手砍掉！精神病医生让我离开，因为（责骂的声音）“我们不治疗暴力事件。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但既然那个婊子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告诉了她，“你想让我成为伪君子，啊？”

你知道，菲利普。我有暴力记录。我曾刺伤过我前夫，但用的只是碎冰锥。他这个人疑心太重，是个酒鬼，经常打我。他甚至不让我出门，所以我儿子布莱尔在学校犯错时我顾不上管他。

现在我和前夫成了朋友。他来访时甚至还帮我刷锅洗碗。我告诉他喝酒会喝死的，还建议他省点钱去监狱看看他儿子。

他不理我的男友迈克。他俩假装彼此都不存在。但在我家，我可以随心所欲。我和男友一起生活了10年，我给他讲过我的从前，并告诉他不能再

重复以前那种糟糕的关系。但迈克老是辱骂我，还跑出去乱来，所以我打了他一顿。知道吧，我学聪明了。我的临床医生让他和我一起去治疗，还问我想不想见他，可我说了，我要杀了他。他害怕了，警察不得不开车把我送回家。

迈克现在蛮好的。他是个瘾君子，老是觉得饿，所以吃得很胖，但他也有不少长处。我喜欢和他在一起。

菲利普：他们现在给你用的是什么药？

埃斯皮朗泽：前几天他们换了处方。现在我服用的是 Ambien，但没觉得有什么效果。还有抗抑郁药 Serzone、Trazone、Buspar 和 Pralzone（一种镇静催眠药）。过去我还用过 Zyprexa（一种抗精神病药）。[笑了笑]有时候用可卡因。但那之前，我吃了五年的百忧解（Prozac）。

我的实地记录上记述有埃斯皮朗泽在服用百忧解那些年里的事。她当时就是凭借这种药来应对失去三个孩子的悲痛。第一个孩子死于 30 年前，是一个两磅重的早产儿。另一个一出生就死了，第三个死的时候只有 3 岁。埃斯皮朗泽刚开始时对这种药物治疗还挺满意。她随即停止了哭泣，一下子觉得好了许多，还告诉她的精神病医生她要重新回到以前的医生办公室做接待员的工作。

埃斯皮朗泽：可我的精神病医生说我还没有完全好。后来我的体重增加了 25 磅，还失去了性快感。最糟糕的是，在我女儿生孩子时，我连陪着她哭都做不到。于是我要求医生停止给我用百忧解。

当时，埃斯皮朗泽的女儿刚生下一个身体严重发育不全的孩子。婴儿的第一年是在医院度过的，接受过各类检查，还做了心内直视手术。现在就住在附近的一座公寓里，靠“各种器械”活着。

对于快克贩子们不守规矩的家属的身心，政府的确正在通过复杂的精神病疗法、社会服务、高科技药物疗法及法律手段进行干预，但福柯对现代生产性的规训权力与早期欧洲历史中惊人的恐怖行动和身体暴力所做的对比分析，在 21 世纪的今天，也许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达，如果考虑到失业虐待制度化这一事实的话。福利国家尚不是过去的附带现象，但新自由主义下的身体牵制政策、暴力和不平等现象却愈演愈烈。事实证明，21 世纪美国越来越严重的失业态势已经改变了福柯于 20 世纪 70 年代论述过的欧洲社会民主进程的路径（Foucault, 1981）。

诉诸法律一直是美国政府应对贫穷最强势的政策，但监狱却注重惩罚而忽视改造。所有快克贩子年少的儿子们，要么正在监狱服刑，要么刚刚假释；而他们的女儿们则与正在监狱里服刑或刚刚释放的年轻小伙子们打得火热。普莱姆的表兄刘易斯在其外甥朱内尔（凯蒂和菲力克斯的大儿子）因犯买卖快克“重罪”而被判7年半到15年刑期时，开了个玩笑。他在一大家子人面前，告诉他“欢迎加入本俱乐部”，但却没人能笑得出来：

菲力克斯：刘易斯说这话时，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是说，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进去过。但那不是什么好事。我在那里呆过三年，那足以让我改变。但我儿子朱内尔，已经在那里呆了六年，另外半年还是凭誓获释的。如今他又涉嫌另一个案子，他为什么就不学着点儿呢？

以前快克买卖点的老板瑞如今已年过半百，也“没有学好”，因法定强奸罪再次被拘捕，“因为侵犯一位14岁的女孩被关起来了”。凯撒同样被关入监狱，原因仍是他对妻子和继女的虐待。

刑罚而非让犯人改过自新这一制度的邪恶之处在于，好几代可怜的妇女和儿童过着失去和探访被关押的父亲／儿子／丈夫／情人的生活，而这些人暴力倾向和心理健康在关押期间则是每况愈下（Comfort, 2002; Rhodes, 2004）。

埃斯皮朗泽：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去狱中探望我儿子，我的心情很愉快。这种不错的感觉可以延续两个礼拜。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去看他，得等到三月份他从禁闭室被放出来。但我会永远等着去探望他的，除非我死了。不管他犯了什么罪——杀人犯——还是什么，他依旧是我儿子。他被关在禁闭室里，一个月只能打一次电话，之前一周可以打一次。监狱里给你测定时间，一次只能说15分钟。我和他讲话时，我总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想让他挂念我。他也很担心我，也装得很像，不想让我为他担忧。可呆在禁闭室里，让他很恼怒。我很郁闷。

跟我说这些话时，埃斯皮朗泽的眼睛一直怜爱地盯着客厅墙上一张Hallmark贺卡，上面用粗黑体字写着这样一行字：“对不起，妈妈。我爱你。”21世纪以来，美国最大的贺卡生产公司——Hallmark公司——每年在美国监狱和监禁所发行500多万张写有亲切的启发或宗教信息的贺卡（黎明贺卡，2004）。

本书发表后，美国管理穷人方面最大的制度政策变化就是1996年所谓的福利“改革”。有孩子的母亲，不管多穷，一生只能享受五年联邦政府的扶持。各个州和城市可以适当放宽福利发放的时间期限，但受益者必须参加工作福利或工作培训，这实际上降低了纽约劳动力市场下层人的实际收入，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Levitan, 2003）。但让我意想不到的，埃斯皮朗泽却向我保证：“这就不错了。他们取消你的福利之前，还给你一份工作。”她的其他亲戚中的妈妈们，也都极力赞赏纽约市官僚的福利部门被迫开展的充足的新工作培训活动，以便有资格继续领取联邦福利金。这些妈妈们说，她们更喜欢低报酬工作，而不愿领取低资金的福利。照看孩子的酬金有时可以直接付给家庭成员，特别受到青睐。比如埃斯皮朗泽的二女儿今年20多岁，有两个女儿（一个9岁，一个3岁）。她最近刚刚报名参加了一个由福利部门组织的相当于高中学历的培训活动，教她如何应用计算机和当厨师。她渴望有份“真正的工作”，梦想着“像普莱姆的姐姐们一样，搬到安全的郊区，不用过像在哈莱姆东区这样紧张的日子。还有，或许我的偏头疼也会好起来。”不幸的是，埃斯皮朗泽没有资格领取照顾女儿两个小孩的酬金，因为她在女儿工作培训期间还在领取心理健康残疾救济金。实际上，社保部门支付给埃斯皮朗泽的女儿一定的救济金，作为她母亲的药物治疗费用。但埃斯皮朗泽坚持说，9岁的布朗安斯托一旦“学会用钥匙开门”，她会“急切地想找份工作”。目前，埃斯皮朗泽还不能让布朗安斯托独自出门，“因为工程楼区里经常有人欺负他，叫他傻子，把他气哭。”

普莱姆今年40岁了。在他大部分朋友和亲戚眼里，他属于“原来那伙人”中比较理性的一个。在恶劣的环境下，他和埃斯皮朗泽都属于很理智的人。包括本书中大部分快克贩子在内，在几代人的大家庭里，埃斯皮朗泽是最为稳重和有资历的人。她说她是为了孙子、侄子、外甥和邻居家的孩子们而活的。她还喜欢办各种聚会，让以前所有的快克贩子们都来参加（当然是指那些还活着或没被关起来的）。聚会经常会持续到天亮，有的人喝得酩酊大醉，有的人吸可卡因——有时也有人吸食海洛因。但埃斯皮朗泽也有底线，“我告诉大家他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吃喝，但不能打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让我“帮忙摆平”。

普莱姆一个21岁的表弟刚从战场回来，医生说患有外伤后压力综合征。

普莱姆：他受到了惊吓！他还是个孩子就参加了入侵行动。他说自己再也不能升入天堂了。他说：“我干了坏事。”他知道自己用枪扫射，杀死了许

多人，看到好多人倒在路边。他说他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但他们的命令就是向每个人射击。太混蛋了！

福利是失业人口最大的消费对象。在监狱的阴影下，对于市中心贫民区的青少年来说，战争期间自愿服现役倒成了最公开的获取补贴、拯救自我的合法途径，如果不是向上层社会攀爬的话。

致 谢

如果没有哈莱姆东区我的朋友和邻居的开诚布公和慷慨大度，本书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为了保护隐私，我修改了每个人的姓名及地址。我要首先感谢本书中我称之为普莱姆的朋友。他自始至终关注本书，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指点。我从他对本书原稿六七遍的阅读和 / 或倾听后所做的评议、指正和探讨中受益匪浅。另一位我称为凯撒的主要人物，在本书写作初期，同样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凯蒂在我的整个实地考察过程中，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在本书写作后期，玛丽亚也提供了宝贵意见和道德支持。我在本书第二版后记中所提到的埃斯皮朗泽和贾丝明，为我在本书第一版出版后造访哈莱姆东区提供了诸多方便，让我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

我同样要感谢以下机构提供的慷慨资助：Guggenheim Found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Ford Foundation,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y Research, 美国人口普查局，以及圣弗朗西斯科大学的 Marilyn Boxer、Brian Murphy 和 Joe Julian。能够加盟人学研究院、亨特学院的西班牙葡萄牙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农业及城市规划学院，以及圣弗朗西斯科州立大学的城市学院和人类学系，我深感荣幸。当然，最应感谢的是我在圣弗朗西斯科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的任职身份，它为我提供了长期的资金和后勤保障，使我得以写就这本关于美国社会疾苦和不平等现象的书。

我要向 Mark Edelman、Robert Merton 及已故的 Eric Wolf 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花费大量宝贵时间对本书底稿的大部分内容做了详尽、具体的评点。但说起文本编辑时具有启迪意义的争论，无人能与 Loic Wacquant 的才华、精确和卓越的钻研能力抗衡。本书前半部分就是他在 48 小时不间断的疯狂编辑过程中重写出来的，只有他有这般的活力、清晰思路和敏锐，使得本书按时发行。其他许多朋友、学生、同事和导师都读过本书的底稿——至少听过本书的主要论点。在研讨会期间、课间、

正式会议之后，甚至在各种聚会上与他们的随意交谈，都给予我有益的启迪和思想。还有一些重要的反馈意见，尽管我没有在文本中吸纳，但我仍然感念他们的积极参与。据此，我要感谢已故的 Pierre Bourdieu，他的系列丛书使本书的法语版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在重现等级制度方面对符号权力实践的批评，为本书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灵感；我还要感谢 Karen Colvard, John Devine, Army Donovan, Eloise Dunlap, Angelo Falcon, Jerry Floersch, Charles Hale, Arthur Kleinman, Antonia Lauria-Petrocelli, Gloria Levitas, Roberto Lewis-Fernandez, Jeff Longhofer, Peter Lucas, Susan Meiselas, Jim Quesada, Clara Rodriguez, 已故的 Ulysses Santamaria, Sasskia Sassen, Nancy Scheper-Hughes, Carol Smith, Carl Taylor, Frank Vardi, Joel Wallman, Eric Wanner, Terry Williams, William Julius Wilson, 以及我的祖母，已故的 Peggy Regeler。

我更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系列丛书的编辑 Mark Granovetter。在我绝望于无法完成此书的关键时刻，他为我提供了大量评议和支持。那里的内部编辑们——Emily Loose, Russell Hahn, 特别是 Elizabeth Neal、Mary Child 和 Alia Winters, 也提供过切实的帮助。文字编辑 Nancy Landau 和 Phyllis L Berk, 审查出了本书中几十处出令我尴尬的错误，修正了诸多结构笨拙的句子，使我的研究增色不少，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质量。

没有 Harold Otto 和 Ann Magruder 在打字和情感上的支持和道德关怀，最初的手稿是无法完成的，他们与我肩并肩地度过了焦虑不安的几个月，但我们最终成为挚友。Russell Sage Foundation 的 Eileen Ferrer, James Gray, Clay Gustave, Pauline Rothstein, Madge Spitaleri, Camille Yezzi, 和 Adrienne Zikjlin, 为本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研和后勤保障。圣弗朗西斯科州立大学的 Thoreau Lovell 在工作时间之外，为我大开方便之门，很友善地提供了电脑使用和不时技术支持。人学研究院的 Florence Rivera Tai 的大力支持和友谊，我将铭记于心。

上高中时读过的 Piri Thomas 的 *Down These Mean Streets* 一书，让我第一次面对自己成长的城市里的贫穷、种族主义和毒品。这本书成了本书卓然萌生的种子。承蒙托马斯的允诺，我有幸把他读完本书后发给我的传真内容附在前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会终生感谢 Charo Chacon-Medez, 她从哥斯达黎加直接移民到哈莱姆东区，在我科研项目刚开始时与我结婚。我们一起住在街区的那些日子里，她给予了我难以估量的帮助。我为自己长年累月呆在街道上和快克

买卖点而给她带来的焦虑和担忧表示歉意，并希望这不是我们如今分手的原因之一。如果是，我将为此深表遗憾。我们的儿子埃米利亚诺（楠诺）热爱哈莱姆东区。他在这里从没受过任何来自街道的威胁。在我们还没有人身保险时，离我们居住地只有几个街区远的一家自由诊所的一位鲁莽的实习医生，诊断他为大脑性麻痹。我猜想，楠诺如今超凡的自信心和社交能力，就是从街区里那些粗暴的街道混混那里得到的尊重中锻造出来的。他学着用自己的学步车，骄傲地穿行于布满快克瓶的破烂的人行道上，感化了那里每个人的心。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跌跌撞撞、时时遭遇挫折和沮丧的过程中，楠诺展现出了只有两岁小孩才能感知的生活的迷人乐趣。他眼中闪现的明澈光亮，在他逐渐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心存感念、同情身边多数人的少年的十几年里，一直影响着我。

我的父母在本书的调研和书写过程中也给予我莫大的帮助。我明白自己深受母亲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每个工作日里在南布隆克斯从事写作时违反种族隔离制度的事实的影响。同样，我也从作为一名纽约人、成长于双重文化之家的父亲的经历中受益匪浅。他对美国文化“典型的法国式”直言不讳的批评，特别是他对纽约市种族主义和阶级不平等现象的深恶痛绝，成了我们这群深受美国冷战高峰期意识形态观念影响的人的一剂良药。或许是在 1944 年 6 月 7 日逃离奥斯威辛 I.G. Farben 集中营的事实，让我在有生之年有了实录自己家乡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的决心。或许是年少时我们共享一根烟时他告诉我的“我是军营里拿面包换烟抽的几个傻瓜之一”，让我开始对烟瘾变得异常敏感。更重要的是，我父亲一直以来对驻扎于奥斯威辛毒气室顺风处的官兵，包括他自己，在疯狂大屠杀时期对焚烧人尸的气味要么麻木不仁、要么拿此开玩笑的卑微的耿耿于怀，激发了我写这本关于世纪之交美国种族隔离制度日日狂暴的书。

2002 年 8 月

于加利福尼亚大学

译后记

菲利普·布儒瓦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医学系的知名教授，是首位深入哈莱姆东区贫民窟毒品贩子内部，进行长达数年的社会调查研究，并与那些“亡命之徒”成为朋友的人类学家。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广博的爱心，凭借自己的胆略雄才，依据翔实、鲜活的实地考察事例，给世人展现了美国地下经济这一隐形的世界，以及隐藏其后的强大的社会机制原因。

本书的翻译过程持续在中国人同悲同喜的2008年。在冰雪灾难和汶川大地震举国泣血锥心之时，在奥运会成功举办和中国人首次太空漫步世界华人同庆之日，译者都没敢过多地迷恋于电视与网络讯息。合上这本厚重的书，好像结束了一次喧闹久长的谈话。轻松得意之余，也有一些淡淡的失落和不情愿。书中大段大段的对话记录，让译者时时把翻译的过程幻化成超越时空的谈话，渐渐觉得自己也像本书作者一样，和这些为了尊严而挣扎在哈莱姆东区市中心贫民区的波多黎各毒贩，交上了朋友，成了知己。在一次次透着坦诚和仁爱的谈话中，书中人物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文化习俗、生活经历、社区邻居、家人朋友、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晒曝出来，让译者迅便地了解到他们的苦与痛，喜与悲，他们的无奈、希冀和梦想，他们身处社会边缘和生活夹缝中的坚韧和奋斗，以及造成其当下生活、生存、生命态势的美国社会机制缘由。

如果说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的小说，揭示的是纽约市哈莱姆区“隐形”的美国黑人的生活片断的话，那么，本书则让我们看到一个被遮掩在浮华、躁动的大世界里的隐形的小世界。如果说道格拉斯、马丁·路德·金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是在为“他们的人民”求声音、求权利、求自尊、求自由的话，白人社会学家布儒瓦，则是站在人类学的高度，通过对美国制度化的种族隔离现象的透析，张扬了对人、对人类、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在后殖民话语中，飞散不仅表述了离乡背井的状态，更传达了一种强烈的对心

理及精神“家园”的追求。对于那些有着飞散经历的民族来说，需要栖息的何止是他们失所的身体，更有其游离的灵魂与精神。身处纽约繁华世界的褶皱中、社会边缘地带的波多黎各人，不仅需要寻找赖以生存的工作，更需寻找空寂的精神的栖息地，寻找能反证自我身份的尊严。在主流社会找一份合法、稳定的工作是其几代人的梦想，但低工资、低人格、低尊严又使其心力交瘁，不惜用吸毒麻醉自我。地下经济中的快克买卖暂时减缓了囊中的羞涩，但同时也带来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惊慌和焦虑，家破人亡与饱受牢狱之苦成了大部分人的最后归宿。可悲的是，他们却往往无知于社会机制的罪恶，把怨恨、指责和暴虐的矛头指向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和自己的内心，所以自残、自毁和残虐身边的人成了他们不得已的选择。如今，海洛因和快克买卖仍以上亿美元的交易额和其特有的致命性，危害着市中心贫民区的家庭，还有这些家庭中“孩子的孩子”。这群合法经济中的局外人，依然被纠缠在有利可图的毒品经济、发展繁荣的监狱制度、困顿的毒瘾，以及时时发生在彼此间的暴力之中。这是怎样的一个街区、怎样的一个社会、怎样的一个国家！

在本译后记画上句号的时候，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走马上任。作者在汉语版的后记中感叹“从哈莱姆东区年青一代人身上，看不到希望的曙光”，那么，暂且让我们以卑微的身份，寄望于这位少数族裔总统能够力挽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文化狂澜”，惠泽书中这群寻求尊严的朋友及其家庭，如果不能改善他们生活的本质的话。

在“绪论”的注释20中，作者曾说过自己“无法表达”某些夹杂着西班牙语和波多黎各土话的尴尬。其实面对这样一本轰动全球的学术著作，翻译过程中译者也时常遇到一些生动有趣的语句，苦于找不到满意的汉语词句对应而辗转反侧，忐忑不安，唯恐漏掉作者的妙笔而对不起读者的期待。所以本书的翻译大多采用直译，部分不得已的变通也旨在准确表达作者的原意，以尽力保持原著的面貌，尊重读者的理解权利。

作者还透露，他已经删除了一些可能会被视作色情描写的事例（见“绪论”注释24）。但书中仍有部分段落和语句，对于生活在不算太开放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译者来说，还是无法译成书面语，所以个别地方略有删节（删去了六句话），好在不影响这本学术著作的旨要，敬请读者谅解。对于译文中欠妥当的地方，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作付梓之时，我要特别感谢北大出版社的于海冰女士，是她的介绍和牵线，

我才得以接触到这本社会学方面的巨著。很欣赏她的睿智、聪慧和真诚，所以在美丽春城的短暂相处后，我把她列入永久的朋友名单。我更要感谢责任编辑徐文宁先生的信任和不时的鼓励，徐先生每次迅捷的邮件答复让我印象深刻。

我还要特别感谢河南大学外语部资料室的向荣老师。她在身体的特殊时期帮忙校读了译稿，并对语言生涩之处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党京川和女儿党涵博。他们的理解、支持和关爱，让我在大半年内释然逃避了许多责任和义务。一家人茶余饭后关于某个精确的表达方式的辩论和争议，为我繁复的翻译过程平添了许多温馨。

译 者

2009年2月16日

于河南大学仁和小区